



尼雷尔文选

第一卷

自由与统一

1952~1965

[坦桑] 朱利叶斯·尼雷尔 著

韩玉平 译

沐涛 译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尼雷尔文选

第一卷

自由与统一

1952-1965

[坦桑] 朱利叶斯·尼雷尔 著

韩玉平 译

沐涛 译校

本套书由教育部对非合作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本套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雷尔文选. 第1卷, 自由与统一: 1952~1965/(坦桑)尼雷尔著; 韩玉平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675-3168-0

I. ①尼… II. ①尼…②韩… III. ①尼雷尔(1922~1999)—文集②政治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203 号

尼雷尔文选第一卷(1952~1965)

自由与统一

著 者 [坦桑]朱利叶斯·尼雷尔
译 者 韩玉平
译 校 沐 涛
策划组稿 王 焰
项目编辑 王国红
审读编辑 吴飞燕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26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168-0/K·427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东非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任：童世骏

副主任：任友群 沐 涛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树哲 艾周昌 任友群 李安山 刘鸿武

沐 涛 张宏明 俞 斌 洪永红 舒运国

童世骏

《尼雷尔文选》(四卷)

总策划：任友群 沐 涛

统稿人：沐 涛 王 磊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简历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1922年出生于坦噶尼喀维多利亚湖畔穆索马附近的布蒂亚马村,其父尼雷尔·布里特是瓦扎纳基部落的首长。

尼雷尔先就读于穆索马的一所小学,后来进入坦噶尼喀中部的塔波拉读中学。在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学院^①学习两年后,返回塔波拉,执教于圣玛丽学校。1949年他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1952年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从爱丁堡回到当时的坦噶尼喀托管地后,尼雷尔到达累斯萨拉姆附近蒲谷村的圣弗朗西斯学校任教,并在坦噶尼喀立法议会担任过短期临时委员。

1954年7月,尼雷尔成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创始人,并被选举为该民族主义政党的主席。1955年在面临教书还是从政的抉择时,他选择了后者。1957年7月他再次接受了立法议会议员的提名,但同年12月愤而辞职。

1955年尼雷尔到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发言,1956年在联合国第四委员会发言,并于次年再次在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发言。

1958年在坦噶尼喀的首次大选中,朱利叶斯·尼雷尔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在1960年的第二次大选中再次当选。此时坦噶尼喀总督要求尼雷尔组建该国首届部长委员会,尼雷尔成为第一任首席部长。

1961年5月,在当年3月召开的立宪会议之后,尼雷尔宣誓成为首任总理,1961年12月坦噶尼喀独立,6周后为了弥合民族主义运动和新建立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尼雷尔辞去总理职务。

在决定把坦噶尼喀建立为一个共和国之后,朱利叶斯·尼雷尔被提名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竞争对手仅获得大选总票数的3%。1962年12月9日,朱利叶斯·尼雷尔宣誓就任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入住官

^① 当时英国在东非殖民地唯一的大学。——译校注

邸“议会大厦”(即原来的政府大厦)。

1964年4月,朱利叶斯·尼雷尔签署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协议后,成为新成立的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后改称坦桑尼亚)总统。

1965年9月30日,尼雷尔获得人民的极大信任,再次当选总统,任期5年。在大选中他获得了250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96%。第二天,即1965年10月1日,在达累斯萨拉姆国家体育馆举行的全民盛大仪式上,朱利叶斯·尼雷尔就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自序

我们国家的构建是集体努力的结晶。事情本应如此。本书的问世也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借此机会,我想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坦噶尼喀人民,然后是坦桑尼亚所有人民。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为我提供了灵感、鼓励和信心。

我要特别感谢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千上万的成员,以及非洲—设拉子党^①的成员;感谢我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同事。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保证我们能共同为未来做出努力。

在此不可能一一细数那些我要感谢的人的姓名。但是我必须要提到琼·萨科瑟尔比小姐、简·威尔逊夫人、露西尔·豪威尔夫人和琳恩·珂塔姆夫人。在我准备这些演讲和文章、在准备本书时,她们替我打印了文稿。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私人助理琼·威肯。本书的成形绝对离不开她对我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那些善良的编辑和出版者们,他们允许我把已经发表在他们刊物或书籍上的文章用到这本书中;感谢新闻界和其他机构的摄影师们允许我们在本书中使用他们拍摄的照片。

最后,我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感谢他们的耐心和坚持,使本书得以完成。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
1966年2月

^① 1957年,由桑给巴尔非洲人协会和桑给巴尔设拉子协会合并而成,桑给巴尔独立后成为执政党。1977年该党与坦盟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革命党。——译校注

译 序

朱利叶斯·尼雷尔(1922—1999年)是坦桑尼亚“国父”、共和国首任总统、非洲统一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当代非洲一位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政治家,在坦桑尼亚被尊称为“姆瓦利姆”(斯瓦希里语,意为教师、导师),在国际社会被称赞为争取自由的先驱、清正廉洁的非洲贤人。他一生追求以“自由与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他一生追求非洲解放与统一,他的思想成为非洲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922年4月,尼雷尔出生于坦噶尼喀西部维多利亚湖附近的布蒂亚马村的一个酋长家庭。他12岁时到距家40公里的穆索马上小学,用了三年时间学完了四年课程。之后,他去了坦噶尼喀中部塔波拉的一所中学学习。1943年,他获得奖学金,到邻国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学院(今麦克雷雷大学)学习。1945年毕业回国后,他在塔波拉的圣玛利亚学院讲授生物和历史。1949年2月,他再次获得奖学金,成为坦噶尼喀第一批赴英国留学的学生,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经济和历史。1952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圣弗朗西斯学校任教,并很快投身于民族独立运动,加入了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后当选为主席。1954年7月,他将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任主席,同时辞去了在学校的教职,专事政治活动。1955年、1956年和1957年,他三次前往美国纽约,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和第四委员会慷慨陈词,宣传独立主张,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了坦噶尼喀民众的诉求。1960年9月,坦噶尼喀建立自治政府,尼雷尔任首席部长。第二年坦噶尼喀宣布独立,他就任总理。1962年共和国成立后任总统。1964年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尼雷尔又被选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在1970年、1975年和1980年的三次大选中连任总统。1977年2月,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桑给巴尔的非洲—设拉子党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执政党——革命党,尼雷尔任党的主席,直至1992年。

在担任总统期间,尼雷尔极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主张采取一党制下的民主体制,探索“乌贾马”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倡导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和实现非洲的整体解放,是白人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的坚定反对者,并极力推动非洲的统一运动。1982年2月,他荣获了第三世界基金会授予的“第三世界奖”。1985年11月,尼雷尔主动辞去总统职务,由姆维尼继任。1999年10月14日,尼雷尔因病情恶化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77岁。

尼雷尔一生著述甚丰,从1949年留学英国起,就开始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还将莎士比亚的《朱利尤斯-凯撒》和《威尼斯商人》译为斯瓦希里文。这里呈现给各位读者的《尼雷尔文选》(四卷),是分别译自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自由与统一》、1968年出版的《自由与社会主义》、1973年出版的《自由与发展》和2011年出版的《自由与解放》。每一本都是节选自尼雷尔的公开演讲或文章,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段尼雷尔的主要追求和思想主张,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他的建国主张、治国理念、经济政策、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思想、对外政策,以及他的“中国观”,是我们深入了解尼雷尔思想、现代坦桑尼亚的发展和中坦关系,乃至20世纪下半叶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泛非运动、世界不结盟运动和南方委员会的重要资料。

在两年多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国际交流处、社科处和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翻译也得到了国内非洲学界同仁们的支持,中国政府前非洲问题特使刘贵今先生,非洲问题专家舒展大使和李松山、韩蓉夫妇,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和张忠祥教授都对此书的翻译给予了鼓励和帮助;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Joseph Lawi 博士和 Muhidin Juma Shangwe 博士帮助翻译了书中涉及的一些斯瓦希里语的词句。第四卷后的译名对照表由陈金龙和王华协助完成。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教育部对非合作专项基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的支持。

因翻译时间较紧和译者水平所限,书中肯定尚存许多不足之处,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沐 涛

2015年4月

前 言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①诞生于1954年7月，坦噶尼喀现代政治发展也从此真正开始。但这个在很短时间内就集聚力量，并迅速达到基本独立的目标的组织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的成功也不能归因于非洲这一部分人民的特殊能力或美德。

实际情况是历史条件垂青坦噶尼喀：曾经是受英国管辖的托管地，政治组织的基础是一些享受极少福利的民众和部落组织，国内缺乏总体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当地不存在强大的既得利益支持保留殖民主义或特权。此外，在坦噶尼喀全境，多数人——尤其是男人，都懂斯瓦希里语，没有一个部落能够在规模、财富和教育方面控制其他部落。

这些因素为有组织地联合要求自治和独立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民族自由——uhuru(乌呼鲁)不是一条复杂的原则，坦盟最初的几位发言人不需要向听众做出辩解，而需要向他们解释民族自由与他们生活的关系，并让他们充分相信可以通过坦盟提出的方法来实现这一自由。

第一项要求——自治并不难。人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很难认可他们自己与其他人的平等权；很容易向他们解释殖民主义的现状是对人们平等权的否定，而这种不平等带来了社会特权。在坦噶尼喀，第二项要求——独立在一开始就比较难。反对德国殖民者的赫赫起义^②和马及马及^③起义以及殖民者对起义的凶残镇压在我们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征服我们的德国殖民者被英国人打败，后者接着统治这里。人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问道：“没有枪我

① 在以下原文中，该党被简称为坦盟，TANU。——译校注

② 1890—1898年，坦噶尼喀南部赫赫族人反抗德国殖民者的起义。——译校注

③ 1905—1907年，坦噶尼喀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德起义。“马及”在斯瓦希里语中为“水”之意。——译校注

们怎么能获胜？我们如何能保证赫赫起义和马及马及起义的悲剧不再重演？”因此，坦盟有必要在一开始就要使人民了解，和平争取独立的方法是可行的，是能取得成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人民是懦夫，特别喜欢非暴力行动；不，他们知晓如何战斗；他们曾经被打败并受到无情的镇压。因此，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想了解为什么坦盟认为我们可以不用武器就能获胜。

这些因素决定了坦噶尼喀在独立斗争中采取何种策略。坦盟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拘泥于部落问题，抛开部落主义和宗教偏见，构建一个真正的国民意识，建设一个合众国。坦盟的这个设想实现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坦噶尼喀人民的宗教信仰不尽相同，因此坦盟很容易陷入宗教仇恨的陷阱。但是坦盟没有落入陷阱，这要归功于本国的宗教领袖，尤其要归功于沿海地带的穆斯林，而坦盟起家于沿海地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本党审慎灵活的策略才使得个人的宗教信仰从未被政治争端所批评或利用。但也不能说在坦噶尼喀的所有地方，坦盟的官员总是以最正确、最有远见的方式，最合乎民族运动的道德基础行事。国家的落后意味着坦盟的多数官员可能几乎没受过教育或没受过正规教育，他们并不总能明白自己的行为或党的政策的长期影响。1954年殖民政府的《6号通告》规定，任何公务员职位都不能由坦盟的党员担任，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同时，坦盟还存在一个巨大的财政问题：由于多数党员是佃农或自给自足的农民，实际上没有党员的收入能够达到所得税征收标准。但是，坦盟最大的政治问题是避免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或种族组织。因为在1963年1月前，坦盟成员受到严格的种族限制。

在坦盟成立时，已经存在一个欧洲人协会、几个亚洲人协会和一个后来被坦盟代替的非洲人协会。因此，在这种种族隔离的殖民地社会中，坦盟很自然就成为一个非洲人的组织。但是，在形式上可以避免完全把成员限制在非洲人的圈子内；实际上，1956年成立的坦盟青年团就没有这么做——尽管独立前该组织的非非洲人成员屈指可数。坦盟只接收非洲人作为成员（后来规定只要一方父母是非洲人即可）的规定是一个必要的政治决定，因为在非洲人社区中普遍缺少自信心。阿拉伯人长年累月地抢掠奴隶，而后是欧洲人的统治，使得我们的人民对自己的能力有很大怀疑。这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试图摧毁被统治者的信心，因为这样会帮助他们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坦噶尼喀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在坦噶尼喀还是在别的地方，压

迫与外来统治最大的罪行是对被压迫者的心理影响。因此，任何革命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建人民的自信，所以我们很清楚多种族的坦盟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人民中的很多人会认为，独立运动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应归功于我们的优势和那些非洲人党员的帮助。只有通过创立并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才能在当时的坦噶尼喀重建人民的自信，才能使人们相信坦盟真正是“我们自己的组织”。因为上述原因，坦盟成为一个种族性的组织；但从一开始，该组织就争取种族平等。

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可以说坦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争取平等权的。但在50年代结束时，坦盟就受到了考验。那些声称为自己争取平等权的人愿意接受事情的另一面——争取其他人的平等权吗？

不可避免地，少数坦盟成员会有较深的种族歧视，缺乏基本的自信使得他们没有经受起这场考验。此外，不可避免地，还有一些人出于贪婪与嫉妒的心理，才在独立的过程中加入坦盟并参与党的活动。这种人现在不仅在坦噶尼喀有，在世界各地也都有。但坦噶尼喀的人民大众和坦盟的绝大多数领导成员仍然坚定他们一直为之奋斗的崇高信念。1965年在坦桑尼亚大陆上进行的选举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能表明，坦盟在选举及其他方面都吸取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教训。我们的人民已经表示接受下面的目标：建立一个由120多个不同部落、不同宗教信仰的社会团体组成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一个人的种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过去做出过多少服务，他能做出多少服务。

独立运动对独立的坦桑尼亚的看法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明确的。坦盟所强调的道德和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使人民对独立国家和国家领导层的行动产生了一些期待。坦盟要求平等权；我们的人民现在期待平等。我们要求人得到尊重；我们的人民现在要求他们的领导人给予每个人尊重，不管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何。我们要求机会平等；我们的人民现在批评说根本不存在机会平等。正是这些道义上的期待在坦桑尼亚独立后的不同背景下既产生了问题，又创造了机遇。

独立斗争对坦桑尼亚的政策正产生深层次的持续影响。从坦盟诞生到1961年，我们的运动也从非洲其他地区的独立运动中汲取了力量。我们把自己的独立运动看作是全非洲独立运动的一部分，1957年加纳独立运动的胜利鼓舞了我们，给予了我们新的动力。那时，我们认为我们的战斗和梦想是现实

的：非洲一定能自由。

非洲内部的这种相互关联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坦盟意识到了本国的独立运动对邻国的重要性。因此，坦盟加入到1958年成立的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组织（简称PAFMECA），积极参与该组织的活动，帮助本地区弱小的政党，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一些合作行动。坦盟也积极参加全非人民组织大会，因为我们知道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要想取得进步就要相互依赖，因为我们意识到分隔我们不同自由组织的国家界限是人为的。这些惺惺相惜和相互依赖的想法既强烈又普遍，不会在国家独立后就消失。这些想法不但基于普通非洲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也基于人们对现代非洲严峻现实的了解。就像非洲一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另一非洲国家一样，非洲某国民族运动的成败同样也会影响到非洲大陆其他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成败。

因此，全非洲的自由和非洲统一的信念仍然是大家认可的独立后非洲的方向。就坦桑尼亚而言，已经把非洲的统一和一体化列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现在非洲统一已经成为我们政府和人民的一项行动原则，就像平等和自由的概念是坦桑尼亚国内的一项原则一样。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可以在国内为自由和平等而努力，几乎可以不必考虑外人的决定；而非洲统一则需要国际上的认可，而且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加强，它越来越难实现；在实现统一以前，每个国家必须要保护好自已的利益，尽管各国都知道这可能会使统一的进程更加复杂。

1961年12月9日独立以来，坦噶尼喀即现在的坦桑尼亚一直在尽力遵循这些来自独立运动的目标和原则，把它们贯彻到坦桑尼亚的政策中。如果我们声称从未犯过错误，一直尊重这些原则，那就太愚蠢了。我们严重缺少受过教育、有经验的人才，我们缺乏资源，这些都意味着我们该做的一些事情还没有做，一些本该做得很好的事情还没有做或没有做好。但因缺乏经验而造成的错误不会再次出现；在历史长河中，它们只是瞬间之事——尽管它们对有关个人来说可能是重要的。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原则来指导行动，也有一些不同的目标，但有时这些原则和目标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或一个负责任的个人该怎么办？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理论可讲。这是每一个有明确目标的政府都会遇到的日常问题。在那些几个人的行动就能抵消上千人，甚至几百万人努力的国

家中,这个问题更难解决。根据个人自由与法律至上的原则,一个人如果没有因非法的行为被判有罪就不能被逮捕或拘押。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总能获取必要的证据来给某人定罪,在有关破坏、腐败及密谋的情况中尤其如此。然而,如果我们毫无例外地坚持法律原则,我们年轻的民主制度以及这些原则本身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原则冲突。例如,严格遵守平等的原则,可能会要求不要把资金投入中等和高等教育,以便让所有的儿童都能接受小学教育。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发展我们的国家?再有,我们是应该在全国范围分散所有服务,还是应该集中发展某一地区,希望这一地区将来会成为一个支点来撬动消除其他地区的贫穷呢?

在类似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这些不仅仅是经济优先的问题,它们会对我们要逐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起到根本影响,因为现在发生在非洲的变化都是根本性的变化,社会本身也正在被变革。传统的社会秩序正在消失。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我们过去历史之上将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将最终替代传统社会。必须按照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社会的想法来做出能包容原则冲突的抉择,因为我们的优先选择会影响我们未来的观点和制度。我们必须展望未来,判断我们的决定在未来二十年后——而不是明天,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尽管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决定对当前的影响。因为事实上,这是另外一种需要不断做出抉择的抉择,是在现在与未来之间进行的抉择。

人与社会新的结合

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冲突——个人欲望的冲突,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两件东西: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和自己的爱好。同时,他希望得到只通过在社会上生活就能得到的自由,即免于恐惧受别人攻击的自由,免于受自然危险影响(尽管自然危险会不断危及每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任何人都经受不起)的自由和从大自然获得回报的自由,因为在大自然中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但一个人一旦成为社会的一员,就要为了社会的利益牺牲他在社会之外拥有的一些个人自由。例如,为了获得个人安全必须要牺牲攻击别人的权利;要想从合作的努力中获益就必须不时与他人合作,而不能考虑个人的特殊愿望。这种冲突是社会存在所固有的,在任何社会中都一样。一个人与

他的同伴们的关系越复杂,这种冲突就越大,他从社会中获得的潜在回报就越多。

这意味着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不可能总是社会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必须要不断满足二者,但构成这一切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意识:一个社会存在的目的、存在的原因是而且必须是人的个体、他的生长、他的安全、他的尊严和因之带来的幸福。人们并不自愿为了物质财富、效率或集体的荣耀而加入社会群体,除非这些东西会给他带来利益。集体财富或集体权力本身并不是什么美德,人们不愿意或不应当为此做出牺牲。只有在集体财富或集体权力能为社会主体的人服务时,才能算得上是美德。

社会存在及社会所有问题存在的理由不是某一特殊的人,而是与其他所有人都平等的每一个人。在人们自由参与的任何社会团体中,所有成员的平等是该团体的基础。因为加入一个社会团体,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个人就要牺牲一定的自由,与其他成员得到一样的回报。如果得不到与其他成员一样的回报,那么他就没有成为这个团体的成员,而是成为了某个个人或团体的奴隶或仆人。在这种情况下,该组织就不可能稳定或和谐,除非这个组织有足够的力量——武力来维持下去。

因此,理想的社会是基于人人平等及其成员自由与团结的基础之上的。必须要有平等,因为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相互协作;必须要有自由,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个人就不能从社会获得服务;必须要有团结,因为只有在社会团结的情况下其成员才能和平、安全、幸福地生活和工作。

要保证某一社会坚持其基本目标,需要做到两件事。第一,必须要有机构来维护和促进团结与自由;第二,社会上必须要有一种社会道德准则来保证这些机构能够坚持目标,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些目标做出调整。从传统的非洲家庭这一最小,也可能是最使其成员满意的社会团体中,很容易可以看到这些要求的本质及意义。

传统的非洲家庭是一个几乎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单元。生老病死的大部分需求都能在单元内部得到解决,尽管其生活水平低下,但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都同样低下,而且会比该家庭的子家庭能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

各地的非洲家庭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甚至还存在家内奴隶制,但基本上都有同样的行为和态度,综合起来说就是基本的平等、自由与团结。正是这些原

则从根本上排除了一个家庭成员可以杀害或偷盗另一个成员的想法,因为对任何非洲人来说,杀害或偷盗另一个成员都不是什么美德。每一个传统的非洲家庭都具备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首先,有一种使所有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相互尊重和相互负有义务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用“爱”这个词来表达,但这个“爱”指的不是男女之间的浪漫或亲密的个人感情;第二,人们共同拥有对家庭、对个人都很重要的财富;第三,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劳动的义务。

这三项因素把家庭成员团结成一个整体,对于每位成员来说家庭都很重要,因为每位成员都把自己和其他人考虑在家庭单位的框架内。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独特性,都有自己的私欲,但他同时也知道,为自己利益采取的行为应严格限制在与他的社会单元——家庭一致的行动范围内。然后,家庭组织及其规则鼓励家庭成员间相互尊重、相互负有义务,通过这种方式创立一个对所有成员同等和谐、同等有益的社会。

在传统的非洲家庭里当然有当权者,而且当权者一般是一家之主。尽管这个当权者能够解决家庭内部因性格产生的内部纠纷,能够在受到外部威胁时迅速做出决定,但他的权力也是受到限制的。非洲传统家庭有自己的相互制衡系统,因这些系统与某些责任相关而被家庭的成员所接受。如果不能履行这些责任,久而久之这个家庭将会分裂,其成员要么加入其他的家庭,要么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所谓的当权者也不过是“平等者中的首位”,他的地位是基于所有成员的相互尊重和共同期望之上的,即家庭内与所有人的生活相关的协议必须由包括当权者在内的所有成员共同制订。

这种期望以经济和社会一体化为先决条件,直接依赖于该团体对基本财产的共同占有。房子、食物和土地是而且必须是“我们的”房子、食物和土地,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各成员之间才存在平等。个人财产当然也存在,也被人认可,但个人财产在所有物品中仅占次要的位置。家庭成员也不会因其他人拿走他的个人财产而感到缺少食物或居所。对于家庭和家庭成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家庭财产。由于是家庭公共财产,只要还没产生出令所有人可以接受的分配方式,所有家庭成员都有平等使用公共财产的权利,都有权参与分配的过程。这种“分享”的观念如此强烈,以至于衍生出在需要的时候能使用别人私有财产的想法,但私有财产与集体财产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对于家庭公共财产,每个人都有权使用、参与分配,但对于个人财产,人们可能会希望能有权使用,但是没

有理所当然使用的权力。

这种分享的原则是家庭和谐的基础,也是对家庭成员平等地位的认可。每位家庭成员可能不会得到数量相等的食物,因为在家庭中是按需分配食物的,但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他应得的份额,不存在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拿走自己想要的食物,而其他人食用他剩下的食物这种情况;一切物品都要按比例分配,尽管分发或吃饭的顺序会给很多旁观者留下错误的印象,每份数量的不均等有时也会遮盖所有人基本平等的真相。

尽管家庭的头领、狩猎者、武士或其他群体的头领可能会获得更多的食物或优先获得住所,但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差异不会太大。因为共同财产制,就不会出现一人吃得很饱或囤积食物而其他人挨饿的情况。甚至像牛这样的牲畜——家庭和个人占有的相互性导致了复杂的所有权——每个“不拥有”牛的家庭成员因为某种特殊原因也有权使用牛。不同家庭成员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相等的份额;所有的风俗习惯最终会使他们得到平等。如果家庭的一个成员——不管他的资历多高——以交易的形式获得衣服或其他形式的个人财产,而另外一个成员却无法获得他的基本权利,肯定会成为社会的一大耻辱。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个人主义的货币经济对传统的非洲家庭组织来说是灾难性的。传统非洲家庭的原则一直鼓励人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但相比之下,由商人和殖民力量引介到非洲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鼓励个人占有和经济竞争。因此,一个在外挣工资的家庭成员接触到收音机和手表之类的奢侈品,在更广阔的社会中,他的地位取决于对这些奢侈品的占有。但是,他对家庭其他成员的责任是不变的,并且这种责任随着他工资的增长而增加,因为其他家庭成员拥有分享的权利。这时传统的非洲家庭小社会与外面以货币为基础的大社会之间就产生了直接矛盾,而这种矛盾对个人和整个非洲社会造成的影响现在仍然能够看得到。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通过货币可以囤积财富,鼓励个人的占有欲,以一个人的财产来决定他的社会地位,这使得传统社会生活的根基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的不平等逐渐加大,使得人们的基本平等关系逐步转化为一种商人和客户的关系,这样社会的所有成员就无法作为平等的人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讨论有关社会的维护和发展了。共同利益至少已经被两个利益所取代:富人的利益和穷人的利益。由此,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社

会团结也被削弱。

由于分享权可以维护和加强社会单元,并使社会单元对所有成员都有价值,所以就会产生相应的共同责任。每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员都有义务为所有人分享的事情作出自己的贡献,换句话说,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劳动并承担劳动的责任。有些人可能在田里耕作,而有些人会参加狩猎或做饭;每个人应该做的工作数量也不同,有些人可能被当作懒人,而有些可能被当作勤劳的人而受到赞扬。但是劳动义务是社会认可的一部分,就像分享权一样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一个人做的工作与他的身高和力量不相称,他很快就能以某种方式知道自己做得不够。他可能会不同意这个说法,或不满意他的工作类型,但他不会质疑他的家庭要求他工作的权利。他从未有过不为社会工作就有权吃饭、住宿、得到社会保护的想法,尤其不会声称他的父亲或其他祖先曾经是非常成功的劳动者,他就可以免于劳动。他认可和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平等,认可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相互利益。至少在理论上他会相信,如果没有劳动义务,自己所在的社会单位将会变得糟糕。

由于实施了爱、分享与劳动的原则,殖民前的非洲似乎就是卢梭所说的“高贵的野蛮人”过着田园生活的理想之所——但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这个社会的人不比别的社会的人“高贵”,这些原则在这里得到的尊敬,正如其他原则在别的地方受到的尊敬一样。非洲传统家庭过去没有过、现在也绝没有田园式的条件,相反他们过的是贫穷、不稳定、经常充满恐惧的生活,但这些不安全和恐惧来源于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家庭单位虽然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条件,但是力量太小、人口太少,不能征服环境。由于不能征服大自然,众多家庭创造了一个足够强大的社会单位来抵抗各种灾难,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接受社会稳定提出的要求,以获得粮食和住所。在社会团结的背景下允许个人自由,以谋求社会稳定,必要时以社会成员间的根本平等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奏效的原则在更大的社会同样有效,因为不管社会有多大,它的目标和存在的原因都是人。在较大的社会中实现这些原则有难处,因为在大社会中个人之间的手足情谊和相互依赖不像在家庭中那么明显,但仍然是社会和谐运行、秉承社会目的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手足情谊和相互依赖,社会内部就会存在瓦解的危险——家庭的分裂、内战或国家之间的战争,尽管有时

这种危险是隐蔽的。但是这些原则本身受到挑战，而现存的各种社会几乎没有一个声称要尽力实施这些原则或接近这些原则。

那些认为社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人，颂扬一些如“国家”、“国旗”甚至上帝等抽象观念的人，首先对这些原则提出了挑战。这种态度源自对社会的方式和目的产生的混淆。国家是社会集团，国家本身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便利的行政划分，更是一种社会形式。因此，社会怎么能成为自身存在的目的呢？那种认为社会的存在是为了颂扬一面旗帜的想法就更荒谬了；旗帜只不过是一块布，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被用来代表和加强某一社会的团结。上帝——包括任何神灵——只与那些信仰他们的人有关；没有哪种宗教假定认为上帝与一个抽象名词或只与一个集体单位相关。当然我们对上帝的崇拜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上帝的利益。尽管崇拜上帝会给人类带来一些好处，或者认为会给人类带来一些好处，但很明显不会给完美的上帝带来什么好处。当然，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受到他宗教信仰的控制，但这些信仰并不是他社会生活的目的，即便有人会把宗教信仰当作自己的生活目的。在任何情况下社会存在的目的都是人，尽管在一些情况下，社会机制的形成会受到人类精神信仰需要的影响。

认为爱、分享和劳动作为社会基础过于理想化，尤其对成员互不相识的社会更为理想化，这一观点是对这些原则有效性的另一个主要挑战。这种批评是荒谬的。从概念上来讲，社会原则就是人们追求并进行自我批判的一些理想。所以，问题不是这些原则能否改善（这是个愚蠢的问题），而是一个由自由民众组成的社会能否缺少这些原则。正如民主，人们在小的社会比在大的社会中更容易靠近它，但跟民主一样，对于小社会和大社会——对于传统非洲和现代非洲，这些原则同样有效。

在传统非洲，促进并维持这些原则的不是人类天生的美德。这些原则之所以传承下来，是因为整个教育体系教授这些原则、支持这些原则，它们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儿童从自己的父母、其他长辈或整个社会组织那里汲取到的基本家庭价值观，被简单灌输了这些概念，如他被告知“那是你的一份”或“去找你哥哥”（而在欧洲人的措辞中这个人是一个远方亲戚）。如果一个人忽视了对本团体其他成员的礼貌，或没有与迟到者分享剩余的食物，或忽略了应尽的小义务，他将会受到批评或惩罚。在年轻人的成年仪式上他们再次被教导学习这些原

则。这些原则不必经过分析就会充满部落社会的整个教育体系,并成为这个教育体系的目的。

如果要在已经成熟的较大的社会中保留和使用这些原则,新的现代教育体系也必须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原则进行反复灌输,必须使这些原则成为学校所有教学、所有无线广播内容和出版界所有内容的基础。如果要使这些原则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就不能允许存在任何反对这些原则的主张。

但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自由。相反,这些原则是支持自由的。在变化的条件下会有,实际上也一定会有一些关于某些特殊措施会支持或削弱这些原则的公开讨论,但是不会有公开鼓吹公民间不平等的讨论或贬低某一合法公民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则和其他的一些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观点放在同一位置。我们不会允许一个人宣扬赞同谋杀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会损坏社会的基础,我们允许讨论堕胎或安乐死的问题,因为这些属于“不可杀戮”原则的特殊情况,但我们仍然不能允许任何人在这些问题上先于社会的决定而行动。这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可我们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把这些当作是自然的个人反应。由于教育背景的原因,我们不认为自己因为这些限制而变得“不自由”。换句话说,我们认为这些关于杀戮的准则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根据所有社会成员平等或基于平等意义而不允许攻击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呢?

在“不可杀戮”和平等原则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区别。前者是绝对的——或者说可以是绝对的。进一步说,这是一个表示否定的要求——不可。而另一方面,平等需要积极的行动,因不平等而允许人们之间有差异。例如,一个独臂老人和一个有生气的年轻人各有十英亩肥沃土地,各有一把锄头,如果说这两个人是平等的,那么就是对平等的一种嘲讽。因此,对于自由来讲,没有一条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的、简单的原则。相反,我们被迫回归到人类尊严的概念上来。社会必须保证每个人的基本人性和生命力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每个人必须被社会看作、被自己看作与社会上其他的人处于平等的地位。正是这种愿望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如此危险,使得“极权国家的行为”如此令人厌恶、如此具有毁灭性,因为在极权国家中个人的生活方式任凭别人随意摆布。

然而,即使在这种联系中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冲突。在极度贫穷和严重疾病面前,人没有尊严可言。其背后的无知也一样。当人们共同努力创造出使生活

更舒适的物质后,人们却发现不能分享这些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毫无美德可言。此外,人类的进步需要经济“盈余”,使有些社会成员从消费品生产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能最终提高全社会审美观与哲学思考的行为。社会的目标是人,但是为人提供服务必须要有一个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来帮助生产更多对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有用的东西。这意味着社会的一项功能是组织和保持有效的经济组织和生产技术,尽管有时这些东西本身是令人不愉快或有限制性的。生产很重要,其重要性在于生产能够服务于人,能够产生出人们当时就能看到的利益。但生产并不是社会存在的目的,人类的进步是通过人民摆脱生产对人的束缚程度来衡量的。当对“效率”和“生产”的需要超越人们对充实、幸福生活的需要时,社会就不再是为人服务,而是人在为社会服务。

因为这些原则在任何时候、在不同社会都有不同的要求,在任何社会始终都不存在什么《圣经》能够告诉未来的一代人应该怎样去实现理想。这些理想从未被实现过,或许永远都不会实现。但是每个社会中都仍然存在谋杀的事实并不会阻止任何社会努力消除谋杀,减少谋杀产生的原因,或消除人类对暴力本能的表达。同样,就社会存在更广泛的目的来说,我们必须组织社会机构,形成能够促进人类尊严和社会平等的观点。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促进和鼓励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在考虑决定时要问一种特别的问题,即“组成这个社会的人将会得到什么好处,将会失去什么?”,而不是“我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社会必须严厉阻止这种状况的出现。

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境界,那很多现存的社会将不得不转变方向。尤其是非洲,现在正在向偏离这个观点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来重新鼓舞人们接受这些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应用在由传统家庭和部落发展而来的更大的社会中。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非洲必须同时解决增加生产和重建人人平等观念的问题。很难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在我们严重缺乏专门技术人才,发展极端低下生产力时更是如此。例如,现在坦桑尼亚的工资差距是无法与人类平等相挂钩的。有为数不多的人年收入可以达到3000英镑,最低工资是每年60英镑,而许多农民的收入还要更低。但由于我们缺少有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政府的服务、私人投资组织甚至国际或海外机构对这些人才的

大量需求,都使得我们目前还不能大大缩小这个差距。这意味着具有专门技术的少数人因为他们的能力,会得到越来越大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尽管他们技能的获得是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奖学金,建立并维持我们的中学和技术学校,但这一事实仍然存在。

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有技术的人特别邪恶或特别自私。实际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非常愿意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但由于当前的社会组织状况,只有这些人才能获得个人回报——可能只有万能的圣徒才能要求这些人放弃高额回报。但社会的危险仍然存在,因为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很容易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会导致社会差距的加大,出现支持不平等的观点,会鼓励那些我们需要的专业人员形成一种看法:他们应该得到更高的工资,因为他们认为在其他社会中那些和他们一样的专业人员的工资都很高。但是这些人不太可能拿自己与那些处于经济最底层的人进行对比。

因此,作为一个社会,坦桑尼亚现在应当意识到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了。保持现在的状况只是临时的,应当努力打击强化现状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最终可能会使我们放弃人人平等和尊严的需要。我们必须努力向一个目标奋斗:每个人都意识到,除了个人的基本需要,自己在社会中的权利必须屈居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之后,而且我们必须成立一种社会机构来把个人的诱惑降到最低限度。

这些观点的宣传和机制的引入必须成为坦桑尼亚政府政策的重要目标。这些目标被描述为是社会主义目标,因为对社会进行深思熟虑的调控以达到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学说。但我们是“非洲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在非洲实行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现存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决定的。这并不是说“非洲社会主义”有特殊价值。我们实施非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必须要沿着最适合我们的道路,向人类平等和尊严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一个非洲人和一个日本人都要去印度,但前者向东走,后者向西南前进。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目标都可能是相同的,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不同的起点决定的。

需要国际团结

实际上,谈论“非洲社会主义”有点用词不当。由于非洲被分成许多民族国

家,而且这些民族国家发展程度不同,所以非洲社会主义也会不尽相同。因为尽管非洲的国家都是人为(当然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60年的历史^①意味着它们是基本的政治共同体,我们现在的发展必须由此开始。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非洲存在大约40个独立主权国家,这些国家在地理上、经济上,当前也在政治上联系在一起,但仍然是分裂的。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必将发生一些变化。

这有非常严肃的含义。尽管这些民族国家缺少合理性,但它们正在组合,在其内部,社会在组织自己、保护自己。社会行为规则只在国家范围内有效,只能在国家范围内实施。这意味着这些“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作为不同社会的成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相应团体的自我利益来控制。因此,每个国家都觉得有必要建立自己的防卫体系来保护国家的利益,花费时间和金钱来保护自己免受比它强大的国家的控制。民族国家经常通过捏造或夸大与其他国家差异的方式来巩固本国内部的统一。

因此,当前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很多不同的小国家正在试图追求与其他国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一个能被所有人都接受的行为准则。在国家内部,每个国家都试图在其公民和居民间建立和谐的关系,或者至少掌控其公民和居民间的关系;在国家外部仍然通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有在考虑到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时才会有所改善。

很明显这是荒谬的。20世纪的技术跨越世界,但我们仍然在竭力操控社会关系,好像国家的分界线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建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我们关于社会的概念必须要适应今天的现状,只有那样,我们当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才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各国现在的所为正如尚未组成社会的个人,他们反对组成一个社会的建议,因为他们意识到,要组成一个社会就必须牺牲自己的一些自由。但年复一年,要求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剩下的问题就是是否能在灾难发生之前组成社会。

当前,讨论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完全是白日做梦,尽管从逻

^① 这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西方列强在非洲殖民瓜分狂潮后,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沦为西方殖民地,开始了殖民统治时期。——译校注

辑上讲这样的政府是必要的。但这个梦想不可能很快就实现。纵观全世界,民族国家成功地创造了排外的民族团结概念,使得所有人一想到“外面的”人可能会控制他们,就会不寒而栗,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可能控制其他人。这就意味着,尽管有必要在本世纪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当然除非有些不可预知的事件能够改变当前人类的态度。

因此,不管是在这一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必须从当前的情况着手向目标前进。我们必须为并不完美的联合国感到喜悦并努力巩固它。当前,由于成员国间的不平等以及各成员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联合国还没有独立的力量,因此它的发展踌躇不前。正如弱者在短期内从人类社会组织获得最多一样,弱小国家短期内急切需要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联合国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因此,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必须不遗余力地使联合国在当前的努力中取得成功,以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组织,或在必要情况下被一个更加强大的组织所替代。

但是,要减少民族国家激增带来的危险,眼下非洲社会不止有一条解决途径。在我们迈向世界统一的过程中,可以先在非洲大陆上取得统一。或者,如果说一下子实现非洲统一这一要求太大,我们可以通过国家或联邦的方式,或者通过当前民族国家合并的方式实现更大的非洲统一,以便减少主权国家的数量。

这些初步的想法不一定是白日做梦。如果我们有勇气和智慧,这些想法能很快变为现实。如果普通的非洲人要真正跨越束缚他们的贫穷来提高自己的安全感,这些当然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而且必须是非洲更大程度统一的目的,这一点跟在其他的地方是一样的。真正能够保证普通人的真正自由、帮助他在自由方面取得进步的不是他的国家的大小,而是国家的力量和权力的大小。

社会道德的重要性

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个社会多大,不管它有什么样的机构,其成员的自由和幸福都依赖于一个被所有成员接受的社会道德——即机构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孰是孰非的意识。随着人们意识的变化和外部情形的变化,这种社会道德也必须要变化。现在非洲的社会道德正在变化,而且也必须要变

化,即从适应部落社会的道德转变为适合国家社会的道德。由于非洲正处于转型期,现在有机会建立一种适合社会良好稳定发展的道德,当然也有可能建立一种会为未来的冲突和混乱埋下种子的社会道德。

我认为,在非洲,我们应当抓住现有的机会,以便尝试需要把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社会成员的矛盾结合起来。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增强人们对我们的基本目标和必须解决的问题的理解,从而有助于这样的发展,但本书的出版首先应有助于人们形成社会和谐生活的观点。

在从众多的演讲和文章中挑选资料出来形成本选集时,我就考虑到了这些目的。同时,还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坦桑尼亚的发展及其实践的哲学。因此,除了一些表明立场的演讲,那些有局部重要性的演讲没有被选入本书。基于同样的原因,有些讲话只是选取了很短的一部分,而其他的讲话却选取了全文。

即便如此,还是有必要略去某些有关非常重要主题的参考文字。例如,本书没有包括关于工会主题的演讲与文章,除了最广泛意义上的经济规划外,也没有太多关于经济规划的内容。本书的重点是平等及其意义、坦桑尼亚的民主以及统一——坦桑尼亚内部的统一、非洲统一及世界的统一。我们身处的环境使得这些主题对我们异常紧迫,而且这些主题本身也会发展成为工业和经济组织的问题。

坦桑尼亚的历史和非洲的总体发展状况决定了这些主题的重要性。例如,在关于人类平等的演讲中,着重强调了种族平等的问题。只是在最近几年坦桑尼亚的状况才使得种族平等问题不像非洲人后裔公民间的经济不平等那么危险。即使现在,南非发生的事件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意味着我们不能放松对种族主义的警惕。

变革是非洲的主题

在所有这些演讲与文章中,在我有幸领导和支持的政府的所有行为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变革。因为非洲必须进行变革,把非洲从一个人们勉强生存、被迫适应环境来生活的地方,变为一个向环境挑战并使之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非洲必须变革它的机制,以实现它新的抱负;人民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行为来适应这些新抱负;这些变革必须是积极的,必须由非洲自

己来启动和决定，而不仅仅只是对影响非洲的事件做出反应。

因为在非洲已经开始了一场革命。我们希望能够控制、引导这场革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场有目标的革命，其目标就是把人类尊严扩展至每一位非洲公民。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做出许多决定，这些决定将包含很多原则的冲突，例如，应当选择快速发展还是选择个人自由，应当选择高效还是选择平等。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统一的答案，必须根据历史环境，解决当前与未来矛盾的需求来做出抉择。唯一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忘记其中任何一项原则，或者忽视或打破某项原则，那我们就会背叛我们革命的目标，非洲将不能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机会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要勇气抓住机会。不是在变革还是不变革之间进行抉择，而是在变革还是被变革之间进行抉择——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向进行变革，还是被外界我们不能控制的力量变革。20 世纪的非洲不存在静止不动的稳定，只有在急剧变革中保持平衡才能得到稳定。

坦桑尼亚已经选择搭乘席卷非洲的这股变革的旋风。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相信如果不采取措施将会遇到更多的混乱，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试图保持现状就是试图忽视世界。我们选择加入改变我们自己命运的行动，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克服困难，建立我们希望的社会。

对于那些有勇气去渴望、相信和努力的人来说，坦桑尼亚是一块具有挑战性的、令人兴奋的土地。我很荣幸、很高兴能献身于坦桑尼亚的未来。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

1966 年 1 月

目 录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简历	1
自序	1
译序	1
前言	1
1 东非的种族问题	1
2 在立法会议上的第一次演讲	7
3 1955年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口头听证会上的演讲	11
4 1956年在联合国第四委员会上的声明	15
5 1957年在托管理事会口头听证会上的陈述	19
6 我为何辞职	22
7 国民财产	26
8 非暴力手段	31
9 兄弟越来越多	33
10 坦噶尼喀将由非洲人主导	35
11 水与土地的所有权原则	38
12 坦盟的五位部长	39
13 个人人权	41
14 乞力马扎罗山上的蜡烛	43
15 种族问题需要经济举措	44
16 关于责任自治的提议	46
17 腐败是人民的公敌	51
18 东非联邦	54
19 公务员的非洲化	64

- 20 非洲人与民主——67
- 21 卢蒙巴之死——71
- 22 英联邦、南非和坦噶尼喀——72
- 23 成为总理后的广播讲话——76
- 24 非洲的未来——78
- 25 英联邦成员资格——80
- 26 “摸索前进”：在基武科尼学院揭牌仪式上的讲话——81
- 27 领导的作用——85
- 28 公民权原则——86
- 29 教育与法律——90
- 30 独立之挑战——92
- 31 坦噶尼喀与英联邦——94
- 32 就独立致坦盟的信——97
- 33 接受独立文书——100
- 34 在联合国的独立演讲——102
- 35 辞去总理职务——111
- 36 非洲青年运动的统一——113
- 37 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115
- 38 非洲统一和英联邦——123
- 39 国家伦理的重要性——124
- 40 总统就职演说——125
- 41 非洲合众国——135
- 42 民主与政党制度——140
- 43 第二次争夺——146
- 44 同私人资本投资的关系——150
- 45 泛非主义政策和目的——153
- 46 1963年亚的斯亚贝巴会议——155
- 47 东非大学落成典礼——157
- 48 平等的含义——160
- 49 浮华之风——161

- 50 独立与团结——164
- 51 在联合国日的发言——166
- 52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上纪念麦克杜格尔的演讲——167
- 53 国庆广播讲话:1963年12月9日——184
- 54 坦噶尼喀的公民身份——189
- 55 一党制国家委员会指导意见——191
- 56 和解的勇气:纪念达格·哈马舍尔德的演讲——195
- 57 非洲统一组织外交部长紧急会议——211
- 58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合并——215
- 59 期盼成立东非联邦——218
- 60 对叛兵判决的意见——220
- 61 非洲统一:在非统组织开罗会议上的讲话——221
- 62 大学学院校区的揭牌仪式——225
- 63 马西瓦青年培训中心——234
- 64 私人投资的价值——236
- 65 对剑麻产业的政策——238
- 66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241
- 67 对马里的国事访问——243
- 68 对荷兰的正式访问——245
- 69 节俭——248
- 70 非洲统一的本质及其必要条件——250

1 东非的种族问题

下文摘自一本未出版的册子，是朱利叶斯·尼雷尔在 1949 到 1952 年间撰写的，当时他是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它比较冗长松散，曾被提交给一个组织，但该组织拒绝出版。

……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是令人难以忍受和难以生活其中的。但是，我们不能依赖虚伪和幻想实现目标，而只能依靠诚实的思考、诚实的交谈和诚实的生活来实现。然而，东非现在充斥着太多的虚伪。欧洲官员和欧洲移民主要通过虚伪来控制 and 维持他们的权威，他们的内心动机难以经受考验；印度商人通过彻底的欺骗或至多是纯粹的狡猾（而实质是虚伪）来谋生；非洲职员和劳力经常漠视履行他们的合同，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也假装喜爱欧洲人，尽管他的内心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在坦噶尼喀的官方甚至非官方地区，有一种倾向认为，民族仇恨是邻国肯尼亚人的病，而我们坦噶尼喀人没有这种病。但这就是虚伪。在坦噶尼喀最近的一次公开聚会上，一位欧洲移民在一位英国内阁部长面前声称，他宁可与一位下流坯进餐也不愿与一位非洲人进餐。部长在听到上述陈述后发脾气离开了，而他的行为被大肆渲染。那个移民的表述被坦噶尼喀和肯尼亚的白人群体视为不幸，但是，这位部长因为他的行为而到处遭到谴责，他本人却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那样做。仇恨的表达不只发生在一方。我的一个非洲朋友把东非的欧洲人叫作 Mbwa Hawa——“这些狗”。我个人欢迎这些情感的发泄，这显示出疾病的严重性，就像沸腾水壶中的气泡。我对这种疾病感到遗憾。过去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方式助长了这些仇恨的生长。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纯粹的虚伪来解决问题……

为解决非洲的种族问题，很多计划被提出……但是我必须从一开始就说，任何不对欧洲人的政治特权造成损害的计划都不会解决种族冲突的问题……

只要一个社团垄断政治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不仅阻止其他社团分享政治权力，而且使其他社团处于一种社会和经济劣势，那么任何通过改善其他社团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来解决种族冲突的言论都是虚伪的、愚蠢的。解决种族冲突的办法依赖所有社团对社会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尤其是对政治平等原则的接受度……

1945年12月，英国殖民大臣就东非地区地域组织提出了几点建议。这些建议体现在被称为“191”的殖民地白皮书中。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那些被提议的东非中央议会的种族代表相关的建议。

不管殖民大臣做出了如何相反的严正声明，当时我们确信而且现在仍然确信，《191白皮书》中提出的东非议会的建议在某种形式上是向东非地区的最终融合或联邦迈出的一步。所有的非洲人和印度人都反对东非地区更密切的联盟，主要是因为与肯尼亚的这种联盟将会使肯尼亚的白人定居者控制东非所有的事务。同样原因，他们反对与肯尼亚任何形式的联盟，就像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从1938年至今仍然反对与南罗得西亚^①的联盟一样。因此，与肯尼亚联盟的想法就足以使非洲人和印度人反对《191白皮书》……但是……所有的非洲人和印度人还称颂《191白皮书》，因为尽管白种人占人口的少数，但《白皮书》给予了白人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让他们处理本地区的重要事务，但《白皮书》至少假装接受了种族平等的原则，在措辞逻辑上没有其他的选择。

欧洲人怎么说？他们进行了公开指责，谴责了进一步联盟的观点，声称如果殖民地办公室不放弃种族平等的原则，他们将进行联合抵制……我们不相信英国政府——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会屈服于我们的白人邻居所做出的狂妄的要求。我们深信英国政府会坚定地支持这项原则，对此在逻辑上没有什么可以选择。印度人和非洲人向殖民地办公室提交了备忘录，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但我们的幻想最终破灭。我们不屈不挠的白人邻居们继续指责《191白皮书》，要求殖民地办公室放弃种族代表平等的原则。

1947年2月，殖民地办公室发表了《210白皮书》，对以前的建议进行了修改，以满足欧洲人的要求。令我们震惊和失望的是，英国政府真的放弃了种族

^① 南、北罗得西亚分别为今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得名于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罗得斯（1853—1902年）。——译校注

代表的平等原则！欧洲人获得了胜利，四处欢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使工党政府的威望在东非的非洲人和印度人眼里降低了多少！这一事件使得他们对工党政府的信任完全破灭，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程度。当我后来发现体现在《191 白皮书》中的原则是保守党的殖民地大臣的观点，而《210 白皮书》体现的是工党政府的原则时，我对他们的信任受到了更大的动摇……1946 年 4 月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年度会议上，在坦噶尼喀官方认可的表达非洲人观点的组织——非洲人协会指责了与肯尼亚进一步联盟的观点，认为《191 白皮书》看上去似乎公正，但会使更多的控制权落到欧洲人手中……不可否认，《210 白皮书》比《191 白皮书》更糟糕。如果体现在《191 白皮书》中的与肯尼亚更紧密的联盟被拒绝的话，就没有必要问非洲人对《210 白皮书》的看法如何了……

若不是在非洲，若不是白种人发现自己是少数时，在选举代表方面，数字总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经常听到关于数人头的那些贬义的曲意奉承，在英国或美国没有人认真地提出其他办法。议会应当代表金钱而不是代表人的这一原则早在 1832 年就被否定了；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工人或农民有更多的选举权这一说法也被认为是耻辱的。但在非洲，我们被告知不但要重新恢复这些愚蠢的原则，而且还必须接受一项新的原则，那就是议会代表的是肤色。我们反对这一原则——即使接受它会使我们成为得利者，我们仍然要反对这一原则。

我们反对种族代表平等制，其原因和我们谴责欧洲人对我们的统治一样。这种代表制在名义上具有欺骗性，实际上包含的是种族优越性的原则。它认为 5 万欧洲人——就因为他们是欧洲人——等同于 1700 万非洲人，可以通过他们的财富、智慧、道德和肤色的优势来弥补人数少的劣势。东非有大约 3 万阿拉伯人、5 万欧洲人、19 万印度人和 1700 万非洲人……即使欧洲人能够屈尊接受令人耻辱的代表平等制，我们也不能接受种族代表制的原则。我们的白人邻居拒绝接受这项原则，因为它不能体现他们的优越性，但我们拒绝接受它，是因为它仍然认可种族优越性。在白人占人口多数的美国和新西兰，如果平等的种族代表制是不公正的，那么在白人人口占少数的非洲，这种制度就更不公正了……

安东尼·艾登^①在1945年大选^②后的一段评论使我了解了民主的真正含义。他说,尽管英国人民选择工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这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在那时我才暗想:“原来民主并不代表着有最好的政府,只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为自己选择政府。那么,自由进行选择就是民主的本质,当然也包括做出错误选择的自由。”后来我开始思考人们是否有权做出称之为“错误的”选择。如果民主最主要的本质是“自由”而非“效率”,那么人民想要的政府就是他们的政府,因此,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正确的政府,因为错误的政府是那些由外部势力或少数人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政府,不管那种政府有多高的效率,对人民而言就是错误的政府……

毫无疑问,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正如艾登先生认为1945年发生的事就是一个例子。人民会做出一些错误的抉择,也就是说,一些不能使他们获得最佳利益的抉择,但没有人会梦想这种抉择应当被别人的抉择所替代。民主就是对人类共识的信心。如果人民没有被剥夺其他的自由,即推翻政府的自由,正如1945年艾登先生所相信的,真正的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将意识到他们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已做的抉择。但这也不一定会必然发生,因为人民可能不会改变主意,可能会重新做出“错误的”抉择,甚至第三次、第四次……幸运的是,人们对于民主会比讽刺家们认为的有更多的共识。做错了时人们会知道,也不愿让错误重演。正是人的这种共识使得民主成为一种可能,而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的意志和对人民的信心……

我们东非和南非的问题是白种人占人口少数,他们坚信民主的首要基础是人民的意志,但却把非欧洲人排除出“人民”的范围。我们的所有争论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东非的人民是谁?”……

一小撮白人来到我们国家,告诉我们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人民,而我们不是——这是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的许多侮辱之一。越早告诉他们我们将不再容忍这样畸形的放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越好。在我们还能够平和地拒绝这种侮辱时做到这点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不是等到这些侮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使得任何和平的补偿方式都似乎不足……今天,人们带着消遣的语气谈论

① 英国保守党领导人和政治家,1955—1957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② 工党获胜,保守党成为在野党,安东尼·艾登成为在野党的副党魁。——译者注

“君权神授”时,不会再有任何恐惧。如果可怜的查理一世^①那愚蠢的父王没有对“君权神授”发狂,那么他的命运可能就不会那么悲惨,所以我不确定我们白人邻居的父辈和祖辈坚持这种“欧洲人特权神授”的思想是否真正符合他们子孙的利益。法国的路易十四曾经说过:“朕即国家。”今天我们在读到他子孙的遭遇时都会不寒而栗。眼下我们的白人邻居说:“我们即人民。”当我想到这种说法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时也会不寒而栗。非洲人忍受屈辱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们会在几个世纪的间隔里到处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普通的非洲人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只是普通人,不会永远甘受屈辱。总有一天他们会受到煽动,因为受到侮辱的人很容易受到煽动!当我想到这样可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时不由得不得不寒而栗,但如果我们的白人邻居们坚持“欧洲人特权神授”的思想,不愿过普通人那样的生活,那么这些可怕的事情终将发生,一场血腥的革命将连根铲除这种思想。我这样说完全发自肺腑。人们可能会谈到军队或其他愚蠢的东西。查理一世有军队,但克伦威尔没有;乔治三世有军队,但华盛顿没有;路易十六有军队,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终究有一天人们将宁可死亡也不要屈辱,而那些能看到那一天的人、那些造成这一后果的人将会痛苦!我希望并祈祷那一天不会来到,但答案握在欧洲人手里,他们希望这一天不会而且永远不会到来。

非洲人和所有选择东非作为他们家园的非非洲人都是东非的人民。坦白来讲,我们不想看到非非洲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不管是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的不平等的待遇……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包含我们的东非社会,而不是一个属于不同种族的社会。我呼吁我的非洲同胞们主动建设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200多年来,欧洲人曾经有过这个主动权和所有的机会,但是在所到之处仅仅成功制造出了种族间的各种混乱。现在我们在东非有一个伟大的机遇,让我们好好抓住这个机遇吧……

我们呼吁所有理性的欧洲人和印度人把自己当作坦噶尼喀的普通公民;呼吁不要再有欧洲人特权神授、印度人特权神授或非洲人特权神授的想法。我们都是坦噶尼喀人,都是东非人。种族之间的争吵是愚蠢的,能演变为悲剧性的

^① 英国国王,1625—1649年在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1649年1月3日被送上断头台。其父是主张“君权神授”的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译校注

争吵。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下定决心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不再认为上帝专门创造我们成为主人,而其他被创造为伐木工或汲水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东非变成一个人人能够幸福生活的乐园。

2 在立法会议上的第一次演讲

在 1954 年上半年的段时间，作为达累斯萨拉姆圣弗朗西斯学院的教师和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T. A. A.)主席，尼雷尔被任命为立法会议的临时议员。当时立法会议完全由被任命的议员和官员组成，其中政府官员占大多数。

坦盟成立于 1954 年 7 月，由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发展而来。

1954 年 5 月 25 日，议会议事录，第 29 次会议 《拨款议案》

朱利叶斯·尼雷尔：议长先生，第一次在议会发表演说，参加这次辩论，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曾经讨论过大量的进口，讨论我们将怎样赚钱，怎样花钱。我要讲述一个我以前读过的故事。一条船所处的情况和我们面临的形势相似：这条船需要水，它已经很久没有水了。最后他们发现了另一条船，然后向这条船发送了一条求救信息：水，我们非常需要水。然后得到回复：把水桶扔到你们所在的位置。他们不相信这个答案。于是再次发出了要水的请求。第二次得到了同样的回复：把水桶扔到你们所在的位置。他们又第三次发送求救信息，最终他们听从对方答复，把水桶扔了下去，捞上来一些水——这些水不是咸水，而是淡水，因为他们正在经过的地方有河流入海。先生们，听到这些讨论，我感到我们应该把水桶扔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并且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政府最终决定朝我们所在的方向扔下水桶——那就是税收的方向。

我想转到教育问题，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对教育的渴望非常强烈。我认为，当我们因为被征收的税款接近极限而呼吁削减经费时，必须记住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需要服务而且急需服务的国家。我希望当我们说到削减经费时，我们指的是削减享受服务的费用，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继续削减经费，而且仍然可以得到服务，高效的服务。有人告诉我，我们在教育方面的进步太快了。1947年，当“十年计划”出现的时候，我们有13.5%的小学适龄儿童在校学习。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做得很好。我被告知，今年将有大约30%或31%的适龄儿童进入学校。我还被告知，政府计划到1956年实现36%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的目标。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人们预祝政府如期实施这项计划。

这是一个巨大成功，但这样是否就足够了？到1956年，我们仍然有64%的小学适龄儿童不能入学。我们一直在以每年2%的速度降低文盲率，但是在1956年以后，如果我们继续以每年2%的速度减少同龄儿童的文盲率，需要30年或更多的时间来使全部适龄儿童入学，那将会是在1986年或1990年。我认为这还不足以让我们自满于现有的教育事业。先生们，必须记住，我们奋斗的目标是，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小学适龄儿童人数占所有学龄儿童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甚至在1956年当我们已经实现36%的目标时，也并不真正意味着我们全部儿童的36%能够上学。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不能削减教育经费，因为国家极其需要教育。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满足这个要求。只有一件事情可能会妨碍我们完成任务，那就是钱。我认为，不能允许任何顾虑来阻止我们给予人民他们渴望的教育。

我们也已经批评了儿童正在接受的教育。但是我认为，当我们批评现行教育的时候，谈到了学生接受过多的古典教育——但我确定我们并未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教师。学生没有受到古典教育，而且我也不知道古典教育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有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太学究了。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学生在学校学习四年，然后大约80%的学生被赶出学校。对于这80%的小学生儿童，除了给予他们所谓的“三R课程”^①基础知识外，我们还能为他们真正做些什么呢？他们太年轻了，你不会真的指望他们成为木匠或石匠。我们唯一能为这些人做的事情就是教会他们阅读和写作，希望他们在将来可以使用这些有限的知识和读写能力来提升自我，希望许多人因为在校学习的这三四年，会比

① 即读、写、算这三种基础教育。——译者注

那些未曾入校学习的人在社会上生活得更好。

我们非常需要技术教育,我希望技术教育能够得到扩展。其他演讲人也已经提及应该在坦噶尼喀成立更多技术学院。但我认为,增加技术教育学校数量的同时,如果没有增加小学的数量,将会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因为小学为技术学校提供生源。

最后,虽然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太多,但是我还是想就今天早上提到的两个话题发表一些评论。其一是总督提到的当地的一些麻烦制造者,他们利用当地不满情绪煽动群众对抗土著当局,有时甚至对抗中央政府。我确信所有理智的人、所有理智的非洲人在这个问题上会支持政府,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也已经看到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一旦当地发生动荡,他们也许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的一个邻近地区已经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个地区。非洲人不希望本地区有类似的麻烦,所以我希望所有有理智的非洲人都会支持政府,处理那些麻烦制造者。但是在离开这里之前,我非常希望再说一些其他事情。我知道当局——尤其是最高当局——一定了解制造麻烦和合理批评政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确实存在巨大的区别。有时我担心不容易分辨这种区别。政府是否知道一个人到底是在制造麻烦还是在合理批评政府?一般来说,二者之间有区别,我希望当地人民不要把总督对麻烦制造者的警告当作是英王阁下发出的警告,他不能忍受对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任何批评,而我认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许多人将失去唯一向当局提出处理事情良策的机会,或者有时只是发表那些在他人看来比较荒唐的观点。我们不应该恐慌,因为我真的不认为坦噶尼喀人民正在计划制造麻烦(许多年来他们一直非常快乐)。我确信每个非洲人都希望看到这个地区的和平,因为只有通过和平,人们才能得到他们想拥有的发展。先生,这就是我需要说的全部内容。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祝贺政府决定实行麦肯兹教授关于立法会议新宪法的报告。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将会产生新的宪法,非常高兴地看到政府大多数成员将留任,大多数官员也将留任。政府的决定中只有一件事令我非常失望,那就是一点都不修改现行的非官方人员提名制度的决定。我曾经真的希望、真诚地希望政府至少修改这个制度,至少允许人民拟订一组名单——这是一名荣誉议员提出的建议——总督根据这组名单进行提名。我曾经希望

修改这种与省代表相关的提名方式,但这种提名方式将不涉及达累斯萨拉姆的人员提名。达累斯萨拉姆是一个很小的社区;我们需要选举的经验。先生,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选举达累斯萨拉姆的代表成员呢?我感到所有社区,特别是欧洲社区,都为达累斯萨拉姆的选举做好了准备。困难是什么?在达累斯萨拉姆唯一有困难组织选举的是非洲人,但是我认为他们可以举行选举,并且为将来在坦噶尼喀举行选举至少会提供有益的经验。

议长先生,对于这些观点,我祈求支持。(掌声)

3 1955年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①口头听证会上的演讲

1954年联合国坦噶尼喀访问团报告建议应制订独立的时间表。他们认为坦噶尼喀在20到25年的时间内可以取得独立。坦噶尼喀托管地的管理当局对报告的这一部分提出反对，新成立的坦盟（在联合国访问团在坦期间曾为访问团提供过证据）于是决定，在联合国即将考虑这个报告时派联盟的主席前往联合国提供更多的证据，其机票和其他费用均由坦盟在首都的党员募集。

1955年3月7日 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第15届会议 对第592次会议的逐字记录

我很难向托管理事会表达自己的强烈感情。这是坦噶尼喀成为托管地以来第一次派一名非洲人来到这里表达民众的希望和担忧。我希望理事会能够理解，我们的民众非常感谢有这次历史性的机会。

坦盟派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访问团的报告一经发表，欧洲人的新闻媒介就对所有的社区施加压力，要求反对该报告，并令人无法忍受地声称，托管地的大多数人都反对报告提出的政治建议。坦盟派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来告诉理事会，他们的声明是毫无根据的。

访问团提出的建议给了我们巨大的希望和新的信心。现在我们知道托管

^① 该理事会是联合国实行国际托管制度的主要机构，成立于1945年，负责对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下的领土实行管理，包括尚未独立的前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和战后自敌国割离的土地。尼雷尔此次是以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的身份向托管理事会申述要求独立的立场。——译校注

理事会对我们的问题表现出了兴趣……

我的组织主张什么？从政治上讲，正如其《章程》所言，其主要目标是使坦噶尼喀人民为自治、为独立做好准备。作为实现目标的第一步，要求确立选举原则，非洲人要在所有政府机构中占多数。

我们相信，这些目标合乎《托管地协定》和《联合国宪章》第 76 条的规定。

因此，当访问团建议坦噶尼喀在 20 到 25 年的时间内获得自治时，我们没有预料到本托管理事会和托管地管理当局会对建议表达出强烈的反对。尽管我们从未制订具体的自治日期，但期望在贵理事会和管理当局的帮助下，能够提前实现自治，而不是等到 20 年或 25 年后。因为我们的邻国都已经在稳步前进，我们怎么能落后呢？

我想人们可能会很难想象一个社团在其成员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如何会有能力进行自治。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我怀疑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治。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贫穷无知的人，但没有人会说这些国家应该成为殖民地或托管地……

我们认为，衡量我们是否有能力在 20 或 25 年的时间内进行自治的最好方法就是看我们能否在那段时间内使当地人——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培训和足够的经验来管理这个国家……

我现在来谈宪政发展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希望看到宪政发展的所有基础是人民的坚定信念，虽然坦噶尼喀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但主要是非洲人。在我们的立法会议上，我们已经接受了代表平等原则，但我们接受它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向更民主的代表形式的一种过渡……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保证，未来在政府机构的所有代表团体中的代表形式都朝着给予非洲人多数席位的方向发展。如果理事会和托管当局能明确声明：尽管坦噶尼喀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它未来的政府应当以非洲人为主，那么我们的人民将会非常满意。

一旦我们得到这个保证，其他的一切事务就只是琐事了。平等的代表权将会消除非非洲人错误的希望和非洲人错误的恐惧，向自治方向发展的速度就会成为坦噶尼喀人民自己决定的事了。但是如果得不到坦噶尼喀将最终主要由非洲人管理的保证，那么这些相对次要的事情就会变成非常重要的事了……

我在前面的话中强调了我们把坦噶尼喀看作是以非洲人为主的这一事实，我不想在此问题上受到误解。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坦噶尼喀的非非洲人

就不是坦噶尼喀人。在我们每一个理智的坦噶尼喀人看来,所有把坦噶尼喀当作自己故乡的亚洲人和欧洲人与在坦噶尼喀出生的非洲人一样,都是坦噶尼喀人。

在所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种族关系的问题中,存在移民的联姻问题与非非洲人定居点的土地让渡问题。我们把选择坦噶尼喀作为家园的亚洲人和欧洲人都看作是坦噶尼喀同胞,这一事实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不希望他们被赶出坦噶尼喀或受到任何歧视。但我们只把那些已经在坦噶尼喀永久定居的亚洲人和欧洲人当作是自己的同胞,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当作亚洲、欧洲或美洲剩余人口的安全阀,因此我们公开宣布反对随意的移民行为。

先生,我说“随意的”是有目的的。我们将一直欢迎传教士或能为我们国家快速发展提供必要服务的各种公务员,也会欢迎那些为了来我们国家建立某种工业或与我们做生意的移民……但是,我们反对主要来自欧洲的农民移民和主要来自亚洲的普通移民……大量的土地已经被让渡给了非非洲人。我们从未宣扬非非洲人应当被剥夺土地权的思想,但我们认为 99 年的土地租赁时间太长。在 99 年的时间中,国家的人口可能会增加两倍。因此,土地的租赁时间应当从一开始就是 33 年,在土地租赁合同更新之前,应首先考虑土著人的需要……但还存在已经让渡了的土地的问题:除非把这些土地完全归还给土地应有的主人,否则我的人民将不会满意。我指的是梅鲁地区。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敏感性,所以不打算进行详细的论述。我只是想强调,我们反对这块土地让渡的目的和方式,希望它能够回到它原先的主人手中……

在回答问题时,尼雷尔先生说:

坦盟一方面是一个新的组织,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又是一个有历史的组织。其前身是成立于 1929 年的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该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组织。坦盟大约 10 个月前取代了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成为一个政治组织,而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是一个半社会和半政治性质的组织。

在过去的 10 个月中,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组织,并做好了心理准备。前非洲人协会的一些分支机构自动成为坦盟的分支机构,并分布在坦噶尼喀各地……

从政治上讲,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让坦噶尼喀人民为自治和独立做好准备,坚韧不拔地工作直至实现自治和独立,用符合宪法的方式实现自治,这就是我

们的政治目的。

坦盟的另一个目标是在坦噶尼喀的非洲人中建立一种民族意识。有人说坦噶尼喀是部落制，确实如此。我们意识到应当打破人民的这种部落意识，建立一种民族意识。这是我们通往自治道路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们也已经说过，我们迫切需要在所有行政部门中——在地方议会、立法议会和其他组织，引入选举制。

我们对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也感兴趣。目前在达累斯萨拉姆，我们委员会的一个会员正忙于当地的工会运动。

我们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强烈要求我们的人民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好的经济机会。这些就是坦盟的主要目标……

我们的党不是一个反政府的政党。关于姆万扎问题，我已经说过，也在我给总督的信里写过，我同意牲畜精养是件好事，因为我们不能允许牲畜量无限制增长。但是还有其他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如果有人反对，我们应当尽力说服他们，而不是强迫他们去做。鉴于此，我们说最好是说服人民去精减牛，而不是强迫他们去做。精减牛这件事本可以受到人们欢迎，但由于我们采取的方法不对，反而成了不受欢迎的事。

我们也说过，苏库马人^①把牛当作是一种资本形式。政府强调的重点不应当是减少牛的数量，而是强调养牛业对土地造成巨大的损害，因此牛这种形式的资本应该转化为能给苏库马人带来更多财富，但不会对土地造成损害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我们认为，政府强调的重点应当是资本形式的转化，而不是强调减少牛的数量。如果宣传卖掉一些牛来购买一张犁，或者卖掉一些牛建起某种产业，苏库马人可能会觉得更合乎常理。

可以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反对政府——我们反对政府处理这件事的方式。这原本是一件可以做得受人民欢迎的事情，但政府却强迫人民去做，因而遭到了人民的反对。

① 坦噶尼喀最大的部族，班图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坦噶尼喀中西部。——译校注

4 1956年在联合国第四委员会^①上的声明

1956年底朱利叶斯·尼雷尔再次前往纽约作证。在去纽约的路上他在伦敦逗留数日，与英国议会成员、与同非洲人有关的组织中的名人进行了会谈。在美国，他也与一些相关团体进行了私下接触与对话。

1956年12月20日

朱利叶斯·尼雷尔在第四委员会第579次会议上的声明

逐字报道

在申请听证时我说过，我愿意谈论坦噶尼喀的情况，特别是宪法改革……诸位都知道，我们的国家曾经是德国殖民地。1885年，德国人开始占领我国。1885到1900年的15年间，我国人民拿起弓箭、长矛、棍棒、小刀和生锈的火枪，拼命战斗，试图赶走德国人，但是没有成功。1905年，在著名的马及马及起义中，他们最后一次试图赶走德国人，但再次失败。德国人用一贯的无情镇压了起义，屠杀了大约12万人。

没有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民族主义鼓动者，没有西方化的煽动者，也没有颠覆性的共产党人在这里鼓动人民反抗德国人。人们反抗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白人统治和教化黑人的权力。他们的反抗不是通过恐怖主义运动或迷信的誓言，而是出于本能的召唤，这是一种一直萦绕在所有人心中的一种精神呼唤——不管他们受过教育还是未受过教育，召唤他们反抗外国统治。主席女士，为了理

^① 又称“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处理其他委员会或全体会议不处理的各种政治问题，包括非殖民化问题。——译校注

解像我们这样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本质，记住这一条非常重要。民族主义运动的作用不是创造反抗精神，而是用语言把这种精神表达出来，用一种新的方式把它表示出来。

反抗德国人的斗争使我们的民众看到：试图用武力赶走统治者是无效的，于是他们陷入绝望。后来出现了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委任统治制度的理想正如《国际联盟盟约》第 22 条所述，给了我国人民新的希望。但是，人民并不知晓委任统治的承诺，除了在唐纳德·卡梅伦爵士^①的管理期间外，所有英国总督在管理这个国家时就像这里是英国的殖民地一样，并利用了德国统治带给人民的恐惧。对暴力反抗的恐惧日益严重，因为坦噶尼喀是东非唯一一个在一战中持久而又艰苦作战的国家。

二战以后出现了托管制度。在委任制度下，大家认识到坦噶尼喀土著居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唐纳德·卡梅伦爵士在其执政期间已经明确了这一点。但是参与了托管协议讨论的坦噶尼喀定居者认为，保证土著利益至上至少不应该是托管协议的一条特殊原则。因此，除了处理土地权的第 8 条，《托管协议》的文本完全没有提到土著利益至上这一重要内容。

〔尼雷尔先生进一步阐述了坦盟的政治目的及其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强调了该组织的克制和现实主义。尼雷尔继续论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他说……〕

我现在转到教育方面。在坦噶尼喀，教育是种族化的。不同种族的学生在不同的学校上学。所有欧洲儿童和所有亚洲儿童都能接受初等教育，但只有 40% 的非洲儿童能够上学。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钱使每个儿童都能受到教育；欧洲人除非能够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否则他们就不会来坦噶尼喀，那么非洲人就忍受一下吧。所以这种对非洲人的明显不公，跟其他的不公一样，都是打着为了非洲人的利益的幌子而为之……

去年，政府从敌产托管基金会获得了 320 万英镑的教育基金。在为未来的大学留出 80 万英镑后，政府把剩余的资金平均分配给了三个种族群体：2.5 万的欧洲人、7 万的亚洲人和 800 万的非洲人各获得 80 万英镑用于儿童教

^① 1872 年生于英属圭亚那。1925—1931 年间，成为英国在坦噶尼喀委任统治的第二任总督。卸任后转任尼日利亚总督。1948 年病逝于伦敦。——译校注

育——这在坦噶尼喀叫作种族平等。主席女士，不用说，这种平等会让坦噶尼喀总督满意，但是会引起非洲人的不快。

主席女士，现在中学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的确在增长，也将继续增长，但这个增长是有限的。大约 14 年前我参加麦克雷雷学院的入学考试时，坦噶尼喀只有三所学校能够送毕业生去这个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现在这个数字还没有变，只是增加了一所女子学校。

1949 年和 1950 年，包括我在内共有 5 名非洲学生得到政府奖学金到英国的大学学习。我们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此后，坦噶尼喀的非洲学生除了能去东非大学学院麦克雷雷外，没有其他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在麦克雷雷，坦噶尼喀的学生数量还不及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学生数量，甚至小小的桑给巴尔岛在英国大学的学生也比坦噶尼喀的多。

对于坦噶尼喀这样的国家来说，再怎么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我们通往自治进步和领导力都要依赖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有关普通教育的问题只能通过坦噶尼喀的自治来解决。

在所有的前殖民地和托管地中都出现过同样的情况，所以也不要指望在坦噶尼喀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受过教育的领导层。在过去的 5 周中，我一直在美国各地旅行，试图找到为坦噶尼喀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可能性。同时，我所在组织的秘书也在印度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帮助我们学生在他们国家学习的所有国家，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设施，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帮助我们。

我就此说一下经济发展。非洲经济的发展与土地紧密相联，但我们的土地仍然流失在非非洲人的手中，而且这种土地流失的速度正在加剧。自德国占领以来，坦噶尼喀流失的土地有一半是在现任总督的统治下流失的……我们再三告诉政府，我们一点儿也不想阻止外国在坦噶尼喀的投资，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外国投资，但我们没有打算要付出任何代价。我们准备接受基隆贝罗河谷的蔗糖项目，但前提是非洲人是以合作者，而不是以廉价劳动力的身份参加……

在这里我要谈一谈我们在 1954 年给联合国访问团备忘录中所说的内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托管地，联合国已经承担了监管我们通往自治道路的责任。主席女士，如果我们要求你们为我们的发展担负一点财政责任，算是过分的要求吗？……在坦噶尼喀我们决心要逐渐实现自治的目标，希望那些选择永久居

住在坦噶尼喀的亚洲人和欧洲人都能享受到和非洲人一样的政治权利。我们将反对任何基于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歧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在自己的国家被当作二等公民。因此，主席女士，我请求您说服坦噶尼喀殖民当局，赋予我们想要的东西，那就是：

(a) 宣布坦噶尼喀将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由于坦噶尼喀 98% 的人口是非洲人，这就意味着坦噶尼喀将最终成为一个自治的非洲人的国家。

(b) 修改宪法，给非洲人和非非洲人官员同样的平等代表权。这不是一个民主制度，但是我们要求把这当作是把国家建设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志。

(c) 在成人普选权基础上，实行所有代表成员都经过普选产生。

谢谢您，主席女士。

1956 年 12 月 21 日

朱利叶斯·尼雷尔在第四委员会第 582 次会议上的陈述

5. (菲律宾人)卡皮奥先生问，请愿人是否觉得第四委员会应当设立托管地独立的期限。如果有必要，将是哪一天？

6. 尼雷尔先生(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强烈支持设立一个具体的独立日期。他认为这会消除人民对国家未来的担忧，能加快托管地的发展。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日期，但是他认为坦噶尼喀应当在 10 年内独立。

5 1957年在托管理事会口头听证会上的陈述

1957年,总督宣布首次选举将于1958年在坦噶尼喀一半的地区以普选的形式举行。要保留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代表平等,每个选区选取三名代表——每个种族一名。强制每个选举者使用三张选票,每张选票选举一个种族的代表,否则他的选票就被视为废票。尽管有这些变化,但立法议会中议员多数来自官方的情况仍然存在。

1957年6月18日

尼雷尔先生对托管理事会第818次会议的陈述

逐字记录(摘录)

非常感谢托管理事会再次给我机会让我谈论我们国家的局势……现在坦噶尼喀有什么事情使我们担心?去年在第四委员会演讲之前我提出了一些要求,是我所在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提交给政府要求改革宪法的……我们主张坦噶尼喀政府应当做出一项声明,大意是:坦噶尼喀将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由于98%的人口是非洲人,这自然意味着坦噶尼喀将要成为一个以非洲人为主的国家。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声明在坦噶尼喀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多种族社会。被英国控制过或正在被英国控制的所有非洲多种族国家中,实施的政策都导致占人口多数的土著人被由占人口少数的移民组成的政府所控制……同时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的国家将要建成一个民主国家,因此需要对宪法做一些修改,作为使坦噶尼喀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意向。我们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当前的坦噶尼喀宪法规定,立法议会有10名非洲人代表,10名欧洲人代表和10名亚洲人代表。这意味着尽管非洲人占国家总人口的

98%，但在立法议会中仅占 10 席，而非非洲人却占 20 席……我们建议增加非洲代表的席位，使之与非非洲人的席位相称，因此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对等——平等权。我们还建议非官方方面，即代表方，应当有 16 名非洲人，非非洲人应当有 16 名代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情合理、温和的要求，所有希望把坦噶尼喀建成民主国家的人都会接受这个建议。但出人意料的是，该建议首先遭到了亲政府的坦噶尼喀联合党的指责，他们说这个建议是不民主的，与坦噶尼喀联合党的原则相悖……我们提出了另一个要求。我们一直在要求，我们的代表必须经选举产生，而不应当是由殖民地总督来任命。我们要求应当举行选举，要求立法议会的所有成员都应当通过全民普选产生。我们将于明年举行第一次选举。

我很高兴地说，政府至少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一项原则，也就是在坦噶尼喀我们不应该有社区选举，那样会使人认为非洲人应当选举自己的代表，亚洲人和欧洲人也选举他们的代表。我们认为普选制是一件好事。政府现在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但仍然坚持选举权应当受到限制……

毕竟非洲人将成为主体，这一点使人满意。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的大多数人民，大多数纳税人都没有选举的权利……即使在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欧洲人，没有一个亚洲人，我们也反对限制选举权的观点，因为这是对多数人的歧视，其中包括那些接受纳税义务、愿意为国家战死的人们。但是这些人却得不到选举权……

如果我们仅仅对 800 万非洲人感兴趣，我们就只要求成年人普选，而不用考虑少数民族的代表问题了。我们会继续争取席位，可以想象到如果没有亚洲人或欧洲人会获得席位，那些仅关注非洲人利益的种族主义者会非常高兴。但是，我们意识到亚洲人和欧洲人都是坦噶尼喀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像我们现在争取平等选举权的过程一样，直到有一天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要求种族代表，我们将会逐渐给他们留出席位，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留出席位，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主体。

然而我再次重复，我们又受到了指责，指责我们不相信渐进的发展。如果我们不相信渐进的发展，我提出的最大的要求怎么能是在立法议会中我们与少数民族一起占 50% 席位，也就是在有 65 位议员中，非洲人仅有 24 个代表。他们指责我不相信渐进的发展。如果这都不算渐进的发展，那这又算什么呢？我

们当然相信渐进的发展。

在第四委员会,我被问及一个问题:你认为你们国家要多长时间才能独立?我说是 10 到 12 年。难道这也不算是渐进的发展吗?我原本可以说:“现在就自治。”

6 我为何辞职

1957年上半年，朱利叶斯·尼雷尔被禁止发表公共演讲数月之后，在7月再次被指定为立法议会的代表。不到6个月他再次辞职，并在党报《坦盟之声》上阐释了自己的立场及其作为立法议会代表时采取的政治态度。

1957年12月16日
坦盟《坦盟之声》第18期

1. 当我被提议作为立法议会指定的成员时，我以为政府的提议是为了表明他们改变了看法，因此我接受了提议，希望政府看法的改变会表现出一种相互让步的精神。在过去的四个月中，我做出了一系列的妥协，以便使政府能够理解我的让步苦衷，推动民主进程的发展。

单议席选区

2. 首先，我接受立法议会的指定是一个让步，因为我反对继续实行任命制。其次，我反对1:1:1基础上的政府选举制度，先是通过媒体，再通过我们给殖民地秘书的备忘录，我建议，一半的代表可以通过政府的1:1:1计划任命，另一半通过单议席选区选出。

宪法委员会

3. 我曾经建议，如果政府现在不能改革宪法，至少可以任命一个宪法委员会来研究宪法，并就宪法和选举权问题提出建议。这就意味着当前的宪法还会继续有效。我们也期望该委员会会花费一些时间撰写自己的报告，然后政府要

花时间研究和评估该报告。因此，当前的宪法延续使用的时间会比我党预先估计的时间要长。

所有选区选民的平等

4. 我向立法议会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取消现存的强迫性的三方选举制（这是一个小要求），在全国实现普选。我故意忽略了平等的问题——这是对我的第二个妥协的折衷的做法。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妥协，而完全是一个投降。我现在愿意接受基于政府 1 : 1 : 1 计划的选举，不是为了一半的代表，而是为了所有的代表，即所有选区的选民。

三方选举

5. 在对我的动议进行辩论期间，产生了一个修正案，它忽略了我动议的第二部分，即要求取消强制性的三方选举制。在这个修正案中我故意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为政府创造了一个机会，使之能够通过消除人民的愤怒（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秘密）来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而在几个月前政府就有这个意向。但政府对该修正案表示反对，这明显表明了政府为了一个合乎逻辑却荒谬的观点而持反对态度。

妥协

6. 如果我的动议如修正的那样得以实施，也就会意味着 1958 年 9 月以后，立法议会将会有 15 名民选出来的委员。由于我自己所在的选区没有计划明年的选举，我可能会作为一个指定委员与其他 16 名指定委员一起坐在立法议会上。这是一个最妥协的让步！

《地方政府议案》

7. 我反对《地方政府(修正)议案》有很重要的原因。当提出的议案要进行第三次宣读时，我本应当提出一个“该议案不应当被第三次宣读”的修正案，这就不会给政府一个做出友好姿态的机会。但是我有意提出一项修正案，认为该议案可以在 6 个月后进行三读。这就再次给了政府一个获得民众及其酋长们信任的机会。政府知道酋长们反对这个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酋长代表几周后

将在姆宗贝集会。我提醒了政府这一事实。非常感谢巴尔顿先生,他就我的修正案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提出议案的三读应该在明年二月的立法会议之后。我接受了他的修正。这是为政府提供的一次绝佳机会,便于向酋长及其民众表态,尽管这个表态不一定就是表明该议案将永远不会成为法律,但至少可以表明政府愿意花时间来缓和人民的担忧。

8. 如果该修正案被接受,那就意味着该议案很可能会被通过,尽管该议案力求建立一个忽视我们传统统治者的地方政府机关,而这些传统统治者在地方政府层面提供的稳定的因素,是中央政府层面无法达到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冒险。

自发的民主进程

此外,政府设立地方议会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由多种族构成的议会。政府自己承认,在56个土著区议会中有36个自发邀请了非非洲人参与。我向政府指出,应当继续这样做,这是那些根植于传统权威的地方议会自发的民主进程的范例,可以在不引起任何激愤的情况下,实现两个目标。这些地方议会应当是现代的、民主的,但是传统成分仍然是议会的基础和标志,非非洲人自愿地被雇佣,政府应当给予这些地方议会更多权力。我这个被称为煽动者和种族主义者的人,实际上是向政府建议如何不激怒酋长及其民众就能实现目标。

我必须再次申明,反对任何激怒酋长及其民众的不必要的行为,这自然将会使他们怀疑在其议会中非非洲人存在的必要,将会阻碍主动权已经掌握在酋长及其民众手中的种族关系的发展,将会产生种族矛盾。在我们摆脱英国统治后,我们将不得不尽力消除这种矛盾。

不必要的招致种族怀疑的行为

9. 引起不必要的愤怒是在非非洲人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与他们没有关系,长期看来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益处。这些人造的、不必要的种族愤怒可能是为了延缓民主的自治政府的建立,但我希望事情到此为止。我真诚地希望它们不会使我们的国家陷入种族怨恨的泥沼。

欺骗公众

10. 政府连续以最不令人信服的理由驳回了我在立法议会提出的每一项

建议,其中很多建议是我在原先我们组织提出的一些建议基础上做出的一些妥协。如果我认为我在立法议会中的作用只是付出,而永远没有回报,我仍然会辞职:我已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出了一切,但我的付出却遭到反对。我之所以参加立法议会,只是希望能够看到一点相互让步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却荡然无存。如果我继续留在议会,作为一名荣誉议员拿着津贴,享受着幕后的小酌,别人以为我还在为议会工作,实际上我什么作用也没有,我感觉这是在欺骗人民,欺骗我的组织,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正式提出辞职,要求我的辞职自1957年12月14日周五,即我的最后一个妥协遭政府反对的那一天开始生效。

7 国民财产

下文节选自1958年出版的宣传册《国民财产》，是朱利叶斯·尼雷尔就政府对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新立法议案的评论。尼雷尔称，当时他正在阅读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困》^①，对书中精彩论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财富的第二种形式——雨水和土地——只是上帝给予其子民的礼物。我们获得的雨水中没有任何人的努力，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都能获得同等的雨水。同样，土地也不包含任何人的努力。所有的人，不管是出生于贫苦家庭还是富裕家庭，不管他的父母是圣人还是罪人，甚或父母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生来都会发现土地的存在，他们既不能增加土地，也不能减少土地，因为土地是上帝公平地给予其所有子民的礼物……

财富所有权源自哪里？是什么促使一个人宣称某物属于他自己？一个人是从哪里获得拥有某物的权利，而反对其他人对该物的所有权？这种权利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一个人不是任何另外一个人的财产。他拥有自己，他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人。因此，如果说一个人拥有他自己，那么很明显，他的身体、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就不可能是其他人的财产。所以，当他用自己的智慧、健康和能力去创造什么的时候，那么他创造的东西就属于他自己。土地是上帝免费给予其子民的礼物，使其子民用于现在和未来。当我用我自己的体力和智慧清理出一片土地供我使用的时候，很明显我正在改变上帝赋予我们的礼物，使之能够满足我个人的需求。不过，这片土地确实不属于我，只是我在开垦土地时所付出的努力使我能够宣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但属于我的不是土地本

^①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政治经济学家，1879年出版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把土地私有看成是社会贫困的根源，主张平等拥有土地，实行土地公有制。——译校注

身,只有我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动,这片土地才算是我的。通过开垦土地,我增加了这片土地的价值,使之能够满足人类需要。任何想拿走这片土地的人必须要为我开垦土地所付的辛劳付出报酬。

我已经说过土地是上帝赋予其子民的礼物,让其子民用于今天、明天和后天乃至将来。应该注意到,我在这里故意省略掉了“昨天”,因为昨天拥有这片土地的人和其他人一样都不再拥有这片土地,他们只是临时的租户,在租期一过的那一刻,土地就不再属于他们。不过,现在我们有时间,也有权利来做土地的租户了——但我们也只是临时的租户。当我们的租期一到,其他的租户将会把这片土地的所有权拿走——这样的变化将会一直延续到世界末日那一天。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只是自己房屋的临时房客。我死后我的继承人将成为该房屋的新房客。但是,这种租赁与第一种土地的租赁稍微不同——因为我的房子永远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能够把它带到天堂,我无须征求任何人意见就可以那样做,甚至不用告知我的继承人。我也完全可以放火烧掉我的房子,尽管这样人们会把我当作疯子。但我完全可以这么做,人们指责我的做法没有任何理由,除非是站在正常人应有的习惯做法——在死的时候把房屋留给继承人。正是这种理性和习惯,再加上我对房屋的所有权,赋予我可以把房子留给任何我喜欢的人——这是因为我有权把自己拥有的任何物品留给我选择的任何人。

但是,我有权把不是我所有的东西送给他人吗?不,我没有任何权利这么做。同样,当前的一代人也不能给予下一代像空气、水和土地这样的物品。所有的这些东西属于未来的一代,不是因为人性、习惯或任何人类规则,而是因为传统的法则。在我们租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放弃,为其他人腾出空间。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为他们制定规矩,通过传统法则迫使他们遵守这些规矩。我们只能给他们提出建议。我们不能强迫他们,因为我们并不拥有土地、空气或水,这些都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礼物——是今天的,明天的,也是后天的。

因此,根据传统法则,如果我们只是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的租户,我们又从哪里获得权利把土地分给其他人,让他们宣称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就像他们对自己手中的笔的所有权一样呢?正确的答案是:我们无权把属于别人的东西分掉。

政府意图消除轮耕带来的危害。关于这一点我支持政府的做法,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找到能够立刻解决的办法。然而,我反对政府提出的解决轮耕

问题的方式。完全保有的土地所有制能够解决我前面已经提到的许多障碍，我同意这一观点，但这一解决方案只会引起更多的比现存问题更难解决的其他问题。

在如此篇幅的小册子里不可能提及完全保有的土地所有制所带来的全部不足。我希望自己已经清楚地解释了声称对土地所有权与声称对房屋所有权一样是多么荒谬。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反对完全保有的土地所有制。我们也反对政府提出的建议，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完全保有的土地所有制将会带来更多问题。

一旦你把土地给一个人，让他像使用房子一样使用土地，你就不能阻止他随心所欲地使用土地了……如果人们像得到财产一样得到土地，他们就有权出卖土地。不难想象，50年后谁是地主，谁是佃户。在类似我们这样的国家，通常地讲，非洲人较穷，而外国人很富，如果允许自由买卖土地，那么在80年或100年之内，非洲人将成为租户，坦噶尼喀的所有土地都将属于外国人。但是，如果坦噶尼喀没有富裕的外国人，会出现富裕的、聪明的坦噶尼喀人。如果我们允许土地像衣服一样自由买卖，在很短的时间内，只有少数的非洲人在坦噶尼喀拥有土地，而多数人会成为佃农。这样危险的情况在乌干达和其他地方都出现了。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只要全世界人类的野心和弱点都一样，就没有理由让我们希望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度……

如果人们分成两个群体——地主们的小群体和佃农们的大群体，那么我们将面临一个在民众之间产生对抗并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导致流血事件的问题。我们的祖先拒绝采用完全保有的土地所有制，使他们避免了这种危险，我们也会有一群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生活，完成上帝给我们规定的法则。但是有一群人什么工作都不做，只会等待剥削别人的劳力，吸吮穷人的鲜血。这些吸血鬼甚至不允许穷苦的工人们获得他们应得的报酬，这些剥削者通过收取极高的地租榨干劳动者的劳动，使他们只有勉强能够果腹的食物来维持生命，以便更好地为这些剥削者服务。因此，一个群体将会不劳而获，而另一个群体则将只劳不获。

当许多人都接受一种制度，允许少数人声称对上帝赋予所有人的土地的所有权时，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自愿地接受奴隶制。不被买卖也可以成为奴隶。因为你使用他的土地，你的劳动力就会受到盘剥，那么你就成为他的奴隶了。上

帝赋予我们礼物——土地、空气和水，并让我们使用，但需要得到某些人的许可——这绝不是上帝意图。任何通过法律的形式允许这种行为存在的国家都是在接受自愿的奴隶制。类似的情形已经出现在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坦噶尼喀……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每个人在某种规定的约束下得到土地，但是在约束下得到的土地不是完全保有所有权的土地，而是一种根据地契年期而拥有的土地。拥有契约土地的人享有那些完全保有土地权的人所有的权利，但是不会经历后者所面临的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仍然归公共所有，但是土地的契约所有人会得到公众，即他的所有公民伙伴们的承诺，不会干涉他如何使用这块土地。此外，如果他想得到贷款，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作为担保。在契约中会规定他在使用和保持这块土地时必须遵守的规则。头两条要求与契约持有者本人相关，只要能满足这两条要求，契约持有者就可以耕种土地或饲养牲畜，而不必担心土地被收回或缺少资金。一旦一个人有了他所需用的土地，并保证他不会被驱赶出这片土地，保证他能够获得一定的资本，实际上他就拥有了所有可以把他的力气和汗水转化为能满足他所需的一切，他不再需要其他别的东西了。土地租赁制可以给他三样东西：足够的土地、安全保证和筹集资金的方法。除此之外，一个人还会需要什么呢？

但是，由于土地属于公共所有，其他的公民也有权对土地的使用制订规则。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一个人一旦停止使用某块土地，他应当立即把土地归还给公众。在给予他所需的三个条件满足他的个人需要后，公众有权收回人们不能使用或不愿使用的土地，以满足公众的需要。这对保护公众的权利来讲是一个必要条件，可以避免那些贪婪的人囤积土地而不使用。这两个要求——一方面是土地使用者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公众的要求——都可以通过土地租赁制得到满足……

同样，在考虑到当前的传统土地制度或土地租赁制的优点和缺点时，必须要忘记政治方面的考虑。由于我们的政府是外国人控制的政府，非洲人害怕所有那些授权政府控制土地的法律。根据非洲的传统，非洲人知道土地属于部落，所以在传统上对土地有所有权。所以，把控制土地的权力让给一个外国人控制的政府就等同于他的土地被夺走，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但是我说，我们必须首先忘记政治，考虑农业的问题。过去，当我们分布在

不同的部落时，土地属于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部落。但是在将来，我们将被团结为一个国家，土地将属于国家。正如现在一个人不能阻止同部落的另一个人使用本部落的土地一样，将来一个部落也不能阻止另一个部落使用土地，因为土地是整个国家的财产。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达成一个分配土地的协议，使每个人的土地需要都得到满足。我认为没有比土地租赁制更合适的做法了。

一些当地人可能会对土地租赁制暗含的一些规则感到不满。其中的一条规定就是必须每年支付租金。没有多少非洲人习惯为自己使用的土地支付租金，因此肯定会对支付租金发出抱怨。如果租金的数额较小，那么这种抱怨可能只是习惯性的，而不会因为什么其他真正的原因。有一些非洲人习惯支付地租，也有一些非洲人，尤其是住在城里的非洲人，习惯支付房租。但是有一点是根本错误的，那就是一个人使用上帝免费赠予他和他邻居的土地，却要向另外一个人支付租金！但公民权的义务却是自然而然的因素，人们为了捍卫公民权利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把税金支付给政府，而不是支付给个人。我们自愿交纳税金是为了加强和捍卫我们的公民权，政府的税收是公共税收，其根源在于公民义务这一自然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不管是欧洲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只要租赁土地，都要交纳地租。这是一种完全公平的租金，实际上，可能也是唯一公平的租金。

那么，出现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租金，关于租金数目的大小和民众支付租金的能力……

如果土地租赁制证明很难实施，那么政府有责任修改土地租赁制的有关规定，使每个人都能轻松地执行这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的存在是必需的，因为要得到好的东西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传统的土地所有制所有的弊端必须要消灭，但是它的长处我们必须要保留。另一方面，鉴于我上述的几个原因，完全保有的土地所有制是毫无用处的。土地租赁制是最好的，即便我们要付出很小的代价，我们也有义务实施土地租赁制，因为这样会使我们摆脱旧的土地制度，避免出现与完全保有的土地所有制相关的奴隶制……

8 非暴力手段

在1958年5月27日的《坦盟之声》^①中，尼雷尔批评了两位官员，后来他因此受到审判，并被判诽谤罪。下面的内容节选自这份报刊，但不包括批评官员的部分。

1958年5月27日
《坦盟之声》第29期

我们不恐惧法律。如果警察能够置身于政治之外，在遵守法律的公民和其他的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包括丛林统治者之间，充当一个公正的裁判，那么法律将成为我们最伟大的朋友。疯子们一直在试图煽动人们使用暴力，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们仍然是一个遵守法律的团体，我们实际上是战无不胜的。他们也明白，过去关闭坦盟分支机构理由多么令人尴尬，所以需要找到更好的理由。如果坦盟拒绝为他们效劳，他们会堕落到使用卑鄙的煽动手段来达到他们罪恶的目的。

我要求政府像我们发起反帝国主义的战争一样，坦诚地发起一场反对坦盟的战争。殖民主义对我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将不屈不挠地发起一场坚定的战役来反对殖民主义，直至我们获得自由。我们将不使用暴力。我们不会降低身份采取不诚实的手段，我们采取的手段将和我们的目标一样没有污点。我们要公开宣扬我们采取的手段，就像我们公开宣扬我们的目标一样。我们不会

^① 1957年由坦盟创办，以英文和斯瓦希里文两种文字发行。1961年12月，坦噶尼喀独立后，坦盟在该报的基础上创办了斯瓦希里文周报《自由报》，1964年改为日报，成为坦盟的机关报。——译校注

屈从于殖民主义的羞辱。

非洲同胞们,加强警惕! 我们的敌人在冷战中失败,因为他们没有反对我们的根据。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煽动暴力,以便于他们可以对我们使用武器。

不要给他们这个机会,不要受到煽动来使用暴力。要保持我们惯有的平静和好脾气,因为敌人注定要失败。

9 兄弟越来越多

本期的《坦盟之声》指出了坦盟在爱德华·特文宁爵士^①任总督最后一段时间的一些活动,以及坦盟对周边地区民族主义力量给予援助的早期承诺。坦盟之所以有能力这么做,是因为它的成员分布广泛(而且现在的成员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并接受了财政资助。但是坦盟从来不是一个富有的组织,它花钱的速度和获得资助的速度一样快。

1958年6月20日
《坦盟之声》第32期

兄弟越来越多

从我们同情东非饮料公司的工人罢工、号召区域性联合抵制欧洲饮料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联合抵制几乎完全成功,而且是自发的、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满了,他们不喜欢这种联合抵制。他们指责坦盟介入工会的事务。

分而治之

这种不满与嗜酒无关。对我们而言,指责这些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希望每个坦噶尼喀人都酗酒是不公正的。我想,在他们清醒的时候,他们应该意识到(而非赞赏)坦噶尼喀人从来没有像近七周来这么冷静。他们不喜欢的是这个国家

^① 英国殖民官员,曾在乌干达、毛里求斯、圣卢西亚和北婆罗洲供职,1949—1958年任坦噶尼喀总督。——译校注

民众表现出来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帝国主义将越来越难通过分而治之的方法统治和剥削非洲人民。

同样的原因

我们的肯尼亚朋友正在因为反对伦诺克斯·博伊德宪法而遭到指控。我们坦盟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给了这些朋友一张 5000 先令的支票，来帮助他们支付法律辩护费，并号召全国在 5 月 27 日绝食祈祷，在 5 月 27 日和 28 日这两天停止吸烟。

同时，我们的尼亚萨兰^①兄弟们也向我们提出资金援助，帮助他们往英国派出一个代表团来提出他们的宪法改革。此前，坦盟已经给了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足够的钱，来支付一位代表团成员的往返机票。

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再次对此抱怨，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贫穷的坦盟成员给予我们危难中的兄弟的资助是一种自我牺牲，而是不喜欢这个行为隐含的意义：非洲人更大范围的团结。如果非洲的所有非洲人都团结起来，帝国主义者肯定滚蛋。

我们为肯尼亚和尼亚萨兰兄弟们的安全和成功祈祷。实际上，不管他们在何处从事斗争，都会恢复我们伟大的非洲大陆上的自由和尊严，为整个世界的自由和人类尊严作出贡献……

^① 今马拉维。——译校注

10 坦噶尼喀将由非洲人主导

在法庭审理尼雷尔的程序开始后至最后的听证与宣判日期之间，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①来到达累斯萨拉姆担任新一任总督。初期的一场私人会晤使坦盟领导人相信，宪法改革可能会出现新的转机。因此，尼雷尔先生用支付罚款来代替入狱。这也意味着坦盟的主席可以自由参加坦噶尼喀的首次选举，并以 2628 票对 802 票的优势击败竞争对手，被选举为东部省的代表。

在 1958 年和 1959 年举行的选举中（大选分为两部分进行），坦盟及其支持的候选人获得了他们竞争的所有席位。尼雷尔先生被一致选为坦噶尼喀获选议员团体的主席，实际上成为立法议会反对派的领袖。

1958 年 10 月 15 日 议会议事录，第 34 次会议，第一卷 答复演说

尼雷尔先生：议长先生，为了支持尊敬的马鲁马酋长提出的动议，我很高兴地和他一起，欢迎特恩布尔总督及夫人来到坦噶尼喀。（掌声）

先生，殖民地总督是殖民状态下殖民地延续的一个象征。因此，像坦噶尼喀这样正在争取自由的殖民地要欢迎新任命的殖民地总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这个总督有特殊的使命来结束该国的殖民地位。但是我相信，先生，大家都认为，在总督阁下来到这里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赢得了所有地区人民的尊重。（掌声）

^① 英国在坦噶尼喀殖民地最后一任总督（1958 年 7 月 15 日—1961 年 12 月 9 日）。——译校注

先生,昨天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总督阁下的一个重要声明……他说,关于多种族政策方面,在这个国家有一些误会和误解。而且,他更愿意用“非种族”这个词。先生,现在确实有一个误解,而且这个误解一直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误解。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多种族。英国在人种上是多种族的,美国和印度也是,但我们没有听说过英国的多种族政策,也没有听说过在美国或其他多种族国家有多种族政策。在我们国家如果强调多种族政策,我们会有充足的理由感觉坦噶尼喀的多种族政策一定有什么危险的成分。我们希望能够清楚了解多种族政策的含义,这样会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都生活在一起,而为什么在坦噶尼喀我们要强调“种族”一词——不管是多种族还是非种族。先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身怀敬意,但却不喜欢“非种族”一词用在坦噶尼喀的任何政策中……

在这个国家我们想要什么?在这个国家,我们想要的只是坦噶尼喀的任何居民,不管他的种族如何,只要效忠于坦噶尼喀,就是一个和其他人完全一样、平等的公民。(掌声)

先生,过去我们已经郑重声明,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个国家达到那个阶段。但不幸的是,政府一直拒绝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将帮助人民毫无保留地争取建立一个无论种族如何,每个人都是平等公民的国家。先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昨天上午总督阁下做出声明时,我很高兴,认为这个声明是总督阁下做出的最重要的声明。

总督阁下说:“另一方面,人们一直计划当自治政府最终成立之后,立法议会和政府都将由非洲人主导,但绝不会影响那些以坦噶尼喀为家的少数种族人的安全和利益。”先生,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位这样的总督,一位即便只是暗示在自治政府建立后非洲人在国家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总督。

这个声明我们已经等了很久,它蕴义丰富,因为一旦做出了这样的声明就会消除非洲人的担忧,就会给非洲人以责任重担,非洲人会感受到这个责任,并采取人们期待的负责的态度,但是如果政府不给人民清楚的责任,人们就不会对他们有期待。只要非洲人感觉到政府不打算让他们成为未来的民主一分子,那么如果他们没有做到人们期待的那么负责,那也会被人原谅。先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感到总督阁下昨天的声明十分重要。我要把这个声明告诉全国各地所有的人,因为这个声明对我们的未来意义重大。它强调了曾经有人说

的：非洲人不应当担忧。由于得到了这个保证，现在我深信，如果非非洲人还有什么担忧，那么非洲人将会努力去消除这些担忧，而且很快就会消除……

先生，最后我想说，听到总督先生声明政府计划在行政部门招募当地人员，我有多么高兴。而且我希望，先生，政府将有力地实施这项计划。

先生，我用上面所说的话，支持马鲁马酋长提出的动议。

11 水与土地的所有权原则

1958年10月17日
议会议事录,第34次会议
《1958年水法案》

尼雷尔先生:议长先生,在我看来,这项议案中所涉及的原则可能会被人误解,因此我站起来只是想说一下法案的原则问题……先生,我感觉我们必须支持这一原则。我想说,像水和土地这类东西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策,因此我强烈支持法案背后的原则,即水的使用权必须归国家所有。因为正如尊敬的卡瓦瓦先生所说,一个地区利用水资源的好坏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如果政府不能整体规划利用水资源,而是毫无规划地任意分派,那么将来我们会很多麻烦,在像坦噶尼喀这样水资源缺乏是最大问题的国家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缺水的地区可能会希望从水资源较为充沛的地区获得水。如果政府本身不能对水有最终控制权,我不知道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

12 坦盟的五位部长

1959年3月第二次选举后,政府宣布任命新的宪法委员会,并提出改革宪法的建议。建议包括成立一个由12人组成的部长委员会,在可能的情况下,5人将来自民选的非官方人员,其中3人为非洲人,1人为亚洲人,1人为欧洲人。

由于所有被选举出的非洲人都是坦盟的成员,被选的非非洲人也因为得到坦盟的支持才得以当选,所以这些建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所做的反应。

1959年3月19日 议会议事录,第34次会议 答复演说

尼雷尔先生:……我们现在是一个托管地。我们在说什么,先生?在非洲的这块即将获得自由的地方,管理我们自己的权力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坦噶尼喀的人民,要求英国做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已经明确地声明过了。那就是管理我们自己的权力要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即将获得自由。对我们而言,我们要求英国人民做什么了?我们没有向他们要求独立。不,先生,我们没有向他们要求独立,尽管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甚至没有请求他们建立一个完全负责任的政府。不,先生,我们没有。我们请求他们建立一个半负责任的政府,要求一条负责任的措施,即拟定具体条款给由大多数当选议员组成的议会,给大多数当选部长以行政权。这就是坦噶尼喀人民的要求……我们一直在考虑政府给我们提出的这些议案,我们为什么接受这些议案?我们接受这些议案不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坦噶尼喀人民的要求。不,先生。我们接受这些议案是

因为，伦敦殖民地办公室很可能会有某个人说：“坦噶尼喀人民真的能够管理好自己吗？”可能在别的地方还有人会怀疑我们能否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先生，我们接受这些议案，把它们当作一个挑战，当作是对坦噶尼喀人民的挑战……来自我们的5名部长，他们要坐在议会的另一边；但每当他们坐在那里就会提醒其他7人，那根本就不是你们该坐的位子，你们应该坐在公务员的位子，作为公务员你们可以为国家提供最大的服务，因为你们受到培训就是为了做这些服务。先生，我想我应该说清楚……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怎样的坦噶尼喀？先生，是一个不同的坦噶尼喀。我们有强劲的、由所有部落支持的民族运动。这不是一场一个部落吞并另一个部落的民族运动。不是的，先生。这是一场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完全不等同于某一部落，而是由所有部落、所有酋长都支持的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有些人会有怀疑，但我内心却没有丝毫怀疑。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怀疑主义者。就在几天前酋长们把坦噶尼喀人民和他们的酋长之间的这种团结写下来时，还有人继续怀疑这种团结。后来这些怀疑主义者终于说：“酋长们和人民真的团结在一起了。”

13 个人人权

作为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组织的执行主席，朱利叶斯·尼雷尔 1959 年 9 月在莫希举行的该组织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并利用此次机会表明了非洲政治的大背景下他对种族平等的态度。

1959 年 9 月

主席在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组织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

……在其他事项中，在本次会议上我们还要讨论联合抵制南非产品和在非洲进行核试验的问题。现在是 1959 年——而不是 1884 年，在非洲我们苦恼的是，一个坐在巴黎的政府决定非洲的哪片土地用来进行氢弹试验，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他们没有问过任何人，就在我们的非洲大陆上选择一块地作为试验地点。非洲人可以抱怨，可以抗议，但这些抱怨都被不予理睬。我们不能继续忍受这种侮辱了。在非洲必须自治的时候，我希望外界会理解我们。

但是我想再次强调，非洲对自治的要求无关于对任何人的敌意。非洲人很有幽默感。他们进行这场战斗是因为他们知道一定能赢。他们对胜利有足够的把握，因此他们可以一边战斗一边大笑，而战斗另一方的那些家伙将会溃败。

这是我想向新闻界的人澄清的另外一件事。一些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这里就人权问题正在赢得外界对我们的同情。我们正在告诉外界，我们正在为自己的人权而战。我们得到了世界各地——亚洲、欧洲和美洲朋友的同情，他们承认我们对人权的要求是正义的。真的会有人相信我们会践踏人权吗？为什么我们一听到说美国小石城的人就会气恼？因为我们认可美国黑人是人。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不是黑人——当看到他不被当作真正的、平

等的美国公民对待时,我们都会感到极为愤怒。在我们独立后,我们难道会转身改变观点,说“去他的有关人权的玩意儿!我们只是把人权当作是用来博得那些天真的人的同情心的手段而已”这样的话吗?我知道人的本性有时是邪恶的,但我认为不会邪恶到那种程度。我认为一个民族的领导人不会像伪君子一样,达到目的后转身改变观点,来做他们一直在反对的事情。我再次向我们的东非的非非洲人朋友们强调,当我们说在我们的国家建立不分种族的个人权利时,我们言出必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建立特权社区,那样就太过分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做。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保障每一个个人的权利。史密斯先生问:“我是坦噶尼喀人,我有选举权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当他问:“我有权站起来做选举的候选人吗?”我们说:“是的。在这个国家中你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有和其他人同样的机会。”如果史密斯先生问:“我有一块土地。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对我的土地我有所有权吗?”我们会告诉他:“是的,当然你有所有权。”人们不能要求我们做的——如果我们说能做就是在撒谎——就是把某一块地留给亚洲社区、欧洲社区或任何其他社区。我们不能也不会那么做。我们承认个人的权利,我也向我们的非非洲人朋友们呼吁,让他们相信在这一方面我们是真诚的。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作为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吗?他们会得到的。或者他们想要非洲人说:“让我们保留阿拉伯高地、伊斯玛伊派^①高地、印度低地……?”坦白地说,我们不能那么做。

^① 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支。——译者注

14 乞力马扎罗山上的蜡烛

尼雷尔先生详细说明了坦盟在 1959 年责任自治的要求,明确表明坦盟拒绝接受长期延续的“有民选部长参与的公务员政府”。坦盟要求一个“仍然有一些公务员要参与的民选政府”。他强调坦噶尼喀人民对和平宪法进程的渴望,欢迎在 1960 年要举行新选举的通告。

1959 年 10 月 22 日 议会议事录,第 35 次会议 答复演讲

……我以前在别的地方说过,坦噶尼喀人民要点亮一支蜡烛,把它放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山巅。烛光将穿越国境,给绝望的地方以希望,给仇恨的地方以爱,给只有羞辱的地方以尊严。我们恳请英国人民,我们诚挚地恳请英国人民和我们各个种族的邻国,不要把坦噶尼喀和我们在做的事情看作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一缕希望的光芒。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无法把火箭发射到月球上去,但是我们能把希望和爱的火箭发射到我们所有的同类的人那里,不管他们身在何处……

15 种族问题需要经济举措

1959年12月：节选自一篇发表在美国《非洲特别报道》杂志上名为“我们输不起”的文章。

……我们最关键的几年将是独立后的头几年。在这开始的几年中，我们迫切需求外援，以便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足以成功克服遗留下来的贫穷、疾病和无知。然而，如果历史重演，在这几年中，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富国——即便是其中最友好的国家——也会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们。当然，也有人提出要帮助我们，但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些提议中很多都是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的，因此也是毫无价值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将不得不弃之不理。

我已经强调过，尤其在我们国家独立后的头几年，我们对外国投资的需求巨大，因为坦噶尼喀社会结构错综复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势在必行。在这个国家，和在其他多数非洲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一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区分恰好几乎与种族的划分一样。在人们能看到高生活水平时，同时又存在极度贫穷，这就有产生怨恨的危险；当这一问题与种族差异相关时，就比在单一种族社会中具有更大的潜在危险。

目前，非洲人能够看到，自己不是与其他种族的人进行对抗，而是在与殖民制度本身进行对抗。非洲人不会把自己对殖民制度天生的憎恶变为对亚洲人或欧洲人的个人不满。但当独立来临时，我们必须迅速解决这种经济上的纠纷。如果我们不能迅速缩小经济上的差距，使得经济地位的差距变得不再明显，首先使得经济差距不再与种族区别联系起来，那么潜在的危险就可能变为现实，经济问题就会把我们带回我们声称已经解决了的种族问题。

一定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单单是坦噶尼喀的悲剧。在我们国家之外的极端顽固分子和死硬分子——那些我们试图改

造的怀疑主义者——将把我们当作是“可笑的教训”，而不是好的范例。他们将毫无顾忌地利用这个“可笑的教训”来应对他们根深蒂固的特权地位所面临的危机，把我们的困难归咎为“被误用的民主”。

坦噶尼喀已经展示了能够通过教授占人口少数的移民学会信任多数人的友善的方式来解决“种族问题”。未来几年我们能否解决并存的经济问题，将决定整个东非、中非和南非的未来格局。

16 关于责任自治的提议

1959年12月,总督宣布在1960年大选之后将引入责任自治,同时还宣布新的、更大范围的选举权条件,为少数民族留出席位,这样会消除原先的种族之间的“平等代表权”,但仍然会给予少数民族超出他们数量比的代表席位。在立法议会的辩论中,坦盟的领导人解释为什么接受这项达不到他们要求的安排。

1959年12月16日 议会议事录,第35次会议 答复演说

先生,在十月份的立法议会会议上,总督阁下宣布明年在坦噶尼喀举行大选。我代表议会中的反对派对总督的声明表示了欢迎,但是总督阁下并没有告诉议会,明年的选举是否意味着给予这个国家一个责任政府,因此我们要求政府和国务大臣在本年度结束前消除人们的这个疑问。我进一步阐述,尽管我们一直迫切要求今年能够成立一个责任政府,但是我们准备好一旦消除这些疑问,我们会要求全国人民在明年接受一个责任政府,以表示我们的善意。议长先生,那个疑问现在已经消除。总督阁下也宣布将给予被选举出来的多数人对该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我认为,与坐在我们面前、只为总督负责,并通过总督为殖民地国务大臣负责的现行政府不一样的是,新政府将为本议会负责,并通过本议会为坦噶尼喀人民负责……换句话说,先生,明年的政府将是一个真正的责任政府,一个为坦噶尼喀人民负责任的政府……

先生,我们欢迎结束原来的不满,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正在消亡的旧秩序的代表之间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对抗而引起的不满。我们欢迎新秩序的到来,欢迎

全国人民、人民代表之间的通力合作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令我们自豪的国家。感谢万能的上帝用他无穷的智慧，帮助我们用和平、友善的方式实现这些变革。（掌声）

先生，我已经表达了议会反对派方的喜悦之情，现在我要讲到总督阁下在他的讲话中提到的一些具体的陈述，尤其想评论一下总督讲到的本国的选举权问题。人们将会知道，先生，我们一直支持全民普选制，因此，如果我说昨天我不失望，那就太不诚实了。我们的斗争现在是，将来也是为争取人权的斗争。作为原则，我们反对，而且我希望我们将一直反对一个国家违背另一个国家人民的意愿，对另一个国家的事务指手画脚。同样，我们也反对在任何国家中占人口少数的人把自己当作占人口多数的人的主人。

我们立场的基础是人类的权利和义务平等，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先生，我们相信，在坦噶尼喀只有邪恶的人才把肤色作为划分人权的标准。我们计划在这里建立一个人的肤色或头发质地与他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无关的国家，就像在上帝眼里这些东西与人的价值无关一样。

那么，先生，在一些国家，公民权是以一个人的财富或受过的教育为基础来划分的。我们选举时所用的选举权制度，把坦噶尼喀也归到这一类国家的行列。我们反对这种选举制度，也把这种制度列为我们当选后会消除的事物之一。先生，我们这么做也是有原则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财富和受教育程度被当作衡量人权或公民权的标准。受过教育的人不一定就比没受过教育的人更诚实、更爱国或者更无私……也不一定更聪明，不一定对他们的同胞有更多的爱心。他们不一定会有更少的危害，实际上，世界上十有八九的危害是由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造成的。（笑声）我们不能说受过教育的人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造成更少的危害，历史没有证明如此……

在财富和教育这两个条件中，前者缺少理由使拥有它的人成为社会上更有价值的人。先生，我个人反对那种受过教育的人和富人更被法律垂青这一观点……但是，先生，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条真正有说服力的原则来使财富和教育成为人权或公民权的基础，那么我们把是否识字或每年收入 75 英镑作为选举权的标准，那不一样荒谬吗？为什么一个仅能识字的人——我强调仅能识字的人——突然就变成比他那不识字的邻居更好的国家公民呢？先生，难道年收入 75 英镑和 74 英镑之间的差距能够大到有没有选举权的地步吗？如果有人

说：“好了，我们总可以找到借口，74 英镑也行。”那么，为什么 73 英镑就不行呢？（笑声）73 英镑和 74 英镑之间有什么区别？先生，我现在很高兴听到议会的另一方也在笑，因为这种情形是荒谬的，整个事情都是荒谬的。（掌声）所以，纠结于年收入是 75 英镑还是 74 英镑是可笑的。它具有随意性，人们没有理由支持这一说法。你们还要犹豫什么呢？……

先生，历史现在已经明确表明，当富有的、受过教育的少数群体怀疑，而不是信任贫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多数人群体时，国家将受到极权主义危险的威胁。先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再次陈述，在听到明年的大选将实行有限的选举权时我极度失望，因为这种有限的选举权是以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为基础的。但我仍然想敦促议会另一方的朋友们重新考虑一下这个决定，开始实施全民普选制度……

先生，我现在要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代表的问题。拉梅奇委员会提议说，议会应当有 71 名经选举产生的议员，其中 50 名是公开选举产生的，21 名是保留的议员席位，应当留给少数种族，即留给亚洲人 11 席，欧洲人 10 席。政府接受了这个提议。尽管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提议，但这个提议的基础是我们在议会中提出的原则，因此，我们接受这一提议。

先生，我们致力于取得坦噶尼喀人民完全的民主代表制度。我们必须致力于设立人口数量大致相等的几个选区，不管是何种族，每个选区向议会选派一名代表……先生，这么幸福的一种状态是以理想的条件为基础的……但是先生，如果我们认为已经创造出了理想的条件，那我们就太愚蠢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仍然还有一些从历史继承下来的偏见和猜疑，因此，我感觉必须把从社会中消除这些偏见和猜疑当作我们的职责。我们不能像鸵鸟那样，因为不喜欢这些事，就假装它们不存在。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接受的这些提议不理想。就我而言，我可以真诚地说，我很高兴它们不理想，因为这会提醒我们，在我们中间的确存在这些偏见和猜疑，所以它们的存在很有必要。我希望并相信，这些偏见和猜疑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先生，这些建议是一个妥协……我们不想给一个甚至很小的少数民族社区加剧恐惧感，即便这种恐惧毫无根据。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我们不应该忽视它。

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感觉我们必须更加谨慎，避免使这个国家

的多数人认为唯一能够代表他们的是黑皮肤的非洲人，因为这么想是错误的。我们接受了政府宣布的提议，如果换在我们的邻国，少数民族社区的成员将会完全反对同样的提议，但在坦噶尼喀这些提议却受到了少数民族社区的欢迎……

我在别处已经说过，我想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先生，必须要正确吸取坦噶尼喀的经验，即在坦噶尼喀少数民族移民相信当地人民的善良，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经验。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不同的是，他们说过：“我们信任坦噶尼喀多数人民的善良。”先生，这就是坦噶尼喀的经验。先生，我认为且深信，这种信任使我们的多数种族的人担负起了很重的责任。从现在开始，保护人权——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人权，我们甚至愿意为之牺牲生命的人权——的重担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落在了我们国家多数种族社区的成员肩上。

先生，我们不能让后代说我们是伪君子，不要让世人指着我们，说我们的自由是通过道德的理由——即人类兄弟关系的理由争取来的，随之又丢弃这个理由，开始因为人的肤色来歧视我们的其他兄弟。先生，我祈求万能的上帝使我们免于犯这样的罪恶。我们已经定好了目标，计划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我们知道我们从过去继承到了什么，现在用手指着某个人说“你应当为此负责”是毫无用处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过去抛在脑后。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面向未来，保证在未来不会有人说：“为什么你们错失建设一个比过去更好社会的良机呢？”先生，我再次重复，保证在未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国家，这一道德伦理将会使坦噶尼喀的每一个人都能说：“我们在坦噶尼喀将永远不会违背。”我希望，先生，在这个伦理中，在我们未来可以说的“永远不会”中，其中的一个“永远不会”就是我们永远不会因人的肤色而歧视他人。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先生，我想用一种似乎势利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我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的目标，已经提到了使我们接受一个并不理想的提议的偏见和猜疑，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我们理想的社会。我已经提到了这些因素，这些从过去继承来的因素。我们从过去还继承了一件事情，使我们很难完成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我国的经济状况。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要用一种似乎势利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我们制定的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完成这个目标的道路并不平坦。过

去我们的一个难题是财富的分配。先生,任何一个划分为“有钱人”和“穷人”的社会都是有潜在危险的,而且种族身份的认同又加剧了这个危险性。“有钱人”通常是外来的少数族裔,而“穷人”则是占人口多数的当地人,这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先生,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必须纠正它,必须尽快纠正它。

我已经提到过我们国家的多数种族社区成员肩上挑的重担。但是,先生,我不想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认为在实现我们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少数族裔的成员就没有这个责任。我认为,本国的少数族裔成员和那些同情坦噶尼喀争取人类进步的其他国家,同样也负有极大的责任。我认为,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人们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先生,从现在起,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打败我们的三大敌人——疾病、贫穷与无知。先生,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面对这个任务。我祈求得到支持。(掌声)

17 腐败是人民的公敌

在坦盟掌权之前，欧内斯特·瓦齐爵士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不过，他是由总督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在尼雷尔先生建议，并与他磋商后任命的。因此，1962年1月前，欧内斯特·瓦齐爵士一直担任财政部长。之后只有坦噶尼喀公民才能担任议会成员或部长。

1960年5月17日 议会议事录，第35次会议 关于财政预算的辩论

尼雷尔先生：……但是我祝贺尊敬的部长先生是因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因为他首次提出一个国家的财政预算解释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的说法……现在我完全相信他指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因为我从未听说当今政府提及这个政策，提及对贫穷、疾病和无知开战的政策。但是，先生，这恰恰是一个新政府应该做的，他们应当对威胁人民的这三个敌人开战……我们首次听到部长这么说，把财政预算与国家政策联系起来。我强调指出，这表达了一种希望，因为我确信，议会另一方的部长和我一样确信，在未来几个月内我们将建立一个致力于向贫穷、疾病和无知开战的政府。

先生，我想再加上一点，但是我不想，也没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件事。我想说，在我们的敌人名单上面，除了贫穷、疾病和无知，还要加上另外一个敌人。（掌声）先生，让我们直面这个敌人，我们能够谈论人们自治权等类似的理想的空话，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人民身怀希望。在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我们已经提高了人民的期望，所以人们期待新政府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怎么做

呢？通过提高税率、利用税收来发起对贫穷、疾病和无知的战争，我们的人民希望有一个政府能够合理利用税收来发起这场战争，希望这个政府能够致力于在国内实现公平。

那个敌人是谁呢？是什么与人民的这个期待为敌？不仅仅是贫穷，因为我们可以对付贫穷；不是疾病，因为只要诚实的人们各司其职，我们可以对付疾病；也不是无知，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敌人，我们知道不需要无知的人。但如果人民不完全信任我们的政府，不信任这个把自己的幸福托付给它的政府，我们如何能够开展这场针对贫穷、疾病和无知的战争？我们必须使人们信任自己的政府。我说的人民自己的政府，并不是指有几个部长坐在一起的部长委员会。我指的是在负责的岗位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在地方政府、在工会、在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组织，还是在中央政府。

先生，如果我说一切都好，那我不诚实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国内存在着腐败，而且我认为，先生，必须无情地处置腐败，因为在和平时期腐败和受贿是对人民福祉的更大的敌人，超过战争。我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对待腐败就要像对待叛国罪一样。如果人民不能相信政府，如果人民感觉用金钱可以买到公平，那么政府会给人民留下什么希望？所以人民只有拿起武器消灭那个愚蠢的政府，除此之外他们毫无选择。我觉得，先生，在我们前行的同时，要对贫穷、疾病和无知开战，必须要获得人民的信任。在地方政府、工会、合作社、政治组织、行政部门和政府，都要有我们的人，有人民完全信任的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坦噶尼喀人民将如何从为之奋斗的独立中获得真正的利益。（掌声）

〔尼雷尔先生继续谈到了非洲化和工资的问题。他说必须要减少当选部长的工资（坦盟赢得大选上台后迅速实施了这一措施，尼雷尔先生时任首席部长），随后他谈到了控制东非公共事务和东非共同市场的东非高级专员公署。〕

……高级专员公署的未来如何？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克制自己。先生，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东非各国不仅能发展为一个整体，而且能够加强这一整体，使之成为一个不仅经济上完整，而且政治上也完整的整体，如果有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想这是很值得的。我们正在建设这些国家，但不是为了声誉来建设它们，而是为了使国家带给人民福祉，带给人民自由——乌呼鲁——的福祉。我认为，这个整体越大，就

越能带来福祉,就越有信心来发起对贫穷、疾病和无知的战争。如果我们能做什么事情,使得这些国家的统一受到鼓励和保障,那么我们就应该做,而且我感觉在坦噶尼喀,我们不应当做任何事情来阻碍统一的趋势。但我认为,我们的朋友,东非高级专员公署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应当面向未来,但我们还要正视现在。我的一个朋友一直站在这里说出一连串的数字,指出坦噶尼喀可能在金钱方面的损失。坦噶尼喀的很多人都感觉现在的形势不利于坦噶尼喀。现在,我想向位于高级专员公署重要位置的人提出申诉,请求他们减少坦噶尼喀人民对公署的抱怨……建设一个整体,我们言出必行。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做什么损害未来统一的事,就让我们内罗毕的朋友们至少做点什么,停止损害未来可能统一的行为……

18 东非联邦

1960年6月,非洲独立国家第二次会议^①上,尼雷尔先生准备了一篇关于需要东非联邦的文章。此前坦噶尼喀一直反对所有类似的提议,因为他们担心会遭到肯尼亚殖民政府的控制。1960年10月在乌干达姆巴莱召开的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组织会议上,同意以人民意愿为基础成立东非联邦,并出版了一个以尼雷尔先生的文章为基础的小册子。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人们清楚看到并深深感觉到非洲人民的基本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是在逆境中反对外来政府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在取得胜利后,如果继续要在反对新殖民主义、贫穷、无知与疾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要加强并维护这种统一。

不过,如果每个国家分别取得独立,就很容易受到国家情结的诱惑,那些从弱小国家谋利的人就会耍阴谋,那么现存的统一情结就会削弱。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保证东非现存的对立的统一能够成为有建设性的统一。应当把统一和争取自由的运动结合起来,那么东非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就会更早获得独立,这意味着当前分别管理的各国成为一个联邦。

但是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桑给巴尔联盟这一概念不能强加给这些国家的人民,人民必须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表达他们的决定。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当前存在的统一情结才能成为现实,才能改变当前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状。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所有相关国家都存在一个能对人民的意愿做出回应、由人民选举出并有完全内政权力的政府的情况下,才能讨论建立东非

^① 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共举行过两次。第一次于1958年4月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共有8个非洲独立国家参加。第二次于1960年6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共有15个非洲独立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译校注

联邦的问题。这个条件最早可以在 1961 年实现。我相信到那时一定能实现，那么相关的四国就有机会把人们现在的统一要求落到实处。

目前，在独立道路上的坦噶尼喀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多的进步，英国不能拒绝我们提出的 1961 年独立的要求。但是，我认为联合起来成为联邦不仅是为了坦噶尼喀的最大利益，也是为了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我还认为，坦噶尼喀单独的完全独立会使东非联邦的成立变得复杂。如果英国政府愿意更改其他国家修宪的时间表，这些国家也表达出加入联邦的意愿，我愿意请求坦噶尼喀人民与其他国家一起加入这个联邦。

自我们开始讨论东非联邦问题以来，我还没有发现东非或东非之外的任何人对联邦原则表示反对。实际上，近来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们在姆巴莱会面时，一致认为应该支持建立东非联邦，现在应该制订相关细节并付诸实施。我认为，在联邦的细节和如何实现联邦上面，人们会有不同的观点。我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但不会谈论最终会采取何种联邦形式的一些细节。我们必须把这些细节问题留给各国的领导人，让他们来决定具体的联邦形式。我想表达的是如何实现联邦的看法。

我认为，如果人民希望实现联邦，最好的时机不是在实现各国的独立之后，而是在各国实现独立之前。东非现在已经有人对此表达出不同的意见。毫无疑问，有些人认为，要想实现东非联邦，人民要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就必须等到各国完全独立后。他们争辩说，如果在各国完全独立前就实现联邦，似乎是殖民强权把联邦强加到人民头上的，而不是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

还有人认为，如果我们不为东非各地的分头独立做准备，而是在独立前把它们揉合进联邦，这种合并可能会延续东非的独立。

如果要实现联邦，东非人民必须要自己下定决心，进行规划并把联邦的思想付诸实践。像中非联邦这样被强加的联邦没有机会取得胜利，也完全没有可能胜利。但是，我认为东非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必非得等到各国完全独立。例如，在坦噶尼喀，我们现在有一个责任政府。如果坦噶尼喀的立法议会想要追求独立（这也正是我们准备在三月份要做的事），任何人，不管他的想象力如何丰富，都不会说坦噶尼喀立法议会的独立要求不是坦噶尼喀人民的想法。同样，如果立法议会表示坦噶尼喀想脱离殖民地身份，独立为东非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坦噶尼喀人民的意愿（当然，除非坦噶尼喀人民反对这种观点）。我意识

到,当前其他东非国家并没有我们这样的政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建议,如果东非人民希望建立联邦,正确的时机是在东非各国都实现类似坦噶尼喀的修宪后,而且我们应该坚持,各国必将举行的选举要产生真正为人民负责的政府。

如果这些国家在拥有民选政府之后决定争取各国的各自独立,那么这也真正表达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意愿。另一方面,如果它们都决定要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争取独立,而且有各国人民的支持,那么这些政府表达的也是本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因此,我不认为为了表明加入联盟是各国人民的意愿,就一定要等到各国都获得完全独立后才这么做。

有人认为(主要是我们乌干达的一些朋友),在我们考虑联邦问题前,应该先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我同意这个论断。如果我们都处在混乱中,再乱上加乱就太愚蠢了(尽管有人会问可能会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我们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后,什么时候才能感到满足呢?我是说在建立责任政府后,我的一些朋友说是在取得独立后,但我很难接受他们的说法。当然,“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这种说法在国家独立后比在独立前更有说服力。我在后面也要说到,各国独立前实现联邦会有助于各国更好处理自己的事务,而在独立后再实现联邦,联邦就没有现在对人有吸引力了。当前各国人民正在团结起来争取独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民反对加快东非完全独立的措施,那么在各国分别获得独立后,这些人民如何能够不反对联邦?当然,我们那些认为应该先独立后联邦的朋友们可能没有把问题想得这么严重。

那种“还差一点”,“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论点与帝国主义者一直用来拖延我们独立的论点相同,因为他们一直用部落间差异的借口来推迟我们的独立日期。如果我们这些一直希望统一的民族主义者将要继承并利用这个借口来保留殖民主义者给我们带来的分裂,那不会成为一个莫大的讽刺吗?

如果我们等到东非各国都独立后再开始联邦,将会有明显的不利局面。如果每个国家都分别获得独立,他们在联邦的路上所走的每一步都可能遭到误解,当然也可能会遭到抵制,说他们的所为是帝国主义的计划,说他们是为了追求个人权力。因此,最诚实、最无私的领导人会尽量避免这个问题。此外,各国领导人将忙于处理本国政府的事务,将无暇考虑建立联邦给各国带来的长期利益。

如果每个东非国家都取得独立,那么我们必须要在外国主要国家设立使

馆,在各自的首都设立外国使馆,因为我们之间的紧密关系,甚至还要互换外交人员——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切。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对我们珍贵资源的浪费。但是,对我们联邦前景最大的危险来源于外国使馆数目在相关国家的剧烈增加。这些使馆只会对加强本国的力量感兴趣,不会关心我们的统一。所以,我们会发现自己被一些奉承包围,心中充满了虚假的民族主义自豪感,而认为我们的邻居习惯丑陋——反之亦然。到时我们会发现当前的统一情结会越来越弱。

此外,一旦我们东非四国各自在联合国都有自己的代表,都有自己的国旗和在外国的代表,我们将会出现对统一不利的既定利益集团。这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些位置上任命了邪恶的人,而是我们会有更多人对不统一更有兴趣,因为他们都是人,多数人都更注重当前的利益和进行变革的难度,而不会注重长期的利益。

尤其是,完全独立后的联邦意味着牺牲主权和主权带来的所有荣耀和标志。如果在还没有牺牲主权的问题时就很难说服我们的一些朋友,让他们相信联邦会很好,那么,在各国获取独立以后再要说服他们会比现在难一百万倍。我后面还要说,联邦现在可能,而且很可能会加快各国独立的进程,这一前景对我们来说都弥足珍贵。但是独立后再联邦就不再会有这种明显的粘合力,因为当前对统一的要求要比独立后的统一要求强烈。然而对强化统一的需求能够使我们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这种需求在我们独立后至少会和独立前一样强烈。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作为一个政治整体脱离殖民主义,各国的分别独立会使得我们变得不如现在这么团结,同时也会降低人们对统一的欲望和争取统一的机会。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东非,我们现在要跨过国境不需要签证,但是在各国分别独立后,我们要想跨过国境就必须有签证。那些被现存国界分开的不幸部落现在感觉非常尴尬,但在将来各国分别独立后,他们会感觉更加尴尬,如果“尴尬”这一词能够表情达意的话,因为各自的独立会使得坦噶尼喀成为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外国,就像中国和美国一样的外国,他们在国界另一边的亲属将成为外国人。现在我们之间的贸易没有关税壁垒,但是各个国家分别取得独立会在各国间产生关税壁垒。我们现在有共同货币,可以使我们将来很容易建立共同的中央银行,但是各国分别独立后会产生各自的货币,各国会成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关于各自独

立会带来分裂而不是统一的例子举不胜举。各自的独立意味着在殖民主义之后，我们不如在殖民时期那么团结了。各国的独立只会带来地区的分裂，并在本地区出现巴尔干化，把本地区长期或短期割据为小国——分别独立带来的影响就这么显而易见。

非洲的巴尔干化是非洲大陆软弱的来源，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势力会通过我们的软弱来强化他们的力量。当然，如果我们有机会消除巴尔干化给非洲带来的危害，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我的观点是，在东非消除巴尔干化的最好时机就在几个月后，在东非各国都有民选政府之后。

反对这一观点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会发现，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奇怪的境地。有一些聪明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毫无疑问地知道，东非国家在分别拥有责任政府后会团结起来，没有人能够阻拦他们制订东非独立的时间表了，所以他们会反对加强这种明显的民族主义力量。他们也知道，因为联邦的倡导者把联邦与争取建立东非各国责任政府联系起来，所以那些支持联邦统一的力量必定会加快东非另外两国建立责任政府的进程。在英属索马里兰就是如此。那些不希望看到此类事情发生的人会反对这类事情，并帮助非洲人反对这类事情。

帝国主义者知道，随着支持联邦的力量不断聚集，将会消灭在中非保留强加于联邦的一切机会，因此他们要反对建立受人欢迎的东非联邦。这不是我的猜测。近来我在伦敦时，很多智者就评论说，由东非领导人自愿创立的东非联邦将终结不受人欢迎的中非联邦。有人甚至坦白地说，我去伦敦就是为了蓄意破坏中非联邦。这不是实情，但我从不怀疑，一个受人欢迎的联邦一定能够加速附近那个不受人欢迎的联邦的崩溃。

在谈到东非联邦问题时，英国政府让自己陷入了窘境。早在几年前如果我们执著地要求建立一个东非联邦，英国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我们。但现在情况变了（虽然那些时代的落伍者不会觉察到这些变化），英国政府在没有损坏或鼓励毁坏一个不受欢迎的联邦的情况下，是不会支持一个受欢迎的联邦的。如果我们在东非建立一个自愿的联邦，那么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自由加入这一联邦。

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不受欢迎的联邦的朋友们会反对我们建立一个受人欢迎的联邦。他们以及他们南非和葡属东非的朋友们宁可与坦噶尼喀为邻，也不愿意看到人口近 3000 万的中非和东非联合起来，所

以他们建议我们不仅在独立前，在独立后也要“先把自己国家的事务处理好”。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希望东非统一呢？他们和那些希望非洲巴尔干化的人一起，盼望在各国分别独立后，有更好的机会来控制这些国家。他们会奉承我们、贿赂我们，并就东非的巴尔干化提出更多的看法，利用我们对技术和经济援助的需要来使我们保持分裂的状态。

为了使非洲各国彼此分裂，他们已经开始了对非洲领导人的奉承和贿赂。我前面已经说过，在我们每一个国家的首都都有世界各国的使馆时，这些使馆将会从这些国家的软弱和不团结中获取权势，从而加倍这种奉承和贿赂。我们那些天真地要求推迟独立的人将会发现，与他们为伍的是对我们非洲大陆真正独立和尊严最大的敌人。

有些愚蠢的人提出，我之所以倡导联邦是因为我是英国的走狗，因为我想强加在人民头上一个我的英国主子可以接受的政府。我相信非洲的统一，因此，我不会介意这些愚蠢的人给我戴什么样的帽子，但是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真实的形势吧。

我们一直在倡导统一。在我们的民族主义组织中，我们不断提醒自己要反对帝国主义者的陷阱，因为他们的政策是“分而治之”。每当我们要求自治的权力时，帝国主义者都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们仍然还有部落差异、宗教差异、社区及一些其他的差异。同时，帝国主义者一直在鼓励分裂，那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控制弱小、分裂的人民。那些陷入帝国主义者“分而自治”陷阱的家伙们才应该被当作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

什么时候才可以改变这条规则？我们要把那些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统一的人当作真正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吗？现在我们应该把那些加入到帝国主义者和新帝国主义者队伍、维持非洲巴尔干化的人当作是我们的真正英雄吗？那些正在不顾帝国主义者划分的国界，正在为非洲统一而战斗的人难道应该被看作是走狗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让那些“还没准备好”（实际上是“永远不”）观点的信徒和巴尔干化的信徒拿出他们帝国主义俱乐部的会员卡。我们这些希望看到东非统一的人一直坚持我们的观点，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或道歉的。如果我们想寻找帝国主义的走狗或部落主义者，我们必须深入调查那些“还没准备好”的人的阵营。

当然,如果那些鼓吹分别独立的人能够采取始终如一的立场,例如,他们允许乌干达现在的分裂,以后再把乌干达合并起来,那么他们的这个建议对东非是不合逻辑的,就像对乌干达的情况也不合逻辑一样。

我知道这些鼓吹分别独立的人会说乌干达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乌干达已经是一个国家,而东非是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我承认这一点。但它们是邻国,是由同一个国家殖民的,并且已经在很多方面做了相同的事情。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类型上的差异。

此外,在我们单纯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的时候,我们大声呼吁不承认帝国主义者不经与我们讨论就人为划定的国界。要么我们说到做到,要么我们就是一帮伪君子。如果我们说到做到,现在就应当拒绝承认这些边界,并向帝国主义要求我们作为一个联邦独立。我相信,在我们这么做的那一刻,帝国主义的力量就会崩溃。如果统一能够加快我们的独立进程,作为致力于把非洲从殖民主义的屈辱中解放出来的我们这些非洲民族主义者,还会有什么要求呢?如果我们有机会给予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自由统一的非洲,我们是应当轻率地对待这个机会,还是像一切真正的爱国者那样严肃对待这个机会呢?

如果声称或给人留下印象说,所有那些希望现在就联邦的人是完全出于爱国的动机,那就太天真了。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因为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加入这场伟大的运动。实际上,帝国主义者经常利用这个事实来诋毁我们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要求从殖民者那里获取独立是基于自己的秉性,倡导这么做的人不应该遭受制裁。如果所有倡导从殖民者那里获取自由的人都是自私、存心不良的人,这也不会损害每个人支配自我的权利。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联邦。在所有倡导联邦的人中,也一定有怀着不同动机的人。

会有商人、资本主义商人和帝国主义商人把联邦看作是巨大的牟利机会,或者是大规模实施新帝国主义的机会;会有一些不能在各国的边界政策上施加影响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会在联邦的层面一试运气;会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敌人反对联邦而倡导联邦(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敌人倡导联邦而反对联邦)。支持联邦的人各种各样,他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这些人可以组成我所说过的那些“还没准备好”的一类人那样的奇怪组合。但是,我再重复一遍,一个由我们的人民自由决定建立、设计并影响的联邦必须要坚持自己的价值,倡导联邦的人的动机、性格、地位和肤色不能损坏或影响联邦的发展,就像

钻石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找到它的人的性格或动机一样，一种矿石要么是钻石，要么就不是。

如果魔鬼亲自出现并支持这个联邦计划，既不会改变我对联邦的看法，也不会改变我对魔鬼的看法。如果魔鬼不是傻子，我们就很容易看清他的心思：他十分清楚联邦的含义。如果他反对联邦，他会让人们知道他的观点，所以如果他表现出支持联邦，人民将会对他产生怀疑。如果他不希望要联邦的计划，他的选择就很简单：他会尽力终结这个计划。那些原本会支持联邦计划的人，因为获得了魔鬼的支持，就会落入一个简单的陷阱，那时魔鬼就高兴了。

认为联合会延迟东非独立的说法几乎是荒谬的，我看不到这种可能性。目前，东非唯一一个确定能够获得独立的国家是坦噶尼喀。所以，如果东非各国要各自独立的话，坦噶尼喀将是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东非的独立晚于坦噶尼喀的独立，那么就要说是坦噶尼喀延迟了东非的独立。但我看不出，为什么东非各国联合起来要求独立会比不联合起来延迟独立的进程。我的预见恰恰与此相反。今年三月，坦噶尼喀将在英国与女王政府就坦噶尼喀的具体独立日期举行会议。在定下坦噶尼喀的独立日后，东非各国将会有三个选择：如果各国要求一道独立，我们可以要求在坦噶尼喀独立前独立，或和坦噶尼喀同一天独立，或在坦噶尼喀独立后独立。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独立都不会早于这三个选择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决定要求一起独立可能会加快，而不是延迟东非各国的独立进程。这里我们有一个先例。索马里是一个跟坦噶尼喀一样的托管地，它的独立日期被定了下来；索马里兰^①是英国的保护地，而它的独立日期没有定下来。两个国家决定以一个国家身份脱离殖民主义，但是没有拖延索马里的独立日期，也没有拖延索马里兰的独立：结果恰恰相反。英国政府为了满足两国合并的需要，专门加快了索马里兰的独立进程——实际上，索马里兰比索马里早五天独立。我们有了前面的先例，当然东非各国可以强烈地要求坦噶尼喀的独立日就是东非的独立日。因此，对我来说，那种认为形成联邦就会延迟东非各国独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但我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统一。我不想让人觉得要取得统一不需要付出

^① 今索马里北部，1887年沦为英国保护地。1925年，今索马里中、南部沦为意大利殖民地，1949年根据联合国决议成为意大利托管地。1960年6月26日和7月1日，两地相继宣布独立，并于7月1日合并成立今索马里共和国。——译校注

任何代价,就像我去商店买一包烟,就必须支付烟钱。如果我们认为东非的巴尔干化是一件邪恶的事情,而除掉这件邪恶的事情需要付出代价,那么我们坦诚地说,我们准备好为之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必须公平。

因此,假如坦噶尼喀人民把独立定在1961年,假如东非所有人民都要求成立联邦,假如某些恶魔使得1961年联邦独立不可能,而把联邦独立的日期定在1962年,假如我的说法正确,各国分别独立会导致东非地区的巴尔干化,而坦噶尼喀的单独独立会有利于本地区的巴尔干化,那么我将先迎接东非在1962年的独立,把坦噶尼喀的独立往后推迟几个月,以避免东非出现长期的巴尔干化局面。

尼日利亚也付出了同样的代价。它南部的两个地区本来可以早点取得独立,如果它们希望的话,但他们没有那么做。在形成内部完全自治后,他们决定建立大尼日利亚。正是由于他们的远见,我们现在的非洲大陆上才有了一个有潜在能力来保护其独立来之不易的国家。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坦噶尼喀可能只是要付出理论上的代价,因此我也只从理论上进行了回应。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有人会说,坦噶尼喀的独立会加速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独立,所以他们争辩说,如果坦噶尼喀现在不独立是出于联邦的原因,那么即使先联邦后独立的做法不会蓄意推迟东非的独立,但却终究会推迟。

这个观点会使坦噶尼喀受宠若惊,但是它夸大了独立的坦噶尼喀的力量,低估了肯尼亚和乌干达内部民族主义的力量。不管有没有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独立都是一定要实现的。如果坦噶尼喀先独立,随后肯尼亚和乌干达相继独立,我绝对不会声称两国的独立是受到了坦噶尼喀独立的影响。肯尼亚和乌干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独立,那么除非是傻子,没有人会怀疑东非的独立了。现在所有明智的人怀疑的是,各国分别独立后是否能够统一。

任何人只需看一下非洲其他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况就能明白真相。分别独立并没有促成亚洲次大陆上的统一,西欧比我们东非有更大的统一空间。但是西欧已经巴尔干化,分裂为不同的主权国家,排除了政治联邦的可能性。西非地区面积比我们东非和中非小,但是各国已经分别独立,使得统一的问题比我们的统一要难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些国家讲英语,有些国家讲法语。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都表明在各国分别独立以后很难实现统一。

有人同样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可以同时实现独立和统一。我已经提到过组成现在索马里共和国的两部分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是他们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和争取联邦的斗争合二为一,最早的13个州作为一个联邦脱离了殖民统治。加拿大也是一个联邦,但不是通过把不同的主权国家和独立的州融合起来形成的一个联邦,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的一个联邦。印度共和国这个联邦是在印度取得独立的同时成立的,我已经提到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反面教材。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也是这样形成的一个联邦制国家,但是尼日利亚人明智、谨慎地避免了印度—巴基斯坦的情况。

在非洲,我们只有一个例外,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外,那就是几内亚和加纳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在各国分别独立后才完成的,和我前面所说的那几个国家的统一不同。实际上,几内亚与加纳的统一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厚的友谊关系,是可取的。但是这两个国家的领袖都是最优秀、最有远见的非洲人,只有疯子才会说这两个非洲之子对非洲统一的追求并非出自真心或自私的。实际上,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其最好的时机,但统一的最好时机不是在各国分别取得独立后。如果我们不能避免各国分别独立,我们当然不能放弃,但之后要统一起来会有更多的困难。可是在东非,可以避免各国分别独立。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一个例外。但是如果我们能避免本地区的巴尔干化,逆历史教训而行,认为我们能成为下一个例外,将成为我们最不明智的选择。

在我心中,我毫不怀疑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机遇。让我们把握这个机遇,赢得子孙后代对我们的感激。如果我们说到做到,那么我们应该迎接这个挑战:让1961年成为我们东非统一独立的一年吧!

19 公务员的非洲化

1960年9月，坦盟赢得立法议会71个席位中的70席，朱利叶斯·尼雷尔成为首席部长。很快，对新政府实施的非洲化政策的含义就产生了一些误解。

1960年10月19日 议会议事录，第36次会议 答复演说

首席部长：……议长先生，我想一开始我们必须明白“非洲化”政府的确切含义。我下面要对政府的政策做慎重的陈述。

议长先生，坦噶尼喀是一个非洲国家，尽管有其他族裔的人在这里定居，而且他们的一些成员当然也合法、真正声称自己是“坦噶尼喀人”，但坦噶尼喀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非洲人。

因此，政府的长期目标（在这里我强调“长期”），自然就是公务员组成应当广泛体现本国的种族构成，因而行政部门绝大多数职位应当由土生土长的非洲人担任。

坦噶尼喀公民权的引入将会解决本届政府使用“非洲化”一词具体含义的问题。此时此刻，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赋予这个词什么含义。就该问题，议长先生，政府的政策将如下，而且这也是对政府政策的慎重陈述：

首先，行政部门的每个空缺职位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应当由当地人来填补，只有在本地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不管何种族）时，才能从东非之外的地方招募这个职位的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则。

其次，在该政策范围内，政府在任命新职位的雇员时，应当首先考虑坦噶尼

喀的非洲候选人。

第三,只有在找不到合适的、符合条件的坦噶尼喀非洲人时才考虑其他的候选人。

议长先生,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但我希望很多人不会感到恐慌,因为使政府的雇员非洲化实际上是政府雇员的本土化,但是如果做不到我说的非洲化,就不可能做到本土化。因此,非洲化的真正含义是本土化,也就是让我们的政府有着非洲人面孔。

我仔细聆听了我最尊敬的朋友卡萨木巴拉先生关于采取区别对待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先生,我刚才所说的可以被看作一种区别对待。我想我们应该诚恳地面对这一问题,并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这么做。

几个月前,我们面临着本立法议会的代表问题。我所在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主张举行普选,在选举中实施广泛的选举权,使本国的绝大多数土生土长的非洲人都将得到选举权。但是,在坦噶尼喀也有人数较少的土著人社区和非非洲人社区。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本国的立法议会也是非洲人的面孔?

我们断定,如果你对候选人——亚洲候选人、非洲候选人和欧洲候选人——说,让他们自由选择,那么很可能没有一名欧洲人能够回到立法议会,也可能没有一名亚洲人回到立法议会,立法议会 will 100% 由土生土长的非洲人组成。

我已经说过这样做不好。我们的立法机构必须本地化,必须能够反映出本国的种族人口结构。因此,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发明了一个方法,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法,使得立法议会得以本土化。这是一种区别对待,但是,是为了那些少数族裔社区的利益,因为这些社区在政治上是弱势社区。先生,在非洲化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如果看一下现在在海外攻读学位、接受职业培训以及其他方面的坦噶尼喀学生数量,就会发现这些人多数都来自亚洲人或欧洲人社区。因此,因为滥用的理想主义,你可能会说招募政府雇员的过程将是一场混战,而且不会是一场平等的混战。很可能绝大多数合格的人都是来自在这方面占优势的亚洲人社区和欧洲人社区,所以,要想使政府本土化就必须为了政治上的弱势社区而有区别对待的行为。

我之所以不辞辛苦地做这么多解释,是为了使人们不会对我们的目标有任何误解。这些话都是发自肺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人需要为此感到尴

尬……

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解释这个问题。在离开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向我尊敬的朋友们提一个建议（他们一直在说服我们让我们在六周内实现非洲化），实际上他们一直在不必要地奉承这儿的殖民政府，而殖民政府不配得到这些奉承。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认为殖民政府已经为我们培养出了我们现在所需的所有人才，作为政府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分配好适当的工作。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现在我开始谈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独立，乌呼鲁……

议长先生，我已经讲了这么多，是为了说明我们的独立问题已经不是要求很高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计划的事。

已经是时候让我们说要为人民做什么了。先生，我已经说过，我盼望一场斗争，但是没必要和错误的敌人或假想敌斗争。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一场斗争，一场大的斗争，在这个阶段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责任去为了计划或考虑如何实现独立而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因为独立就在那儿。我们必须花费脑筋，必须彻夜思考如何给予人民他们需要的水，如何给予人民他们需要的学校，如何给予人民他们需要的健康。出去宣传自由，来唤醒人民很容易，但是宣传自由，你不能烦扰别人。现在我们必须谈论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问题……

20 非洲人与民主

下文摘自《非洲演讲者》中的一篇文章,该书由詹姆士·达菲和罗伯特·A.曼纳斯主编,1961年在普林斯顿由D.范·诺斯特兰出版。在这篇文章中,朱利叶斯·尼雷尔较早地提出了两党制不是民主的必要要求的观点。

……我认为以下三方面是民主政府的必要构成:商讨、平等与自由,而自由由前两者来体现。

那些怀疑非洲人是否有能力建立民主社会的人不应怀疑非洲人“商讨”的能力,因为非洲人商讨的能力与赤道上的太阳一样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也不应怀疑非洲人对平等的意识,因为贵族对非洲来说是一个外来事物。即使在有些地方有的人一出生就是贵族,这种贵族制度在历史上都可以追溯到非洲大陆之外。传统上,非洲人不知道“阶级”为何物。对于是否在何种非洲土著语言里会有“阶级”或“等级”这样的字眼,我表示怀疑。甚至在外来势力留下一些贵族思想痕迹的极少数地方,我也怀疑在当地的语言里会不会有这样的字眼。这些生来就是贵族的人通常是指那些“了不起的人”或者“聪明人”。在我自己的国家,只有两个部落有明显的贵族制:布克巴的巴哈亚人和布哈地区的巴哈人。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的贵族都是外来者,他们都属于同一种族。

传统的非洲社会,不管有没有酋长(很多部落像我所在的部落一样,没有酋长),都是平等的社会,都通过商讨的方式来处理部落事务。近来我正在读盖·克拉顿·布洛克先生写的一本关于尼亚萨兰的小书^①,其中一段他描述了那里人们的传统生活,当谈及长老们时,他用了一个蕴意深刻的句子:“他们一直商讨到达成一致。”

^① 写于1959年的《尼亚萨兰的黎明》, *Dawn in Nyasaland*。——译者注

“他们一直商讨到达成一致。”这句话指出了传统非洲民主的本质。这是一种非常笨拙的处理事务的方式，尤其在耐心而只注重结果的 20 世纪更是如此。但是对于任何民主而言，商讨都是一个至关的因素，而非洲人非常擅长这一点……

古希腊人可能会吹嘘他们的“民主”，但是在处理国事时一半以上的人口根本就没有发言权。美国《独立宣言》的制定者们可能会谈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尽管他们相信有例外；亚伯拉罕·林肯也可能给我们留下了完美的民主概念，尽管他是在一个拥有奴隶的社会中讲到的；我的英国朋友们也会吹嘘英国的“民主”，但是他们仍然为了英国人的荣耀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

这些人不是伪君子，他们都相信民主。他们所提倡的是“商讨式的政府”，进行平等对话，但是他们生存的世界把许多人都排除在他们“平等”之外，很少会对此在良心上感觉不安。在 20 世纪的今天，这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匈牙利人、小石城人、西藏人、尼亚萨兰人和班图斯坦人^①，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进行解释。在《世界人权宣言》^②已经生效的 20 世纪，他们的遭遇是令人尴尬的。人类，不管是大街上的还是丛林中的男男女女，从未受到过如此高的重视，试图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的那些高高在上之人也意识到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使这些人感到恐惧，因此他们不得不试图为自己的罪行开脱。今天的“人民”有权管理自己，不能把任何心智健全、遵守法律的成年人排除在外……

在这篇文章之前我提到过“政府机构”和民主政府的标志。许多批评非洲民主的人都在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些批评者在怀疑我们维护民主政府的能力时，在内心中考虑的不是民主，而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特殊民主形式——两党制，以及发生在议会大厦中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论战。实际上，他们说：“你们能够想象在一个非洲议会出现有至少两党因持不同观点而进行自由辩论的情况吗？”……

尤其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统的国家来说，两党制已经成为民主的本质。在非洲的某一个村落，一百个人坐在一起商讨应该

① Bantustan，即黑人家园或黑人家邦，南非政府为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对南非班图人实行政治上彻底“分离”的地区。——译者注

② 联合国大会于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的一份非强制性的国际公约，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译校注

把井挖在哪里,直至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告诉英国人这些村民们实施的就是民主,这是毫无用处的。英国人想知道这个商讨是不是合理组织的,是否有一派赞同这个意向,而另一派反对这个意向。他也想知道在下一场辩论中,以前持赞成的一派对下一个意向是否会仍然持肯定的态度,而另一派仍然持反对的态度。换言之,他想知道反对派是否是有组织的,因此也是不受别人控制的,或者反对派是否是自发的,因此也是自由的。只有在反对派不受别人控制的情况下,他才会承认这是民主。

尽管在加纳和尼日利亚现存两党制,我必须得说,我怀疑在非洲实施英国式的两党制民主是否合适。听我解释:

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中,每一个非洲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是他所在社团的一部分,他的个人利益和他所在社团的利益没有冲突。这是因为他的社团就是他家庭的直接延伸。首先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单位,小家庭单位又组成大的血缘家族,最后这些家族形成一个部落。正如前面所讲,部落的事务是通过自由平等的商讨来处理的。但是,非洲人在心理上认为,政府是一个有关个人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公共机构。当提及“政府”这一词时,非洲人想到的是酋长,而不像英国人那样想到的是一座里面有辩论的大楼。

殖民地时期的非洲对政府的这种“个人”的概念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普通的人在听到“政府”一词时会想到地区专员、省专员或省长。

后来,当政府是一个机构的概念深入像我这样的“鼓动者”(这些人已经在读亚伯拉罕·林肯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作品了^①)心里的时候,我们开始要求自己的国家也建立政府机构。但是拒绝我们要求的正是现在代表“政府”的那些人——地区专员、省专员或省长。不到最后关头他们不会退让,而我们非洲多数国家在独立前夕都进行了自由选举。

非洲大陆的新国家们因为争取独立而崛起。这种从外国殖民者手中争取自由的抗争都是一样的,都是爱国的。这种斗争把国家的所有因素都综合起来,所以不仅仅在非洲,在世界上面临类似问题的所有地方的斗争都是由民族运动领导的,而不是由一个政党或多个政党领导的。把人民团结起来并领导他

^① 1806—1873年,英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著《代议制政府》、《论自由》等。——译校注

们走向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必须当仁不让地组建新国家的第一个政府；人们不会期待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走向独立的时刻半途而废，只是为了迎合我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而自愿分裂为对立的政治团体。实际上，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民主呢？当然，如果一个政府是由它的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就没有什么不是民主的成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而不是只有一部分人选举它掌权……

“代议制”民主有两个基本的东西：一是个人自由，另一个就是他有可能会通过定期投票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暗杀的方式，和他的同胞一起取代或重新组建国家的政府。有组织的反对派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因素，尽管一个不给无危害的怪人以生存的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几乎不能被称为是“民主社会”。只要你们选择了这两个基本的东西，只要一个国家的事务是通过商讨来决定的，那么你们就有了民主。可能会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也可能不会出现，但是反对派的出现完全取决于人民自己的抉择，对自由商讨和自由状态下的平等没有任何影响。

21 卢蒙巴^①之死

1961年2月15日 议会议事录,第36次会议 休会动议

首席部长:议长先生,在我提出休会的动议之前,我想先做如下陈述,我相信各位尊敬的议员会理解我为什么做这个陈述。

议长先生,如果我不能在本议会表达本国政府在听到卢蒙巴先生遇刺身亡时的震惊和恐惧,将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在这里不应当评判给刚果带来一系列灾难的事件的是非,但是我可以对坦噶尼喀的政府说,邻国按照要求选出的领导人遇刺身亡这种情况,对所有正直、有高尚行为的人而言,都是令人厌恶的。先生,很难说在刚果发生的暴力行为除了能带来恶果还能带来什么。但即便如此,请允许我代表本政府、本议会和本国人民,表达我们的希望,希望刚果的伤痛会痊愈。

^① 1925—1961年,刚果民主共和国政治家、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1960年6月国家独立时当选总理。1961年1月17日,在政变后被叛军杀害。——译校注

22 英联邦、南非和坦噶尼喀

本文发表于1961年3月7日的《观察家报》(伦敦), 时值英联邦总理会议期间, 在收入本书时做了小的修改。本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是: 南非在成为一个共和国后是否仍然是英联邦的成员。人们普遍认为本文对在各国首脑间建立一种讨论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后, 南非选择了撤销重新加入英联邦的申请, 而不是面对几乎确定被拒绝的结果。

坦噶尼喀人民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我们成功地拿掉了多种族国家的帽子,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一个重在个人, 而非他的皮肤颜色或鼻子形状的社会。种族特权或种族歧视与此不相容。

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确实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所有来坦噶尼喀的人都会为各种族间的和谐气氛所震惊。但坦噶尼喀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 同样受着理性与偏见、同情与复仇、自私与自我牺牲这些情感因素的困扰, 而且我们还必须要克服传统留给我们的种族之间的猜疑, 所以我们要改变现存的经济结构, 使个人的收入不与他的肤色挂钩, 否则就是对人类根本平等概念的嘲讽。因此, 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困难。但我们相信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少在我国存在种族主义的可能性。

至于相关的政策我们还没有做出决定,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先在经济上取得胜利后再去做。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反向操作, 我们要承受经济损失。之所以遵循这条政策, 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唯一一条在道义上合理的政策。在我们争取自治和独立的斗争中, 我们谈到过兄弟情义和人人平等的概念, 我们不是伪君子, 只是为了个人的目的才使用这些字眼。现在我们已经处于能够负责的地位, 我们要继续努力来使这些概念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

南非现在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对个人尊严的严重冒犯。此外, 也是对非

洲人尊严的不断侮辱,对此我们不能漠不关心,如果不对此做出反应,我们将无法抑制我们的愤怒感情。为了在我国成功地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我们必须在每个行动中都体现出对南非这种制度的厌恶之情。坦噶尼喀政府不可能与南非政府有任何瓜葛,必须在国际法的范围内,为那些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人提供支持。正因如此,作为政府,我们一直支持抵制南非货物的行动,并与南非终止了招募工人的合同,尽管这会给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关于现在正在讨论的南非在英联邦的成员身份问题,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我们认为,当前条件下南非的成员身份是对英联邦“各种族”组成的一个讽刺。如果英联邦确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一个友好国家之间自愿组成的组织,一个“俱乐部”,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像我们这样以人类尊严为基础的国家,愿意与南非同时作为英联邦的成员。

确实有一些人从内心不喜欢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他们认为,南非脱离英联邦会对英联邦组织造成损害。因此,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忽略英联邦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当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否定回答时,他们会说,给英联邦造成损害的是我们。他们认为,当前英联邦总理会议讨论的南非成员国问题与种族隔离政策问题无关。但是就南非国内的这个问题,英联邦必须要对南非的成员国身份做出具体的决定,必须考虑所有一切可能会产生影响的因素。

不管会用何种措辞来宣布这个决定,全世界都会认为重新允许南非成为英联邦成员是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容忍,或者至少是对人类所有政治原则的讽刺性的否定。不管用词多么美妙都一样不起作用,对外界的评判,尤其是对非洲的评判,是以行动为基础的。那些把攻击者当作朋友的人的怜悯,不会减轻被攻击者的痛苦,只有通过减弱攻击者的行为或减少鼓励恶行的行为,才能减轻被害者的痛苦。

但这个问题也不能回避。在讨论4月份刚独立的塞拉利昂加入英联邦时,就因为南非共和国5月份刚成立,而假装它的成员国问题不必讨论,这就是极大的讽刺和虚伪,只会使得英联邦成为人们鄙视的目标。所以,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没有人比我们这些曾经盼望能够加入英联邦的人更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会给英联邦的机构带来多大的破坏。但一旦发生此类事情,那就是南非政策的结果,不是我们政策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政策对英联邦的基本概念来讲是

一个挑战,不可能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

仍然有一些人会担心,把南非排除在英联邦外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指出,英联邦最大的优势就是各成员国保持完全独立的地位,但同时又从各国之间的关联中获得无形的益处。他们通常使用“俱乐部”这个类比,在这个俱乐部中每个人都能获得无形的利益,但同时又保留了各自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自由。

我们接受这个类比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俱乐部和其他俱乐部一样,只有在把某些人类的基本法则作为俱乐部的行为准则时,俱乐部才能生存下来。如果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享尽各种利益,但继续对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造成严重的冒犯,反对俱乐部的行为准则,那么这个俱乐部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谈论的不是南非政策的严重性,我们也不太可能争论这样的后果就是南非的非欧洲人地位的降低。

但是,南非所说的这些内部事务,真与英联邦其他国家无关吗?我们不这么认为。首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之间的压迫是国际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我们的观点并不仅仅于此。非洲的每个国家都能感觉到南非的政策对各国的影响,南非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我们反对种族主义目标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我们担心的不是对非洲人的歧视会在我们的国家死灰复燃,而是担心种族主义的罪恶及其对多数族裔和少数族裔都带来的恶劣影响,所以我们反对种族歧视的观点,而且认为要打败一个罪恶的观点,必须要明确地、不遗余力地支持一个美好的想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全力实现。我们相信人类的尊严这一理念能够打败种族主义,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与恶行妥协的行为都会削弱我们执行这些政策的力量。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加入一个包括故意继续坚持种族主义政策的“友邦联盟”,如果那么做,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就会迷惑,就会危及我们的目标。通过拒绝加入这个组织,我们可以向与自由和人类尊严为敌的人表明,我们将尽其所能,来维护我们的社会免于物质邪恶和精神邪恶之害。

那些关心帮助南非的非欧洲人和自由欧洲人的人们还有一个观点,即认为通过“俱乐部”给南非施加压力可能会比公开表达观点或采取孤立南非的行动更能促使南非改变现状。当然,如果接受这个建议,就意味着同意在国际舞台上为了其他国家的“良好表现”而把非欧洲人当作筹码。这是一种敲诈行为,而

屈服于敲诈行为几乎不能带来长久的利益。但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表明南非政府经得起理性的考验——它甚至经不起“俱乐部”其他成员国的考验。我们认为，英国在此问题上一直在试图用自己的影响来改变南非的现状，但年复一年，南非的情况却每况愈下。实际上，这些政策都以一些基本的信念为基础，不能受到论证或理性的限制。对此，我们只能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这些错误信念的含义，或者震动他们，让他们对自己的基本观点进行深入思考。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对南非的非欧洲人、对其他非洲人以及对英联邦的原则和力量的影响。事实是，不管错误与否，南非加入英联邦会导致人们对影响每一个成员（不仅仅英国）的“嘉言善理”产生讥讽，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的思想很可能成为这种讥讽的对象。如果把南非排除在英联邦之外，将会向整个非洲表明，民主和非种族主义不仅仅是措辞，更是有意义的概念，能够适用于全世界、适用于每个人的概念。当南非最终做出改变时，这一点将变得至关重要，人们将会首先从反对旧体制的人那里寻求理想和友谊。难道他们觉得只能从共产主义那里才能找到理想和友谊吗？这样的说法是幼稚的，因为原则并不会因为人们做不到就会失去效果。但是，在经历过困难之后，人们很自然会信任那些自己支持的、呼声最高的人，但之后，通常会对这些人的动机产生怀疑。

在坦噶尼喀，我们重视英联邦的这些基本原则。只要不是要求我们与社会基本原则妥协，我们愿意为英联邦付出。我们认为，如果允许南非作为一个共和国成为英联邦的一员，那么英联邦的原则就遭到了背叛。因此，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选择离开。我们很不情愿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们知道这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一个致力于消除折磨着我们 900 万人民的贫穷、无知和疾病的欠发达国家。

在宣布这个决定时，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即便我们希望心存幻想，也不能就此事胁迫英联邦的成员国或英国本身。南非是英联邦的老成员，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人口中有大量的欧洲人后裔；而我们是一个小国，一个穷国，一个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能代表人民的民选政府，我们致力于实现赋予人民植根于世界传统的基本人类价值，希望能够有最大的机会在我们国家实施这些原则。

我们希望这次总理会议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立场能够集中体现英联邦将要做出的选择。

23 成为总理后的广播讲话

1961年3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宪法会议上，议定了坦噶尼喀独立的一些最终程序。第一步就是首席部长成为总理，也成为部长委员会的主席。1961年5月1日以前，委员会主席一职由总督担任。

朋友们，今天我宣誓成为你们的第一任总理，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跟你们说一些话。

你们可能会认为，从首席部长到总理这个头衔的变化并没有多大意义。当然，头衔本身的变化不重要，但你们将会知道……我的头衔的变化将会为坦噶尼喀宪法的进一步推进打上—个印记，所有的坦噶尼喀人都将为此而自豪。

本次宪法的变革完善了人民政府的结构……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忘记，我要一直提醒你们，我们的所作所为有严格的限制。坦噶尼喀是一个欠发达国家，我们在获得独立时不会有加纳那样巨大的资金积累，我们也没有像尼日利亚那样已经拥有许多富人。我们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加纳和尼日利亚，甚至还低于肯尼亚和乌干达。因此，我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来满足我们国家迅速发展的需要。不能让这些因素吓倒我们，吓倒我的同事和我，而是应当把它们当作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你们的挑战。对你们来说，贫穷对你们的挑战要大于对我们的挑战。

我以前也和你们谈过贫穷、无知和疾病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打败贫穷，就能有办法打败无知和疾病。但是只有你们可以真正与贫穷做斗争才可以。如果你的耕地上还有没捡的棉花，如果你耕种的土地比你能耕种的土地少半英亩，如果你让土壤不必要地从你的手上流失，或者你的耕地上长满野草，或者你故意忽视农业专家给你的建议，那么在这场与贫穷的斗争中你就是叛徒，你就辜负了所有坦噶尼喀人，因为在与贫穷这一共同敌人斗争的过程中你

没有竭尽全力。

这是一场你们的战争，也是一场我们的战争。贫穷是我们所有人必须打败的敌人。不要再花费时间去打那些已经结束的战争，去痛责那些已经死亡的敌人。非洲人和全世界人都不会因为我们对旧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发出多少怨恨来评判我们。人民将通过我们为加强自身做了什么来评判我们，所以我们不仅要捍卫自己的自由，还要帮助我们的非洲兄弟来获取自由、捍卫他们的自由……

24 非洲的未来

1961年6月,总理履行了自己很久以前的一个诺言,为南非纳塔尔一所“只招收白人”的中学杂志写了一篇文章。

……实际上,非洲各族人民更多的是由他们自己的历史塑造的,尽管大多数历史现在还被迷雾笼罩,就如同他们一直受到他们接触到的西方的影响不甚清晰一样。因此,作为一个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己未来的民族,我们可以明确地说,非洲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可能成为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复制品。非洲的非洲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黑色的欧洲人。

有时候欧洲人会谈起,我们应当为自己的传统感到耻辱,但我们没有。另一方面,他们有时会说我们应当把不是“非洲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边,就像从未和欧洲人接触过一样。但这同样也意味着应当否定我们的历史,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的已知历史和未知历史造就了我们,我们、我们的祖父以及我们的祖先从自然界、我们自己以及欧洲、美洲和亚洲各族人民那里学会了适应。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这么做,就像全世界的人类和文明一直这么做一样。

我们在吸取过去和现在的教训以及决定我们未来的过程中,要建立一种新的综合体,一种从欧洲和非洲、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那里吸收了精华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现在画不出未来的蓝图,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各种不同的压力在2000年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

统一的非洲并不意味着一个整齐划一的非洲。在独立斗争过程中发生的事件,以及一些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将会影响一个地区的政策与看法。例如,这在南非会意味着,目前当权的人——以及那些争取当权的人——正在影响着未来。但是,他们故意鼓励种族主义和偏见,他们强加给非洲人民的侮辱和失败,正在毒害着未来。不管非洲统一与否,不管我们能否解决非洲大陆的贫穷

问题——尽管我们认为能够完成这两个任务——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非洲将是非洲人的非洲。我认为“非洲人”一词可以包括任何以非洲为家的人，不管他是黑色人种、棕色人种还是白色人种。我认为大多数人现在都希望这一点，但只有在所有人都作为个体，要求每个人都有人的基本权利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肤色或种族，记牢人性。我相信，在平等的基础上，非洲一定能为它所有的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责任在肩，要把别人当作我们的兄弟，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尽力。

25 英联邦成员资格

关于独立和英联邦成员资格的政府动议。

1961年6月5日

议会议事录,第36次会议(第4次会议)

总理:……各位尊敬的议员应该能够记起,3月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我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即我们要问心无愧地加入英联邦,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议长先生,现在这个条件具备了。

既然现在已经满足了这个条件,我的同事和我觉得,国民大会可以看出,我们要求加入一个真正有效的组织是有益无害的。(掌声)英联邦比世界上任何国家联盟都更好地把许多大小不一的国家通过友谊和共同的志向联系起来,不管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如何,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歧视。英联邦各国之间的关系比缔结各种条约的各国之间的关系亲密,比联盟国之间的关系无私,比任何组织内各国之间的关系限制少。因此,在我的同事和我看来,英联邦为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之间持久的和平与友谊提供了很大的希望。

26 “摸索前进”：在基武科尼学院^①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1958年在坦盟的年度会议上，决定在坦噶尼喀建立一所教授成年人社会科学的学院。在经历许多困难后，在坦盟主席的主持下，学院于1960年正式建立。1961年7月，首批包括两名女性在内的39名成年学生进入达累斯萨拉姆港口附近由一家旅馆改建成的学院学习。筹建本学院的经费全部来自坦噶尼喀，包括由卡里姆基家族捐出的6万英镑，以及全国各村捐出的一枚枚硬币、鸡蛋、玉米和牲畜。1961年7月29日，总理为学院揭牌，并利用这次机会谈论了坦噶尼喀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政治理念。

主席先生，朋友们：

今天，我十分高兴、十分自豪，来到这里为基武科尼学院揭牌。本学院的开办是我国人民努力决心的切实体现。这是我们的学院，学院迄今为止所有的花费都来自坦噶尼喀人民，是他们创造了这所学院，决定了它的架构，并将管理学院。当前有这么好的一个例证，说明人民团结起来可以做成多大的事情，可以证明人民愿意为自己认为值得的事情做出牺牲……

但今天我来到这里为学院揭牌，并不仅仅因为学院的建立能够证明这一点。基武科尼学院应当为坦噶尼喀做出巨大的贡献，现在国家急需的贡献。

我们已经致力于建设一个与目前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我们努力争取独立，以便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我们现在有机会开始这么做，但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分裂的世界，分裂的各方都为了加强各自的力量，急于把我们牵扯到冲突中去。

^① 该学院实际上是坦盟为国家建设培养干部的中央党校。1992年，坦桑尼亚实施多党制后，该校改名为基武科尼社会科学院。2005年，根据议会法案，再次改名为“尼雷尔总统纪念研究院”。——译校注

我以前曾经说过，我们不打算牵扯到这些权力争夺中去，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人类的进步。国际冲突的加剧——冷战的狂热——使得大国急于把类似坦噶尼喀这样贫穷、刚刚独立的国家拉到自己的阵营，因为冷战双方都认为自己建立了完美的社会形态。他们认为，他们的社会如此完美，只需要在世界各地实施这种“完美社会”就可以了；但冷战的另一方也同样狂热地认为他们自己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社会。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我们反对这种观点，因为它暗示了人类已经在社会层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没有必要继续努力向尽善尽美的方向发展了，所以人类应该普遍采取一种在世界上某个地方已经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除了世界现在面临的有形危险以外，这种观点还会给人们带来情绪上的危险，会给人类的进步带来巨大的威胁。生命是不能静止的，甚至最原始的细胞也要经历不断的变化。社会与其他东西一样，要么运动，要么停滞——但一旦停滞就会导致社会的死亡。大脑如果不用就会萎缩，而没有大脑的人什么都不是。

当前存在的两种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冲突，引起双方领导者们去思考和发展，但是却把他们的思维限定在了某些方面，这就导致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扭曲、神经质的人。他们会考虑开发新的物质产品，会考虑继续实施新型的大规模杀伤手段，但是却会抑制考虑新型的社会建设——不仅在那些明显的独裁国家如此，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害怕失去解决人类社会最终问题的方法，会给那些不愿意顺应周围人思想观点的人增加更多的社会压力。如果没有个人的思想自由，人类社会就不会发展，而是会被困在教条主义的牢笼中。在考虑所有的国际问题和有关人际关系的其他问题时，都要考虑相关人是否站在“终极真相”这一方，而问题本身反而不重要了。

在坦噶尼喀，我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发现了终极真相——不管是在哪个领域，所以我们也不会假装我们相信终极真相这一理论。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但我们不会“声称”说我们有什么解决办法。我们只能声称，我们要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向着一个遥不可及，甚至还不能真正理解的目标前进，换句话说，向着一个人类希望的最好的目标前进。

这就意味着那些紧紧盯着我们，那些看我们是成为“共产主义者”还是“西方民主人士”的人，将会感到不安，因为我们不会成为二者之一。我们要摸索前进，所以我们可能会创造一种包含个人自由与人类需求的新结合体，使每个人

在完善个人自身的同时，又能为他所在的社区作贡献，同时从该社区获益。创造一个这样的复合体是有必要的，尽管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面前有东方和西方的教训，我们也有自己的传统，我们能够为人类知识的海洋中注入新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么全世界都会为我们的独立而心怀感激。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也不是终极，可能只是向前前进一步或两步，但如果试图停滞不前就一定会失败。

如果我们要为人类进步作出这样的贡献，对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这种自由思考的权利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因为我们可能失去这两种权利。没有人能够阻止另一个人思考，除了他自己。因为思考是很困难的工作，可能会给生活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所以阻止自己思考有很大的诱惑力，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直面。一个人如果认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教授他，那么他就会停止思考。他会接受一些口号或流行语，并把它们当作能给人启发的神圣真理。我绝不否认口号有它们的用途，但它们只能用来提醒人，用作战斗口号。跟许多东西一样，过多使用口号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非洲当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因为一种思想已经被贴上了“帝国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标签，非洲人受到诱惑时会停止思考。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非洲人能给世界作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自由、公开地欢迎新的观点，必须考虑各个观点的好处和坏处，但不能一直考虑下去，要做出判断，要对这些观点采取行动，而且在做出判断和采取行动时，都要考虑这些判断的价值以及实施这些观点带来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能要一个只有不守规矩的人的社会。一只蚊子的叮咬可能会使长途跋涉的司机保持清醒，但一千只蚊子的叮咬会使他丧失能力。在类似坦噶尼喀这样的国家，政府的职责就是允许前者发生，而保护社会免于后者的伤害。换句话说，就是要保护少数人的自由，使之成为多数人的自由，同时还要避免少数人的自由会破坏已存在的多数人努力的成果。在这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最后，我想专门给学院的学生们讲几句话。我一直在说“摸索前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前进的路径，并利用人类积累的经验，将会更快地取得进步。本学院学生的责任也就在于此。如果你们在这段时间学有所获，切实增强了对社会的认识，就会真正帮助本国人民。你能做多少在很大程

度上由你自己决定,你在生活中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更成功地“摸索”。你们受到培训的目的不是成为只为别人思考、让别人盲目追随的“领导者”。如果某个学生在毕业时这么想,那么本学院就没有完成任务。基武科尼学院不是为精英者建立的,它的建立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发展。能够来这里学习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是一种特权,所以相应的责任也就重大。如果哪个学生脱离送他来这里学习的人民,他就是滥用这种特权——但我不认为会出现这样的事。基武科尼学院的毕业生必须要像面包里面的酵母,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不能脱离面包,它的作用通过它所做的工作来体现。

主席先生,学院的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不仅仅是指“在交叉路口”。坦噶尼喀现在就在一个交叉路口。12月9日我们将承担新的、更大的责任,我们需要一个强大有能力的团队来保证国家的安全前进,因此每个学生都要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但首先,他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做出能够有更多了解、更多新的服务机会的选择。

在我们把坦噶尼喀建设成为一个值得人民生活的国家的过程中,希望基武科尼学院能够起到给人以启迪和引导的作用。

27 领导的作用

1961年8月1日,总理为警察学院揭牌。它坐落于达累斯萨拉姆市郊,校舍是椰子树下漂亮的平房。该学院用来培训现役警官。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已经参加了三次令人高兴且意义重大的活动。6天前,也就是7月28日,我为坦盟的新大楼揭幕。该大楼现在已经租给政府,用于筹建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将在今年年底接收首批学生。7月29日,我为基武科尼学院揭牌,这也是一个为我们正在建设的新坦噶尼喀服务的教育机构。今天,我十分高兴,来为警察学院揭牌。这些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政府致力于培养能够建设独立坦噶尼喀的人才的不懈努力。尽管困难重重,政府将继续致力于这项工作……

在我们面临的众多重要任务中,最重要的是为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领导者。有人说领导者是天生的,不是后天人为造就的,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任何一个人的领导力都能通过培训得到发展和提高。

领导力包括多个方面。最重要的是,领导力是人的一种心理素质,一种能够使之从他的同伴那里凸显出来的一种素质。能够理性思考,能够简明、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使自己能够完全理解所做决定的含义,这些都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领导者的标志……

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也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我们在设置警察学院的课程时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里你们可以学到如何用合理的方法思考问题,如何客观地思考,如何清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会学到如何接受指挥责任,包括你将对部下负有的重大责任。“幸福”这个词已经用得太多了,所以你部下的幸福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不能用一个已经用滥的字眼来称呼它。所有的纪律和效率都取决于你部下们的满意度,因此,这就会不可避免地与你良好的管理和良好的领导力捆绑在一起。

28 公民权原则

政府向立法议会提出《公民权法案》，其中一些条款规定，如果非非洲人及其父母一方在坦噶尼喀出生，或在其他条件下注册过，就能获得公民权，这遭到了很大的反对。总理在拥挤的议会脱稿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而后又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坦盟集会和其他公共集会上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该法案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票在议会通过，只有大约两名议员表示反对。

1961年10月18日 议会议事录，第36次会议 政府对公民权的动议

总理：……我不想回答我的同事、尊敬的内政部长先生就有关公民权的政府白皮书提出的某些具体细节问题。但是，我想解释一下许多潜在的种族主义者提出的有关原则的问题。

那么，先生，我们现在正在尽力做什么呢？我们正在确立坦噶尼喀的公民权。坦噶尼喀公民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民选的坦噶尼喀政府说，对国家的忠诚将成为我们国家公民权的基础。有一点是明确的，在人类所能的范围内是明确的，那就是坦噶尼喀公民必须忠诚于坦噶尼喀，而且只能忠于坦噶尼喀。我们已经说过，尽管其他国家接受双重国籍……但在坦噶尼喀，我们不接受双重国籍。

有相当一部分发言者站在这里，他们声称自己代表坦噶尼喀人民发言，我也相信他们是认真的，因为我相信他们确实希望我们能认真对待他们。他们站起来说为坦噶尼喀大多数人代言，但是，他们要求我们不要把对国家的忠诚当

作是公民权的基础,应当把人的肤色作为公民权的基础。

那么,先生,这就是原则上的巨大分歧,没有比这些发言者和政府之间的分歧更大的了。先生,我打算认真对待他们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民主政府,他们向我们的民主提出了挑战。他们声称自己替全国的多数人代言,我们声称自己为全国多数人代言。而现在,先生,我要做一个非常严肃的声明,因为我不希望有人来到议会,沉醉于议会的氛围,并希望别人为他们的胡言乱语鼓掌叫好,然后一走了之。我将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

我们在这里致力于建设民主,我们所代表的组织也致力于建设民主。那些人声称为全国多数人代言,而关于《白皮书》,尽管我们把它当作是一项原则性问题,我们将会比那些民主国家还要民主,因此我们要就这一问题进行自由投票,完全自由的投票,没有任何强制的自由投票——我们要把这当作一项原则。如果坦噶尼喀人民的代表对该动议提出反对,那我们政府就会马上辞职,我说到做到。(掌声)我说到做到,因为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愚弄我们的人民,而是为了告诉人民我们相信什么。

美国伟人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在建成国家时,我们一开始就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现在我们实际上把这句话读成‘人人生而平等,黑人除外’。要是一无所知的那些人掌权,就会把这句话读成‘人人生而平等,黑人、外籍人和天主教徒除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宁愿移居到某个不自吹热爱自由的国家,即便那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但毫不掺杂伪善的成分。”

先生,我相信,那些一无所知者如果掌权就会说:人人生而平等,但居住在坦噶尼喀的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华人除外。但事情不会到此为止,还会继续下去,因为规则都有一些报复的办法。如果打破一项规则,它就会发现一种报复你的方法;如果一个民族试图打破一些重要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就会发现一个报复这个民族的方法。

在坦噶尼喀,如果我们说“所有的坦噶尼喀人生而平等,但居住在坦噶尼喀的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华人除外”,那么我们将打破一条规则,而且结果不止如此。如果在坦噶尼喀我们把公民权和对祖国的忠诚割裂开来,而与肤色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会就此止住;我们将会继续打破规则,我也听说在这里有人已经这么做了。我已经听到过好多次,我也注意到“土生土长的非洲人”这一词语。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开始区分不同的非洲人了。这已经是在开始打破重

要的规则了，然后就会走下坡路，直至瓦解整个国家，直至整个国家都毫无道义可言。

先生，如果我们接受那些声称为多数人代言的朋友们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他们所说的话，那么终归有一天我们会说，人生而平等，但马萨伊人、瓦戈戈人、瓦哈人、一夫多妻制的人、穆斯林等人除外。我们将会不断打破这些规则。

肤色是什么？如果我们以肤色来决定人的公民权，那我们是在犯错误。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肤色。人们可以理解，我可以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我曾经深信的；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宗教。如果有人能够说服我，说我信奉天主教不对，我可以改变。尽管我过去决定信奉天主教，但我现在可以改变我的宗教信仰。我依然不喜欢有人会因为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原因遭到迫害或受到歧视，但是这样做至少还有一点什么原因。因为人的肤色就歧视这个人，实际上正是我们一直在反对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建立坦盟的原因（掌声）——但很快，甚至在12月9日来临之前，我们有些朋友就已经忘记了这一点，现在他们正在鼓吹歧视，把肤色歧视当作一种宗教向我们鼓吹，像希特勒一样颂扬种族优势。但我们应当颂扬人类，而不是颂扬人类的肤色。

你们都知道，当人们醉心于权力、醉心于鼓吹种族优势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像希特勒一样；你们知道这会把人类引往何方，那就是一定会产生像南非那样坚持种族隔离政策的人；你们知道这些人将把人类引向何方。这些人将会告诉我们，应该歧视某些种族的人，因为“坦噶尼喀的特殊情况”，正如南非那些坚持种族隔离政策的人所说：“南非的情况不一样。”这是种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

我们的那些朋友在谈到歧视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华人时，好像这么做完全正确，而只有歧视黑人才是错误的。

先生，当今世界上什么行为是犯罪？是人压迫人，是那些有权的人压迫那些无权的人，把他们当作山羊，而不是当作人，这就是犯罪行为，这就是我们一直反对的事情。那些人来到这里，站到这里，好像只有他们才知道在坦噶尼喀存在种族问题。不必告诉我本国的非洲人很穷，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办法就是把公民权建立在种族的基础上，我不可能相信说出这些废话的人到底有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先生，我曾经说过，由于本国历史的原因，从经济上划分的阶级恰好与种族相关，所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火药桶

上,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除非我们能做些什么,但是要做一些积极的事情,而不是消极的事情。

先生,我说过,我不会就有关白皮书的细节问题做出回答。但我想再重申一遍,再坚决重申一遍,本政府已经驳回,已经完全驳回了任何认为本国的公民权与对祖国忠诚之外的东西相关的说法。(掌声)本政府将坚持这一原则,因为某些人已经醉心于议会的氛围,声称自己为多数人代言,而我绝不愿意在任何原则问题上受到挑战,重申议会的这次投票是完全自由的投票。这里不存在任何人为的压力或政党机器,完全是原则的问题,是一个严肃的原则问题,而那些尊敬的议员们和政府成员们的意见相差太远,所以我要求自由投票。一旦我们人民代表的多数表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马上辞职。(掌声)

29 教育与法律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的第一个院系是法律系，第一批学生于1961年10月入校。他们使用的新大楼是坦盟为其总部盖的大楼。1961年10月25日，举行了第一场正式的开学典礼，并聘请总理为学院的名誉研究员。

主席先生，这所大学是匆忙之间建成的。提出在坦噶尼喀建立一所大学学院的建议中，原定的建校日期晚于我们现在建校的日期，但是政府感觉这是高等教育优先权的问题。有人说这是一个政治决策，确实如此。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它的高等教育全部依赖于别人的施舍，这会产生心理危机。但决定在1961年就建立第一个院系，而且在做出决定后马上开始行动，这也是一个教育决策……根据我们的教育发展计划，我们将要使坦噶尼喀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人数增加六倍以上，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那么最迟到1964年，我们就不能为那些合格的并希望获得大学教育的学生们在原先的东非学院提供学习的地方……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一个坦噶尼喀国家。尽管海外教育为我们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长期看来，如果我们要树立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就必须培养自己的受教育公民，也就是说，不仅仅要在非洲开展教育，而且教育的内容要满足当前非洲的需求。因为尽管某些国家的目标是到达月球，在未来我们也可能希望到达月球，但我们现在的计划必须针对我们的乡村……

主席先生，我当然明白在英国或美国学习带来的魅力。我赞同这样的海外学习经历对我们许多年轻学生产生的吸引力，但我相信，那些有幸成为本学院第一批学生的年轻人，和那些毕业于麦克雷雷学院和内罗毕皇家学院的人一样，会对我们祖国的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在他们最重要的学习时间里，他们受到东非环境的限制，因此不可避免地更容易在学习时把非洲的问题记在心

间……

我们这里的很多学生将来也会去海外学习……但那时他们就已经是成熟的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他国的经验,更好地评价他们所去国家的经验和机构,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接受了培训。他们去海外学习,是为了使他们的海外经历来帮助满足我们的需求,不必先学习再回过头来看他所学的知识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统一、民主、自由的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国家理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有一支高度完整的法律职业队伍,他们不仅要通晓法律程序,而且必须要了解构成社会基础的基本理念。换句话说,我们的律师和司法队伍,不仅仅要领悟法律在我国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必须要理解法律的理念。在任何相信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里,每个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约。此外,不偏不倚地执行法律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各个层面的司法权力必须独立于国家的行政权。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都会相信,自己的案件将会受到不偏不倚的判决,即便案件是针对总理本人。

这当然不仅仅是法律队伍自己的责任。司法队伍和法律职业的其他人员必须保证能够公正地实施法律,立法机关必须保证法律本身是公正的。律师们只能通过自身作为个体公民的行为来影响法律的内容,因为他们也是我们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作为律师,他们的工作就是执行法律,而不能考虑自己的观点如何。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肩负起责任,确保法律能够遵循那些构成自由国家和平等公民发展基础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逃避或转移这个责任。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法律是通过一些公正的人来执行,这些人坚持必须一字不差地实施法律。但是其中有些国家会引起我们的强烈谴责,因为他们的司法部门坚持的法律有悖于人类尊严的基本准则。如果一个法官裁定某人因为皮肤是黑色的而有罪,这不是法官的过错,而是他所在社会本身的过错。同样,在我们国家,所有公民都有责任确保没有人会因为自己是白人而受到法律上或社会上的歧视,因为这样会有悖于法律。人民可以通过国民议会来表达意愿,来改变法律,但这会有悖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人类公平的基本原则。

30 独立之挑战

本文是为伦敦《东非与罗得西亚》杂志所写，发表于1961年12月。

12月9日，坦噶尼喀将成为一个自由、团结而民主的国家，将脱离殖民统治，团结在坦盟的领导之下，在国家治理和生活方式方面是民主的。

在我们看来，这些毋庸置疑的声明却经常遭受质疑。我们将12月8日之前的这段时期称为“殖民统治时期”，这让我很多朋友感到不安，比如，见证了坦盟成立的朋友们会告诉我们使用这些词汇只是出于情绪的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虚假的外表只能使人生理上的痛苦有所减轻，但统治终究是统治。

与我们有着不同生活态度、不同习俗和信仰的人控制着我们的全部。他们已经决定了政府的形式、经济活动的类型——如果存在经济活动的话——以及我们的孩子所受到的教育。他们对塑造现在的坦噶尼喀人所产生的影响，胜于其他任何事物。

即使他们一直在尽力做一些自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群体能始终为了他们控制的人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也是错误的。一个人试图控制另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比摧毁这个人更仁慈，因为他认为那么做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考虑。一个人在未经另一个人同意的情况下统治那个人，这种规定是错误的……

上次的选举不是全民普选，尽管我们无比期待那样。但选举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而且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非投票者群体不同意最终的选举结果。唯一的一个有组织的反对党失去了它应有的席位。被选出的唯一的无党派组织曾经是坦盟的成员，他声称除了在选区选择候选人之外，将在其他所有方面支持坦盟。坦噶尼喀的人民支持坦盟……未来可能有第二个政治党派在坦噶尼喀成长起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另一个政党的出现将标志着坦盟的失败。两

个或更多固定政党的存在意味着社会将存在不同的阶级,而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在我们国家出现不同的社会及经济阶级。如果我们确实避免了这一点,那么,我们的对手将对我们达成一致的处理方式持反对意见,但是没有必要通过两党制的形式来表达不同意见。

事实上,我们认为,如果在人民和政府之间通过坦盟,保持一个思想和教育的双向渠道,第二个政党的存在就没有必要。坦噶尼喀真正的民主问题是建立和维持这种交流渠道,而不是人为建立一个对立政党。

人民应有权来表明是否有这样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是否很容易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很重要。但如果他们想这么做,只能通过自由组建并支持一个负责可靠的反对政党来实现。很显然,目前他们并不希望如此。

31 坦噶尼喀与英联邦

本文是为《英联邦皇家社会杂志》而写，发表于1961年12月。

……坦噶尼喀想要加入英联邦的要求无需解释。我们的民族主义不是排他性的，我们寻求非洲团结而不是非洲孤立，我们想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因此，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成为联合国的一员，我们很高兴能得到英国及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帮助。除此之外，我们还迫切地想加入其他不使我们卷入当前冷战的协会。英联邦的成员资格就是这种类型；它不是对抗任何力量或阵营的联盟，它自身也不是阵营。它的成员包含结盟的与不结盟的国家；它不是要求效忠于某种经济体系或政府形式的意识形态协会。它唯一的理念就是尊重人类及每个国家的完整，无论这个国家是大是小。英联邦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协会，各成员国之间不会为争统治权而斗争。换句话说，英联邦是联合国宪章制度的伟大拥护者，不需要我们参与目前的权力冲突，同时又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未来更危险的冲突，即世界上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中作出贡献。

将来我们为了英联邦可以做些有益之事。目前我们在世界权力结构中无足轻重，相对较少地卷入世界政治，这有助于我们为英联邦议会带来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不必非得考虑政治威望或增强军队的力量。我们的军队或许能协助联合国警察，但也只是绵薄之力，我们当然不可能用之袭击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指望获得声望的唯一方法是对任何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一系列坦诚、认真的考虑，并采取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的无足轻重让我们有机会变得更客观——这对联合国有利无害。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成功抓住这次机会，或我们强烈的经济需求能否使我们偏离应走的道路。现在只能说：尽管不能保证我们会一直正确，但我们会努力以世界的眼光看问题！

在考虑与英联邦有关的非洲国家,如坦噶尼喀的未来时,还应考虑一个问题。非洲人民对统一的渴望人尽皆知,坦噶尼喀人民也有这种渴望,而这自然会在将来某些时候对我们寻求英联邦成员资格的问题产生影响。我们不可能预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非洲统一将采取何种形式尚不明确,而这虽然会有不同。如果成立了非洲合众国,那么很多目前没有资格成为英联邦成员的国家将跟英联邦成员联合在一起。显然,一个联邦的不同成员国,不可能与不同的国际协会有联系,除非协会有某些特定的项目在其国家的权限之内。为了实现如此程度的非洲统一,坦噶尼喀将放弃英联邦成员资格。当然,实际上,在实现全非洲的统一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建立区域组织。或许,东非联邦主要包含受过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因此每一个国家都能单独申请英联邦成员资格。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整体可能会决定申请成员资格,而这项申请必须通过英联邦部长会议就其价值做出考虑。

我不认为在未来某一时刻可能离开英联邦意味着对英联邦的原则不忠诚,因为这只是对历史事实的认同。对我们来说,地理、殖民前的历史以及未来的繁荣都要求我们必须将非洲统一排在其他任何组织之首。而无论我们对英联邦怀有多大的信任,非洲其他地区曾经处于不同的殖民统治之下,与东非没有相同的历史联系,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殖民历史决定的边界影响到非洲部分地区的联合是不能让人接受的。无论语言、统治习惯及其他方面有多么不同,“法语”非洲与“英语”非洲的区别必须消除。如果我们必须放弃英联邦的成员资格才能获得前法国殖民地国家或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的统一,坦噶尼喀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不过,我们仍然希望英联邦的成员资格能向坦噶尼喀开放,因为在我们看来,英联邦最重要的是其基本原则。每个国家依据其自身情况对这些基本原则做出诠释,但不能抛弃人类基本的平等与尊严。坦噶尼喀不会声明放弃这些原则,但在将来发展这些原则可能会使之与其他国家建立政治关系,而这些国家没有英联邦成员的资格,也没有传统使他们接受这一点。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坦噶尼喀会像一个改变了地址的俱乐部成员,失去在俱乐部常驻成员的身份。英联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任何不同形式的关系都有可能存在,不过新的非洲联盟及英联邦成员必须对这种不同形式的关系进行考虑。

英联邦当前的存在形式及其充当世界和平因素的可能性,源于其组织的灵

活性,及其呈现的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友谊的态度。我相信,如果英联邦能以某种形式继续保持这些东西,未来它将成为维护世界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32 就独立致坦盟的信

这封致坦盟及其成员的信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发表于斯瓦希里语党报——《自由报》。

12月9日，宣告坦噶尼喀独立的绿、黑、金三色的旗帜将在我们头顶飘扬。这是我们追求已久的时刻，它的到来比我们任何人在1954年梦想的都要快。

旗帜飘扬起来了，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决心让它飞扬起来，他们为了这个结果而无私地工作。在庆典被报道之后，许多坦噶尼喀领导者的名字将会在世界媒体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然而领导者的名字，甚至是坦盟建立者的名字，都不重要了。黎明已经到来，因为坦噶尼喀的人们已经团结协作，并且锐意进取、勇于创新，都为了这一个目的：获得乌呼鲁（自由）。住在难以在任何地图上找到的小村落里的坦盟委员会的人，传播会议消息、讲话、报告及事件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们，筹集资金并如实上交用于斗争的人们，建造办公室并打扫办公室的人们：每一个人都为坦噶尼喀旗帜在这个月的飘扬尽到了责任。任何为建立、巩固坦盟“作出贡献”的人，无论做的是多么微小的事情，都能为他们的成绩感到自豪与满足。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怀着莫大的喜悦庆祝独立日。我们正在庆祝一场胜利，但我们必须记住，在那一天我们所赢得的是为自己工作的权利，是设计与建造我们自己未来的权利，就像获得一块要建造房子的土地。为获得那块土地而击败对手，是一件伟大的、值得庆祝的事，但建造房子需要更多的工作，甚至更艰苦的工作，因为如果想使房子成为我们——房子的主人的骄傲，需要技术、汗水和耐心的历练。

关于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何种房子，我们已经谈论了很久，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来建造房子了。我们已经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致，现在是把这些原则付

诸实践的时候了。在坦盟为乌呼鲁而战时，我们的斗争始终以信仰全人类的平等与尊严及《人权宣言》为基础，我们一致同意，我们的国家将是一个人民自由、平等的国家，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来发展自己，并尽其所能地为社会的发展作贡献。我们已经说过，种族、部落、宗教、聪慧程度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剥夺一个人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的权利。我们将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然而我们知道，到12月9日，我们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在真正建立起我们梦想的那种社会之前，必须消除贫穷、无知和疾病。这些不是小障碍，它们比任何外国统治都难以克服。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是同人类作战，而是同自然作战，要从自然中为我们自己打造一个更加美满的生活。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唯一的武器是我们的决心和努力。我们将会从坦噶尼喀之外寻求帮助：我们将会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汲取其他人民的智慧，但我们必须付出劳动、努力和牺牲。这将是一场长久而艰难的斗争，尽管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吸取教训，但是没有蓝图可以参考，也没有理想的国家能让我们看着说“那就是我们必须做的”或“我们必须成为那样的国家”。我们必须依靠自己，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和努力来建设坦噶尼喀。

我相信，坦噶尼喀的人民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能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之前已经有人说过我们是在做白日梦，说我们做事情不顾实际。但我们——坦噶尼喀的人民，现在已经展示了我们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展示了我们自己的力量。通过坦盟，我们显示了实力，打破了阻止我们前行的镣铐。如果我们能这么做——并且正如我们的旗帜已经飘扬起来了——那么我们就投入到这场克服物质匮乏的斗争。

我们可以通过劳动，通过共同劳动来完成它。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采用跟第一个阶段斗争相同的方式：共同努力。我们可以用相同的工具——我们的民族运动，坦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任务会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会更加复杂。政府应当制订一个总计划，为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如同过去坦盟的国家执行委员会为我们制订出斗争的战术一样。但同时，若没有国家中各个村落的活动，坦盟的国家执行委员会将会十分无助。因此，政府只靠自身无法实现任何东西。未来几年中真正重要、能够真正决定我们进程的，是人民的态度和参与。

综合这一切，坦盟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是一个人民的组织，通过它，人

们能够且必须向政府传达他们的需求和担忧；通过它，政府能够且必须向人们解释政府正在做什么及为什么那么做。因此，坦盟必须成为一个供思想来回交流的广阔渠道。过去，我们不顾殖民政府的反对，发起了教育运动，组织了志愿力量，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成人大学。现在我们必须加强这些活动，与新政府合作，协调我们的活动，用人民的直接行动促进政府的工作。现在由于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目标，成立了一个坦盟领导的政府，我们可以将工作推进到实现其他目标。我们没有必要坐下来等着看我们选举出的政府将要做什么。那么做将是灾难性的，会使我们过去的所有努力都只是浪费时间与精力。我们必须以过去的劳动成果为基础，向前奋进。

要做好这些新工作，坦盟组织必须变得更加强大，必须更加仔细地节俭使用人民的钱财，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官员们能得到下一阶段斗争所需的教育和知识。坦盟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组织值得去挑战。但它不仅仅是对一个组织的挑战，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过教育的，每一个人都有应尽之责。

坦盟在过去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尽心地寻找自己能做之事。本着这种精神，未来我们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为自由而奋斗！

33 接受独立文书

1961年12月8日晚，随着新建的露天国家体育场内鼓声喧天，独立庆典开始。子夜12点整，新国旗升起来，英国国旗最后一次在坦噶尼喀降落。现场约7万5千人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第二天，庆典仍在此举行，到场人数与前一天大致相同，爱丁堡公爵将独立文书交到坦噶尼喀总理手中。

我已经认真聆听了尊贵的阁下的良好祝愿以及您向我们转达的女王陛下的意旨，我怀着深深的情感接受了这些能体现我们国家自由的文件。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天，在这一天，每一个坦噶尼喀人都能说：“我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独立国家的公民。”

尽管这是令人高兴的时刻，先生，您正确地提醒了我们这也是责任重大的时刻。对此，我们十分感激。的确，我们对人民负有重大的责任，圆满履行这些责任必定十分艰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标准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斗争将是激烈的。但无论斗争如何激烈，这个新国家的人民将满怀信心和决心将斗争进行下去。

另外，除了对自身负有责任之外，我们还有更广泛的责任。对于其他与我们有着密切联系的非洲国家，我们同样负有责任。而且，在这些日子里，即便是刚刚成立的国家也对地球上的所有国家负有责任，理应寻求机会通过执行政策等方式对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产生影响。

然而，今天是我们喜庆的一天。因此，我不想再谈论在坦噶尼喀及外面更大的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而是提醒我们的人民，问题仍然存在，必须团结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请允许我向所有帮助过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到今天这个欢乐日子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感谢坦噶尼喀的人民，你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和良好可靠

的判断力使坦噶尼喀的政治进步得到有效支撑。接下来,感谢坦噶尼喀国内外众多忠实的朋友,为政府服务的英国军官们,为教会劳碌的宗教人士们,种植园主们以及为我们的经济奠定基础的商人们,每一个人,所有那些满怀信心、辛勤工作、坚定不移地投入到自身职责中的伟大的人们,都慷慨无私地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有些人,我本想提一下他们的名字,但因时间有限就不一点名了。对于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以及那些依然健在的所有的人,我向他们致敬。

尊敬的阁下,对于您的出席,我不胜感激,也非常感谢女王陛下能派她的丈夫前来出席这场盛会。

愿上帝指引我们,让我们的国家在幸福与繁荣中不断前进,让我们与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

34 在联合国的独立演讲

在独立仪式结束后，总理立即奔赴纽约，在联合国大会进行了演讲。1961年12月14日的讲话概括了对坦桑尼亚外交政策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在坦噶尼喀和坦桑尼亚的宪法和其他发展中仍然没有变化。

恐怕在讲话前我首先要向在座的诸位道歉并做一个恳求，道歉是因为我很肯定，我不能像之前讲话的代表那样做一个简洁的演讲，我的讲话会有点长。我恳请联合国大会在座的各位成员：如果你们发现我的讲话太长，你们可以睡觉，但前提是不能打鼾。

我代表我的祖国，希望向联合国，向所有资助我们的人，以及所有那些支持和帮助我们——使我能够作为独立的坦噶尼喀的代表站在这里成为联合国的一员——的人表示感谢。我们对联合国有特殊的感谢和忠诚，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欠托管委员会，当然，也欠联合国大会一份人情。

12月9日之前，坦噶尼喀是英国管理下的一块托管地。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要因为我们取得的独立向除了坦噶尼喀人民之外的任何人说声“谢谢”，完全违背我本来的意愿。但是，我们曾经是英国管辖下的托管地这一事实，使得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取得独立，如果我不能公开感激地承认这一事实，那就太不诚实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在这里向联合国和英国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感谢联合国对我们的事务产生的浓厚兴趣，感谢我们原先的管理者、我们现在的的朋友——英国。我可以向英国表示祝贺，因为英国也向本国的完全独立和自由迈出了一步。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使得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处在不自在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

当我们欢迎联合国接纳我们成为会员国时，我们也确认了自己与其他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我们确实获得了国家独立，但是我们这种新的国家

意识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现在在所有方面都自立了。我们知道,独立会带来责任,对世界的责任。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我们将行使考虑世界政治主要事务的权利;同时,也要对对我们坦噶尼喀有明显或直接影响的事务行使权力。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们对那些烦扰联合国大会的大问题有解决方案,而是因为我们感觉,那些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巨大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我们很高兴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成员,这意味着联合国赋予我们加入到世界各民族中去追求加深理解和更大和谐的权利。为了完成这一职责,我国政策将以对人性的基本信仰为基础,将以遵循这种信仰的四条行为原则为基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陈述一下这些原则。

我们对内对外行为的基础将是一种尝试,一种尊重人类尊严的、诚实的尝试。我们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与我们之间共同的人性比起来,我们之间的心理区别是完全不重要的。我们认为,不管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不管是直发还是卷发,不管有什么样的体型,都不会改变,甚至不会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每个人在人类的发展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可能会引起我们个体之间的一些问题,但从我们的思维方式看来,不会影响每个人都应当被当作有尊严和荣誉感的人这一权利。

可能由于非洲历史的原因,我们尤其意识到有必要重申这一与人类的种族划分相关的基本信念,我们相信这个信念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而且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人可以改变他的宗教信仰,可以改变他的思想信仰,但却不能改变自己的脸型或种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任何人因为种族不友好地对待其他人是邪恶的。我们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将把《世界人权宣言》当作我们对内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

该《宣言》确定了每个人对许多事务的权利,但现在我们还不能赋予我们本国人民这些权利。从这个方面来讲,《世界人权宣言》代表着我们奋斗的目标,而不是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主题是:人类,不管种族、肤色或信仰,都是兄弟。这一原则是我们坦噶尼喀人,我相信也是非洲其他地区以及世界上所有人都在奋斗争取的一条原则。

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一个基本的信条,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继承

地球、分享地球的欢乐和悲伤，按照自己及其子孙的意愿建设社会的权利。我们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国家正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知道，要想成功实施一项高尚思想包含的精神，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有时我们的努力也是白费。但是，我们对《宣言》条款的任何明显的偏离都是为了在维护主要原则的同时，平衡相互冲突的一些利益。不管是在联合国大会还是在其他地方，在任何要求我们参与的国际问题中，我们都会尽全力按照这条原则来决定我们的立场。

我们将尽力搞清楚在实施这项原则时政府和国家会面临的实际困难，但我们永远不会与那些否认这条基本原则的人妥协。我们接受联合国不能干涉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规定，我们相信在当前情况下，的确应该如此。但我们依然认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高于一切的利益。此外，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内部事件不会对外部产生影响。

我国政府不对任何人怀有偏见，但是对那些以种族歧视为政策基础的政府，我们深抱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在我们国家有一些遗留的种族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种族歧视问题做出妥协，就会危害我国人民为驱除种族歧视这个魔鬼所做出的努力，而且在坦噶尼喀人民中间传播这种有害精神会使我们为获得个人和国家尊严的斗争站不住脚。

事实上，我们认为人的个体才是社会存在的理由。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赞同这个简单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如何在实践中实施这项原则。因此我们认为，每个国家由于其不同的历史和其他条件，都在用适合自己国家的不同方式来实践这条原则。我们不相信在这一方面有人已经找到了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我们认为人类仍然在探寻一种解决方案。能加入这一探寻解决方案的队伍是我们的追求。

我说过我们国家的政策有四条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关注实现世界和平，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和平，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所有计划，甚至所有有关生活的计划都将不复存在。我们相信世界和平的问题将最终得到解决，就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通过建立政府，给予每个公民安全感一样。我们认为，世界和平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但目前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政府。我们知道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但它的存在却印证了我们对世界和平的需要。

因此，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就是认可联合国的重要性。我们认

为,任何人,尤其我们这些没有多少经验的年轻人,很容易会批评联合国的某些方面。当然联合国不可避免地需要提高效率,提高实行决策的速度,但困难是,在讨论什么是进步,什么会损坏当前存在的机制问题时如何达成一致。我们认为,这个困难与需要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机构的要求相比,仅仅只是细节的小问题。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有其伟大的目标,有更大的潜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有国家的代表,不论国家的大小,都坐在一起商讨、辩论人类的问题及分歧,这一事实本身对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所有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联合国的福祉都有共同的兴趣。

在联合国大会,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正是联合国独一无二的特点及其最大的优点。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代表的各个国家除了主席先生您和联合国大会赋予的尊严和尊敬外,在其他方面却是不平等的。我希望我这么说能够得到你们的原谅。我们所代表的国家在面积大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在今天在座的一些人代表的国家面前,我们一些国家,尤其像坦噶尼喀这样的小国家会战战兢兢。像我们国家一样的政府,在不同的时间来到联合国大会,或访问不同国家,请求你们帮助我们解决现在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只有在联合国大会,我们所有国家才能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共同寻求全球更好的和谐和相互理解。不管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有多不公平,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够与美国或苏联这样的大国一样有同样的发言权,这实际上就是联合国最大的一个优点。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对我们所有国家都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我要虚心地说——因为我们有些国家力量小而且不重要,所以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情况处理这些事情。我这么说并不是宣扬我们这些小国家有什么特殊的优点或才能,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如果没有别国的合作,我们的观点可能,而且经常可能会苍白无力,但在我们形成这些观点并付诸实践时——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并不把声誉押在每次机会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观点会不会被接受。我们的声誉只能来自我们为人类尽职责时所做出的努力,不管这些努力多么微不足道;这种声誉不可能来自权力,因为作为单独的国家,我们这些小国的力量非常有限。

我们相信——我再一次谦卑地说——声誉的问题不应小觑。因此,在我提出一个国家会担心本国在其他国家眼中的形象受到损害时,没有人提出任何批

评。在这一方面，国家和人一样，也有尊严，能感受到屈辱——尽管有时是不必要的——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小国能够在尊重方面帮助下大国，我想我们所做的事情还是有一些意义的。

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尽管小国不会失去军事或经济声誉，但在维护世界和平和联合国的未来时，与其他国家肩负着同样的责任。独立和决定自己未来的这些权利对我们和对其他大国一样同等珍贵，至少在联合国大会这里，我们和那些比坦噶尼喀大一百倍的国家一样关注我们讨论的结果。

当前，联合国是全世界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论坛，我想即便联合国有什么不完美之处，也与此无关。我们认为——由于我来自前托管地，我相信各成员国的代表相信我说这番话时的真情实意——联合国已经取得了许多值得赞扬的成就。联合国的权威大体上还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威，如果一些大国认为联合国的某些决议有悖于他们的利益，这些决议可能就无法得到实施，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聆听联合国大会的声音的国家越来越多。我们相信，联合国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这取决于我们所有国家决心的大小。我们只能说，就我们而言，我们将尽其所能来提高联合国的地位，帮助联合国执行其决议。我们相信，由于通过联合国的行动会避免被其他国家控制的担心，联合国能够为我们追求的和平作出巨大的贡献。坦噶尼喀在制订每一项政策时，都要把我们认可的联合国重要性当作基础。

我想借此机会来陈述的第二条基本原则会比较简单，是在第一条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那就是我们继续坚决反对非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不会再持续多长时间了。殖民地的人民不可能继续接受殖民主义了，那些声称相信人人平等的人绝不会支持世界上任何地方继续实施殖民主义。任何保留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地位的尝试只能引起战争和冲突，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一样也要承担所带来的痛苦。

关于殖民主义问题我们面前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选择所有殖民地国家马上独立，要么选择这些国家在一个国际机构的监督下完成独立。我们认为，坦噶尼喀的例子展示了在一个国际机构监管下实现权力的有序交接的优点，同时也表明，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需要很多时间。在我们国家，首位非洲大学毕业生在1952年回到祖国。在1954年，我们确实没有合格的非洲人能在坦噶尼喀政府工作，所以人们认为坦噶尼喀的独立将会花费20至25年的时间。但是，我

今天却作为独立的坦噶尼喀的代表站在这里讲话，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国际机构的有序监管对现存的殖民地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进一步认为，任何社会要维持法律和秩序，要依赖一个能被多数人接受的最高权威机构，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个权威机构能够对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坚持权威。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如果一个权威机构突然撤出却没有当地的一个权威机构来取代，这会给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完全崩溃的危险，从而给该国的人民带来可怕的后果。但是，现在某些地区的殖民地人民不可能相信一些大国的善意，即便这些大国真有善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个外国的管理当局应当最清楚权力交接的危险和困难，所以只会谈论这些危险和困难，甚至经常会夸大这些危险和困难，但因相关个体的基本兴趣不同，他们面临的危险和困难也不尽相同。我们不明白一个国家怎么能够评判自己的事业，就像一些殖民宗主国评判自己的行为一样，因此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肩负起评判的责任。我建议那些真正希望加快殖民地人民发展的国家，应当把这些殖民地当作托管地来对待，这意味着每年要向联合国递交一份报告，让联合国讨论托管地在建立本土政府方面取得了多少进步，以便向这个政府移交权力。

我非常高兴，长久以来一直反对这个建议的英国政府现在宣布要提交有关其控制的所有地区的报告。我们希望，其他的殖民地宗主国也能够效仿英国的做法。我们相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现在那些对他们不诚恳的怀疑就会消失，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有机会考虑这些问题，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样的做法对双方都有利。一方面，殖民地宗主国的善意将不再受到怀疑——我们相信一些宗主国确实有一些善意；另一方面，联合国大会和所有殖民地的人民将有机会敦促加快权力交接的进程。

我提到的殖民地，并不只是用来指那些在宗主国眼中有殖民地法律地位的国家。对我们来说，认定大片的地区为某些小国的省份是合法的，这是一种狡辩，不会影响事情的真实。我们举两个例子，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我们的眼里，在这两个国家的人眼里，它们就是别国的殖民地，所以在它们通往独立的过程中，必须要被当作殖民地来对待。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各成员国必须尽全力来保证做到这一点。

在坦噶尼喀，我们尤其不能接受用法律理论的名义来解释发生在我们周边国家的那些残酷的压迫。这些国家和当前所有的殖民地国家一样，必须在真正

自由的条件下获得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无忧无虑、不偏不倚地参与选举这一点是必要的，除非我们相信有一些人希望被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国家控制，尤其在目前这些国家中，人民对殖民当局表现出了坚决抵制时更是如此。

我在倡导有序地交接权力时，并不是说可以轻松地实现权力交接。必须要尽快结束殖民主义。我们这些已经获得完全自由的人，无权舒服地坐在一边，向那些还没有获得自由的人提出咨询建议。这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因为这是人类发展内在的一部分。在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疏于防范，以免这些新的国家中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政府的政策被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行动所控制。我认为“新殖民主义”一词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却是一个事实：就是由政治控制变为经济控制。我们认为这也有悖于联合国的原则和人人平等的原则。

我刚才说过了，我们反对殖民主义，决心要看到殖民主义迅速瓦解。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我这么说并不表示对世界上任何人怀有敌意。我们反对的是一种制度，但不反对为这种制度服务的人，除非他们在履行职责时不遵循我们共同的人性原则。在这儿的一些国家的代表会认识到，为我们旧制度工作的一些人现在仍然在我们独立的坦噶尼喀政府中担任公务员。我们反对一切殖民主义，不管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但我们应当特别关注非洲——这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实施我们第三条政策，即争取非洲统一，要取决于整个非洲大陆能否获得完全自由。如果周围国家仍然麻烦重重、没有得到解放，坦噶尼喀就不可能作为一个自由和平的孤岛存在。在我们国界的两边住着有共同语言、共同传统的人民，所以我们必须关注坦噶尼喀邻国的事情，他们的麻烦也是我们的麻烦，这一点对于我们邻国的邻国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整个非洲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不能被分隔得七零八落。

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非洲大陆的自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希望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消除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人为划定的国界。现在，非洲大陆有很强的统一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感情来自我们追求自由的斗争，但这种感情同时受到了地理、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历史和现代经济等因素的支持。把非洲各国分开的这些国界与人种或非洲的地理特征都没有任何关系。此外，非洲一直遭受着一些相互矛盾的条约和协议的折磨，这就给非洲遗留下

了一些潜在的冲突危险。新生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潜在的冲突摩擦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新的集团,使之能够把那些可能会存在怀疑或敌对的国家团结起来。我们的雄心就是把非洲统一起来,但我们知道这个统一必须是以所有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自由意志为基础来实现的。

我们认为,通过统一的非洲,我们不仅能够避免非洲大陆上产生冲突,还可以加强我们每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战斗能力——联合国大会的一些成员国在这里提到了这场战争,那就是反对殖民制度遗留下来的贫穷、疾病和无知。如果这些国家的边界从属于统一的非洲组织的成员身份,那么各国之间的跨境合作将更容易。

我们决心与其他非洲国家一起合作,致力于争取统一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希望在非洲大陆实现统一的不仅仅是坦噶尼喀,每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都提到过赞同某种形式的非洲统一,我们只是加入他们的呼声,加入他们的努力,向着非洲大陆统一的目标前进。我们相信,一定能实现这种有机的统一,但我们也认为,朝着这个方向行动的速度越快,就越容易实现这个目标。

我想有必要再说一下,我们渴求这种统一,但不是因为对别国的敌对,或要割裂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联系,而是因为这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而且通过统一带来的团结和力量,会最终符合全世界的利益。我们渴求非洲统一是为了非洲的利益,但我们认为,非洲统一还会带来另一个好处,我希望联合国其他的老成员国的代表会原谅我厚着脸皮这么说。从国际上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被意识形态冲突割裂的世界。我们急切地希望远离这些纷争,希望我们非洲大陆不被用作这些冲突中的棋子,因为这些冲突本来与非洲毫不相干。根据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我们没有觉得需要加入这种冲突。

我们政策的第四个原则是远离世界上的这些冲突。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相反,我们非常关注我提到过的这些基本的原则。我们非常关注人类的未来,但我们不认为当前世界的割裂是善与恶之间的区分,甚至不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割裂。那种认为主要竞争国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总是正确或总是错误的观点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认为,那种旨在使人相信这种观点的宣传是一种最丑恶的麻醉剂。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人类就不再是人类,因为人们将不再为自己思考;我们也不认为让人停止思考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我们现在似乎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一些所谓的“结盟国家”——希望你们原谅我用这个词——很难会不带偏见地看待别的国家也涉及的事务。很多对我们重要的事情是由一些我们认为与此无关的国家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参与到国际层面讨论的任何事情中，我们应当根据事情本身来进行讨论。我从不认为我们是一贯正确的，我们也从不宣称在坦噶尼喀的直接利益受到牵扯时，我们能够一直保持不偏不倚。但是，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对世界政治来说是一个小的崭新的国家，所以不太可能出现我们既是上诉人又是法官的这种情况。因此，对我们而言，我们会尽力利用我们的智慧和判断去处理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我们采取这种态度的目的，是为了向全世界所有国家表明我们对各国都持友善的感情。

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敌意，我们也没有感觉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我们表示出敌意，我们传承了与许多国家的友好关系，也希望与其他国家发展同样友好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能力通过向外国派出大型代表团或使馆来达到这一目标。出于经济需要，我们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会更加谨慎，希望这样会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我们相信，由于我们能够与不同国家及其政府进行接触，我们也一定能够得到友好的对待。

最后，我想指出，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自由的世界，因为人类已掌握了大量知识，世界的未来遭受着威胁。我们发现世界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决心要学会合作，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我要用一开始时说的那句话来结束，那就是我们对人类有信心，我们将为促进人类有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而努力，在联合国这个组织中我们一定会完全、真诚地担负起建设性责任。

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向你们陈述坦噶尼喀政府的基本原则，将来你们可以据此来评判我们。感谢你们友善、礼貌地听完了我的演讲。

35 辞去总理职务

总理在国家独立几周后辞职一事引起了坦噶尼喀内外的轰动，在国外引起了广泛的误解。实际上，总理早在数月之前就有辞职计划，其目的为：通过用实际行动证明政党的重要性，使之在人民与新政府之间担当一座沟通的桥梁，并帮助人民支持这个独立国家的各项制度。

总理的辞职在坦噶尼喀国内带来的影响是，带给了人民对其自身及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新的信心。在新总理拉希迪·卡瓦瓦先生^①上台后，国家的稳定及这两位领导之间明显的继续合作，逐渐消除了外界的误解。

这篇公开声明发表于1962年1月22日。

今天，我放弃了坦噶尼喀总理的职务。在这之前，我亲自挑选了一个新的部长团队，由拉希迪·卡瓦瓦先生担任团队的领导人。他已经同意成为总理，带领着我认为最能胜任继续领导国家工作的团队。我本人将不再是政府中的一员，但是我将以议会议员及坦盟主席的身份继续支持政府的工作。

我的此举在经过持续数日的长时间讨论之后，赢得了同事们的支持。因为我们坚信这是实现新目标——人人都全身心、积极地投入到抵抗贫穷、冷漠和疾病的斗争中去，从事国家建设的最好的方法。

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一个能干的民选政府，一个能够得到人民全力支持与合作的政府，这是我们曾经有过也即将拥有的；还必须要有一个活跃在每个村落中的强大的政治组织，它就像一条双向、全天候通行的路，沿着这条路，政府的意图、计划和问题能传达给人民，同时，人民的想法、需求及问题也能直接传达给政府。这是新坦盟的工作。

① Rashidi Kawawa(1926—2009)，1962年2—12月，接替尼雷尔任总理，此后至1977年任国家副总统。——译校注

我相信,坦噶尼喀的这两种需要现在会得到政府中能力显著的部长们的妥善处理。我对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同时我也会将全部时间投入到处理坦盟的工作中去。通过这些方式,政府和政治组织间目前的合作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实现他们的共同计划和愿景……

我知道这会让您们中的很多人感到震惊,但这种震惊只是出于习惯,也是习惯让您们中的一些人误解了这一步的意义。我们知道对一个总理来说,从政府领袖的位置上退下而到支持新政府的国家政党中担任领导,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模仿别的国家的制度,必须制订出属于自己模式的民主,而我今天宣布的这一步是目前能促进我们前进的最好方式。

因此,怀着对新政府及坦噶尼喀人民的充足信心,我现在将着手我的新任务——参与建设一个新的坦盟,一个能适应独立的坦噶尼喀新环境的坦盟。我呼吁每一位坦噶尼喀国民,都加入到下阶段争取更好生活的斗争中去;我呼吁来自海外的每位公务员或在其他地方任职的人参与这项工作,能像为原先政府服务一样,继续为新政府服务;我请求海外的朋友们理解这些改变,而不要试图将其解读为不同的含义。因为这些变化仅仅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可以完全参与到国家发展中来的民主社会的决心。跟过去一样,我们满怀喜悦在团结中前进,为我们面前的机遇而满怀喜悦地前进。

为自由而奋斗!

36 非洲青年运动的统一

1962年,坦盟青年团召开了一次国际青年会议,但没有听取坦盟的意见就发出了邀请函。由于感觉邀请的形式及受邀人的名单对非洲统一的发展不利,于是在1962年3月16日,尼雷尔先生参加了开幕式,就非洲统一的内心要求发表讲话。同时,他指导把此次会议的讨论成果投入实际应用。

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在去往埃塞俄比亚的途中参加你们的会议。我想针对在非洲变革的这段时期,青年人能够参与的活动提一两点建议,但是我也想解释清楚坦噶尼喀在非洲统一中所处的地位。我很担心此次会议发出的邀请函会成为那些想要分裂非洲的人的武器。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非洲的青年人在把受殖民统治和贫穷困扰的非洲转变为一个自由大陆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五年前坦噶尼喀那些没有意识到青年工作重要性的人,现在已意识到了。在争取独立的斗争期间,坦盟青年团发挥了十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常规工作,组织振奋精神的唱诗班,并确保我们能成功贯彻和平斗争的政策。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在坦噶尼喀,建设国家的任务必须由坦噶尼喀人民来承担,我们不能等着外界的人来帮我们——我们必须靠自己来完成建设任务。

同样,因为青年人必须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因此他们也必须积极参与到非洲大陆统一的建设中来。人为的界线能把非洲的国家分开,但一定不能把非洲的人民分开。

我们都认识到,如果没有统一,非洲的国家和人民将仍然处于贫穷和剥削之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能很容易实现统一,成立一个非洲合众国,就犯了一个大错误。然而,尽管有很多困难,不管是现实困难还是想象的困难,我们决不能放弃努力,否则就意味着放弃争取做人的勇气和尊严。首先,我们自己决不

能做些或说些会让实现统一变得更困难的任何事，因为实现统一这事本身已经够困难的了。

我认为这次会议（由于坦盟青年团发出的请柬的措辞）这么做，会使自身处于危机之中。

我恳求你们仔细看看现在的形势。在我们的邀请函里，对西非国家进行了攻击，暗示了某些人在组织中的失败源于故意追求思想体系的冲突。先是批评科纳克里会议的邀请名单，然后完全随意地选取参加这次会议的受邀国家！这么做只能在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全非人民会议的组织者之间播下怀疑的种子，这是我们承担不起的。

另外，我们已经谈及了非洲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的存在——非洲之外那些急于减少非洲统一机会的人夸大了这两大集团的重要性。实际上，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在地域上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上都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如果仔细阅读他们在不同会议中通过的决议，可以发现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小。然而，存在两个联盟而非一个较大联盟潜在的危险，更容易使双方互相指控不守信用，但不可能成立一个青年级别或其他级别的竞争性的联盟合并它们。比起非洲其他地方，从“开普敦到开罗”的做法不会对泛非统一更加可靠。我们不要犯错误，建设一个不把全非人民会议考虑在内的专属区将会给非洲统一带来危险，否则我们早就会建立一个新部门，而且这个部门的领导就是那些真正关心统一事业的人，那么做我们会把怀疑的种子播种在自己的欲求和意图上。非洲现在是一个整体，而且我们必须保持非洲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我希望在讨论中，你们能认真思考可行的办法，让受邀各国的年轻人能帮助我们向全体人民传播教育，并号召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共同面对的或将要面对的伟大的建设性工作中。这样，本次会议就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弥补了会议筹备之失误。

37 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

这是尼雷尔先生在辞去政府职位期间发表的三篇文章之一。另外两篇是《第二次争夺》和《坦盟与人民》。

“乌贾马”可以译成“家庭关系”。

社会主义跟民主一样，是一种思想认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态度，而不是死板地遵守固定的政治模式，来保证人们关心彼此的利益。

本论文旨在检查那种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而不是为了指定哪些组织该在现代社会中体现这种认识。

个人跟社会一样，将社会主义者与非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是思想认识，而与其是否拥有财富无关。赤贫之人也可能是潜在的资本家，来剥削他们的人类同类。同样，一个百万富翁也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他珍视他的财富，但可以用这些财富为人民服务。而通过自己的财富来支配他人的人就是资本家。那些一旦拥有财富就会通过这些财富来支配他人的人也是资本家！

我已经说过一个百万富翁也可能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富翁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实际上，从用词上讲，这几乎是矛盾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富翁的出现与社会的富裕程度有关。他们能在贫如坦噶尼喀的国家产生，也能在富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出现。产生富翁的不是国家的生产效率或财富数量，而是对产品的不平等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不是生产财富的方式，而是分配财富的方式。因此，一位富翁也可能是一位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但几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

由于富翁的出现并不取决于社会的富裕程度，社会学家或许认为，尝试查明为什么我们非洲社会实际上没有产生任何富翁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确实拥有足够的财富来创造几个富翁。他们会发现这是因为传统非洲社

会的体制——人们对所生产出的财富的支配——几乎没有任何寄生现象生存的空间。当然，他们或许也会说，那是因为非洲没能产生一个悠闲的地主阶层，因而没有人来创作艺术或科学作品，而资本主义社会却能做到。但是艺术作品和科学成就是智慧的产物——就像土地一样，是上帝馈赠给人类的礼物之一。而我无法相信上帝会如此粗心大意，使得人们对他的一个礼物的使用权，要依赖于滥用他送给人类的另一个礼物！

资本主义卫护者声称富翁的财富只是对他能力或进取心的回报，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富翁的财富对富翁自身的进取心或能力的依赖跟封建君权对君主自身的努力、进取心或大脑的依赖一样少，二者都是对其他人能力和进取心的使用和剥削。即便有智慧超常且工作努力的富翁，他的智力、进取心、努力工作与其他社会成员间的差异，也不可能与他们“报酬”之间的差异相称。然而，如果一个人不管怎样努力工作或者怎样聪明，他得到的是跟他一千位同伴同样的“报酬”，那么这个社会也肯定有什么地方错了。

为获得权力或声望而渴望占有是非社会主义的行为。在一个渴望占有的社会，财富总会腐蚀那些拥有它的人，使他们滋生欲望，总想比同伴住得好，穿得好，想在任何方面都超过同伴。他们开始觉得，必须尽其所能爬得比同伴高。他们的舒适与社会中其他人相对不舒适之间的明显对比，几乎成为他们享受财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也引发了个人竞争的飞快上升——进而使这些人反对社会。

个人财富的累积除了导致反社会外，也体现了对社会体制投的“不信任”票。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组织良好，关爱个人，那么，如果他乐意工作，社会中将不会有人担心如果自己今天没有囤积财富，明天将会怎样。社会会关照他，或他的遗孀、他的孤儿——传统的非洲社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传统的非洲社会，富人与穷人都是十分安全的。自然灾害带来了饥荒，但是它给每个人都带来了饥荒——无论穷富。没有人会因为私人财富而挨饿或缺乏尊严，他可以依赖他所处的社会所拥有的财富——那就是社会主义。渴望占有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因为这在用词上会是一个矛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分配，它关注的是要确保那些劳动者能从劳动成果中分配到公平的份额。

财富的生产，无论是用原始的还是现代的方法，都需要三个要素。第一，土地。上帝赐予我们土地，我们从土地中获得原材料进行加工后满足我们的需

要。第二,工具。通过一些简单的经验,我们已经发现工具确实管用!所以我们制造了锄头、斧头,或是现代的工厂或拖拉机,来帮助我们生产财富——我们需要的物品。第三,人类的努力——或劳力。我们无需通过阅读卡尔·马克思或亚当·斯密就知道,创造了财富的既不是土地,也不是锄头。我们也无需取得经济学的学位就会知道,创造了土地的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地主。土地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它一直在那儿。即使没有经济学学位,我们也能知道,斧头和犁是由劳动者们创造的。我们的一些专家朋友显然费了好大的脑力才知道石斧是古代的绅士“早期人”创造的,目的是让自己能更容易剥掉刚刚用棍棒杀死的动物的皮,而棍棒竟也是为自己特制的。

在传统的非洲社会,每个人都是劳动者,因为社会中没有其他谋生的方法。即便长者和那些正在劳动的人相比,他看起来像是什么事情都不干,只管享受,实际上在其年轻时代都曾经努力工作过了。他现在貌似拥有的财富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他作为长者的创造财富的群体。他是财富的保护者,但财富本身没有带给他权力或名誉。年轻人对他的尊敬是属于他的,因为他比年轻人年长,为社会服务的时间更长。而且,在我们的社会中,“贫穷”的长者受到与“富裕”的长者同样多的尊重。

我说在传统的非洲社会每个人都是劳动者,这里的“劳动者”一词不仅仅是“雇主”的反义词,也是“混日子者”或“懒惰者”的反义词。我们社会取得的最社会主义的成就之一,就是带给其成员的安全感以及他们可以依赖的普遍的热情好客。但是,现在经常忘记的是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的基础:社会中的每位成员——除了孩子和老弱病残者——都为创造财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这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仅仅是资本家,还有地主剥削者,都不为传统非洲社会所知,我们也没有现代寄生的其他的形式——混日子者或懒惰者,这些人把社会的好客当作他的权利却没有回报社会任何东西!因此,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可能的,混日子也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耻辱。

我们这些谈论非洲式生活的人,肯定为保持“好客”这一非洲式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感到自豪,一定会记住斯瓦希里语里面说的“Mgeni siku mbili; siku ya tatu mpe jembe”——翻译过来就是“客人呆两天,待他如客人,客来第三天,给他一把锄!”实际上,客人很可能在主人给他锄头之前就要锄头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耻于再懒惰下去。因此,劳动是人生不可分割的

重要部分，实际上也是我们如此引以为傲的社会主义成就的基础和证明。

没有劳动就没有社会主义这类事物。一个社会没能给予其社会成员劳动的手段，或者，给了他们劳动的手段，却阻止他们从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勤劳动得来的成果中获得公平的分配，这需要纠正。同样，一个能劳动的人——社会给他提供了劳动的手段——却不劳动，同样也是不对的。他对社会毫无贡献，因此就没有权利期望从社会得到任何东西。

“劳动者”的另一个意思，专门表示与“雇主”相反的“受雇者”的意思，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态度。这种资本主义的思想态度随着殖民主义的到来引入非洲，跟我们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反。在以前，非洲人民从未渴望拥有私人财富以支配他任何一个同胞。他从未让劳工或工厂工人来为他劳动。但是，随之，外国资本家来了。他们富有而强大，而非洲人自然也开始想变得富有。我们想变得富有这一点并没有错，我们想获得财富带来的权力也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想得到财富和力量是为了支配任何人的话，这肯定是错误的。不幸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学着为了那个目的贪求财富，而且愿意用资本家用的方法来获取财富。也就是说，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了建立私人的权势和声望，愿意利用或剥削我们的兄弟。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且这与我们想在此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互不相容的。

因此，我们的第一步必须是重新教育我们自己，来重获先前的思想认识。在传统的非洲社会，我们是一个团体中的众多个体。我们关心团体，团体也关心我们。我们不需要也不希望剥削我们的同胞。

而在反对殖民主义带入非洲的资本主义思想态度时，我们也必须反对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土地的私人占有。对我们非洲人来说，土地通常被认为属于整个社区。社区中的每个人都有权使用土地，因为除此之外他无法谋生，而一个人无权维持生活方式就没有生命权。但非洲人对土地的权利仅仅是使用权，没有其他的权利，他们也从未想过试图索要拥有土地的权利。

外国人引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根据这一制度，一个人可以宣称一块土地是他的私人财产，无论他是否打算使用它。我可以占领几平方英里的土地，宣称它们是“我的”，然后我奔向月球。要靠“我的”土地谋生，我所要做的就是向想使用这块土地的人征收租金，如果这块土地处在市区，我便无需再开发，我可以把它留给开发“我的”周围那些土地的傻瓜

们,这样“我的”那片土地的价值就自动提高了。然后我可以从月球上下来,要求那些傻瓜们花大价钱支付“我的”土地的高价,这是我在月球上享受时他们为我创造的价值。这样的一个体制对我们来说,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在承认土地私有的社会中,地主会是而且通常是,与我所谈论的混日子的人处于相同的阶层:寄生阶层。

我们决不允许寄生虫在我们坦噶尼喀滋生。在土地拥有方面,坦盟必须回归到非洲传统惯例上。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社会成员使用土地,就要给他一块土地。无条件的或“终身拥有”的土地所有制(导致投机和寄生病)必须废止。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必须恢复我们之前的思想认识——传统的非洲社会主义——并把它应用到我们正在建设的新社会中去。坦盟已保证,让社会主义成为各方面政策的基础。通过选出坦盟政府来领导他们,坦噶尼喀人民已经授予我们实行那项政策的权力。因此,人民可以信赖政府,相信政府只会引入与社会主义原则相和谐的立法。

但是,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所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态度。因此,是由坦噶尼喀的人民——农民、工人、学生、领导,我们所有的人——来确保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态度在面对个人利益或滥用职权的诱惑时不会迷失,确保这种个人利益不会使我们形成个人主义,也不会诱惑我们,使我们以自己特定群体的利益为先,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次。

正如长者在我们以前的社会中,因其年龄和对社会的服务受到尊重一样,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仍将保留对年龄和服务的尊重。而跟“富有长者”表面的超额财富的确只是替人民代管的财富一样,在今天,一定的领导地位带来的表面的超额财富,只是在目前属于他们,用来帮助他们完成职责。这些财富是委托给他们,让他们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不属于“他们”个人:他们既不能为了积累自己的财富而使用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也不能把它当作他们离职后的“保险”,否则那将背叛把财富委托给他们的人民。如果他们能尽其所能地服务社会,在他们没有能力做下去时,社会必定会照顾他们。

在部落社会,部落里的个人或家庭是富裕还是贫穷,要看整个部落是富裕还是贫穷。如果部落很繁荣,部落里的所有成员会享受其繁荣。今天,坦噶尼喀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低得令我们感到羞耻。但是只要我们国家里的男男女女都能迎接挑战,尽其所能为整个社会谋利益,坦噶尼喀也

会繁荣起来，它的子民们也将共享这份繁荣。

但是，必须要分享这份繁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会剥削他的同胞。因此，如果我们社会中有任何群体中的成员们对此提出异议，因为他们比其他群体对国民收入作出了更多的贡献，认为他们必须分配到超过其实际需要的更大的利益，如果他们坚持这么做，而不顾及那将会减少群体对综合收入的贡献，因此会减慢整个社会的受益速度，那么，那个群体就是正在剥削（或试图剥削）他的同胞们。这呈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态度。

必定有一定的群体，凭借其工厂产品的“市场价值”，比其他群体对国民收入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其他的群体，实际上也正在生产具有相同或更大隐含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尽管他们恰好不能把控如此高的人为价值。例如，农民生产的粮食比姆瓦杜伊矿开采的钻石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但是，姆瓦杜伊的矿工完全可以宣称，他们的劳动力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要比农民们的大。然而，如果他们继续要求自己该因此获得大量的额外报酬，而不分配一部分来帮助农民，他们将是潜在的资本家。

这正是思想态度的来源。因此，确保劳动者们享有其劳力收益的公平分配是工会的目的之一。但是“公平”的分配必须跟整个社会的公平有关。如果这项分配超出了国家的可承受力，从而使国家不得不降低社会其他部门的待遇，那么这就不是公平的分配。工会领导和他们的拥护者只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不会受政府的强制，而是会主动将其需要限制在整个社会给予的需要之中。只有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潜在的资本家时，社会主义政府才必须介入，并且阻止他们将资本主义思想付诸实践！

与群体一样，个体也是如此。有着特定的技能、特定的资格的人有充足的理由来要求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工资。但是，这儿，我再说一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依据他所属社会的贫穷或富有的程度，按一个公正的比例来要求自己的劳动报酬。除非他是一个潜在的资本家，他不会要求自己的工资跟一些遥远而比较富裕的社会中地位相当者的工资一样，以此来勒索社会。

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农业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时期。前者创造了社会中的“拥有土地”阶级和“无土地”阶级；后者产生了现代资本家和工业无产阶级。

这两次革命在社会中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产生于

那种矛盾，而且它的倡导者将这种矛盾神圣化为一种哲学。内战看上去不再是邪恶、不幸的事物，而被看作是好的、必要的事物。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离不开内战（它们成为阶级战争），犹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离不开祷告——这是一种从一开始就不可分离的方式，每次内战都变成整个生活方式的基础。没有社会主义之“父”——资本主义，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就不会想到社会主义！

我本人就在部落社会主义中长大，所以我必须说，发现这个矛盾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它给予了资本主义一个既没有提出也非应得的哲学上的地位，实质上是说：“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在社会中创造的矛盾，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我再重复一遍，教条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赞颂，我是无法容忍的！

另一方面，非洲社会主义没有从农业革命或工业革命中受益，它不是从社会中不同阶层的矛盾开始的。实际上，我怀疑在任何本土的非洲语言中是否存在与“阶级”这个词相等的事物，因为语言描述的是操这种语言的人的思想，而“阶层”或“等级制度”这种思想在非洲社会不存在。

大家庭是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目标。真正的非洲社会主义者不会把某一阶层的人看作是兄弟，而把另一些看作是天生的敌人。他不会跟“兄弟们”结盟来消灭“非兄弟”。他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他的兄弟——一直在扩大的家庭的成员。这就是坦盟第一个条款的信条“Binadamu wote ni ndugu zangu, na Afrika ni moja”的原因。翻译过来就是“我相信人类皆兄弟和非洲的统一”。

那么，“乌贾马”或“家庭关系”，描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它反对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寻求建立美好社会的资本主义，也反对以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的哲学观为基础建立美好社会的教条社会主义。

在非洲，我们已被“教”过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也不需要再作转变。两者都植根于我们的过去——产生于我们的传统社会中。现代非洲社会主义能从其传统遗产中得到“社会”是基本家庭单位的扩展的认识，但它不能再将社会家庭的思想限定在部落或者国家。因为没有真正的非洲社会主义者能看着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说：“线这边的人是我的兄弟，而线那边的人没有向我提出要求的权力。”这块大陆上的每个人都是他的兄弟。

正是在为打破殖民主义束缚的战斗中，我们认识到了统一的必要性。我们意识到，在部落时期，同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态度给每个人带来了来自一个大家

庭的安全感。现在,在我们国家这个更大的社会中,我们必须保留同样的思想态度。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停止。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对我们共属家庭的认识——超越部落、社会、国家,甚至大陆——来拥抱整个人类社会。这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合乎逻辑的总结。

38 非洲统一和英联邦

在议会6月会议上,政府有关坦噶尼喀应该成立共和国的动议引发讨论,尼雷尔先生从后排座位上发表了讲话。

1962年6月15日 议会议事录,第一次会议 政府动议——坦噶尼喀将成为一个共和国

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我是英联邦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也是非洲统一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要向尊敬的穆瓦康格尔先生(Mr. Mwakangale)保证,若某天,哪怕现在,英联邦的成员对我们倡导统一,为我们非洲大陆谋福利不甚感兴趣的话,我们将离开英联邦……

〔然后,尼雷尔先生继续回答其他成员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谈到有关刚果的问题时,他继续说:〕

我们相信这块大陆的统一,我们相信此刻非洲大陆正在摸索如何实现统一。我们加纳、几内亚和马里的朋友,正根据独立的形势,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探索如何实现统一;我们法属领地上的朋友也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况,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探索如何实现统一;非洲大陆上几个地区的人民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探索如何实现统一。每个地区都在根据自身的情形,进行着对统一的探索。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为独立而斗争。每个国家都在用适合自身情况进行斗争,但我们的一致目标是整个非洲大陆必须获得自由。先生,这次我们在这里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每个地区都在用最适合本地区的方式探索统一,因为他们的历史不同,但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整个非洲大陆的统一……

39 国家伦理的重要性

尼雷尔先生谈到成立共和国的建议时指出,要起草一部完善的宪法是不可能的,对抗专制的唯一现实的保护是国家伦理。

1962年6月28日 议会议事录,第一次会议 政府动议——成立共和国

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我们必须指出一点:最终维护人民权利、自由及他们所珍惜的事物的,一定是国家伦理。

当国家没有一种伦理,政府便可以说:“我们不能做这个,这个是非坦噶尼喀的。”而民众也可以说:“我们不能容忍那个,那是非坦噶尼喀的。”如果人民没有一种伦理,那么,什么样的宪法都不重要了,因为它们将一直是专制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建立这个国家的伦理,让这个国家的无论哪个元首都能说,“依照宪法,我有权去做某件事,但我不能做,因为这件事是非坦噶尼喀的。”或是对坦噶尼喀的人民来说,如果他们出于失误选择了一个糊涂的人担任国家元首,一个能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下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人,坦噶尼喀的人民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接受的,不管是总统还是谁,我们都不会接受。”

先生,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看待宪法的正确方式。尽管我知道有些议员一直质疑“信仰”的提法,我们必须得有点信仰。但是,先生,民主是人类信心的宣言,是我们在此努力维护的东西。民主是对人类信任的宣言,而民主的敌人是那些在某些方面对人类没有信任的人。他怀疑一切,只认为自己全都是正确的,而其他人却全是错误的。

40 总统就职演说

1962年11月举行了总统选举,实行一人一票制。代表坦盟的尼雷尔先生获得97%的选票,完全击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候选人。

1962年12月9日共和国成立,在国家体育馆举行了开国大典。在12月10日举行的宣誓仪式上,新就职的总统向议会做了就职演说。(根据《坦噶尼喀共和国宪法》,总统不是议会成员,但可在适当的情况下向议会发表讲话。)

1962年12月10日

议会议事录 总统就职演说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说声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坦噶尼喀的人民,让我挑起责任的重担。怀着谦恭与感激,我接受了这份重担,在万能的上帝与你们的帮助下,我将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履行我们的职责……在过去的十个月里,我们的政府在尊敬的拉希迪·卡瓦瓦先生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毫不犹豫地承担重任,恪尽职守,为国家提供了不为妒忌、争吵和谋职者的口角所玷污的服务,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相信,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希望我为卡瓦瓦先生及其同事们在过去几个月中提供的服务,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而且我知道,在此次集会上你们所有的人,以及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希望他们安好,并且你们依然会像过去帮助他们那样,继续帮助他们履行新的职责。

距离我们获得独立已一整年了……上次开会时,总理向你们说了人们自己通过“自助计划”正在做的事。我知道这项工作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继续进行,而最终他们将受到他们子孙的感谢。这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参与

这场为建立一个更好的坦噶尼喀而进行的战争。

我知道仍然还有一些人在听到我们用“战争”这个词时会认为我们是在开玩笑。我向他们保证,我们没有开玩笑。任何有点智慧的人都会知道,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即便有人把马及马及起义和奴隶战争作为例证,他们会发现,贫穷、无知和疾病对人民造成的屠杀比战争还要多。我们都会憎恶杀死人类同伴的罪犯,我们想让警察抓住这个凶手并惩罚他。然而在现实中,那些人类杀手对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致命的威胁还不及疟疾蚊子给我们的威胁大。这些细小的害虫在一年内杀死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能比人类杀手在100年里杀死的人都多。去年的饥荒也一样,如果它在我们毫无准备时降临,会杀死比死于马及马及起义更多的人。每年我们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死去,只是因为无知——他们在出生时没有得到适当的护理。

因此,贫穷、无知和疾病不是假想敌,而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任何拒绝加入这场战争或阻止其邻居奋力抗争的人,比那些帮助武装侵略者的人更罪加一等,因为他们是在帮助更为致命的敌人。因此,我再重复一遍,这场战争是一场非常真实的战争,是一场我们已加入且非虚假的战争。我希望每一位国民都加入这场战斗,任何妨碍我们对战争做出努力的人,对我来说,都将被视为我们国家的叛徒和敌人。

但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谈论建立国家任务的物质方面的问题。我想谈论的是我们自己——坦噶尼喀的公民。我们已经决定把我们的自由当成着手建立我们国家的一种工具。建设一个国家不仅仅是建设柏油路、高楼大厦、奢侈宾馆等那么简单,一个国家可能拥有了所有的那些东西,却仍不值得赞美或尊重。为了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我们必须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一项任务,那就是建立人民的品格——我们自身的品格;建立一种思想态度,让我们能跟坦噶尼喀的同胞们,以及与全世界的人民一起生活,互为朋友,互相合作。

关于团结,我们享有很高的盛誉。我们有责任向万能的上帝表示感谢,感谢他赐予我们团结这一礼物。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为不同于我们邻居们,或是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人民,那我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与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我们这里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同样的诱惑,这些困难和诱惑能让任何国家的人民互相争吵而非共同工作,互相憎恶而非成为朋友。

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提醒自己要建立什么样的坦噶尼喀。建立我们年轻国

家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在我们仍然要求得到自由权的同时，就会把这个问题搞得无比清晰了。我们过去和现在坚持的原则，都是人权的原则。尊严和幸福贯穿我们所有努力的始终。我们所要求的自由不仅仅是从殖民主义那里获得独立，我们寻求的是坦噶尼喀所有人民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并利用这种自由与他的同伴们合作——来满足他自身及同伴们的需要，并因此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决心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在那里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和文盲之分，没有痛苦者和闲散者之分。我们决心在这个国家里使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尊严；所有人都平等享有尊重别人的权利，平等享有获得良好教育和生活必需品的权力；所有的国民都平等享有尽其所能服务国家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打算建立的坦噶尼喀，但我们从历史上继承来的国家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从殖民主义继承的坦噶尼喀，仍然存留着殖民时期的不公，仍然有种族歧视，殖民主义产生的耻辱和邪恶还有待消除。在我们继承的坦噶尼喀中，目前只有少数国民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足够的财富，拥有适当的尊严与舒适的生活。我们的大多数人都很贫穷，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幸的是，由于近期的历史，这条“有”与“没有”之间的分割线与另一条分割线一致。一些人可能会耻于提及这种一致，但我不认为人们不应当为此感到羞耻。我们不能期望通过假装问题不存在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受过教育和富有的小群体中，有很多人是印度人和欧洲人。基于这个原因，就很可能因为经济分歧导致我们非洲人与非非洲人之间的种族仇恨。这种仇恨跟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因为思想分歧而引发仇恨一样不合理。因为我们都知道，殖民政府没有太多地关注非洲教育，大多数想接受教育的人都去了教会学校，因此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那么这儿就有了又一个分界，它的存在对团结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你追究这个“分界”，你会发现这个分界远远不止如此。你会发现，传教士们并没有在整个坦噶尼喀建立学校，而只在特定的区域建立了学校。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很可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中很大比例的人来自瓦哈亚（Wahaya）、万亚克于撒（Wanyakyusa）和瓦查噶（Wachagga）地区。因此，那些抨击我们团结的人会充分利用这种局面，挑起部落之间的仇恨。

还有另一个源于过去情形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无需羞愧来面对的问题。正如我前面所说，在我们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洲人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事实上,就连这些受过教育的少数人都无法获得政府的高级职位。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人数少的事实就赋予他们更加难得的价值。他们能在行政部门或商业公司找到好工作,也可以在教会学校做教师。在我们开始组织坦盟时,那些行政部门的人员被禁止做任何与政治活动有关的事情。那些为商业公司工作或为教会工作的人要么被禁止加入我们,要么就是勉强被许可加入我们。因此,对所有这些人来说,扔掉工作加入坦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更进一步说,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要求他们的妻子加入坦盟,自己则继续工作。在此期间,坦盟是由那些多数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因此能自由加入政党而不必被迫牺牲自己的事业的人建立起来的。

但很快——早在独立以前——就开始出现了麻烦的迹象。首先,一些人开始小声抱怨坦盟是个文盲的政党:在它的执行委员会中没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政党很多高级职位上的人几乎都没受过任何教育。事实上,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这绝不是件坏事。宣称坦盟是一场代表坦噶尼喀所有人民团结的全国性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由少数受过教育的人领导的联合运动,目的是利用这种团结来统治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多数人,这是荒谬的。不,应当说坦盟自身应该像坦噶尼喀一样,它的领导权应该代表整个国家。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在坦噶尼喀建立真正的自治政府,而不是建立一个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人领导的政府。

然而,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给未来的争论埋下了种子。今天它可以导致政客间的摩擦和相互不满,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可是我们行政部门的成员,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我们从英国继承的规则的存在,加剧了这种危险。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些规则与我们的政治形势有关。也就是说,这种规则在政客和行政部门人员之间树起了一堵分隔的墙,而且,它迫使人在进入政治或进入行政部门之间做出选择。这太荒谬了,因为这会使我们认为文职人员不能成为好的政客,甚至不能成为好的爱国者。更糟糕的是,它会让我们忘记,所有人都是这个国家人民的仆人。

我提到这些问题,是至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继承的这个坦噶尼喀与我们打算建立的坦噶尼喀有多大的区别。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第一要务是要认清我刚才已经声明过的事实:我们继承的坦噶尼喀跟我们着手建立并将遗赠给后代的坦噶尼喀有巨大的区别。我们的第二要务是要弄清我们面临的

问题,并知晓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捷径。要消除非洲国民与非非洲国民之间现存的差异没有捷径;要消除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或是少数受教育者与多数未受教育者之间现存的差异也没有捷径;把马萨伊人和瓦戈戈人变成和瓦哈亚、瓦查噶和万亚克于撒一样,同样也没有捷径可走。总之,没有魔法能让这个坦噶尼喀一夜之间就变成我们要建的坦噶尼喀。我们的第三要务是避免因为我们的困难而责备他人。我们不能抓住亲爱的坦噶尼喀同胞中的任何一个人,说是他给我们弄来了这些问题。因此,我们最后的任务是,所有人都要集中资源,互相信任,友好地共同工作,来建立一个不再有我谈论的那些问题的坦噶尼喀。

这就是我对坦噶尼喀所有国民最真诚的呼吁。对我们的欧洲和亚洲国民,我想说:“我知道非洲人民已经占据了坦噶尼喀政坛最重要的位置。但你们不必因此感觉受到拒绝或藐视;因为在另一方面,就教育和财富而言,欧洲人和亚洲人仍然位居最前列。”对我们的非洲国民,我想说:“忘记过去。的确,我们国家的欧洲人和亚洲人的教育与财富仍比你们的好些——但政治掌握在你们手中。即便这些欧洲人和亚洲人想控制政治,也无法用他们手中的财富和教育来伤害你们了。”对我们所有的国民,我想说:“我的朋友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倾尽所有,投入到坦噶尼喀的建设中来吧,那里将没有差别与分歧。你们中受过教育的人,请利用你的教育知识来帮助建设坦噶尼喀,让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你们中拥有资本或财产的人,不要把你们的财富当作武器用来压迫你们的兄弟姐妹,而把财富用作一种信托基金来帮助建设一个繁荣的坦噶尼喀,一个不再有贫富鸿沟的坦噶尼喀,国家的财富将是‘家庭财产’——我们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财产。而你们,我的拥有政治权力的朋友们,请不要利用权力来压迫任何一个同胞,或去复仇,而是用它来建设坦噶尼喀,一个不会有如此多的人感觉自己二等国民的坦噶尼喀。”

坦盟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已经向我们示范了如何在新的坦噶尼喀生活。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年度代表会议”批准了两项非常重要的举措。我们都已经听说这两项举措是什么了。因为目前非非洲人没有加入坦盟的资格,所以我们冒着遭受种族歧视谴责的风险。在依然过于依赖殖民主义习惯的坦噶尼喀,种族歧视可能仍然存在。但对我们来说,因为国民的肤色而剥夺他们加入坦盟的权利,将是坦噶尼喀共和国和乌贾马坦噶尼喀的耻辱。年度代表会议批准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每位支持坦盟政策,同意接

受这个组织的规则和责任坦噶尼喀公民，都能成为坦盟的一员。

那次会议做的第二个决定是向先前那些由于自身错误而被驱逐或已经离开这个组织的成员重新敞开大门。如果我们继续向任何一位想重回坦盟的朋友关上我们的大门，就不能继续谈论我们对团结的热爱。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重新加入，但我们会做好准备欢迎那些想这么做的人。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放弃无用的争吵，但就我们自身来说，不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建国伊始还背负着昨日的争吵。我们想忘记过去的错误，重新开始坦噶尼喀建设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在我们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我曾经承诺，在我们获得自由之后，将努力在十年之内获得殖民统治者在统治我们国家的整个时期内都没能得到的大部分东西。今天我想重申那个承诺。但这次我代表坦噶尼喀的人民做出那个承诺，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人民都决意帮助我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变我们的国家。

我说“改变”，是因为建设这个国家需要做出很多改变。而为了改变它，我们必须愿意尝试新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去改变那些阻止我们获得好东西的旧习惯，却渴求得到那些好东西，那是毫无用处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该抓住这次机会，迅速改变我们传统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这个国家约有1千万人口，其中城镇人口只有25万到30万，其他的人口都以土地谋生。这就是说，坦噶尼喀实际上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只有数量相对少的工人。出于这个原因，在制订我们的三年发展规划时，政府决定着着重强调农业。

但是如果不改变陈旧的耕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只强调农业是荒谬的。如果想发展，除了将生活方式和耕作方式提到现代化方式上来，我们别无选择。锄头不能带给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东西，它甚至经常无法使我们获得足够的粮食。我们必须开始使用犁和拖拉机来代替锄头，但我们的人民没有足够的钱，政府也没有足够的钱，来给每个家庭提供一辆拖拉机。所以，我们必须做的是努力把农民群体集合起来，让其分担拖拉机费用并共同使用一辆拖拉机。但是，如果我们的人民准备继续分散地居住在一片宽阔的土地上，彼此相距很远，依然像我们祖父的时代一样，会对巫术感到恐惧和不安，我们就不会做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想开始用拖拉机来耕作，要做的第一件也是最必要的事情，就是让人们开始住在固定的村庄里。因此，如果你们问我，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打算干什么，答案很简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的政府将尽其所能，使

坦噶尼喀的农民能集中住在固定的村庄里。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政府想让我们住在固定村庄里,答案同样简单: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给人们提供他们所需,就不能开发土地和提高生活标准;我们就不能用拖拉机;我们就不能给孩子们提供学校;我们就不能建医院或有干净的饮用水;我们就几乎不可能创造小乡村工业。相反,我们将不得不继续依赖城镇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即便我们拥有大量的电力供应,我们也永远无法将它与每个孤立的民宅连接起来。

然而,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为,只要住在固定的村子里,就会神奇地发现自己能得到我提到过的所有这些东西。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即便我们真的做到让每个坦噶尼喀的农民家庭都住在村庄里,要战胜所有的困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总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开始住在固定的村庄社区里,那么为发展国家所做的所有努力都将只是浪费精力……

进一步说,村庄生活的发展将会帮助我们改善民主政府的机制。的确,目前中央政府和我们的当地政府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选举方法可能是民主的,但我们对民主的实施却还没有达到民主应有的操控方式,如果我们大多数农村人口依旧分散而居,就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

我打算首先建立一个新的部门:发展规划部。这个部门将直接由我掌控,而且它会不遗余力地、尽可能快地为我们整个国家村庄的发展制定计划。但是,我们不该等到整个坦噶尼喀的规划完成后才开始我们的工作。正如我前面所说,这项工作本身就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我们能做的就是,首先选出一片或两片合适的区域,在制定好计划后立即开始工作。

如我前面所说,如果你们问我,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打算做什么,我会告诉你们,政府打算让我们的国民重新定居在固定的村庄社区,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我不想让任何人认为我们只打算做这一件事。我们先前的三年发展规划当然也会继续进行。而且规划部将开始制定的新规划中,不仅包括建立实实在在的新村庄,而且包括大量能帮助村庄发展的项目,还要包括其他一些与村庄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项目。

在一开始时我告诉过你们,我不打算对政府在最近 12 个月里所做的事情进行详细的描述。但是有一件事我要简单提一下。我们已经做了若干与合作运动有关的事。第一,所有的合作团体都共同加入了一个全国性的联盟。第二,合作银行已经开门营业,而且这是由这个国家人民创立的第一家银行。第

三,合作社联盟已经开始在城镇开设零售商店,而且政府提供了很大一笔资金来帮助启动这些商店。

我想在这重复一下我在为坦噶尼喀农业合作社揭牌时说过的话。坦噶尼喀有很好的理由因其合作运动而感到自豪,但目前我们的成功只限于农业生产者的合作领域。还有很多其他对合作社开放的领域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而其中的一些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涉入了。政府的目标是将合作社运动扩展到坦噶尼喀的每个城镇、每个村庄、每个小村落,并且让这些群体能从事靠合作力量运营的每一类企业。

我们所有人都一致赞同,必须在坦噶尼喀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用到两种非常重要的工具:政府自身和合作社运动。但我希望看到,我们中的每一位都是能够传播乌贾马精神的老师,都是能利用乌贾马精神的人。我想看到我们中的三两个人无论在哪里遇到,不管是在酒吧、在公共汽车上、在学校、在商场、在耕地上、在办公室,还是在商店或在户外,那些地方都能变成教室,来讨论学习乌贾马及乌贾马的两种主要工具——政府和合作社运动。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国家建立乌贾马,就要让我们所有人都加入这场建设,我们不要闲在一旁把建设的任务留给“专家”。乌贾马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比你们更合格的专家能阐释乌贾马的生活方式。我们都是乌贾马方面的专家。

最后,我想告诉你们我对各部做出的两个改变:一个是大的改变,另一个是小的改变。我已经把卫生与劳工部拆成两个部……

我做出的大改变是成立一个全新的部:国家文化与青年部。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文化是每个国家的本质和精神。一个缺乏本国文化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国家精神的人的集合。在殖民主义所有的罪恶中,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没有自己的本土文化或我们拥有的文化是无用的——说我们应为我们的文化感到羞耻,而不应感到骄傲——这是最大的罪恶。我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接受过欧式教育的人,向殖民统治者阐明我们已经变得“开化”了,那样做意味着,我们已经遗弃了所有与过去有关的东西,只去模仿欧洲的方式。我们青年人的目标不是要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而是要成为欧洲黑人!确实,曾有一段时间里,把模仿欧洲人的黑人称为“欧洲黑人”,是对他的一种赞美而不是一种侮辱。

在学校时，老师们教我们唱欧洲人的歌曲。有多少人曾被教授过瓦尼亚维齐(Wanyamwezi)^①或瓦赫赫人(Wahehe)歌曲呢？我们中很多人都学过跳伦巴舞、恰恰舞和摇滚，学过跳街舞甚至华尔兹和狐步舞，但我们中有多少人会跳，哪怕是听说过贡倍素固舞(Gombe Sugu)、曼加拉舞(Mangala)、康格舞(Konge)、纳扬午姆米舞(Nyang' umumi)、基多舞(Kiduo)，或是乐乐玛玛舞(Lele Mama)呢？我们中很多人会弹吉他、钢琴或别的欧洲的乐器，但有多少坦噶尼喀非洲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会打非洲鼓呢？有多少人会弹奏竖琴(nanga)、泽泽琴(zeze)或马林巴琴(marimba)呢？虽然我们跳舞弹钢琴，那舞蹈——即便是摇滚或街舞——有多少时候能真正带给我们像跳姆甘达舞(mganda)或贡倍素固舞时的那种快乐呢？——尽管我们的音乐或许只是来自摇晃罐子里的卵石。对任何人来说，要从不属于自己血统的舞蹈和音乐中得到真正的快乐是很难的。

因此我成立了这个部，来帮助我们重获对我们本土文化的自豪感。我想让这个部找出我们所有部落中最好的传统习俗，并让它们成为我们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尽他所能来帮助这个新部的工作，但我不希望有人认为复兴我们自己的文化同时就意味着抵制其他国家的文化，因为一个拒绝学习外国文化的民族不过是一个白痴和疯子的民族。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拒绝互相学习，人类就无法进步。但是学习其他的文化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文化，那些能帮助我们完善和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能使我们从中受益。

昨天，我进行了宣誓。我发誓，作为坦噶尼喀共和国的总统，我将恪尽职守。工作中绝不害怕或偏袒、钟爱或憎恶任何人。这不是说过就忘了的空话，这是我在万能的上帝面前最庄重的承诺。在他的帮助下，我会证明自己值得承担坦噶尼喀人民托付给我的责任。我会努力履行赋予我的职责，不让自己受到任何个人好恶的影响，不会只考虑自己的舒适与方便。我说“我”发誓，但实际上，说“我们”发誓是对的，因为我代表你们发誓。坦噶尼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国民，无论他是总统、政客、公务员、农民、教师，还是报酬最低的工作者，我们

^① 坦桑尼亚西部操班图语的原住民。该族按母系血统传代，以祀奉祖先为主要宗教活动。——译者注

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责任来尽其所能。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责任，来做好上帝赋予他的工作——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就像他也宣誓过的一样，要不谋私利，投身于建设我们新的坦噶尼喀共和国的工作中。

41 非洲合众国

这篇文章发表在1963年1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非洲研究杂志》第一期上。

有一种感觉非洲的统一已经存在。现存的“非洲主义”情结，这种相互牵连的感觉，在这片大陆上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蔓延。非洲所有的民族主义领导者都觉得他们将成为这项较大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对于他们所在的政治单位负有特殊的责任，但也觉得个人与其他所有国家的胜利或倒退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存在一种感情上的统一，这种感情可以用“非洲个性”这一概念来表达，可以通过在国际会议上共同交流来表达这种感情。

但是，这种非洲统一目前只是产生于殖民主义历史和压迫的一种情绪。在能够真正对我们的未来产生积极影响之前，仍需用经济和政治方式对它进行强化和传播。这一点可以比作一群兄弟同时经历了一场大动乱，登上了绳索桥，每个人都背负着平衡杆、自己的体重以及他自己的装备。所有人都很容易通过有着坚实基础的宽阔的桥，能在适当的时机共同背负货物，避免一个人不小心摇晃绳索使别人失去平衡而摔倒的危险。非洲统一就是一座坚实的桥，让我们能够安全地通过政治力量的旋涡，并且能让我们更轻松地担负我们面前的经济和社会重任。

为了所有非洲国家——不管国家的大小——的利益，必须实现非洲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必须是真正的统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非洲合众国。只有这样，非洲人民在经历过几个世纪的经济不确定和社会压迫后，才能真正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美好未来。我们必须要实现这个目标，至于是立即实现这个目标，还是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循序渐进来实现并不重要。

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尽快实现非洲统一。从历史上来看，世界

各地的统一是通过两个途径完成的：要么通过征服，要么通过协商。认为通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控制实现非洲统一是荒谬的，我们的统一只能是经过协商后取得的统一，因为非洲的统一是平等国家之间形成的一种统一。

把非洲各国分割开的国界是荒唐的，如果我们没有统一，这些国界就会成为冲突的根源。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从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分割状态开始努力。如果根据政治地理学的划界原则，没有一个非洲国家不把属于另外一个政治单位的领土包括在内，无数部落至少生活在两个国家内，或者他们的起源就在非洲的某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开始“声称”别国的土地是我们的，那我们就会落入一些人的陷阱，因为他们希望保持非洲的弱小地位，以便他们能从中获利。这将把我们引入一个悲剧的、荒唐的境况：我们的人民因为缺医少药、缺少知识而面临死亡，但我们却把有限的资金用到购买武器装备。

从边界的范围以及其他方面来看，我们开始要求非洲统一必须考虑到我们历史传承的事实。从历史上看，从有历史记载开始我们非洲就是分裂的，所以各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甚至有不同“国际性”语言。尽管如此，非洲的统一仍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非洲统一必须建立在各国人民自愿的基础上。外国势力对我们的控制引起的分裂以及我们的共同经历，使我们感觉到统一的需要，并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与我们自己的村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非洲人情感。因此，我们想要的是行动上的统一，在仅仅影响某一地区的事务上，要最大限度地表达当地人民的心声。这样做与非洲古老的传统一致，将是扎根于我们生活之上的新的发展。

然而，有人说，因为非洲统一必须是非洲人民的自由选择，那么非洲统一肯定是一种不完全的统一。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对国家独立产生的新自豪感，对国家主权的新的意识，当然都会影响我们完成目标的方式，但不能允许这些因素使我们偏离我们的目标。非洲国家之间在某些经济领域和教育领域的一些合作将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合作本身还不足以给我们带来统一，或使我们免于遭受分裂的危险。只要存在单独的非洲国家，就会存在这么一种危险：其他国家可能会利用我们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歧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只有实现非洲统一，才能保证非洲人自己管理非洲；只有实现非洲统一，才能保证非洲的资源用于非洲人的利益。

我们的目标是坚定的，可以说建立一个非洲合众国应当成为我们的最终目

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或我们能够——在明天一下子就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循序渐进地实现这个目标,可以通过所有非洲人一起决定,或不同地区的人民采取不同的步骤一步步实现。尽管我们的目标清晰,但那种认为一个非洲合众国是一个政府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会受到我们为实现目标所走的路径的影响,也会受到某个时间世界局势对某个国家要求的影响,但这不应当影响我们现在的事业。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要求独立时,并不会停下脚步来讨论适合本国的理想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会讨论如何从外国势力手中夺回国家的主权,至于国家政权的使用和形式会根据独立时的形势再来确定,我们争取非洲统一的斗争也是如此。

从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我们还可以吸取一下其他的教训。这些争取独立的斗争都被当作是全非洲的事务,但是每个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的进步。加纳利用了它原先的发展优势,但是其他非洲国家没有发展到同样的水平;坦噶尼喀也没有因为肯尼亚和乌干达面临的困难而推迟独立,尽管三国都参与了同一共同市场。实际上,坦噶尼喀独立前,曾有人建议坦噶尼喀把独立日期向后推迟几个月,以便能够把三国的独立斗争联合起来,但更多人持有的观点是,如果坦噶尼喀能够首先独立,可能会更好促进三个国家的联盟。换句话说,人们认为零星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确的。当然时间已经证明,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独立,在其他地区反对殖民主义的压力也随之增加。

其次,每个民族主义运动都根据各国的不同形势,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各国的不同形势不是因为殖民宗主国在各国采取的不同政策,而是因为不同国家人民因历史原因形成的不同态度。例如,在坦噶尼喀民族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是重建人民的自信,因为人民对历史上起义遭受的无情镇压仍然心有余悸。在其他国家,首要的工作是控制运动,使之免于陷入灾难的危险。

这些策略都与我们争取非洲统一的新的斗争相关。在新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向前发展,前进的方式也因各国的形式不同而不同,这是由于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所使用的策略的结果。因此,在实现非洲统一的道路的第一阶段,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国家松散的联盟,就有关相互利益的问题和不断互访的问题进行磋商。而在别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共同市场,并就有关经济问题采取联合行动,但人民可能不会同意任何形式的政治联

盟。也可能出现一些国家会形成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政治联盟,也可能形成某种形式的联邦。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某些事务,即便没有对决定的承诺,进行全非洲大陆范围内的讨论也会是富有成效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是它们都向我们的目标迈进了一步,因为它们都提高了我们相互依赖的意识,增进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都包括了一些非洲思路的成分。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本地区的联合形式不一定适合别的地区,只要我们牢记我们的真正目标,所有这些发展都会受到欢迎和支持。

非洲已经开始了通往统一的攀登之路,而且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取得了进步。但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我们的攀登者中极少有人能够看得到我们目标的全景,他们依靠的是那些对我们攀登持怀疑态度的人所提的建议,但这些人很可能对我们攀登之路心怀敌意。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产生怀疑,甚至在非洲人之间产生敌对情绪。我们已经见证过了类似的例子。人们不断讨论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现在是不是也有人谈论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组织集团),但事实是,这些集团召开的会议没有一个放弃了最终目标,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表达目标的方式及实现目标的路径不同。如果能够仔细看一下各集团的公报,就能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很明显,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把两个泛非大会结合起来(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组织是一个地区性组织,把自己看作是全非人民大会的一部分,有着完全不同的基础),这会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怀疑。

但要真正解决这个过渡期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我们像已经取得统一一样行动起来。在一个国家,政府的成员并不总会彼此喜欢或同意对方在公共场合的演讲,但这一点却并不能被公众所知。他们之间的辩论要限制在议会或办公室,不能广而告之,非洲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同样,正如总理不能干涉他同事的政治主张一样,非洲各国也必须接受其他国家人民的决定,就像尊重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一样。

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意味着我们必须私下地梳理好我们之间的差异,必须停止对他国内政评头论足,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关注的特别事务,每个国家都有在非洲各国间引起反响的问题。同时它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抓住任何增

进互相理解的机会。对于其他国家领导人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情，我们不必总是赞同，必须要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学习他们的经验。当我们真正关心其他非洲国家的政策时，我们当然不能向整个世界宣扬，而需要向那个国家的领导人说话，而且需要用一种兄弟精神来说话。此外，我们必须谦逊地做任何私下的评判。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要比深度介入一件事情更容易，因为当年让各国领导人介入政治的那些信念通常有一些局限性，而容忍这种美德不太容易和狂热的感情相容。因此，我们有时很难认识到我们自己处境的局限性，其他国家也有我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的不能置之不理的困难。

我们东非的很多人认为，我们通往统一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地区联合，这会迅速加快我们的经济实力，同时也会告诉人民统一带来的好处。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三国的联邦相对来说容易实现，因为，我们三国已经有了共同市场，通过公共服务组织提供多种服务，而且这个共同服务机构有自己的中央立法大会和由三国总理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这是联邦自然成长的核心。我们各国之间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分离状态，使得我们三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宪法》传承，所以要制定联邦的一些细则也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联邦的机构不能打破各国利益的微妙平衡，而各国的宪法都体现出了各自的利益。但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发展本身是很重要的，因此所涉及的人民必须明确发展的目的、好处以及联邦带来的对国家主权的放弃。有一点必须清楚，那就是：一旦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一个联邦，就不允许再打破这个联邦。这个联邦可以扩大，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但它的组成部分形成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不能分裂。东非联邦这一概念必须要仔细考虑，这不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因为东非联邦是非洲统一路上的一步。一旦建立东非联邦，就不允许发生任何分裂它的行为。

当然，实现非洲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如果非洲人民决心实现统一，那么非洲统一也一定会实现。正如我在前面所说，非洲民族主义的角色已经不同于，也应当不同于过去的民族主义了。我们必须把非洲各个国家当作非洲团结的一种手段，不允许我们的敌人把我们用作分裂非洲的工具。非洲民族主义是毫无价值的，是逆时代而行的，也是危险的，除非它同时也是泛非主义。

42 民主与政党制度

1963年1月,坦盟年会再次号召团结,欢迎坦噶尼喀所有人民加入联盟,同样欢迎那些曾经在选举中组织反对联盟的人重新加入该党。在这些重新加入该联盟的人中有非洲国家议会党的前领导人,他在大约三个月前在总统选举中是候选人(现在他是公务员)。

在该次大会上,原则上规定了坦噶尼喀是一党制的国家,总统有权任命委员会去调查那些需要调查的变革。大会本是保密的,但是下面摘录的内容都来源于尼尔雷总统为会议发言准备的小册子。

……不管在非洲还是在其他地方,民主就是民治。从理想层面上说,它是政府通过全体人民自由讨论的方式去解决自身事务,这样基本的、纯洁的民主方式的实施条件是在小范围内实现的。例如,古希腊城邦实践了这样的民主方式。在非洲社会,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就是自由讨论。盖·克拉顿·布洛克先生曾描写了一个典型的非洲村社,我在一开始就引用了:“长老们坐在一棵大树下,一直商讨到达成一致……”但是,在一些大的社区内,民治可能就只是一种改良了方式的自由讨论。

纯粹的民治之后最好的民主就是人民代表政府。当几百万人的事情需要通过讨论来解决时,很明显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叫来直接参与讨论,所以我们有一个议会来代表他们进行讨论。如果议员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就必须是由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因此,自由选举是代议制民主不可或缺的条件。

那么,公选的目的是选举人民的代表。但是在代议制民主发展十分完善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这种选举通常是基于政党基础上的选举。选民的选择只是在竞争的政党中进行选择,可以说,选举的目标与其说是选举代表人,不如说是选举一个政党的代表。这种代议制最成功的国家是那些有两个主要政党的

国家。

现在我想指出,在那些一党制的国家,某一政党被视为与这个国家等同为一体,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基础就比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国家的民主根基要稳固,因为在多党制的国家,每个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现在我的观点是,只有两个政党在某些基本问题上有分歧时,两党制才是合理的,否则它只会增加党派之争。换句话说,一个政治集团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民的利益,在没有成为一个宗派时,他们才能为消除社会上某一严重错误而争辩。那么,这个政治集团和造成这一严重错误的另一集团之间的分歧就是根本的分歧。因此,毫无疑问,在通过变革来消除这些分歧之前,是不会有国家团结的。在那种情况下,“变革”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因为任何基本层面的变革都可以被合理地称作“革命”。此外,“革命”一词之所以通常与武装暴动相关,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存在的根本分歧都会引起“内战”的局面,经常会导致流血的革命。

……在那些基本问题有分歧的国家中,都存在我们一直讨论的“内战”情况。在另一方面,如果党派间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在这个两党制中,人们会很快把政治问题降格为一场足球比赛。当然,足球比赛可能会吸引一些十分有能力的运动员,也可能是娱乐性的,但其本身仅仅是一场游戏,也只有那些最狂热的粉丝(他们通常智商平庸)十分看重比赛。事实上,这就像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中所发生的一样:那些最精英的社会成员已经厌恶了被称为政治的政党之间虚伪的博弈游戏,并对之失去了兴趣,他们看不到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的政党。因此,可能除了通过写书这一方式外,即便他们希望,也无法在政治领域为祖国作出贡献。因为两党制统治下的国家政治不是,也不可能是全民政治,而仅仅是不同集团的政治,这些集团之间的分歧往往与多数人无关……

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两个主要政党只在小事上有分歧。两党都把人民利益记在心中,或者双方都声称如此。两党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好事,应当使每个人都受到教育;都认为所有的劳动者都应该有合理的基本生活费;都认为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等。所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今天所有的政党都不敢告诉他们的选民自己不相信这些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不管哪个政党赢得选举,该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尽其所能为人民提供尽可能多的福利。那么,每隔几年,全国选民都要从相互对立的政党中选出一党来做双方都一致认

为应做的事情，难道这不荒唐吗？如果对前面的基本问题意见一致，双方都抛开扯皮的事情，让选民从两个政党中选出最好的几个人；如果这些个人成为议会成员，在一起谈论具体的工作并协作把工作办好，那岂不是一种更明智的做法？

当然，支持政党选举制度背后的理论是：选民选择的不是人品而是政策。好的。但是，在政策上没有分歧的地方（我再重复一下，政策的分歧就是根本问题上的分歧——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分裂和潜在的革命），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在个人中进行选择，也就是说，选出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个人。实际上，我们在选择政党领袖的过程中就是这么做的，即在选举的过程中对政党的政策达成一致。在国家选举中也应该这么做，以便在选举过程中实现对国家政策达成一致。

我知道，作为一党制政府的领导人，这样写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是特殊的诉求。但是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反驳他们这样的指责，两党制的抗辩者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指责。因为，尽管他们公开声称民主政府需要有一个反对党，但我从未听说过一个政党参与选举的目的是为了成立一个反对党！相反，每个政党参与竞选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席位，但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赢得所有选票。之后，即使失败了，他们非常坦然地装出无辜的样子，用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宣扬他们的失败。

批评我们的人应该了解，在非洲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对待政治；他们也应当记住非洲政党与欧洲或美洲政党的历史区别。在欧洲和美洲，第一个政党的产生是当时存在的社会与经济矛盾的结果，而第二个政党是某些贵族或资本主义集团为挑战第一个政党的垄断而成立的。但在非洲，我们的政党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根源，它们的成立不是为了挑战任何统治我们自己人民的集团，而是为了挑战那些统治我们的外国人。因此，非洲的政党不是政治“党派”或小集团，而是民族运动，从一开始它们代表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例如，在坦噶尼喀，我们成立了坦盟，但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英国的保守党或者工党，英国的政治纷争与我们无关。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殖民者，我们建立坦盟作为民族运动，目的是为了摆脱他们对我们的殖民。那些帮助资本主义的坦噶尼喀人被视为是祖国的叛徒，而不是两党制的信徒！

例如，在英国甚至直到现在，两个主要政党中一个政党与富人联系在一起，

而另一个政党与穷人——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近年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确实在缩小，两个政党之间的政治分歧也在缩小，但是在两党成立之初，两党之间的差距很大，两党之间的分歧也是根本性的分歧。早在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保守党与工党出现之前，在英格兰就已经有了两个主要政党。这两个政党都是富人的政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之间的分歧慢慢消失，就像现在它们的后继者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的分歧正在缩小一样，但是这两党在一开始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集团：一个代表贵族集团，一个代表富裕商人集团。前者从其聚集的土地中获得财富，但后者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一开始不是来源于土地，而是来源于贸易。老贵族阶级把这些人看作是暴发户，认为他们不配拥有土地，更不配在政府有发言权。但“暴发户们”想的却完全不一样，他们挑战贵族阶级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近代，工会运动的发展导致了工党的诞生，这次来挑战保守党代表的富人的政治权力或政治现状的，变成了工人阶级……

换言之，非洲以外的古老的议会制民主下的政党是个别的利益集团。因此，在非洲试图模仿它们的也是个别利益集团。现在，这些党派并不将他们的成员局限于出身高贵富裕的人群；相反去限制那些与他们属于同一贵族的知识分子。在某些类似的现代“贵族”中，与以前那种有高贵的血脉才能进入统治阶级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现在判断一个人是否配进入精英阶层的标准是他的思想是否够“红”。如果读者中有人想成为这样的党派中的一员，仅仅证明自己爱国、有人道主义和遵纪守法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证明自己的思想带有可被接受的红色“贵族”色彩。但是，那些将成员局限在任何种类的贵族的政党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民族主义政党。他们是一些个别利益集团，企图通过宣称自己高人一等来统治社会上的其他阶级……

……在任何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不仅是必须的，同样也是人们渴望拥有的。因为妥协是人类达到共同标准的唯一途径，没有这个共同标准，社会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如果妥协是人们渴望拥有的，那么使之具有该特点的是人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个别的利益集团。因此，个人主义应当调和到适应社会整体利益，而不只是为了社会一部分人的利益……

下面回到我的论点，假设在一个国家里，一个政党被视为等同于这个国家，那么该国的民主基础就会比较牢固，该国的人民比有两党或多党的国家的人民

有更多机会行使真正的选择权，因为两党或多党制的每个政党都只代表一部分人。在习惯两党制的国家中，很难在选举方式上做出重大改革。但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选民已经排除掉多党之间竞争的可能性，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我们通过选举箱的形式也给予人民行使选举领导人的权利。假设我们接受一党制的现实，不去试图采用两党制，那么，只要每个公民都拥有加入坦盟的资格，我们就可以真正自由、民主地进行选举。

我将进一步来进行阐释。我认为，我们不仅有机会摒弃两党制的理念，而且认为保留两党制也是错误的。这种制度对一些只有一个党派的国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会对民主制度产生致命的危害。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些理念在两党制国家的议会里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至少在每个党派的内部会议上，允许各成员之间进行自由辩论。在议会面对敌对党派时，对党派的忠诚将会使他们聚集在领袖后面支持他。（实际上，这种忠诚的基础是对抗，从而使得维持纪律变得相对容易）事实上，如果选择了一个保留了两党制的规则和制度的一党制，那么还不如人为制造出一个反对党，尽管这样会造成众多的矛盾和对自由的限制。在没有竞争政党阻碍的情况下，强化政党纪律、在议会中限制言论自由等行为，迟早要让我们遭遇比我指责过的两党制引起的宗派主义更糟糕的情况，那会导致政党内部对自由讨论的限制，直至最终自由讨论被完全压制，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毫无原因就限制人的言论自由。人们不是傻子，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接受“党内团结”的规矩，但是由于没有被对手政党挤出权力层的危险，稍有头脑的议员可能很快就会质问，为什么总要在公众场合毫无异议地支持政府？我们能给他们什么理由呢？我们将不得不说服他们，也说服我们自己，他们必须支持的“党的路线”从根本上是正确的，任何偏离都将等同于对人民的犯罪。换言之，我们不得不把决策提升到教条的高度，而一旦沉溺于教条就不再允许言论自由。不把相反的观点放在“政党路线索引”上，就不可能有教条。

我相信，这不太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共产主义者好友们身上。他们将政策变成信仰，也发现教条主义和言论自由很难并存。他们担心“另一个政党”如同两党制下的政府一样。对他们而言，“另一个党派”只是一个幽灵，但幽灵甚至比现实存在的对手还要令人恐惧！他们对这个幽灵的担心使自己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一党制下，必须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党员，必须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

没有一个把成员局限在一个小圈子的政党会不担心被其拒之门外的人推翻。因此，必须要时刻警惕反对的迹象，并将那些“危险的”思想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是，一个面向大众并被视作等同于整个国家的全国性运动，应毫不畏惧那些被社会所排除的团体的不满，因为那时将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团体，也不存在这样的团体。当然，构成政府的人员会不断更替，而这也正是选举的意义所在。我们的运动领袖在不断更换，那么国家领导人就没有不更替的理由，当然这并不是指敌对党派推翻政府。这样的全国性运动没有给不满的情绪滋生的余地，因此也就不必担心批评和言论自由。相反，国家和运动自身会从国内和国外不断汲取新的思想。如果等国家领导人死后才去批评他们，对国家和运动自身而言是错误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运动的任何一个成员（因为我们所谈论的是一个国家的运动，在这个情形下指的是任何一位怀有爱国热情的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可以自由地成为候选人。在每个选区，选民可以在这些候选人中自由地做出选择，选民所考虑的是候选人本人，而不是他所带有的政党标签。事实上可以这么说，这些竞选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选出自己的代表。如果这还算不上民主的话，那我真不知道民主这个词的真正涵义了。

在大众选举之前没有必要进行党内选举，所有选举都应当同等地向公众公开。比如，坦盟和坦盟政府当前的不同之处终将消除，虽然民众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应当让民众自己去选出领导人，而且人民可以随时罢免这些领导人，而不必等到法定年限时才能罢免自己不满意的领导人。只有这样，选民才可以时时刻刻把政府牢握在手中，因此也就不只是每隔四五年对某一党派投出赞成票或反对票的事了。这种情况下，执政者再次执政只是因为人民对其满意，而不是法律保证在下次大选之前他将无法被人替代。

进一步讲，当前人为存在的政客与公务员之间的区别也不必存在下去，这种区别只是在多党制存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为在多党制下，多党轮流执政时公共管理的连续性必须不能出问题。但是，当你从单一的民族运动而非一些小党派间的斗争方面考虑时，只是因为他们碰巧是公务人员，就不允许这一批最有智慧与才干的社会成员参与政策的讨论，那就非常荒谬。在被视作等同于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参与政治事务应当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不管他选择服务国家拥有的能力有多大……

43 第二次争夺

1962年间,总统发表了一个以“第二次争夺”为题目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以先前在达累斯萨拉姆世界青年大会上的讲话为基础。1963年2月4日,在莫希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总统进一步就此次演讲的主题进行了阐述。

自1960年4月上次会议到现在,非洲大陆上的很多新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已获得独立。过去我们所遭受的殖民主义即将灭亡,但还没有从我们的国家中消失。帝国主义的黑手仍然抓着罗得西亚、安哥拉、莫桑比克、肯尼亚、桑给巴尔、西南非和其他许多例如所谓的“西属几内亚”、“西属撒哈拉”等较小的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人民。这种殖民统治必须消失,1963年的非洲将没有它存在的位置。

我们南非的兄弟们依然遭受着无情的压迫,我们没有人会坐视不管。只是因为不是白人,我们的兄弟们就丧失了人权,遭受种族主义的歧视,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在消除这种侮辱之前,在南非政府为一个不分肤色的人民政府取代之前,我们不罢休。

关于这个问题,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能保持中立。在那片伤心的土地上,我们的兄弟们正发动着一场不可避免战争。但毫无疑问,有效的贸易和外交抵制能极大地帮助他们推翻目前的专制。然而有很多宣称支持我们自由与平等事业的,在现实中却蓄意破坏我们朝这个方向所做的努力。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保证不会让我们的国家会因此被南非人民谴责为“背叛”!

我所提到的国家以及亚洲其他尚未获得自由的国家,必须接受我们对其斗争的全力支持。但是,他们及我们都无需怀疑最终的结局。这些土地上的所有人民都将获得以自治为基础的独立。殖民主义的武力正在撤退,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让它们跑起来,把他们从其依然占据的优势中驱逐出去,并阻止他们重组

之后发动反攻。这个我们能够做到。

然而我们仍该保持警惕。仍然有人在问“谁将控制非洲”，问这个问题的人没有期望答案是“非洲人民”。刚果事件已经表明：殖民力量从前门离开，而相同或不同的外部力量从后门进来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能犯错误。我们已成功摆脱了第一次“非洲争夺”，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新阶段。我相信，这是为了非洲展开的第二次争夺的新阶段，也是为了亚洲展开的争夺的阶段。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过，这场第二次争夺将要以一种与上次不同的方式进行，但其目的是相同的——即得到我们大陆的控制权，但这次我们将不会屈从于我们大陆之外的国家的军事入侵，外国力量也不想在这场第二次争夺中彼此争斗。他们会煽动非洲人打非洲人，亚洲人打亚洲人，但是总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无论是新帝国主义者还是老帝国主义者，都会利用非洲国家内及非洲国家间的分歧，利用亚洲国家内及亚洲国家间的分歧。

我们也不应该只根据旧殖民势力考虑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财富与权力的副产品；我们必须警惕其中任何一项的侵袭。实际上，我希望我可以坦率地说，这场为了非洲或亚洲的第二次争夺将是一场只在资本主义势力间进行的争夺。冷战冲突中，我们中的弱者只不过被当作棋子的现象太常见了。

然而，这场争夺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是否会受骗于其他人——或是我们在向殖民主义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使用的口号。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做，外界力量只会利用我们一个来打另一个。如果我们团结起来，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所有的控制都将失败。因此，非洲的未来仰仗团结，亚洲的未来也仰仗团结，仰仗于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要维护这种团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尝试去做我们公正谴责的帝国主义所做的事。一旦我们中的任何人开始干预其他自由国家的内政，或伙同持不同政见者耍阴谋，或试图影响建立一个能掌控的傀儡政府，到那时，我们对新帝国主义最强的防卫以及我们在经济斗争中获得的最多的资产，将受到巨大的威胁。

我们必须像来自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们解决他们的分歧一样——私下以基本的团结为基础，讨论解决我们之间的差异、分歧及误会，只有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拥有他们想要的政府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或许会以为他们弄错了，我们或许会认为他们选择的领导人执迷不悟甚至更

差,但这不重要,当然也不允许我们用任何方式干涉。例如,我们永不允许自己参与诸如最近暗杀多哥总统的此类犯罪活动。

我们现在的确该关注非洲国家与亚洲的关系问题了。攻击帝国主义然后离开,这太简单了——甚至每一个上学的孩子都能做到。我们绝不能形成对帝国主义的迷恋,但我们中的一些人似乎正在这么做。我们的工作是要确保外来者没有机会利用我们之间的分歧,要确保我们以维护和巩固团结的方式行事。而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彼此间公开的攻击不利于获得我们需要并渴求的那种团结。我们每攻击彼此一次,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想控制我们的人都会高兴地跳起来。他们怎么会介意我们攻击兄弟政府是因为它是一个“帝国主义配角”,还是因为它是一个“共产主义配角”呢?他们所在意的只是我们互相攻击,毁灭了团结,停止了自己的思考而用口号来代替。

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道路走向独立,或许我们也需要用很多不同的路线来实现谋求人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共同目标。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幻想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情形以及国家斗争的所有阶段都有天赐的答案,每一个国家必须自主解决这些事情。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压倒一切的、共同专注的问题——我们从团结朝更高级别的团结前进。如果我们取得这方面的胜利,必须避免互相谩骂,避免给一项新建议或一项新分歧的答案贴上“共产主义”或“帝国主义”标签。

独立斗争的基本意图之一是得到自己思考并运用思考结果的权利。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为获得自由而进行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这会导致我们可能成为跳跃者,等着西方或东方势力说什么想法,然后机械地模仿或从相反的方面着手。我们必须像要求别人尊重我们一样尊重自己,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理性来回应争论,用讨论解决分歧,以友谊与平等为基础做这些事。

我们已经说过,非洲与亚洲不同的国家将用不同的路线实现我们共同的经济目标。但是,今天在会议现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通过一些社会主义的组织,我们才能消除压迫几百万人民的贫穷。换句话说,有着不同成就的我们所有人,正努力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建立一个不分等级的社会。为什么要这样?而且这跟团结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旨在建立一个不分等级的社会,出于一个原因。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

的财富能满足个体对权力和声望的欲望，因此，一旦财富与财富的目的——消除贫困分割开来，个体之间就会出现残酷的竞争。每个人都试图得到更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样做他能得到较之同伴更多的权力和声望。财富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和羞辱他人的方法。

社会主义的根本是拒绝把财富用于这种用途，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个人财富不是，也不应是权力或声望的象征，只是一种用来消除贫穷的工具，这是我们每个人所致力于并朝其不断努力的方向。实际上，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成功在于社会公平，今天几乎成为了一个普遍接受的目标，甚至资本主义政府今天在他们国家为其人民所做的，在上一代甚至同样的人在十年前看来，也太具有革命性了。

然而，国际上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阶级划分也越来越严重。现在不仅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由国家组成的更大的社会中心的“个体”，现在也犯了资本主义之前犯过的罪行。从国际层面来看，他们现在开始为资本主义目的使用财富，也就是说，为了获得权力和声望。

然而，无论国内的政策是什么，除了为在贫困地区消除贫困而使用国家财富外，出于任何意图使用国家财富都只有一个结果，阶级斗争会由国家层面转向国际层面。卡尔·马克思贫富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的学说，适用于国家内部的情况，恰恰也适用于国际的情况。

这就是当前世界面临的分裂——是一种阶级分裂，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分裂。除非我们现在开始按照我们宣布的社会主义信条行事，否则我们将发现，对冲突双方来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划分。

在我看来，只有在来自贫穷的独立国家人民的集会上，比如我们的本次会议，才能对即将到来的国际“阶级斗争”进行最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都承认社会主义和维持不公平的状况是不能相容的；社会主义与尝试进行经济或政治的统治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尤其是那些在冷战中不受约束的国家之间，应该可以想出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场世界级的阶级划分发展成为一场痛苦而血腥的冲突……

44 同私人资本投资的关系

摘自 1963 年 2 月 11 日东非商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坦噶尼喀还有很多事要做，而将政府资源与私人投资结合起来也不足以能够做这个国家需要做的所有的事。因此，我重复一遍，为了发展坦噶尼喀，政府希望同私人投资者合作。但是，政府不能，也不会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来消除投资者的顾虑。如果我们的发展是为了建立我们想要的那种社会，那么政府就不能不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知道商业和私人投资有其自身的需要和想法，我们承认在做出新的计划时，呈现社会这一部分的是商会及同类团体的工作。但商业活动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些，商会和行业工会必须比这做得更多，他们必须了解我们所有活动的目的。

我们寻求对坦噶尼喀的资本投资，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工厂，认为他们能增添景致，也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同机器工作、建立分配与交换的复杂系统。我们寻求资本投资仅仅是因为我们想改善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

总统先生，这意味着针对我们依照自己条件寻求资本投资的指控是证据确凿的，我们请罪！但是，这也是愚蠢的指控。每个国家都想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求私人投资。就此而论，我们的“有罪”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商业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相反的是，它暗示了政府承认，如果能让政府计划快速生效，就需要私人投资，这是为创造未来和谐良好关系而进行的成功讨论的基础。因此，我们的“有罪”，换句话说，是私人投资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保护。我们承认为了社会发展，我们需要私人投资，我们不能任意地打破我们获得它的希望。

然而，我们在想要符合自身条件的私人投资时，我们的确暗示了私人投资的意图及实践都应限定在坦噶尼喀境内。私人资本现在不能只是索取，它不能

只是为了拥有者的利益而剥削工人或社会。工人们必须要有合理的工作条件以及与他们为一个运营良好的公司付出的劳力成正比的工资，而且他们必须受到尊重。这两件事对新坦噶尼喀任何企业的健康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不仅如此。无论一个特定的工厂或产业拥有多么好的条件，工人们不能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离开来。我们忠于非洲社会主义的哲学观，而这种哲学观的基础是人类平等的原则。因此，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就必须是阻止在我们社会中出现一种阶级结构……

我们缺乏能够经营运作新工厂、现代农场、文职部门以及合作型社会的高学历、高技能人员，这意味着这类人能得到比高度发达的欧洲社会的工人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服务条件。同时，我们的绝大多数人民尚处在维持温饱的水平。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社会中发展了一种与我们宣称的社会平等目标不一致的收入结构。一些商界及文职部门的顶层人士月收入是 4000 到 5000 先令，而达累斯萨拉姆的最低法定工资是每月 150 先令。这种最低工资使得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首都，希望赚取比他们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农场更多的收入……

但从长远来看，避免这种不健康想法滋生的唯一方法是缩小这些难以置信的收入差异。顶尖人士或许通过其工作对社会做出了更多贡献，但也很难多达 27 倍。专业人士和有能力的管理者以及其他获得高薪的人是靠上帝赐予他们的大脑工作，他们无需对此负责，而他们能这样做，是源于整个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培训。我们应当认识到，从总统往下的这些顶级人士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孤立地工作，他们都不过是团队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一点也很重要。

当然，重要的事是面对当前的经济现实，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收入不平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能快速而轻松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积极制定政策以增加我们国家创造的财富总量。正如我说，我们需要私人企业和政府企业用一种合理的速度来增加我们国家创造的财富数量。

其次，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阻止把现在的境况固化为一种阶级结构的行为，而且我们绝不允许当前的收入差异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事实。我们所有的重点必须是改善最底层人民的收入水平，公开宣布要缩小当前收入不公的打算，使每个人都不会因为相对那些不如他的人处境变差而要求增加收

人——因为这正是我们打算做的！

同时，应该尽可能地增加教育和培训机会，以降低尖端人员的“稀缺价值”……

45 泛非主义政策和目的

摘自 1963 年发表于南斯拉夫《国际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

要使非洲的发展充分发挥潜力,只靠我们现有的民族国家是不够的。实际上,现在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很弱小,因而它们不断面临更狡猾的统治形式——普遍称作新殖民主义——的危险。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只能靠接受国外的补贴,才能履行最低的政府职能。这种情况下,很难维持长时间的完全自由。而且这种类型的薄弱不仅会影响到相关国家,也会影响到其邻国及其他所有非洲国家。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卷入了东西方冷战,或卷入其他任何与我们自身问题无关的世界冲突之中,我们都不会安全。

对整个非洲大陆及大陆的每一部分来说,非洲统一都是必要的。从政治方面看,我们继承的国界线要么不明确,要么从民族学、地理学来看也毫无意义,但却是众多分歧的源头。如果我们允许此类分歧的发展,将会建立国家军队,从而浪费我们的稀缺资源……

只有一种方法能使非洲站在与其无关的世界冲突之外,并有望处理现在正困扰着压迫人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现存的边界必须失去其意义,变成仅仅是一个大的单元内行政区域的分界线。这是一件紧急而困难的事;随着现有的民族国家通过建立民族主义反对部落主义,这会变得日渐困难。但是,在争取独立的斗争期间,普遍产生了一种统一的感情,认可统一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性。

寻求非洲统一的政治争论自然不可避免,然而经济方面的争论也同样强烈。我们所有国家都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全部的收入依赖于世界对某一种农作物或某一种原料的价格及需求。没有任何政治底气,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讲,非洲正在遭受着剥削。它的土地被开发来种植单一的作

物,它的矿产被带走而没有换来替代能源财富的增加;我们所有的出口几乎都是耗取自然资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原材料被输入到欧洲或美国,被他们制成产品然后再以高价卖给我们。

而且,很多非洲国家都生产或能够生产相同种类的主要产品或原材料,因此我们彼此竞争销售,经常把我们的产品卖给相同的主要消费者,使我们都处于极为弱势的交易地位,一个国家在销售方面的胜利总是以另一个国家的受损为代价。个人尝试纠正国家经济不平衡的行为经常会使另一个非洲国家的地位降低,在与世界产业区域有关的领域削弱整个非洲。同样,在多样化进程及建立我们国内经济的尝试中,我们彼此竞争以争取少量可利用的外界资本投资和经济援助。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容易给彼此带来麻烦,而每个非洲国家的需要使这个国家在面对提供者带有明确或含蓄附加条件的援助时,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些都表明,不同的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卷入与其无关的争吵的危险。如果存在一个真正的非洲统一,将不可能存在此类的道德勒索。

从积极的方面看,只有非洲被当作一个单一的市场和单一的经济单位,才可能会有很多发展机会,许多小的经济计划能得以协调,更容易产生跨越国界的发展……

这些因素当然是统一道路上的障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被那些愿意看到非洲依然衰弱的蓄意制造分裂的宣传夸大了。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指控,指控某一非洲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配角,或在共产主义控制之下,或对其邻国有帝国主义的企图。有时非洲人会说起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给予新旧帝国主义可乘之机。但大多数时候,这种言论就像毒药般通过强大的媒体和宣传品,不断涌入非洲。

但是无论有什么困难,不管是国家之间短期的利益冲突——其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的不团结——还是因为我们不同的行政和经济传承而产生的真正的误会,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不会影响我们对统一的需求和渴望,非洲统一必将实现。然而,这会影响到统一的进程以及它的机构设置。当然,现在无法预测非洲统一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也不能画出非洲统一的路线图……

46 1963年亚的斯亚贝巴会议

尼雷尔总统是最后一位在非洲独立国家大会上演讲的非洲政府首脑。此次会议起草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并成立了该组织的解放委员会，总部设在达累斯萨拉姆。1963年5月24日，尼雷尔总统发表了讲话。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发现我们是否想要一个自由的非洲。甚至非洲统一最大的敌人也知道这是毫无疑问的，整个非洲用一个声音喊出来的就是：我们渴望看到非洲摆脱殖民主义，完全获得自由……我们来到这里，是想知道为了获得非洲最终的自由，我们都应该做什么。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发现我们是否想要非洲统一。我想再次重申，甚至我们的敌人也知道我们由衷地渴望这种统一……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在通往非洲统一的道路上，能够找到我们的共同特性……

我幸运地成为最后一个做演讲的人，所以我可以坦诚地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共性……

为了完成全体一致的目标，让我补上坦噶尼喀的声音……目前，我们没有对非洲自由事业作出更大的奉献，只是因为接近尚未独立的非洲地区，为南部非洲的解放作出了微薄的贡献，而且我们准备做更多，尤其是我们准备支持我们的兄弟塞古·杜尔总统^①的建议：留出国家预算的1%用于解放尚未获得自由的非洲。我想向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英勇的兄弟——本·贝拉^②总理保证，坦噶尼喀人民已准备好，愿意为最终消除非洲遭受的殖民主义羞辱献出生命。

①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1922—1984)，几内亚第一任总统，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者，非洲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译校注

② 本·贝拉(1918—2012)，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于1962年9月成立后，成为首任总理。1963年9月当选总统，1965年6月被军事政变推翻。——译校注

我坚定地请求皇帝陛下^①和在此集会的兄弟们,我们应当严肃地看待任何外国势力对非洲的继续占领,就跟我们严肃地看待外国势力利用威望和声誉,占领我们国家的某一部分一样。我们不能再说安哥拉没有解放或莫桑比克没有解放,等等,我们正在帮助安哥拉或莫桑比克解放它们自己。这样的陈述隐瞒了事实。真正令人羞愧的事实是非洲并没有解放,因此,非洲应该采取必要的、全面的措施来解放自己。这是这次会议应该向联合国安理会传达得清楚而严肃的信息……

尊敬的皇帝陛下,兄弟们,在我们努力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我相信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共性。我们都一致同意全身投入到实现非洲的完全统一中去。但是我们也确实说过,就跟非洲独立是一个过程一样,非洲统一也必定是一个过程。没有一个神灵会说出“让非洲统一吧”,然后非洲就获得了统一。从人类行为的本性来说,愿望和愿望的实现不可能同时发生。我们没有那种力量,只有上帝有那种力量。在人类行为中,在愿望和实现愿望之间有着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够以统一之名,邀请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人来通过征服完成统一。因此,要实现非洲统一我们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自由商定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演讲开始时说,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如何实现统一的自由和自由的统一……我们已经找到了最高层次的共性,现在的任务是刻不容缓地利用这种共性……

我再重复一遍:让我们所有人一起接受宪章吧,这是我们采取的第一步。或许一些人会说,宪章还远远不够或宪章还不够革命,也许是这样,但怎么样才算够呢?好的泥瓦匠不会抱怨他的第一块砖砌得不够高,他知道第一块砖将会做到物尽其用,但不会很显眼。他将不断地砌上一块又一块砖,直到建成宏伟的建筑。

我说,有些人会认为其不够革命,而什么是够革命呢?真正的革命者不是不现实的做梦者。真正的革命者是会科学客观地分析任何现有形式,并采取相应行动的人,这正是本次会议的行动所在:现实地考虑在寻求统一的过程中我们的共性,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

① 指埃塞俄比亚时任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1941—1974)。——译校注

47 东非大学落成典礼

东非大学既有联邦性又有国际性,由麦克雷雷学院(乌干达)、内罗毕大学学院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组成,尼雷尔总统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963年6月28日,大学落成典礼在内罗毕举行,尼雷尔总统以校长身份发表讲话。

在奥博特先生^①、肯雅塔先生^②及尼雷尔总统宣告计划在1963年底前成立东非联盟几周之后,举行了东非大学落成典礼。因此,在对伦敦大学为东非大学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之后,尼雷尔总统进一步表示,希望东非大学仍保持联邦性,但不要总是保持世界性的。他谈及交换学生对于发展“东非意识”的重要性,并指出培养联邦统一的精神将是大学的职能之一。之后他继续发表讲话。

……让我们都弄清这一点:大学不是只为追求名誉而建,它在本地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为了有效做到这一点,它必须为它所在的社区服务。东非大学必须从东非及世界其他地方借鉴经验和思想,必须将其精力放在满足东非的需要上面……

确实,我们必须考虑本大学在2000年及以后的发展,但是,更要关注它在1963年的发展。现在,我们不得不打击三大敌人,它们的名字已是陈词滥调,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压迫我们。当前的争议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种观念非常宝贵。但是,我们目前的行动会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对整个未来的认识,会淡化这种超脱的观念。我们的问题不会等待,因此我们必须要求这所大学在我们正在策划的社会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所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东非大学必须尽可能地客观、科学,尽可能地尽其所能。它必须同各类偏见作斗争,坚持不懈地寻求深奥的真理。只有通过

① 弥尔顿·奥博特(1924—2005),时任乌干达总统。——译者注

② 乔莫·肯雅塔(1893—1978),肯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译者注

这种方式，东非大学才会为我们的发展作出贡献，因为在任何领域中，反对偏见的斗争是取得进步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学在校内外都必须积极参与这场反对偏见的斗争，而这可能会意味着坚决反对大多数人的信念，因为偏见意味着，人们在现实问题非常棘手，也没有准备好面对个人和社区困难的复杂性时，他们选择了逃避。

如果这所大学真要用这种方式为我们服务，其自身必须提防知识及科学的偏见，其表现为拒绝重新思考传统的做事方法。除此之外，大学还必须帮助我们处理东非此刻正面临的导致偏见的特殊诱惑。这是最容易让步的，而否认我们中有部分人已经这么做了是错误的。我提到，20世纪最流行的社会疾病是基于种族、肤色或等级制度的歧视。

庇护这种特定的偏见，或者允许基于这种偏见的行动，就意味着放弃了我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类尊严的斗争的成功果实……

在东非，为了大多数人，也为了少数人，我们必须提防只需推翻现有的种族问题态度的偏见。非洲民族主义正在扫除部落主义，原因很明显，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部落主义者。但不幸的是，在这个世纪，一个人不可能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种族主义者，这一事实却不同样明显——尽管这个观点同样正确。因为在20世纪，民族主义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是个人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个人的自由依赖于在社会中他的平等成员资格。现代民族主义必然是人道主义的、国际化的，因此它与种族主义无法相容。这所大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让这个真理成为我们民族主义者措辞中本能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承认，身在东非，很容易沉溺于种族主义。对我们来说，从我们的国民中挑出一些肤色或其他生理特征有别于他人的少数派群体，并因真正压迫我们的邪恶势力责备他们，是很容易的。的确，比起处理基于人类平等重建社会的艰难工作，这么做会容易得多。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消除昔日的歧视对大多数人的影响，这样就会使形势更复杂了。因此，就会产生诸如“什么时候合理的行为变成了歧视？”“什么时候儿子不再为父亲的罪恶买单？”等此类问题。如果要本着鼓舞我们政治斗争的人类兄弟情谊的精神来回答，需要不带偏见、坦诚地考虑这些问题。

这所大学必须切身解决这类问题。这所大学必须坚定地支持这类原则，在必要时为之而战。大学内部必须有——这意味着尤其是在教师身上——真理

的精神。它必须尽可能地客观和科学,必须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反对所有形式的偏见。而且,它的成员必须站出来强迫我们考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后果,而且必须愿意帮助我们在行动之前进行思考。

然而,有必要补充两点。第一,必须意识到我们十分匆忙。我们不能只是思考,不能无休止地争论赞成或反对某个决定;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现在就解决这些问题。第二,这所大学必须思考,并强迫我们基于人性而不是某部分的利益来进行思考,它的成员们必须提防我们的偏见,也要提防他们自己的偏见。

我知道,我正对东非大学提出大量的要求。我要求它的成员们既要客观又要积极,很难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而且,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些要求容易对政府和人民产生误解。如果我们足够坦诚,这类情况将会减少,但这需要我们所有人,包括大学成员们的勇气和自我牺牲。因为我不能宣称,我和我的同事们能永远不把坦诚的批判误解当作违背宪法的反抗。我也不能诚实地许诺,说为了民族统一的战斗,我们永远不会犯辱骂不同意见者的错误。我希望我们不会犯这些错误,但只有一件事我十分确定。纵观历史,人类进步的基础是存在这样的人:不考虑对自身的后果,在认为必要的时刻会站起来说“那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这么做……”如果我们知道世界是圆的,我们必须这样说,即使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它是平的。

这所大学必须接受的是艰难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它的成员们必须像奴仆一样为东非服务,收集并传播我们应当知道的事实。同时,他们必须是我们社会的火炬手,是火炬的保护者,因为在我们陷入紧急状态时可能会危及它的光明。最重要的是,这所大学,大学的成员及学生,必须跟东非人民一起,为建设一个对得起我们拥有的机会的国家而斗争。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48 平等的含义

1963年6月29日,在访问内罗毕期间,总统向东非铁路培训学校的学生和员工发表了演讲。该校由东非铁路和港口公司联合拥有。

……当我们说我们想要自由,想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具有平等的地位时,就必须认识到平等的含义。平等意味着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技术人员,还有我们的清洁工和工人,都必须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应职位的人做得一样好。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其他的都只是感觉……

49 浮华之风

1963年7月7日(萨巴节^①),在全国庆祝坦盟成立的活动中,总统在一个群众集会上谈到浮华的危险。7月13日,他给政府的所有部长与官员及坦盟写信,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该信随之被发给媒体。此后情况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亲爱的同事们:

在萨巴节我不得不公开提出,反对我们很久以来就一直在抱怨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政府内部越来越有这么一种倾向,把尊严与我认为是浮华的事情混为一谈。如果我们不想让它损坏共和国的尊严和对共和国政府的尊敬(尽管这可能是这么做所强调的),我们必须现在就制止这一倾向。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恳请坦盟和政府所有负责岗位上的人来帮助消灭这一恶习。

我将通过实例来说明我所指的浮华是什么。我能举出很多例子,你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些。

我们独立后,每当总理到一个地方,甚至在非正式的晚宴,我们都会唱国歌。这已经是很不必要了,但是作为一开始,我觉得一点过分的热情也可以理解,当时我希望,以后只是在真正需要的场合才唱国歌。但我似乎抱了太大的希望,因为现在不管是部长、议会秘书还是地区专员到坦噶尼喀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会唱起国歌!

把国歌当作是畅销歌曲,或把国歌当作是政府人员的识别标志,只要有政府人员出现的场合就唱国歌,没有比这更对国歌不敬的了,但我们却真在这么

^① 纪念坦盟成立的节日。Saba 在斯瓦希里语是 7 的意思,该节日为每年的 7 月 7 日。——译者注

做,在最不合时宜、最不应该的场合唱国歌。如果有不幸的路人碰巧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就会对他们大动肝火,开始大声指责他们这么做是“对共和国的侮辱”。这样做不仅可笑,而且也十分有损尊严,因为应该是我们对国歌表达更大敬意。实际上,如果真如人所说的“过于熟悉会产生厌恶”,我们自己应该为国歌有蒙受耻辱的危险负责。

不管是坦噶尼喀人还是外国人,都极不可能故意忽视唱坦噶尼喀国歌。毕竟在世界各地,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在听到国歌时都会习惯立正以示尊敬。但是在别的国家,只是因为政府的某个官员碰巧来到一个小的集会,或在去岳母家时飞机停到跑道上,就播放或唱本国的国歌——这不是惯例。假设我们在另外一个国家度假,碰巧看到一小群外国青年一边唱歌一边欢迎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听出他们唱的是他们的国歌,突然发现自己因侮辱性的行为而遭到指控,那我们会有多么吃惊!

警察的护送也是一样。我们还没有执政时,没有警察护送也一样可以随意走动,但现在我被告知不能这么做。在有些场合,警察护送总统或副总统确实有必要。比如,在接见国事访问的客人或在议会的开幕式时,必须确保总统能够准时到达目的地,在这种情况下,清理从议会大厦到卡瑞姆基厅^①的街道是有必要的,公众也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就像播放国歌一样,场合本身必须要足够重要,才能使用警察护送。如果我们把警察的护送或播放国歌当作虚假的盛况来粉饰普通的场合,那就太不值得了,也是对公众的侮辱。

本国及他国的总统办公室都肩负着国家元首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它不应当成为首都所在城市最大的公害!随着日益增加的浮华和讲排场,坦噶尼喀的总统已经成为达累斯萨拉姆市人民不得不忍受的最大公害。一旦他决定出去,不管是去吃饭、去跳舞还是去拜访朋友,达累斯萨拉姆的正常交通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他没有时间提前通知警察,其他正在通往目的地的行人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像难看的垃圾一样被清除出大街,来给总统的车让路。为了完成马上清街的任务,摩托车警卫们没有时间向行人做礼貌的解释,所以普通的汽车驾驶员被粗鲁地驱赶出街道,完全不考虑这些人方便与否,这样怎么能赢得这些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如果警察得到足够时间来通知从而使他们能有效地工作,那

^① 国家议会开会场所之一,原由印度裔卡瑞姆基所建。——译校注

么在总统离开议会前，总统出行路线的四分之一英里范围内，交通会出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停滞。

如果我不是总统，可能现在已经习惯于在与朋友定好约定前先打电话给议会，因为在达累斯萨拉姆，如果不事先了解总统那天是否出行，任何人都猜不出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会花费多长时间！

受苦的不仅仅是民众，还有警察本身。他们很难做到像坦盟和政府所说的“用关心和礼貌来对待民众”，因为同时他们还要在短时间内把不知所措的汽车驾驶员们驱逐出大街，以便完成我们的突然命令！有一次，因为这种浮华产生了严重的事故。当时我正要去莫罗戈罗，已经有两辆警车作为护卫，但最后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够引人注目，所以又命令一辆警卫摩托车在警车前面开路。就在摩托车警卫匆匆执行这项任务时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摩托车翻了，他受了重伤，丢了四颗牙——而这都是浮华引起的。

还有一个是议会大院的问题。现在要进入议会的大院要比在殖民地时期还难。有几次，我想允许过路的人进入大院来观看正在举行的恩戈马鼓表演，但结果我或任何其他人都不能让门打开，可能这都是因为得到了内阁指令的授权！就连我自己，如果没有门前的卫兵拿着喇叭大声向全城宣布“总统要出去了”，也不能走出那个大门。

迄今为止，每当我质疑这种不民主的浮华之风，都会得到“人民喜欢这样”的保证，但这真的太令人怀疑了。人们不能进入议会大厦去看正在上演的恩戈马鼓表演真的会高兴吗？人们真的喜欢因为总统、部长或地区专员下午出行而被大声吆喝着离开街道吗？并不认识的某位新上任的官员的朋友们为这位官员唱着国歌《小夜曲》，而人们必须停下手头在做的事情而立正，他们会真的有自豪感和爱国感吗？

我们应当停止自欺欺人。这种浮华与人民无关，因为浮华是民主的对立面，我们必须停止浮华，必须鄙视浮华，因为浮华应当被鄙视。尊严并不需要浮华来支撑，所有形式的浮华都是错误的。即使能够证明人民喜欢浮华——我十分怀疑这一点——浮华仍然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仍然有责任停止浮华，并告诉人民他们喜欢的浮华是错误的。

50 独立与团结

1963年7月15日,在对美国进行短期访问期间,尼雷尔总统在华盛顿特区向美国国家新闻业俱乐部发表了讲话。在解释非洲对殖民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及统一与平等的问题时,他说:

……当我支持的那些难民和政客来到坦噶尼喀,开始进行宣传工作,反对种族歧视或支持普选时,我知道他们做得对,我应该怎么做?我知道他们在殖民地国家没有机会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我应该阻止他们吗?

这完全不同于允许对某个独立国家采取敌对行为,尽管你可能碰巧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政策,或者你不同意这个国家的某一个政策。二战期间,美国支持了被占领土人民的反抗活动,所以我们并不因为占领发生在多年前就观点相左。那些在二战中因美国支持而立刻解放的国家迅速成为欧洲争取自由的巨大力量,同样,我们在坦噶尼喀、加纳、乌干达、刚果等国家也必须继续战斗,直至整个非洲都获得自由。

当然,南非联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他们采取的种族隔离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邪恶、非常危险的殖民主义形式。种族主义的基础是一个人有权来决定另一个人自由的限度,而仅仅因为后者在外貌上与前者不同。这比殖民主义对世界造成的危害更大,因为对世界上所有人来说,种族主义和群体歧视更容易使人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真正问题,种族主义具有更长的历史,也对懦弱的人性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给全世界带来的重大影响。不管受到多大的刺激,不管能够得到多大的回报,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自己的脸或肤色。为了某个原因,一个人可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个人侮辱,甚至对家人的侮辱,但是不会失去做人的尊严和自尊,但肤色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肤色!

如果只是因为我的存在就遭受侮辱,那么我只有拿起所能找到的一切武器起来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只能阻止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歧视我们的人过上充实的生活,阻止我们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51 在联合国日的发言

1963年10月24日，总统向联合国和本国发表的广播讲话。

……在冷战和对抗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一直担负着国际争端调停者的重任。在这个角色中，影响联合国生存的危机一直没有停止过；实际上，对联合国的恶意中伤也从未停止过。但是，联合国勇敢地面对这些中伤，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通过行动和卓越的方式，巩固了友谊，挫败了敌人，逐渐成为争取和平的国际组织中极为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去年一年见证了冷战中紧张关系的极大缓和，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而达到顶峰。坦噶尼喀签署了该条约，并把它当作是通往和平的重要标志。固然，这只是迈往和平的一步，而且只是部分禁止核试验，但这是重要的一步，是一个开始。我们必须全力消除战争，而消除战争是联合国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我们充满希望地看到冷战前线的这些进步时，我们却沮丧地发现，在葡萄牙殖民地、在罗得西亚、在南非，我们几百万非洲兄弟仍然没有获得基本人权，没有拥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的政府。联合国必须努力、必须不懈努力，来维护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必须警觉地继续努力来消除世界各地的贫穷、无知和疾病。联合国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一个神圣的任务，那就是保证所有的人，不管身在何处，都能获得政治自由，像人一样生活。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他们的分支，已经不仅仅出现了异常的行为，他们才是世界上最严重最真正的累赘。我们必须期待联合国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好自己的问题，为这些领域尚未完成的任务而努力……

52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上纪念麦克杜格尔的演讲

1963年10月18日,总统受邀在罗马举行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纪念该组织创始人麦克杜格尔的演讲。此次演讲对于欠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分析,也给出了他们可以选择的各种出路。

尊敬的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我清醒地意识到是你们给予了我这份荣耀,我才能受到邀请,站在这里演讲。我也清楚,在座的许多人比我更了解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其工作内容,而且在座的许多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在这些话题上,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也不打算去尝试。

相反,我想从生活水平极为低下的人的角度来谈谈世界发展的问题。对于一个像我的祖国这样的农业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因此,我应该首先仔细考虑存在于我头脑最前端的关于这个机构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谈到的很多问题可能会超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职责,因为这所国际机构不是,也不可能孤立地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权限和影响之外的一个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复合体。

首先,我认为带有偏见、怀有希望、时而愚蠢又具有潜力的人类是每一个人类组织和机构的发展目标,时不时地提醒我们这一点是很有用的。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生活在幸福和平的环境中,而政府职责的现代概念要求政府要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做到这一点。确保人民远离暴力,被认为只是目前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此外,人民还期望政府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来保持人们认为好的东西,而改变那些人们认为坏的东西。

对于一个像我们那样不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来说,政府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变革。没有几乎完全的变革,和平就不能,也不会得到保障,因为现在许多人

所居住和活动的环境是对人类尊严的否定，是对 20 世纪世界的羞辱。我们的政府要想保证明显的改善，就必须在国内进行完整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正如变革是欠发达国家政府的目标一样，变革也是国际机构、组织宣称的目标。联合国本身将维护和平作为它的特殊职责，但是，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专门机构，联合国表达了要彻底改变几十亿人生存条件的目标。我每天关注非洲一小部分国家正在发生的变革，站在这个角度看待能做出变革的国际机构，这是我今天的目的。

“一个世界”还是“不”？

除了南非——今天我不打算讲这个国家——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认可人类共性，对人类兄弟情谊的感情也正在逐步增强。实际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存在就是人类参与关心彼此幸福的一种表达。事实上，这种想法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它不再需要经过讨论来证明，却得到了坚持和认可。当然，我们还有足够的理由来设想，现在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一个团结的世界里。

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的世界毫无疑问每天都在变小。甚至在 30 年前，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上学之前，像今天这样的国际会议在当时是很难开展起来的，因为与会代表需要时间才能来参加会议。现在我可以想象，很少有人是在经历了超过 36 个小时旅程后才来到这里的，而且很快，旅途时间将变得越来越短。与地球上人民运动速度相伴的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国际影响力。全世界都在关心核试验的终止，因为全世界都将受到核试验的影响。另外，批量生产的技术意味着一个生产单位往往可以有效满足分散于全球的成千上万消费者的需求，相比只能满足附近消费者需求的小型工厂或者家庭生产者，批量生产要更便宜。

因为从技术上来讲我们是一个世界，但是我们习惯于把这个短语用在各种不正确也不相关的情境中，以至于频繁的使用阻断了我们的思考。

从政治上来讲，我们谈论一个世界，然而这 100 多个独立的国家才刚刚开始意识到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当两个政府为了同一片领土互相争夺时，不管这两个政府多么需要对方来确保这片区域的和平与繁荣，我们也不会说这是“一个国家”。同样，如果我们弱小的国家主义被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权威控制，而这个权威能够将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付诸实践，我们才有正当理由在政治语境中使用“同一世界”这一短语。

从经济上来讲,我相信这个短语更不恰当。的确,国际贸易发展的结果意味着产于伦敦、纽约或者东京的产品可以影响到坦噶尼喀灌木丛生的腹地的人民的生活。同样,我们还可以在德国、美国、印度和非洲看到同一家公司的名字。

经济对比

尽管世界本身呈现出强烈的经济差异,但是不同区域的人类不仅可以在不同的行星上生存,也可以在不同的太阳系内生存。我确信没有必要再详细描述这些事实了。大家都知道贫富差距的数据,有的国家的人大腹便便,而有的国家的人却忍饥挨饿。大家也都知道,在每一个国家内都有经济不平等——即便在美国也有穷人和营养不良的人——世界不同国家总体生活水平的差异令人惊愕。在印度,人均国民收入为 60 美元,而美国则是 2000 美元——这些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出版物。你们也不需要我告诉你们,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仍然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找到一种可以使人保持健康的食物。

而这些事实没有一个是刚刚出现的,当我们谈到这些时,无法避免会老生常谈,这正是联合国成立专门机构的原因。联合国粮农组织本身的起源可以上溯到罗斯福总统向世界发出的“为四个自由而奋斗”的号召,其中一个就是远离饥饿的自由。

尽管这些事实都不新,但也都没有过时,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据估算,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增长了 200 多美元,而欠发达国家整体的人均年收入由 50 年代初的 80 美元,增加到 50 年代末的 90 美元,10 年内仅仅增长了 10 美元。换句话说,富裕国家人民的平均收入增长数要高于欠发达国家人民的财富总量。两组人民收入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减,反而以更快的速度扩大。在过去的三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趋势得到了改善,实际上这个差距正在继续加大。

差距扩大的显著

我想强调这一点,因为它具有广泛的含义。因为人们已经觉悟到世界经济的不平等,因为很多国际机构的建立是为了改善这一情形,但是全世界贫富之

间的差距正在加剧。一个人越富有，他所积累的财富就越多，一个人越贫穷——忽略他自身的努力——他就越无法改变贫困的状况。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而不是一个世界中。

你们可能会说，我正在从对比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且重要的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均年收入有所增加，这令人感到满意。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辩解，随着很多贫穷国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那些微弱的“人均”增长抵消了大部分生产产出的增长。

我并不想低估这些进步，也想祝贺那些对这些进步作出贡献的人。这很好。但是，比起 1945 年，现在世界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平衡了，这仍然是一个事实。这一点很重要。经济萧条时期仍然出现小量的财富增长，它的重要性才凸现出来。

从技术的角度讲，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们和商品随着贸易和旅游——甚至发展本身——从富裕的地区到了贫穷的区域，这意味着我们处在一个贫穷世界的期望上涨的氛围中。什么样的生存条件是可行的，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现在已经大不同于几十年前封闭的村庄社会时人们的了解。那时候，人们极度贫困，而且普遍贫穷。人们没法期盼其他的事物，全部生活和文化都是为了和自然斗争以求生存。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更好的生存方式，而且跟他们一样的其他人已经获得了这种生存方式。一个母亲看到水龙头里流出干净的水这个奇迹，难道不想让她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也得到吗？自行车、鲜亮的衣服、教育、铝制厨具等这些别人拥有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诱发了人们对辛苦劳作却仍然贫穷这一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只有在能够改变贫穷的现状时，才是一种神圣的不满。

因此，毫无疑问，为了人类的尊严，为了和平与正义，必须消除世界经济不平等，人民大众必须从贫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我不相信这样的生存条件不能得到改善。我认为必须下定决心，客观地科学地改变、冲击这些问题。

世界能提供比人们需求更多的商品，欠发达国家自己也能生产更多的产品。事实上，欠发达国家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工人和土地的生产力低下。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是不发达国家时，我们的意思是，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人口来说要低。人们生产的不多，消费的也不多，两者不是像纯经济理论所表明的那样能够自动互换。

需要整体改变

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双重性的。首先,要增加人们需要的商品的产量和服务的产出。其次,增加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这意味着一种高质量且自由的生活。后者意味着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要么是生产者直接需要的,要么是必须通过交换系统,通过与生产者努力创造的财富等值的购买力再回到生产者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合理地组织市场,使农民以公平的价格卖出他们的产品,同样也能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他们需要的商品。

我想这么说是稳妥的,那就是,在任何欠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强烈、本质性的变革,就不会增加产出,也不会增加消费。例如,在坦噶尼喀(如果我从这个我最了解的国家中列举了太多的例子,请你们原谅我),几乎 97% 的人居住在农村,他们大多靠农业维持生计。因此,很明显,我们应该考虑增加农业产量。

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增加土地面积来达到增加农业产量的目的,更要改善我们的耕作方法,这在我们整个社会系统中有了不起的结果。农业耕作模式一直是文化的一部分,改变我们手中使用的工具,引进灌溉,甚至引进杂交种子,都会影响家庭间的相互依赖、整顿部落社会安全和对实践的传承。

同样的道理还适用于与乡村经济不同的国家级机构的引进。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传统关系被打乱了。

请不要误解我,如果我们想增加农业或工业产量,就必须做出这些变革。我想澄清的是,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这两件事相互关联,改变其中一个并不能获得整体的成功,除非同时也改变了另一个。正如农业变革会带来社会变革一样,社会变革也是农业变革的一个先决条件。好的饮食对于发展至关重要,同样,发展是获得好的饮食的关键所在,这一说法确实千真万确。

必须要规划好变革

变革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所以不能孤立地考虑任何一个单方面,这很容易做到。由不同部门组成的政府最难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协调合作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政府的每一个部都把其他部当成竞争对手,只有在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向它们让步或把它们号召起来,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忽视它们。我发

现在联合国的各个专门机构之间,这些专门机构和技术援助委员会之间也存在这种倾向。他们设立的多个办公机构经常在外人看来都互不关联,几乎没有工作接触!

变革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也意味着在我们实现任何特定的变革时,必须考虑到整体的影响。用来保证农业变革的方法以及选择的新技术都必须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

首先,变革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例如,在坦噶尼喀,我们要拒绝在农村出现等级制度,即便这能带来最大的总产量。我们应该放弃这种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法,因为它将背离我们追求所有人民幸福生活的变革整体目标。

其次,人民普遍持有什么样的文化态度?这些文化态度能马上改变多少?因此,如果一位专家制订了一个农场发展规划,但当地人对规划中所采用的技术反感,那么这个规划就是无效的,无论它对纯粹农场用地有多好。所有的规划必须要考虑到与之有最直接关联的人,而且规划所带来的文化变量不应超出人们的承受量。

第三,社会中有哪些可用的资源?在坦噶尼喀,一个要求一大批有技术、受过良好教育的农业工作者的计划不大可能派上用场,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些人,即便我们付出很大努力,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我们也不会有。事实上,变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使我们能够培训出这样的人。

然而,这些都不意味着可以缓慢地进行变革,或者人们的偏见和保守会不可避免地阻碍发展。这些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实之一——就是这样。

实现变革有很多方法。有时候,能够与过去完全断裂并引起接受新观点新技术的方法或新的农村规划会规避传统的态度。有时候,有必要采用一些代价高昂的措施,这些措施因其教育和社会价值,从经济上讲并不具有可行性。把大众成人教育运动当成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永远有必要,但成人教育的方式不应该全是面对黑板而坐或者捧着书本阅读。我想说,略过那一点,这个需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在考虑是否应当资助某一特定项目时,几乎任何一个组织或者投资者——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都没有把这个数额巨大但却至关重要的成人教育的费用考虑在内。

这是我讲的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一点。只有经过规划,才能在没有混乱和极度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实现我讲到的秩序变革。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天我们

都能看到提出国家发展计划的需要及其伴随的困难。这个计划可以是灵活的，但是它必须覆盖变革项目的各个方面，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

援助的重要性

然而，没有计划能够脱离人和钱这两个发展的基本要素。我们做出的每一项变革，哪怕是用犁和牛来代替原来的挖掘木棍，都要求资金的投入。每一项变革都需要有技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来做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而这都需要短期和长期的教育投资。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缺少所有这些供应。

当人均年收入少于 100 美元时，我们很难找到剩余的钱来用于未来投资。无论政府有多严厉，无论人民多有激情，这都是事实。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的供应是一个国家过去收入、政策和社会优先权的产物，所以没有几个欠发达国家能有大量受过培训的人才。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快速实现我们渴求的变革，就必须从国外获得人力和物力。如果我们能够在单一国度内实现国际税务平等再分配，以不会留下债务负担的拨款方式进行，那将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这种方法不可行，要求推迟偿还债务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然而，克服暂时性缺陷的这些方法没有我们有时想象的那么简单。独立后，我们很快发现，全球都存在对资金和技术人员的大量需求。我们也很快意识到，决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模式使得我们吸收国外资金的努力变得复杂。

一旦需要外来援助，你就无法避免在做出的决定中受到来自国家之外的影响。无论它的意图是什么，任何一个拥有有限资源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前进的道路。人们常说，政治是拥有优先权者的语言。因此，决定在这个区域而不是另一个区域资助项目就是政治决策，往往影响到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计划。

欠发达国家没有真正地抱怨过这一点；这也不代表着刻意去干涉，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影响会被外部援助和当地资源的不同配置所规避。但是，有时候，援助的类型或条件包含着更多意识形态的内容，然后我们不得不在接受有条件的援助和放慢经济发展进程这两者间做出抉择。这是因为我们期望国际机构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强加给我们这些条件就可以让我们得到援助。

不过我承认，有时候很难找到这么乐观的事情。就像我们从历史上归纳出的对国外投资的怀疑并不总是合理，所有国际组织会允许我们自由地制定自己

的发展体系这一假设也不总是合理的。例如，(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似乎在一项计划中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们的合作者应该是私人企业，最好是当地的私人企业，但在很多国家这都不会奏效。首先，我们并不奢望去创造出企业家这么一个阶层，尤其是现在我们没有一位企业家。第二，这往往要求私人投资者拥有无私的心态，这显然与他们的经济动机相矛盾。所有的私人投资者都质疑变革，他们的目的是赚钱，因此，他们不想依靠水晶球或者变戏法的巫术来了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未来。在变革激烈的时期，即便有可能，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欠发达国家对要求有私人资本参与的有条件的援助感到犹豫。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发现，如果通过国际机构的渠道，可以大大减少接受援助带来的政治问题。然而，这不是一个可以牺牲任何代价来换取的优先选择。一般情况下，捐赠者要么选择给予双边援助，要么就不给，但整体数额可能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因此，捐赠者和受益者双方都极其关注，通过国际途径的援助应该得到有效的管理，以便即刻达到最佳效果。如果组织机构想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我认为他们必须认真关注这一因素。管理和运行成本之间的关系、总部高收入人员的数量、在不舒适环境中工作的人员的数量与执行任务相关的服务条件等都必须接受常态性的审查。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重要性

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来说，国际组织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的成员身份不仅仅是一种独立国家才能做到的形式。我们感觉自己与这些国际组织的成功相关，而且这适用于我们参与的所有专门机构。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以保证我们一直追求的整体变革，我们也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对于像坦噶尼喀这样的农业国家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确站在了我们对抗贫困的前线。我们确实很想在经济中引入工业成分，但是我们也相信，强大的农业基础同样拥有优先发展权，因为农业发展需要低成本投入，这使得发展农业的难度要稍微小一些。

我可以确定地说，这个组织在过去的18年中一直做着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从整体上来说，也做得非常出色。研究、信息的整理和传播为不同国家带来了它们承受范围内的简单而不贵的技术，使这些国家取得了很大进步。这种全球发展观念在制订特殊的发展计划中具有极大的价值。所有的进步都来源

于当地人民、政府、外来人力和物力的共同努力。因此,不可能依据如下事实来评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职责,比如,印度的粮食产量在 10 年内增长了 46%,希腊和墨西哥的谷物产量几乎翻倍。事实上,国际组织的优点之一就是不会尝试去做这种评价。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国家刚开始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帮助中获得的利益可以判断出,联合国粮农组织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粮农组织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它是完美的,在如此盛大的讲坛上我也就无话可说。所以可能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领域。我打算分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谈谈你们在与贫穷作斗争中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努力增加农产品产量,另一方面是努力创造有序的国际市场。

在我们看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帮助我们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困难,在于它没有或不会意识到我们的起始水平有多低,所以在它提供的帮助和我们能够从中获利的能力之间,将长期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

坦噶尼喀在这方面的经验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所有欠发达国家,但这确实显示,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满足现存需求的灵活性方面还很欠缺。因此,当我们要求技术支持时,提供给我们的往往是高级专家咨询者,条件是我们必须提供一位对等的人来吸收提供给我们的高端智慧。问题是,除非在非常少有的特殊情况下,我们并不急需特别聪明的人才。我们急缺的是实践型人才,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可以一边培训我们的人民,一边和他们一起工作,而且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在我国政府的领导和控制下承担行政职责。世界知名的专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尴尬;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一个农业服务部有 46 位大学毕业生,雇用了 1900 名接受过一些培训的员工,但只有 2.5% 的人是当地人,而且他们都位于政治敏感的职位。结果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真正提供一位有效的高水平的相应人才。

当然,联合国粮农组织对此已经认可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培训。我们发现,这个组织以及每一个双边援助项目在给人们提供出国培训机会上都非常慷慨。不幸的是,我们又遇到同样的问题。这能够帮助我们国家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人才拓展视野,跟上最新发展,但是他们不可能经常接受这样的培训。我

们真正的需求是为农林助理员提供教育,农民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亲己咨询”。最好也最经济的方法是,在我们国内用我们的语言从他们已知的领域开始培训。

联合国粮农组织不擅长市场营销

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说到在增产事宜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工作做得不好。这不正确。我想努力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提出我的一些想法。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无疑将会有很多其他建设性的批评。

我想就联合国粮农组织职责的另外一些方面提出挑战,让其所有成员国重新进行思考。如果联合国粮农组织准备达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实现的增产就必须转化为欠发达国家购买力的增加。

联合国粮农组织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减少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混乱,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认为在这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打败了。因为在目前,无论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是其他任何国际组织,或者这些组织的联合体都没有能力处理这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能够消除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贫困。

这是一件很难开口而严肃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是认真检验任何国际市场问题后的必然结论。

我已经说过了,从本质上讲,增产和消费能力的增加都要有计划地进行,这一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仅仅增产几乎达不到什么效果,稳定和自信的市场才是必要的。用于交易的基础设施,如公共机构、道路、金融贷款等与旨在增加农业产出的设施同等重要。

在政策范围内,我们尝试着实现供应与市场需求的平衡,我们试着将现存的饥饿转化成对粮食的有效经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控制着货币和贷款,因为我们决定着产出的流向,因为我们能做到在农民要求高价和消费者要求低价之间达到平衡。

但是让我们比较一下国内和国际的现状吧。在我们国内,我们给予贫困农民一份保障,以对抗每天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我们鼓励并帮助他们与其他农民合作来组织他们的销售与购买行为,这样能防止他们遭受控制市场的富商的盘剥。通过营销局和合作社机制,通过对贸易和投资流向的审慎控制,我们努力

将产品放到一个价格对双方都公平的正确的位置。我们在做这些时,要满足以下条件,那就是让生产者可以规划未来,让国家从整体上规划发展项目,而这些项目都是消除贫穷不可缺少的。

国际市场的混乱

这种计划体系只有在政治团体中运作时才有效,而且组织越高效,效果也就越明显。这种计划体系能够通过预算和规划安排改善最贫困地区的状况,增加所有地区的财富。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却盛行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情形。

即使我们安排一个单独的出口机构来负责某种农作物或几种农作物的出口,每一个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还是像过去我们的农民独自与富商打交道一样无助。国家的贫穷让我们无法库存商品以待高价,而只能按照当天的价格进行交易——尽管在一个月后该产品的价格可能会大大提高。因此,每年年初,我们必然完全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期我们的购买力将如何。我们可能会知道我们能够有多少种植量,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种植量能让我们购买多少我们需要的商品。市场的需求或供给变化都会导致我们的发展计划降到荒谬的程度,但这些变化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甚至超出我们的预期。结果就造成我们内部计划混乱,完全毁灭我们为公平回报人民的辛勤劳作而做出的努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为某些产品制订了控制商品产销协定,来避免这一领域的混乱。然而,这些协定都是以限制产品的种植为代价的,但这些产品的种植对当事国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不管这些独立的商品协定有多好,它们都是孤立制订的,就像台风中一个毫不相干的平静岛屿,无法影响更深刻的基本问题。这一点存在于供应者和消费者处于不同经济实力和不同复杂程度的自由无序的市场,不同国家经济体增长数据的对比和战后国际贸易的经验,明显表现了现存系统对新水平有效要求的创造和分配产生的影响,或现存系统的缺乏。

战后国际贸易经验

尽管世界上存在巨大的饥饿问题——缺乏有营养的食物,贸易问题继续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占劣势的农产品生产者身上。这种情况唯一的例外就是战争时期或受到战争威胁时期。朝鲜“事件”对欠发达国家经济作出的贡献比他们十年努力作出的贡献还要大。但是之后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停战,购买

者决定使用累积的库存而不再购买，所以我们走到了一种极具讽刺的处境：两个欠发达国家同时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不同产品，双方却无力购买对方的产品，对此唯一的“突破市场”的方法似乎是战争的爆发，而战争可能会摧毁这两个国家！

同时，当我们将产品卖给发达国家时却会发现：他们或者保护本国行业不受所谓的“廉价劳动产品”的影响，或者生产比我们更便宜的产品，因为他们有密集的投资资本。我们的劳动之所以被称为“廉价劳动”，是因为我们无力投资，我们除了双手别无他法可以利用，而发达国家对此不感兴趣。我们停止“廉价劳动”的唯一方法是强大我们的经济，而发达国家对此也同样不感兴趣。

此外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因为内部分配原因，支付给本国农民的是一个价格，卖给世界市场时又是另一个更低的价格，甚至是赠给他们。单独来讲，我们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这些礼物。事实上，我自己的国家对此非常感激，因为我们农作物的歉收，人民经历了两年的饥荒。但是，这种影响可能会给贫困国家之间建立新贸易模式的努力带来灾难性的损害，毕竟新贸易模式的建立可以增加它们的整体财富。国家控制下的库存的存在意味着，当不发达国家有能力在现存市场上提供价格公平的物资时，发达国家库存的开放可以在任何时候使得我们接受的价格变得完全不合算。

这些问题都不能一件件地单独得到解决。这涉及国际货币流动性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有效的且不断增长的世界供应的有序市场相关因素。如果每一个问题都要在几十个国家之间进行协商，那么这些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协商时总是要达到一致才行。我们都知道，无论我们参与了何种讨论，一个大量库存某种商品的国家，或者控制着大部分供应或有效需求的国家，如果想要有所获得，就必须同意最终做出的决定。这样的国家——事实上都是些富裕的国家——因此决定了结果：他们在一个案件中扮演着诉讼当事人和法官的双重角色。“自由的国际市场”必然无法避免地成为一个弱国败北的竞技场。

需要一个世界性的规划

这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新发现。在世界各地都是成功孕育成功，发展吸引发展，效率使培训成为可能同时又产生更高的效率，如此等等。几乎很多国家都把这当成是自己国家的内部事务。他们承认，本国部分区域的发展是以牺牲

其他区域的发展为代价的。一旦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内的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共存无法令人接受,就会开始采取措施慎重地纠正由于“市场的自由运营”导致的不平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美国的田纳西流域开发、英国的“开发区”以及意大利南部的政府投资区。

然而,从国际上来讲,对贫富共存在理论上的排斥带来了“援助”——富裕区域对贫穷区域的无偿赠予。这样我们不得不用我们微不足道的努力,来对抗世界投资和贸易的整体趋势。

在这个基础上,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必将扩大。我们得到的“援助”的影响力能够——而且经常能够——被某一原材料边缘化的价格变化所消除。如果我们不做出国际和国内发展规划和贸易计划,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

我们的政策本身促成了混乱

我们别无选择地要真正建设性地消除世界贫困,并希望取得快速成功。然而,此刻包括我的祖国在内的很多欠发达国家,正在扩大贫富差距。我们这么做,是因为事实上我们似乎接受了“同一个世界”这一信条,而且我们赞同多边自由贸易理论,只保留了较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收入。

例如,作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我们不能歧视其他的供应商而支持其他欠发达国家。我们可以自由兑换货币,这意味着我们发展的倍数效应不仅溢出了国家,而且多数情况下进入了那些不需要它的人的口袋中。我们接受“有条件的贷款”——通常被称作“援助”——有时候强迫我们在昂贵的市场上购买产品,还要支付利息。另外,我们允许进口各种大量密集广告宣传说服人们去购买奢侈品。

能够支持孤立考虑的这些政策的东西有很多,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决定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结果是,从经济层面看来,我们以及和我们类似的国家似乎与各个国家是平等的。我们这些贫穷国家(不管我们的发展潜力如何,现在我们是贫穷的)一方面向富国乞求,同时也与他们竞争,以求获得资本和技术人才方面的投资,并为不同技术水平生产的商品寻求市场。在此基础上,我们之间的悬殊一定会进一步加大,就像动物中挨饿的总是最弱小的幼崽一样。

作为理性的人,在控制我们自己的命运时,很明显欠发达国家不会允许当前的情形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要么我们和大家一起向前发展,参加世界经济发展计划,要么我们将不得不暂时后退几步,回到我们的经济孤立主义。当弱肉强食的法则占主导地位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于兽类来说,可能完全适用,但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方式,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但是,一旦这种生存法则开始盛行,弱者就应当谨慎地与强者保持相当的距离。

要做出何种选择很明显。要么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全世界具体地域的贫困问题得到科学的解决,要么我们承认同时存在富裕世界和贫困世界。若是选择后者,我们就要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免于受到另一方的统治。

孤立政策的替代选择

很明显,孤立的贫穷国家要实现经济突破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订一个简单的经济计划,正如整体世界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如果没有一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计划,就要有一个适用于贫穷世界的计划,但不受控制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奢侈是不值得讨论的。只要不是建立在富人采取和接受的交易媒介(即货币、支票等)基础上,贫困国家之间在任何地方都会有贸易和发展活动。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消除贫困的世界性的方案,可以在世界上创造出一个只包括不发达国家的独立的经济团体,而且这个团体应该有它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并由它自己管理的贷款来支持。这个团体和其他组织的联系应该降到最少,应当得到仔细审慎的管理。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强大起来,直至我们有能力平等地参与竞争。

然而,从世界经济规划的角度来谈,这是不现实的;期待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能够看到,他们自身内部的长期利益依赖于他们对富国的一致抵抗,这也是不现实的。但长远来看,一个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货币、贷款、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贫困地区,仍然能够从远离其他国家的措施中获益。

无论如何,就算在现存的国家外都实现不了,我们也没有理由接受这种弱肉强食的国际准则限制。如果我们出口的商品无人有力购买,那我们只能回家跟自己人进行易货交易。通过互相包容,我们将继续生存并实现繁荣。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产品买到我们心中想要的东西,但也不会腐烂在地上,还能给我们或者其他人带来利益。即使是仅限于贫穷国家

的完全独立的自由市场,对我们产生的益处也远远好过完全依赖现存的体制,因为在现存的体制中,贫穷国家听任富裕国家的摆布。这个有限的未规划的市场的混乱,至少意味着穷国不会帮助把富国养肥。“极度贫困”和“不是很穷”的国家之间的不利条件,至少会缩小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距,而不是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距。

孤立主义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难题的一个令人沮丧的药方。我不是在幻想我提出的那几种后退措施带来的困难或不愉快,因为这些都要求严格控制出口和进口的数量、来源与目的地。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活动进行控制,而我们因为条件不成熟无法做到这些,因此不可避免地会给我们区域内人民的个人自由带来影响。

如果我们被迫做出孤立政策——无论经济单位有多大,在很多方面,发展的任务将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它肯定会要求当代人做出更多的牺牲。事实上,面对困难时获得积极合作的代价,就是要故意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来对抗少数富裕国家,以谋求发展。

但是,必须要付出这些代价,因为通过孤立我们自己,我们最终会取得成功。通过实行如此冷酷的政策,我们将最终打败压迫我们的客观存在的贫困和相对贫穷。当前“援助”和“国际自由竞争”的继续无法做到这一点。

作为慈善机构的联合国粮农组织

因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是一个慈善机构,所以,我之前说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没有能力处理世界贫困这一基本问题。将产量的增加转换为消费能力的增长,超出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能力范围。联合国粮农组织是现存制度的产物,因此它的工作对这些问题只有最边缘的影响力,而且那些已有的改善也随时有可能被“市场的力量”消除。联合国粮农组织必须有能力规划世界粮食和农业的生产和市场,或者保持现状——仅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存在。

我不想谴责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一个慈善机构的这种功能,因为有贫困的地方就有慈善。“贸易而非援助”是我们的目标,但同时,“援助”对于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外界如何变化,旨在帮助我们的慈善是无价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制订的世界粮食计划、派给我们的每一位专家和每一条有用的信息,都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说都是无价的。基于这个原因,无论现在还是将

来,我们都会继续支持这个机构以及联合国的其他专门机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联合国粮农组织建立之初的目标远不止如此,应该是“改善农村人口条件”以“致力于世界经济发展”。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它无法履行更多的职责来对抗贫穷这场战争。

这等同于说,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在帮助不发达国家,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我已经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使这个机构更有效工作的建设性意见,但我要说,在成为一个世界型粮食和农业规划的政策决策机构——成为整个世界的粮食和农业主管部门之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无法实现它的目标。

总结

我知道,对这个建议的简短回答就是,这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的机构是无法建成的。这可能是真的。我的观点是,我们甚至还没有尝试去建立这样的机构,而且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替代措施,在世界三分之二的地区与贫穷作斗争。

我们这群意识到自己贫穷问题的人,无法接受目前混乱的延续,无法接受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发展态势。因此,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一个方案就是接受经济不平等的现状,采取故意孤立政策,同时使我们自己日益强大起来。

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一个实际意义的简单解决方案。可能我们对其他国家的需要,多于他们对我们的需要,尽管我们有一些他们想要的资源。如果我们能够进口资本和技术人才,无疑我们的经济发展将会更快,痛苦更少,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真正的问题是,外来援助或者外来投资能否帮助我们建设经济,或者它的影响力是否会被未经谋划的国际市场运作所消除。

每一个不发达国家都像是一个渴望组建一支船队的人。首先,他先建造一艘划艇。他努力划行,载人过河,直到他赚够足够的钱来建造一艘沿海贸易大船。随着他的沿海贸易船的收益渐长,他可以建造越来越多的远洋船只。然而,如果他试着直接把划艇划到大海里,划艇肯定会沉没,那么他将重回创业的起点。如果他的沿海贸易船没能逃过风暴而沉船,那么他将返回到划艇阶段。只有当他建立起一支船队时,才敢将船只开到飓风区。

在有能像抵抗飓风的远洋航行船之前,欠发达国家经济体不能冒险进入未

规划好的国际市场的风暴中去。如果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接受合适的援助,可以迅速成为能抵御飓风的远洋船。但是,在此之前——先不说能不能获得援助——如果国际市场这片海洋无法通过国际规划而获得平静,那么我们必须从中撤退,同时我们要建立足够强大的经济体以抵抗“自由市场”不可预料的厄运。

尊敬的主席先生,我相信我可以用工会的措辞来总结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目标:从公平的工作中获得公平的工作条件和公平的收入。人民愿意并渴望能够公平工作,人民代表的职责是保证人民得到公平的工作条件和公平的收入。为达到这个目标,再多的牺牲也不为过。我们欢迎朋友们加入我们的战斗,我们感谢那些在奋斗的过程中帮助我们的人,但无论是独自应战还是并肩作战,我们都必将为繁荣而奋斗。

53 国庆广播讲话：1963年12月9日

在国庆日或者新年的时候，总统保持着一种习惯，就是对全国人民过去经历的进步与苦难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做一个极其真实的报告。1963年12月9日的国庆广播讲话，就是总统决心通过说教来践行领导职责的实例。

去年对于我们坦噶尼喀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所以我们应当对过去发生的事进行反思，并思索这些事情对我们获取独立以来的第三个年头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几年来，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的姿态，将关系到我们的后代将传承一个怎样的社会。因此，放慢脚步并对现实问题进行短暂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现在的作为将会成为未来的传统，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应对外来事件的姿态会形成一种既定模式，这种模式或许很难被我们的子孙后代打破。因此，作为坦噶尼喀共和国的第一代公民，我们的责任重大。

从很多角度来看，1963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向非洲统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当然，尽管已经建立起非洲统一组织，这次会面没有促成非洲统一，但这依然是重中之重的第一步。亚的斯亚贝巴会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在应对我们与非洲姊妹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出现的争端时，非洲统一组织的及时应对措施，也与这次会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此同时，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为以后建设性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成立了非洲解放运动协调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协助非洲大陆上的自由运动。然而在这次反殖民斗争中，真正的困难在等待我们……

在今年过半时，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在11月时，我们不仅可以庆祝东非殖民统治的完结，同样也是东非统一的开端。1963年6月，我同肯雅塔先生和奥博特先生在内罗毕会面时宣称，应该建立一个东非联邦。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或

许是这一年最大的遗憾。

如同其他统一运动一样，在我们的斗争中也存在许多艰难险阻，我认为必须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三国的宪法差异很大，历史传承中遗留殖民主义的阴影，三个国家有不同的经济状况，而且我们已成为主权国家是既成事实。这些因素必定会使快速建立联邦政府增加难度。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商榷如何更好使这三个国家结成联邦，形成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在了解那些确实存在的困难时，我们必须抵抗来自东非以外的主张。我们已经听到一些奇怪的传言，认为东非继续分裂会有益于非洲统一；还有人认为现在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联邦——像尼日利亚——就符合《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精神，但是像东非一样的新联邦却违反宪章。

这些说法都在企图给谬论找到正当借口。

在我们通往非洲统一的道路上，必须面对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那就是这里的统一对一些国家来说意味着放弃主权，对另外一些独立领导人来说意味着放弃最高职位。我们应当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以非洲统一之名做出让步的举动。

然而，不论是非洲大陆上的哪位领导人，如果愿意用放弃主权来证明他们的让步——而不是通过文件或讲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做出这个证明。而我们也义务鼓励这种行为。

我说出的这些话是发自肺腑的。我们坦噶尼喀上下都提倡统一。我们不会借非洲统一之名做任何有悖于统一的举动，不会对姊妹国家制造猜忌与争端。

尽管我们建立联邦之势有所回落，我们也不该磨灭对统一的信心。我知道我们的人民有足够的力量，将失败化作胜利之母。我们国内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1961年11月，我们在第一次庆祝独立时，正值粮食饥荒，国内近50万人遭受饥饿之苦。第二年的情况也不乐观，洪水和虫害让农民们的辛苦劳作付诸东流。然而坦噶尼喀人民并没有被打败，反而将这当作挑战来应对。1963年，农作物面积大幅增长，粮食收成非常乐观。不仅如此，成千上万人民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苦劳作，还投身于国家的建设计划。现在遍布全国都有了以前没有的公路、诊所、住房、学校和其他设施，如果没有坦噶尼喀人民不求回报的劳

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我对全国考察的过程中，收到了来自各位部长和各级官员的报告，我了解到人民对这些劳动的巨大投入。在此我要表扬那些为国家建设付出努力的人民。这是我们的前进之路。

为了让以后的工作更有成效，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吸取教训。现在已经完成的国家建设多亏了人民空前的投入，虽然这些并没有包含在三年国家发展计划之中。因此，一些城镇建成了学校，却没有专业的教师；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工程师建桥，一些公路被修得没头没尾。这些都让人民的努力成了白费功，在以后的工作中，政府会竭力避免这一点。

为了实现这一点，许多听众们都参与了将于1964年颁布的《国家发展规划》，将会把所有建设方案综合起来，并成为《规划》的一部分。对于民众自愿建设的工程，必要的后续工作会及时到位。例如，假如一个地区按计划修建学校、公路、水坝或其他设施，人们将会分工有序地工作。我相信，较之过去，在了解自己的努力会得到明确成果——并用来造福自己的情况下，会唤起民众的更大热情。

这并不是说，除了特定的需求，住在村子里的居民就无事可做。我们的人民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团结起来做很多事情，比如维护村子环境的整洁，为年老体弱者建造房屋等。我想要表达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义务劳动者需要借助村子之外的力量来使自己的劳动有效，我们都会尽量满足，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的政府也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吸取了教训。那就是人们需要更好的工具来提高工作效率。我们正在解决工程中需要的工具问题……

说了这么多，我不想让大家曲解我的意思。18个月来，大家努力的成果是巨大的。

在工作中，人们利用自己的工具，甚至徒手上阵，为我们的国库增加了数百万先令的财富。在国家建设中，这笔钱被节省下来了，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国家建设的工程都是需要进行的，否则就不可能完成。所以说这笔钱是为国库增加了财富，而不是节省。

我们建立了属于人民自己的市场营销机构——合作社和法定委员会。这非常正确，在未来，这些机构会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试图一次给他们太多的

任务,结果在有些地方人们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自己的粮食,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为了让人民得到更好的服务、更好地实现粮食的价值,我们建立了这些合作社和国家市场设施。如果没有足够的仓库处理交易的粮食,或者缺少足够的经过培训的人手管理财务的情况,合作社的运行情况恐怕不容乐观。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明年我们将推动合作社合并,并提高他们的运行效率。不论在培训方面还是储备设施方面,政府将会尽可能多地提供帮助。

我今天想说的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拖拉机的问题……如果人们想继续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用牛拉犁代替使用锄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对大型合作农场企业来说,拖拉机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我们希望在1964年发起的新村庄建设运动。

这都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吸取了过去两年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尽管出现了很多不可避免的失误,我相信有更多的东西会使我们骄傲。我提到的国家建设计划工程,包括全国青年服务队的成立,在建立大学学院等高等学府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新开垦的土地,成果之多不胜枚举。但是还有一个更加值得骄傲的重要事实,那就是我们国家整体的觉悟提高。两年前,我们还在为国家取得的独立成果而欢呼雀跃,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全国上下都意识到,那只是一个开始。两年来,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悉心规划,创造我们的未来之路。1964年间,我们在实行国家发展计划的基础上,还要推行有秩序的发展。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实行,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收到劳动成果。五年的确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的人民,你们有能力创造奇迹。你们为摆脱贫困而奋斗,你们为达成胜利而不懈努力,你们得到了应有的收获。

在结束之前,我还想暂时把视角转向国际环境。我们都知道,只有在世界和平的前提下,我们的规划才能顺利实行。坦噶尼喀向美国及其他一些地区派去代表,尽可能多地帮我们取得和平援助。我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1963年来,强权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核战争的威胁也随之减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我们希望这种局面可以持续并增强。

坦噶尼喀自身是一个小国,我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我相信,建立和平来取代僵持对峙的世界和平局面,我们也可以助一臂之力。当然前提是我们

必须首先在国内贯彻实行这一原则，用和平取代对峙。我坚信我们可以做到，而且一定能做好。

去年，这个世界失去了两位伟人，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和赞扬。愿他们安息。一位是多哥的奥林匹欧总统^①，他曾与我们一起欢庆独立运动取得的成果。作为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前往统一的路上，他还为解决我们历史遗留的殖民地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位是上个月遇刺的肯尼迪总统，他在人类平等和尊严上诚挚、坚定的信仰，带给非洲及其他地区成千上百万人民以希望。我认为缅怀逝者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他们生前的心血，继续奉献给人类事业。

在结束之际，我想对出于人类高尚品格，参与坦噶尼喀国家建设的人民报以诚挚的感谢。另外，我代表全国人民，对肯尼亚和桑给巴尔的欢庆周以特别问候；我们以手足情谊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感谢独立带给我们这份喜悦。

愿自由与统一永恒！

① 斯尔法纳斯·奥林匹欧(1902—1963)，多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和国家首任总统，在1963年1月军事政变中被枪杀。——译校注

54 坦噶尼喀的公民身份

1964年1月7日,坦噶尼喀总统颁布了供各部和公共团体传阅的下列政策,同时也传给了新闻媒体。

1961年12月9日,坦噶尼喀宣布独立。坦噶尼喀的广大民众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公民;坦噶尼喀的公民身份成为一个合法事实。然而对一部分人来说,成为坦噶尼喀的公民意味着放弃另一个地区的公民身份,这一部分人有两年的时间来做出决定。

现在限期已满。1963年12月9日开始,我们可以通过出身确定每位公民的身份。基于这个记录,所有人都要提出申请,我们将视个人价值决定接受或驳回申请。过渡期已经结束,是否具有公民身份已经不应该再存争议。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确信作为坦噶尼喀共和国公民的一员是非常荣耀的;这对我们意义重大,使我们随时可以为了国家需要而做出牺牲。不管在什么地方、处于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名坦噶尼喀公民”。

作为坦噶尼喀公民的自豪感已经得到具体体现。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坦噶尼喀这几个字意味着某些价值,我们也开始受到尊重。这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不断追求,最重要的是我们抛开了肤色、种族和信仰,对人类平等价值的不断追求,正是对这种价值观念的追求,为我们赢得了尊重。

两年前,我们确实在行政事务中表现出了“种族歧视”。不论是招聘还是提升,与坦噶尼喀公民相比较,我们总是优先考虑有非洲血统的坦噶尼喀公民。我们已经充分解释过这样做的原因,对当时的情况来说,这种做法十分有益。为了消除过去种族歧视对非洲血统公民的影响,我们便实行了这种“地方性变通”。当然,当时对许多非非洲血统却为国家效力的公民并没有做出充分解释。

需要对原则妥协的时期已经结束,1961年的原因对1964年已不再适用。

最重要的是,是否是坦噶尼喀共和国的公民已经无须疑问。

坦噶尼喀共和国公民与非公民民众,我们必然要区别对待。但是出于某些原因,对坦噶尼喀公民和为坦噶尼喀做出特殊贡献的民众有所区别是不被允许的,我们绝不允许公民有阶级差异。作为坦噶尼喀公民,每个人行使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每位坦噶尼喀公民都受同样法律的制约,热爱祖国,奉献国家,尊重同胞,享有平等的生存权。超出这些范围的行为就是我们无法认可的矫揉造作。

区别对待非洲血统公民与非非洲血统公民的行为必须结束。

这意味着不论是在招聘、培训还是提升方面,存在于行政部门的雇佣过程中的歧视必须马上停止,一些关于解决歧视方面问题的法律和制度的立案也会被作为紧急事务提上日程。从现在开始,我们唯一承认的区别就是是否具有坦噶尼喀公民身份。

这是一个关乎是否诚信的问题,是一个关乎在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是否有尊严的生活的问题。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所谓的“为了不论棕色还是白色肤色的人民”,而是为了坦噶尼喀人民。对坦噶尼喀公民来说,我们这样做是必须的——不论他们身在家乡还是漂泊在外,都可以不加掩饰、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

我列出了取消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因,让坦噶尼喀的每一位政府官员、每一位公民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了关乎我们的尊严,这样做还会带来一个眼前利益。

《五年发展计划》现在已进入后期的准备工作。这个计划现实可行,同时又充满挑战性,毫无疑问,这个计划需要许多富有技术和经验的人来帮助实施。如果不让坦噶尼喀公民来参与发展计划的实施,将会显得非常荒谬可笑。不论什么肤色,我们必须利用这个国家人才的技术和经验宝库。关于技术支持问题的其他态度,将对与我们未来息息相关的发展计划的成功实施造成不良影响。怀疑我们坦噶尼喀自己的公民是否有能力致力于国家建设,而去求助其他人,这无疑会加重我们对自己的羞辱。

不论是出于原则问题的考虑还是出于现实问题的考虑,对坦噶尼喀公民的歧视传统必须根除。关于这个问题,不允许有任何回避搪塞。我们作为公民——作为坦噶尼喀公民的职责和传统已经非常明确。

55 一党制国家委员会指导意见

1963年1月,坦盟国家执行委员会通过修改坦噶尼喀宪法的决议,决定将坦噶尼喀为一党制国家的既成事实载入宪法。总统有权任命一个总统委员会来执行这项决议。

在东非联邦有望成立之时,委员会的正式任命被推迟了,因为宪法的任何变更都可能使推行一党制的争议变得更加复杂。1964年1月,总统签署文件,批准委员会开始运作,这些文件不仅扩大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也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一些指导。1955年^①3月的《委员会报告》发表了总统首次宣布成立委员会的声明及相关文件。下文摘选自任命声明:

……我认为,一党执政国家可以采取多种管理形式,一些形式较好,一些形式稍有逊色。委员会的任务是向我报告坦噶尼喀应当采取哪种国家管理模式,所以委员会不仅要考虑到共和制政体,还要考虑到坦盟的相关法律以及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种各样的行政条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委员会进行商讨审查期间,我已告诫委员会成员要遵守下列原则:

- (1) 坦噶尼喀应保留共和制政体,国家元首拥有行政权;
- (2) 强调依法治理国家,保留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 (3) 坦噶尼喀公民人人平等;
- (4) 在民族运动中,人人享有最大程度的政治自由;
- (5) 关于政府事务,人民享有最大的参与权,在普遍参政的基础上,人民享有对国家各机构的最终控制权;

^① 应为1965年。——译校注

(6) 法治社会下,人民拥有选举众议院成员和立法机关成员的绝对自由权,这些成员也将代表公民自身的利益。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商讨坦噶尼喀是否应该采取一党执政的形式。我们已经决定要建立一党制国家,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我们如何使一党制的执政形式在整个国家运作起来,使之符合国家伦理,也同委员会该遵守的上述原则一致。

国家伦理

一些涉及坦噶尼喀民族事务的伦理原则和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的伦理原则需要快速落实。

1. 坦噶尼喀人人平等,人人有权维护尊严不受侵犯。
 2. 任何一位坦噶尼喀公民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公民都享有参与地方政府、地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事务的权利。
 3. 任何一位坦噶尼喀公民都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范围内的参与社会团体的自由。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证人人享有自由权。
 4. 任何一位坦噶尼喀公民有权要求社会保护其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有权拒绝暴力逮捕。每位公民也应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支持法律,维护法律的强制力。
 5. 在坦噶尼喀,无论公民付出的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有权享有劳动回报。
 6. 为了子孙后代,国家自然资源归全体公民所有,任何个人、家庭、组织团体都无权拥有自然资源的永久所有权。
 7. 人民有责任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确保坦噶尼喀人民生活幸福,任何人不得在人人平等的社会环境下对他人进行剥削或进行财富积累。
 8. 坦噶尼喀坚定不移地反对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团体和团体之间的剥削。因此,为了人类平等和自由,国家有责任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并同其斗争,国家也有责任为非洲统一而战,为世界和平和民族间的合作而战。
- 坚持这些原则的同时,坦噶尼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也需要得到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比如:

(1) 政府的目的是为在各个领域工作的坦噶尼喀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为公民创造良好的环境。

(2) 坦噶尼喀不会因公民的种族、部落、肤色、性别、信仰和宗教问题产生歧视。现在,政府和其他掌权机构应采取措施,努力纠正过去因种族、部落、性别和宗教不同而产生的歧视,政府应努力营造出对所有公民都平等相待的社会环境。

(3) 坦噶尼喀不会宣扬仇恨和憎恶,也不会有任何政策让人产生一种对种族、部落、性别和宗教不敬的感觉。

(4) 坦噶尼喀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即使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享有较高地位的人也没有法律豁免权。

(5) 任何公民都有权获得公正的司法机构公平审判的权利,司法机构有责任拥护根据宪法制定的各项法律。

(6) 任何公民都有义务按照法律要求参加工作,凭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作出贡献。

(7) 坦噶尼喀政府有义务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让人民生活富足安康,让国家和平安定,也更有义务建立一个平等无歧视的社会。

(8) 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也有义务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非洲统一,在人人平等、亲如兄弟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委员会的工作指南

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人民的意志享有最高地位,因此委员会需要考虑下列问题:

1. 一党制国家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必须是能够代表一党制国家人民意志的机构。

2. 只要拥有坦噶尼喀公民身份,虽然人们持不同政见,各自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但这些并不是入党的障碍,人人有权入党,这对维护公民的自由权是否至关重要?

3. 议会和坦盟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应继续存在吗? 如果存在,二者之间有何关联,又如何进行权力的分工? 有建立一个坦盟的地区委员会和地区议会的必要吗? 如果有必要,二者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4. (1) 坦噶尼喀通过哪个政府组织形成国家政策？

(2) 人民通过哪个政府组织表达自己的意愿？

(3) 哪个组织能够通过和平方式给国家带来改变？

(4) 哪个组织处理官员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

5. 公民要成为立法机构成员和其他政策制定机构成员应该具备资格吗？如果需要，这些资格是什么，又由谁来决定哪些具备资格的人可以进入立法机构或其他机构？

6. 如果人民要自由选择能代表他们意志的人，但这些人不具备国家规定的资格，那政府应该如何为中央立法机构或地方政府机构选拔人员？尤其是面对下列问题时：

(1)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选举，进入中央立法机构或其他政策制定机构代表人民意志吗？

(2) 如果不是，选举标准和流程是什么，如何限制参与选举的人数，谁会服从人民意志——谨记我们需要确保人民充分享有知情权，并根据人民意志做出决定，人民有权在有资格的人中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志的人。

(3) 如果人民可以自由选举代表，那么需要什么程序来保证选举的公正？

7. 为确保人民自由选举总统和立法代表，选举共和国总统的程序需要做出哪些改变？这些改变必须使总统和立法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最小化。

8. 政府和立法机构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尤其要注意：

(1) 政府通过何种方式可为其重要措施获得支持，且不涉及政党分赃制？

(2) 国家运用哪种体制来约束总统和政党领导人的权力？——① 同政府成员有关的体制；② 同立法机构成员有关的体制。

(3) 是否要限制既供职于政府也供职于立法机构，并且领取薪酬的工作人员的数量？

9. 如果有限制，那对在政治机构、立法机构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公务员会有什么样的限制？

10. 如何确保公众为了自身的特别目的有组织地向政府施压的自由？

11. 工会和其他专门机构在制定政府政策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委员会也应该考虑其他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稳定的一党制国家有关的问题……

56 和解的勇气：纪念达格·哈马舍尔德^①的演讲

此演讲是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组织的一系列纪念达格演讲中的一篇，随后发表于《寻求和平》上。这篇演讲地点是在达累斯萨拉姆市政厅，是在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赞助下进行的。

实际上，本演讲发表于坦噶尼喀的“一月兵变”后的第三天。当总统抵达礼堂时，听众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为了建立法律与秩序所做的努力深表认同，并且对于他的个人安全感到欣慰，热烈欢迎的掌声持续了五分钟。尽管民众对总统表示支持，但首都的局势仍旧十分紧张。总统别无选择，只好恳请英国军队前来镇压武装叛军。

主席先生、尊敬的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从世界的观点来看，关于已故联合国秘书长重要的一点是他致力的事業，正是这一点使得他成为一个伟人，使他受到人民爱戴，也受到人的记恨——这使他在非洲的殒命成为全人类的一个悲剧。

哈马舍尔德的名字与许多事件相关，与许多历史细节息息相关。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概括起来说就是寻求世界的和平。他认识到，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以获得这样的和平，那就是要学会让步、相互容忍、献身于人类平等和相互友爱。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加倍努力去改善这些外部条件，并争取宝贵时间使这些条件生效——这是同等重要的。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将那些小冲突化解在演变为军事冲突之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的社会。他相信，只有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对人类社会的不断威胁才会消失。

^① 1905—1961年，瑞典人，1953年4月起任联合国秘书长，直到1961年9月在刚果（金）从事和平任务时飞机失事殉难。——译校注

需要法律和权威

和解和建设的需要产生于人类社会固有的基本冲突。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社区内,就被赋予许多的机会来提高他的幸福生活水平,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一个人只有在与同伴的相互配合下才能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同时,这样的合作也限制了他的自由,因为他再也不能按照自身的意愿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通过两个人的相互合作,他们可以完成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比如砍倒一棵树并且把它运输到一个地方,通过合作他们可以把木材打造成一艘能坐两个人的独木舟,这艘独木舟能够航行到单人独木舟无法到达的地方。双方的合作可以大大提升他们的出行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他们自身的自由性。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对于圆木来说独一无二的归属感。例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失去了把原木用来建造房子的权利,或者是用木头烧火的权利。一旦由于他们双方的力量把原木制成独木舟,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独木舟用作自己一个人来钓鱼的工具,也不能把它用来作为交换其他东西的工具。他们合作的努力扩大了他们的自由,同时也埋下了双方冲突的隐患,而这样的冲突假如在两个人单独做自己的独木舟时是不会存在的。

合作和冲突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它们的起源都是人与其同伴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类的群体越大,他们之间的合作发展机会就会越大,而冲突的机率也越大。两个人相互合作制造一条独木舟并一起捕鱼,他们之间的和平至关重要,但是也会因为他们的相互合作,会有产生冲突的危险。

正是法律和权威才能改变这一状况——受到冲突威胁的合作——并把这一状况变成扩大人类发展的条件。只有建立并实施一系列规则来规范人们之间的行为,才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法律就是规范人民行为方式的规则,当然可以使用暴力来实施这些规则,这样人民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法规,因为他们害怕违背这些规则会受到惩罚。这样在一定的时间里能够带来和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民共同遵守着框架内的规则,但没有彼此争斗。无论社会的大小贫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充满了此类法律的例证,但是强权法律带来的和平不会长久,因为当有人感觉到他的力量可以强大到废黜现行法律,并且用他所理想的代替品去取代现行法

律时,和平将不复存在。或者他觉得现行的法律对他生活或他的家庭生活造成极大威胁时,甚至他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来换取他的自由及人权时,他会完全绝望地打破现有的法律。

唯一能够维持持久和平的法律制度就是建立在广大民众基础之上的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并且这项制度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解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法律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外部环境与科技的变化,甚至人之间要求接触还是孤立的变化,都会引起法律的变革,最后可能会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要保证社会和平需要三项必不可少的事情,第一是这项法律制度必须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平等人权;第二,这项法律制度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受受保护的权力、履行应尽的义务;第三,这项法律制度在全体人民的同意下可以进行变革。

有了这三条就足够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不同的身体、精神、道德水准,但是这一事实并不允许任何社会因为认为它的公民可以就法律方面互相分离而免责。因为不管受到歧视的群体有多小,他们的存在对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威胁,无论这些理由的根据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被故意排除在法律的利益之外,那么和别人相比,他就不会在意维护社会及社会和平,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对其他社会成员有危害的人,其他人试图对他攻击,反过来也会影响他们。因为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他别无选择,只有在机会来临时对社会、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报复。事实上,不平等存在于每一个可以看到的方面,这样人与人之间才可以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和平。

但是脱离了法律的和平是不存在的,同样法律失去中央集权的保障也不存在。在一个小的社区里,可能不用去明文规定法律,并且可能没有正式的规定来实施法律,但是能够保持这个社区内的和平,正是由于人们都知道这些约束并口口相传,因为可以凭借公众的观点或遭受惩罚来得以实施。如果没有实施法律的途径,那么对一个人获取个人好处的诱惑力就越大,就不能使法律得以实施。每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会要求获得别人的帮助,来满足他与别人和平相处这一基本的需要,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强制机构。那些不能强制实施的法律注定只会变成为人民画的一个不能充饥的饼。因此,在每个社会都需要实现一种平衡,那就是既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稳定,同时使用国家强制力使人民为自己的决定付出社会代价。

如果法律希望带来永久的和平,就必须不偏不倚,所以说法律的强制力也必须公正。在执行法律时,参与法律的执行者不能牵扯进法律的执行中去,这一点十分必要,因为在有些冲突中这些人也会变为参与者。因此,必须要有一方人民都认同的外部机构,该机构愿意而且能够公平处理人民之间的问题。

不同组织间的接触

一旦家庭或者组织在法律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起一种令人满意的内部合作关系,他们与其他人的接触就成为了一种崭新的形式。他们自己的社会与外部单位相比就成为一个单元,人类联系的所有混乱在社会之间的联系中就会出现新的形态,从而在这个单元中出现多重成员关系这一新的问题。但是,原则同样地适用,在过去非洲社会谈之色变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即不同社会之间的战争),现在被包含不同部落的所有成员的法律体系和权威所取代。不同部落之间成员的接触产生的冲突还没有完全结束,原先从个人转移到部落单元的主权现在被转移到了更大的一个组织——国家,而正是这个事实使得我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和平。

现代所有民族国家都是从这样一些小的、可能不断冲突的人的群体发展而来的,他们都发展了自己不同的武力与协定的统一形式,但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而这些主权正是每个人在加入这个社会时牺牲的个人的权利。

因此,国家成为与世界产生联系的基本单位,就像个人是村社的基本单位,村社是部落的基本单位,部落是国家的基本单位一样。同样,希望与其他单位紧密联系,但又不想失去独立行动的自由这样的对立分歧就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只是演变成为互相合作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民族国家是一个中间阶段

这些民族国家本身都是一些综合的个体,在它们内部存在很大的人类合作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社会的成员。就像冰川缓慢下降到海平面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一样,自从世界开始以来,向着更大的人类交流和团结的趋势一直在继续。一个国家的公民与非该国的公民进行贸易往来,拜访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和邻居们争论,后者碰巧住在地图上标注着“国界线”之外的地方。即使国家想要阻止公民私自与外部的个人交流,但是国家

保护自己和公民免于外部事件影响的责任迫使它对外面世界感兴趣。在现代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彼此接壤,没有海,也没有山脉能够构成对外面世界的一个屏障。

法律和权威在小的村庄社会存在是必要的,如同一个国家社会的基础是法律和权威一样,在世界层面的交流上法律和权威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来自不同国家的公民一起进行贸易,除非他们接受相同的规则并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合作,否则将会以吵架来结束。在短期内这些规则是什么并不重要,不论货物是以千克还是吨记重,不论价格以美元、英镑还是卢布为单位。但是如果一个参与者同意 1000 英镑 100 吨的价格,而另一个参与者同意 1000 美元 100 吨的价格,那么就会发生混乱和冲突。交易的“规则”不管是美元、英镑还是卢布,它都一定要存在。

同样,在交流的其他所有方面,当当事双方是主权国家时,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规则来调节双方。这些规则系统,这些法律可以是所有那些参与者自发协商的结果,也可以是力量强大的一方强加到其他方身上的。短期内,与法律的存在和强烈的意愿存在相比这个显得不太重要。当拿破仑和希特勒宣称他们统治世界的结果是世界和平的时候,我推测,他们真正要说的是如果他们成功了,将会有有一个世界法律体系,并且有一个权威来维持这个法律体系。

我们现在的许多国家是武力的结果这个说法确实正确,它们的统一是通过一种武力把法律强加到一个广阔的地区,并用武力维持它直到这个法律被当地人接受的直接结果。坦噶尼喀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我们被殖民之前这个国家是不存在的,不同的部落使用不同的法律,所以他们之间也存在冲突。正是殖民势力强制实施了一部法律并依靠武力保证其实施,而独立运动的发展壮大使这部瘦骨嶙峋的法律有了鲜活的情感体现。

通过协议达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统一作为一个在早期通过武力解决争端而产生的副产品,它不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命题。现在存在两个主要的力量集团,除了自身毁灭,否则没有一个可以毁灭另一个,并且现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止另外的国家通过扩张来挑战他们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世界上我们已经实现了一种“相互威慑的局面”,这可以有效地阻止用武力建立一个世界法律体系。因此,可以实现的唯一

方法就是通过相互竞争的力量达成协议来实现。有时这可能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但除了共同灭亡没有别的选择。国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之间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它们,并且有一个各国普遍接受的公正权威来保证法律的实施。

然而,在任何层面上,都只有一种通过协议的方式制定法律。当没有法律的时候,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和平地解决争端,那就是通过对话直达成协议。此外没有任何捷径,也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法。除非一方同意现有体系,完全认同将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同意在协议达成前的必要妥协。除非一方同意这些,否则就不会放弃把暴力作为生活一部分的观点。进一步说,在最终的结论上达到全体一致是有必要的,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们强加到那些仍然不同意的各方,而不需要太大的执行费用在物质或道德基础上对此做出宽恕。

因此,任何这样建立的国际法律体系的目的一定要和乡村法律或国家法律的目的相同,那就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在和谐中工作、生活。然而,国际法律却只能通过国家之间的协议建立,而每个国家仅为自己的国民代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主义制度现在把人类和所有世界社团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必须来处理这两个事实,第一,几乎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在从国家的角度思考。第二,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毁灭当前的世界和平。因此,世界法律体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有一些共同的行动中达成一致,其公民也会随之行动达成一致。

联合国

正是这些事情赋予了联合国当前的重要性,也构成了联合国当前的局限性。联合国是各国政府聚会的地点,一个他们可以谈论争端和引起争端问题的地方。在这里除了对话之外没有别的权力,除非那些专门赋予它的权力,并作为对话的协议结果来保持这一权力。但是联合国作为对话地点的存在,是承认战争是可以被取代的。当人们在谈论时,他们不是在战斗,他们可能会找到一种妥协的方法,使他们免于战争。进一步说,联合国就是一个多国在一起对话的地方。这就构成了一个共识: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以及他们找到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将影响除他们自己外的许多其他国家。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联合国的存在是通往和平路上取得的一个巨大进步。

同时,联合国的存在并不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一种方法,对它抱太多的希望可能会导致各国对联合国的幻想破灭,会怀疑通过讨论来产生解决争端的方法是否有效。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并且危险性会因为我們使用的措辞而增加。当世界有麻烦的时候,我们批评联合国,批评它的程序,批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存在,或者当大会通过的解决方案没有得到实施时我们耸肩表示不满,认为整个讨论就是在浪费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对未能就争端问题达成一致的政府表示批评。错误不是联合国的责任,而是因为谈话没有达成一致行动。某些政府应该被蔑视,但通常被蔑视的却是联合国本身。同样,行使否决权不是对组织的批判,而是表明常任理事国还未能磋商并达成共识,这可以被看作是对事实的可行的认知,即反对其他成员破坏世界和平的行为。

我再重申一遍:联合国的首要目的是促进并鼓励对话,它的其他力量来自对话的结果。世界各国同意对话,并同意在他们下次讨论具体事情前保持分歧的程度,即为各国政府及其公民渴求和平的程度。没有在某一特定时间达成一致而采取的行动就会给和平带来威胁,例如,当存在分歧时,存在争端的国家将部队派往有边界争议的地区。而实际情况是在太多情形下双方不等达成共识即采取行动。此外,通过对话来阻碍进程或寻求解决方案都是可能的。

地区和意识形态组织

在这方面,许多地区和意识形态组织比联合国更具有优势。作为阻止和解决争端的方法,对话是更有效率的,当然也更简单,在同情的情感越强烈、成员之间的友谊越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一名代表愿意并能够理解其他与会成员的内部困难时,就能取得更多进展,因为任何达成的争端协议往往都包含妥协和对计划的调整。互信和共同目标的存在使得这在政治上成为可能,而缺少信任会使每一个妥协看上去都像是失败。

在农场边界的争议中,我更容易让步于我的兄弟,而不是一个我不喜欢的、打老婆的男人,尽管他的婚姻问题与此事无关。同样,我会更容易赞同那些符合我意愿去建造堤坝的人,而不是那些想要在此区域种植作物的人。我们的共同目标将会使其他问题不再那么重要。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1963年5月举行的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我们有不同的语言、国土面积和资源,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达成非洲统一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边界非常模糊,但同时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有一个联合的行动来反对非洲的殖民主义,我们应该采取其他措施来协调不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个为期一周的会议来说,能够达成这些一致意见是很大的成功。这能够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认识到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唯一合法的关注就是,在处理国内的困难时不应该对其他非洲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当然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并没有解决非洲国家之间所有的关系问题,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实现我们现在依然在追求的非洲统一。在实现非洲统一之前,总会存在因地区不和而导致争端的危险,这些争端会导致感情恶化和战争,最终会影响统一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体系来管理这些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它们之间就会有产生分歧的危险。建立共同法律和公平制度的最好时机是在他们都感觉到他们有必要进行统一和意见保持一致之时。

在任何时候,冲突的真正危险都存在于那些彼此不信任,对对方的见解有着深深厌恶之情的国家之间。例如,我们不太担心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争论,但是却对这二者中的任一国与苏联的纠纷感到不安。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组织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或者最多它只能解决一些互不相容的小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有在世界组织的框架下才有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危险的冲突。让地区和意识形态的会议认同它们将有可能的统一,它们都将能为世界统一的发展作出贡献。但是如果想要避免一场大屠杀,那么没有一个局部的组织能够完成这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联合国的世界性

联合国是我们实现更大抱负的唯一会议场所,但是很多国家并不是它的成员国——瑞士、德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还有很多不便一一列举。它们中的一些没能成为成员国,是因为联合国是由二战中的盟国发起成立的,它们对战后欧洲重组未能取得一致意见,造成拥有7000万人口的德国不能加入联合国。

其他国家也被排除在联合国外，是因为某一个或另一个成员国认为它们不爱和平，或是因为什么其他假设出来的原因。

因此，现在的联合国既不是朋友之间的联合，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体都参加的会议场所，目前最流行的观点认为，加入联合国是一种特权。我发现自己对这个观点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因为这暗示着对这个世界组织的成员有一个最低程度的行为要求，那些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国家都应该被排斥，并且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

然而，这种观点缺乏逻辑。如果这就是联合国该如何运行的理念，那么就不应该与非成员国有任何联系，所有的贸易都应该停止，所有的外交、国际通信都应该停止，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都应该远离那些非联合国成员国的邻国。但这不会发生，联合国唯一郑重倡导的事情就是与南非联邦有关，但南非联邦仍然是联合国的成员！

事实是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国际实体，一个国家不会因为其他国家与它有纠纷就停止存在。相反，它成为一个旨在解决纠纷的组织的成员就更为重要。谁是爱好和平的人是我们应该在联合国争论的问题之一。

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原则，即：某些成员国不赞成的国家应该被排除在联合国这个维持和平的组织之外，那么联合国的性质就变了，就变成了一个既不积极友好，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异议的国家的联合。然而，对于一些冲突国家来说，失掉一个他们能够坐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地方意味着他们的特殊争端不能通过商讨解决，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

从原则上来说，维持和平要求联合国具有世界性。如果有的国家被联合国排除在外，只可能是因为其他成员国一致决定他们不想与这个国家保持和平，他们宣布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里是不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作为一个团体来反对被排除在外的国家，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是通过改变管理或行为方式的途径做出改变，使之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世界性的问题应该优先于其他问题，除了最终要采取的行动，因为这些是可以替换的：战争或者对话直到达成协议。我们期待或希望问题能够和平解决，那样我们就不能拒绝任何国家加入这个为对话提供场所和机构的组织。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接受所有宣称自己是够资格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进一

步说,加入联合国的条件应该简单并且正式,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并愿意承认三件事,即渴望和平,愿意和有争端问题的国家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接受人类平等的原则从而实现国家平等。

一旦发表了这项包括三个原则的声明,任何国家都应该被允许加入联合国,哪怕其他国家怀疑这些国家是否真正接受和平原则。宣称某些特殊行为与这些原则不一致的问题是需要讨论的。

在做这个声明的时候我完全意识到,坦噶尼喀想要迫使南非联邦停止种族迫害,因此坦噶尼喀与其他国家一起,要求把南非联邦从联合国中开除出去。我认为在这方面不存在不一致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真正要求的是全世界都排斥南非。其实,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强迫它离开联合国,而是想使它服从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当南非仍然是联合国成员的时候,如果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联合抵制成功而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那么没有人会比我们更高兴了。但是联合国会议被用于支持种族主义这种不道德的、危险的看法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当这个情况继续的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支持把南非驱逐出联合国。

联合国的运行方式

驱逐或者排斥应该是最后不得已的做法,并且必须由成员组成一个联合的小组来预设进一步的行动。因为联合国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建立和平,为和平创造条件。我相信,尽管有缺陷,但联合国能服务于这些目标。

联合国是会议外交的中心,是一个世界各国提交观点接受公开讯问的地方。此外,联合国还是世界上进行私下外交的最佳场所,在这里可以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从而促成和解,交换意见。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代表都在联合国大楼的走廊和大厅里会面,产生分歧,然后再次会面。在一场争端中没有利益可得,但如果发生战争却会失去所有的国家。可以与竞争国家的代表交谈,并陈述他的——我们的——观点。因此,通过其公议和密谈的独特结合,联合国总部为通过对话构建和平提供了一个基础。

联合国也是一个可以采取国际行动的机构。一旦各国政府达成协议,就可以派遣一支“消防队”到有可能出现麻烦的地方,或者由于政府垮台而邀请外界干预和冲突的地方。当前的世界形势使这种公正干预的能力更加重要。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一国干预到另一国的地区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会扩大这个冲

突。当联合国进行有效的干预时,这种冲突就会被孤立。

关于联合国的干预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性,但这一重要性目前还没有被完全重视。当成员国同意派遣一支联合国部队或者是“同意斡旋任务”时,他们自愿放弃在争端中自己干预的权利,可能只是因为对他们敌人的干预或许会比他们自己的干预更有效,但是这种效果实际上就是主权国家对国际组织权力的一种让步。

无疑,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各种场合需要再次对这种权力做出让步。但是,它是一个开端,我们希望,随着越来越多地使用临时协议,其有效性就越越来越低,一些为“国际警察部队”制定的更为持久的协议将会得到肯定。

然而,仅仅是低效率性不足以使目前的安排被替代。任何一支永久的联合国武装力量都意味着联合国要对其进行管辖。这也是我们目前真正面临的联合国的低效率性所在。现在,我们拥有一个由各国政府代表组成的联合国大会,但是代表们必须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做出判定,而不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其长远利益。而且联合国根本没有行政权,安理会仅仅是联合国大会一个拥有特殊权利的委员会,尽管这些特别的权利使安理会能够引领联合国主体,但并不能代表联合国,也不能确保做出的每一项提议都得到支持。

国际公务员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行政部门的工作极其艰难,但却非常重要。国际公务员是唯一在《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对世界以及和平负有责任的人,他接到的来自上级的指令常常是很含糊的,在危急情况下解释这些指令就成为他的职责。但是他对多国政府负有责任,而各国政府最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就意味着,无论这位公务员做出怎样的决定,他都因为公开化的身份必然会受到批评,而绝不会受到表扬或支持。

因为国际公务员的服务对象很分散,而且是为某一理念而工作,所以他可以为世界和平做很多事。他可以在其他人的提议受到质疑的时候采取主动,使讨论得以继续或者达到一致的妥协。他可以把自己当作不同竞争国家之间的缓冲区,并且用世界统一的理念而不是以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意识形态感兴趣的方式,来解释他的指令。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他是一个勇敢和睿智的人,他可能在明知会冒犯服务对象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决定,甚至还不确定会有其

他支持就要做出决定,除了他自己的良知的支持以外。

对国际公务员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期待他成为一名非政治化的政客。在高度政治化的形势下他被要求中立,并且在缺少政治权威的情况下能处理任何事,其做出的指示不能引起冲突。其实,联合国公务员填补了一个因世界上某些国家统治者的无能和政治统治权威缺失而造成的力量空白。他仍然经常受到更正,但他需要主动充当一个催化剂去保护国际和解,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这样做。

只有在世界上的独立国家为世界主体牺牲一定的主权时才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然而,最近在实现欧洲统一和东非统一的努力显示出,甚至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都很难牺牲主权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彼此怀疑的国家之间产生的普遍牺牲主权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提议,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段后将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及时处理和平问题,正如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一样,国家之间正在彼此接近,但同时增加了产生冲突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现在必须面临的处境。

正在取得进展

然而,我不觉得我们有失望的理由。我们正在取得进步。当世界上突然爆发危险时,或出现地方权力真空而产生恐惧时,许多国家现在考虑的是要求采取国际行动。每一个得到同意的联合国干预行动都使个别国家应该远离势力冲突的想法更强烈,但是联合国应该维护法律和秩序,或者分开冲突的军队。换句话说,世界各国人民都正在心中建立并将最终赞同一种观点,那就是国际政治行动。当然,目前这个观点的接受度仅局限于某些受限制的领域,而联合国官员不能履行这些要求的职责仍然可以毁坏它。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形成一种习惯,而习惯性的人际关系行为将逐渐变成普通法,并最终成为正式法律。

在其他方面,我们也正在慢慢向国际法的方向前行。每一个制度都有它的“接受做法”,它的行为准则,我认为联合国也不例外,这有一个不断发展可接受的国际惯例标准。确实这只是开始,但是联合国各国代表在建议他们的政府,什么样的行动可能会被接受,这个行动可能会对他们在联合国的威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秘书长地位的提升是实现真正国际主义的起点,这是出于需要,而不是因为个人野心。每一任秘书长都是被选举出来,他被视为“安全”、“中立”和“谦逊”之人,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凭借自己的世界责任对发展国际意识作出了贡献。

从这些和其他无数的小事中将发展出一部国与国之间的法律,这将是我们的唯一能够真正防止残酷的国际战争的武器。但是我们首先要接受这样做的含义。

保护自己反对别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暗含着他们与我们的对抗,因为保护人们的法律同时也限制着人们的行为。不幸的是,更引人注目的往往是这些限制。国家和人一样,不愿意去考虑尚未出现的危险,而保护越有效就越不被注意。因此,和平的关键——法律,从未受到过人们的欢迎。所有用来保护人们的法律都应该被人们自愿地维持。

从这个方面讲,世界才刚刚开始。国际法庭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接受在所有法律纠纷里法庭管辖权的国家数量是有限的,我发现坦噶尼喀也不包括在内。通常给出的原因是,大多数争论是有关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这就像一个小偷宣称自己从富人家偷钱是为了去帮助穷人——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与法律的存在无关。然而,使用国际法庭来执行国际法律的主要困难是,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也没有实施法庭判决的途径。如果被提交给安全理事会,那么一个裁决就变成了许多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然而,如果国际法庭变得更有效、更迅速,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同意执行它的裁决,那么目前世界上有多少热点问题能够降温,这是值得考虑的。

不过,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人权是和平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论是否有执法机构,不论法律是否是法定的,如果国际法以某些基本原则为基础,那么和平都将得到保护。冒犯最基本人权的法律,或者不能保护人类权利的法律,都没有达到法律的目的,因为它没有保护人的生命。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对人类有权进行起义的最著名的宣称,如果“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那么拒绝遵守法律就丝毫不亚于一场起义。没有必要从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有许多机会,如果法律不采取违反个人的行动,那么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的,并且会得到他同伴的支持。全世界对于那些密谋杀死希特勒未遂之人没有产生同情,是因为希特勒是一个参战国的领导者。这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密谋反对人道主义中希特勒是一个领导人物,法律不仅无力反对他,反而变相地为他服务。

同样,如果国际法律无力反对那些违背基本人类道德的事情,那么有些国家将自己着手解决问题,会像法官和刽子手一样采取行动。重要的是,他们会要求其他人支持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道义上的理由,不管在国际事务中是否存在那些法律。

这意味着对国际和平的关注必须成为对正义的关注,正如关注法律和秩序一样。在联合国对于人权的争论并不是对寻找和平话题的愉快转移,它们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新国家都有维护和平的优先权,创造人走在路上不用担心丢掉性命的条件。公民之间公正的问题总是次要的,也是从未得到过解决的。但是正如缺失公正最终会导致国家革命一样,所以不论法律和权威系统是否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公正的缺失将最终毁坏和平。法律和人类正义必须一起发展,相互支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向着一个建设性的、没有杀戮的人类发展方向前进。

动手比动口容易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概括出了目标,我们必须朝着目标前进。将来和现在的和平都依赖于人类,最终将依赖于所有人,所有国家的所有公民。但是正是那些担负着责任的人,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人必须肩负起这个重任。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可以为我们的进步作出贡献,当然他也可能屈服于愚忠的压力,开创一个大规模破坏的新时代。因为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什么比这个事实更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动手比动口容易。

在过去,世界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因为这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导致了排外的国家忠诚的发展,并产生了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而且他们仍然在这样做,这就是广大世界公民的价值。这就意味着与其他国家的代表谈论分歧和困难经常会被指控为不爱国或支持绥靖政策。他们的意思是可以透过好战声明和具有侵略性的态度来赢得伟大的个人声望,国家领导人如果坐下来和其他国家讨论实际或潜在的争端就必须道歉。

对于一国政治领导人来说，很少有比与他有争端历史的国家的领导人在一起交谈更难的事情了。如果他想这么做，必须制造借口，对他试着去谈判的人使用威胁的语言，也可能要“炫耀武力”，或者做一些其他能使实际的探讨更难的事情。进一步说，一旦达成了一个妥协，双方就有必要表明这个讨论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一个胜利，获得常识和心智的胜利还远远不够。

这不是一个仅局限于某大洲领导者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局限于有着多党制政府的国家领导者的问题，尽管这在选举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困难。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所有领导者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没有必要引用例子，因为我们都知，站在公共平台上宣称赞成与“国家敌人”进行讨论永远不会受到欢迎。

然而，如果不是通过对话解决这些问题，那该如何解决呢？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通过暴力和战争。可以理解那些争端中的国家会拒绝合作完成建设性的工作，因为这需要有基本的信任和理解，但是拒绝讨论已经破坏了相互信任的争端，就是拒绝去面对基本的人类困境。为了自己的自由，他需要和同伴团结，这要求他妥协、容忍、保持公正。其实，现代社会中真正的敌人是那些拒绝讨论包括涉及他自己的争端问题的人。

二十世纪的挑战

二十世纪的挑战就是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转换。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是否有勇气信任一个世界机构，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将以平等为基础向统一的方向引导。

追求和平是一个漫长而令人厌倦的工作，它已经历了很长时间。哈马舍尔德曾经引用了公元前350年中国思想家“周游列国解决分歧”的故事，但是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危急。在以前，战争影响士兵和在他们土地上打仗的人们，而现在的战争会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除了还未出生的孩子。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说起来很容易，但实施起来很难。致力于这个问题需要比作战更多的勇气，也需要耐心，需要在各种压力下坚持原则。最大的问题是我們是否能够迅速地在教育、看法和体制上取得进步，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我相信，如果能满足两个条件我们会成功。国家必须有勇气来讨论他们的分歧，以及必须坚持我们共同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当承认实现目标的道路漫长而崎岖。除此之外，必须有一种超乎民族国家的忠诚度，如果有必要，人们要

愿意为了更大的忠诚来牺牲他们的名誉,甚至他们的生命。

哈马舍尔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支持《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应当做的事,他宁可成为别人不欢迎的人。他是人道主义的公仆。他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为人服务的范例,而且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可以接受对他非常不公的结局;一个能用耐心和宽容来对待那些没有耐心和不宽容的人;一个缺少果敢行为却自愿从事危险的和平使命而牺牲了自己性命的人。

57 非洲统一组织外交部长紧急会议

在兵变及英国军队应邀抵达坦噶尼喀后，总统先生召开了由非洲统一组织各国外长出席的专门会议。此次会议于1964年2月12日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钻禧礼堂开幕。会上他首先对非洲各国应其要求做出的及时响应表示感谢。他接着谈道：

今年1月20日，坦噶尼喀军队的第一营发生兵变。第一营士兵主要驻扎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郊区，兵力占到了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二。叛军控制了机场、广播台、总统府邸等重要政府机构，他们还逮捕了大批市民和军事长官。

由于外交与国防部长奥斯卡·坎伯纳先生的勇敢与忠诚，事态才有所控制。他保证干涉国内事务的英国军官已出境，劝说叛兵们回到军营，政府会马上考虑改善工资和待遇问题。但该事件已经造成不良影响，不法之徒趁乱掠夺，解决私人争端。有部分士兵，甚至警察参与叛乱抢劫，但到傍晚时大部分士兵和警察同政府携手努力恢复社会秩序。当天有17人在叛乱中丧生，伤者众多。

此后数日，很多士兵显然为叛变的后果感到震惊，但部分士兵还是沉迷于武力带来的甜头，负隅顽抗。国家无纪律无秩序的状况日益增加，原本只是单纯地想要改善工资和待遇问题，现在事件却慢慢演变成一种类似于绑匪威胁受害者的情形，这种状况很危险。持不同政见的人开始同叛军头目密谋，使得局势更加恶化，以扰乱国家秩序为目的的违法活动更加猖獗。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证国家主权和市民的安全，因此政府有义务重塑秩序，尤其是确保叛军交出所有的武器。问题是，政府该如何解除部队的武装呢？

我们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寻求东非共同事务组织伙伴国的帮助，但同时，继

坦噶尼喀兵变之后，乌干达和肯尼亚都先后遭受了国内军事力量的冲击。换句话说，这次事件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后果将难以估量。在面对威胁之时，乌干达和肯尼亚政府都需要英军的援助，这样才有可能控制住国内局势，消除混乱局面。

因此，为解除坦噶尼喀军队的武装，我只能寻求可立即获得的军事援助。1月25日清晨，英军空降坦噶尼喀，包围并解除了第一营的武装，随后，飞抵塔波拉和纳钦圭阿，解除于1月21日发动兵变的第二营的武装。英军也一直驻留在坦噶尼喀，基本上帮助我们维护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和恢复公众信心。

面对诸多事实，我必须强调的是：没有证据显示坦噶尼喀发生兵变是由境外共产主义或帝国主义力量策动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民变的预演，这都是无稽之谈。过去的几周着实令人担忧，但人民的坚决拥护给了坦噶尼喀政府源源不断的勇气。人民支持政府依靠其自身力量，先尝试处理此次事件，然后再向英军方面寻求援助。

因此，我们期望同非洲姊妹国家进行磋商并非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我们需要外部军事力量参与国内事务为我们提供帮助，才是国家的耻辱，这与哪国人帮助我们并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英国是一个深深卷入冷战冲突的国家，在非洲民族主义和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大环境下，英方向坦噶尼喀派兵就有了重大暗示，我们想要成功奉行民族主义和不结盟政策，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冲突挡在国门之外，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方法。

去年，坦噶尼喀同其他独立的国家齐聚亚的斯亚贝巴，各国一致认为非洲必须统一，统一后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政策，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不是在创造统一，而是把它当成共同的目标，在统一的环境下，我们要担负起自身的责任，寻求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

所以，从根本上说，政府是出于这种责任才决定召开此次紧急会议的。不法之徒很容易利用这次英军援助坦噶尼喀的机会，妄图制造分裂，控制非洲。当前，已有部分民众不失时机地渲染新殖民主义，企图激起人们心中的恐惧感，以期使非洲各国人民之间产生嫌隙，相互猜疑。仅仅是为解决这些问题，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会议也是值得的。会上各姊妹国家将亲耳听到，亲眼目睹何为事实，何为恶意流言。所以，此次会议至关重要。因为面对任何企图破坏非洲统一的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要行使自主权，采取应对策略。

但是我们要求非洲各国就其当前状况进行磋商还有其他原因。坦噶尼喀是非洲的一个“边界国”，非洲解放委员会总部就位于其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此外坦噶尼喀还有很多来自莫桑比克和南非的自由斗士，他们在此组织各自的自由运动，这种结果不仅仅是坦噶尼喀单方面面临的问题，非洲首脑会议各国领导人的决策也促成了该问题的产生。坦噶尼喀事件可能与这些自由斗士的自由运动有关，或是与这些人要寻求心理安慰有关，所以坦噶尼喀事件是非洲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事情。就坦噶尼喀目前局势来说，我们不需要有任何隐瞒，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局势很容易被人利用和操纵，比如葡萄牙，他们一直在抱怨英国方面只是简单的出兵援助，对接下来局势会怎样发展却避而不谈，也没有给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而在非洲，当各国依靠外部军事力量保障公众安全时，反对非洲解放的顽固分子又会继续冷嘲热讽，这种情况和葡萄牙的情况很类似。我从不理会这些冷嘲热讽，因为它会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知所措，即使我们自身的能力不足以消除这些嘲讽和偏见，我也不会放任这些流言蜚语颠覆我们的国家政权，扰乱社会秩序，但是非洲国家还是需要进一步考虑坦噶尼喀兵变带来的影响。坦噶尼喀通过英军帮助获得国内和平，政府觉得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和面临的问题是“未来还有可能发生什么”，“我们将何去何从”。

显然，坦噶尼喀需要重新组建军队。虽然我方自身力量承担不起这项任务，外交政策暂时也不需要我们去组建一支庞大而复杂的军事组织，但是我们还是要保证军队必须要忠诚于国家，并且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所以，最初的选拔和训练可能会耗费一些时间。单纯从坦方来看，我们可以要求英军驻留在坦噶尼喀，直到坦方新的军事力量组建完成，但作为“解放运动”的先头部队和领导人，我认为非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应该共同参与商讨此事。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在坦方进行军事训练期间，非洲各国会找到帮助坦方的方法，以此维护法律，维持社会秩序。

作为会议发言人，我不适合就上述问题发表过于详尽的看法，但坦方代表团成员会向各位展示几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政策，这些方案都透彻地分析了我们目前的处境。基于这种处境，非洲各国需要竭诚合作，我们认为，坦方兵变带来的问题，应以一种能促进非洲统一，而不是破坏非洲统一的方式予以解决。

我还要澄清最后一件事，坦噶尼喀一月份发生兵变，这种动乱情况并不是

只在我们国家才发生,其他东非国家也都经历过和我们类似的困境,面对不同的政治局面,各国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但是始终一致的目标都是追求非洲统一。

58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合并

1月初,桑给巴尔爆发了革命,卡鲁姆^①成为该岛新共和政府的总统。坦、桑双方领导人就统一问题已进行过多次秘密商讨。之后,1964年4月25日,坦噶尼喀总统主持召开了国民大会特别会议,并发表演说。通过简短的讨论,所有与会人员都赞成两国合并的提议,并一致通过了必要的法案,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坦桑尼亚联合日。

今天将你们召集在这里举行会议,是想请求各位议员批准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共和国的联合协定。议会是坦噶尼喀人民至高无上的集会,个人或外人无法决定任何涉及宪法或法律的重大事务。作为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我谨向各位提供建议,但最终决定权还在你们手上,或赞成或反对。今天,我给各位议员阅览的文件是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协定和法律草案,我在此请求各位议员正式批准此项协定,并通过必要的法案。

从各个角度说,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都是友邻之邦,地理上两国离得很近。在我看来,桑给巴尔到东非大陆或者奔巴到东非大陆的距离比起桑给巴尔到奔巴都近,所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在历史上,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陆地的大部分地区曾经都受桑给巴尔素丹政府管辖。由于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我们不再属于同一个国家,那时正值殖民主义入侵并瓜分东非国家,他们把桑给巴尔、奔巴岛以及肯尼亚海岸地带划归英国管辖,而坦噶尼喀的海岸地带和内陆腹地则被德国控制,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自此分裂。一战后,英国取得了东非各国的委任统治权,但还是没有结束坦噶尼喀和桑给

^① 1906—1972年,1957年起任非洲—设拉子党主席。1964年1月,领导推翻桑给巴尔素丹王朝后,任共和国总统。同年4月,坦桑尼亚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副总统。1972年4月被暗杀身亡。——译校注

巴尔的分裂局面,后来两国的独立则让我们有机会纠正历史遗留的分裂问题。

如今,非洲人民要求统一的呼声高涨,坦噶尼喀人民渴望同桑给巴尔人民成为手足同胞,并服从同一个政府的领导,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我们发现,非洲人民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同时,我们也以人民向往统一的志向和情感为傲。我们必须记住,意义重大的统一不会通过简单的谈论就能获得。我们采取的行动要表明统一的决心,要展示出推动非洲统一是一个可实现的梦想,并不是不可实现的。

友邻国家和历史上曾一度被纳入统一管理国家要承担特殊的责任。如果他们不能实现统一,我们将吸取其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导我们自身的统一大业。如果他们实现统一,取得成功,那他们就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证明统一并非空想。如果两个国家可以实现联合,那三个也可以;如果三个国家可以实现联合,那三十个国家联合起来也是可能的。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是睦邻友好国家,在语言上两国也有共同之处;两国还有着相似的习俗和文化,就连政治上两国也相互影响。非洲一设拉子党和坦盟的友谊世人皆知,两党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也很深厚。我们完全有理由联合起来;走向统一是非洲大势所趋,是全体非洲人民共同的愿望。因此我代表与会成员,卡鲁姆总统代表桑给巴尔和奔巴的同胞们,于本月22日相聚在桑给巴尔,签署了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协定。

各位看到的的就是这项协定,也请各位就该协定进行讨论。我不必对该协定的内容进行详尽的阐述,通过讨论,各位会清晰地看到所有条款和内容。我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建议你们批准联合协定。

非洲各国同胞们都期待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宣布联合协定。他们有这种愿望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从未怀疑过他们关于促进非洲统一的承诺;那些拥护坦、桑联合的人们也必将拥护非洲统一过程中我们迈出的这一小步。

肯尼亚和乌干达完全意识到我们今天倡导的联合不会影响成立东非联邦。我要向外部世界重申立场,东非联邦积极拥护我们成立联合共和国,坦、桑双方政府将采取一切手段尽快实现联合。坦桑联合不会影响我们关于建立东非联邦的承诺,而实现东非统一的承诺也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整个非洲的统一进程。我们把这些小联合、小发展当作是迈向非洲统一的一步。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政府决定两国联合,是基于非洲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利

益。这样做是考虑到整体的利益,并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的统一不需要美国和苏联的干涉。有人认为,非洲统一进程中的每一项行动、每一项措施都与冷战活动有关,这是对非洲的侮辱。我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意愿,不受他人摆布。因为我们受到一个极其简单的意识形态——统一的鼓舞,我们才要实现统一。我们提倡联盟,与国际上的任何主义都无关,我们只想支持和壮大非洲,尤其是非洲我们这一地区。两国联合后将适用一致的联合共和国外交政策,我们要为非洲统一和非洲自由而奋斗,奉行不结盟政策,不参与和我们无关的国际力量斗争,我们要以自身价值为基础决定在处理国际问题中的政策;同其他国家发展友谊时,我们也会采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态度,如果我们的盟友同我们的敌人伍,那我们一定不会维持这种友谊。

尊敬的议员们,尊敬的议长,我认为坦、桑联合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值得各位深思熟虑。统一之路注定布满荆棘,不会一帆风顺。在这条道路上,很多人明白非洲统一是大势所趋,可是仍然倾尽全力阻挠联合,质疑联合,煽动不满情绪。所以我们要时刻警惕这些破坏活动,因为只要成立了联合共和国,我们就有责任保护她,维护她。

愿上帝帮助我们及桑给巴尔和奔巴的同胞们履行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

59 期盼成立东非联邦

1963年底,三位东非国家领导人首次宣布成立东非联邦,负责起草宪法大纲的工作组没有贯彻履行自己的任务,联邦的计划最终搁浅。因此1964年4月底,肯尼亚议员邀请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议会议员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东非联邦的相关事宜。乌干达方面的议员没有做出回应,所以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议员会面,决定派代表团约见三国政府领导人,推动实现东非联合。5月10日,尼雷尔总统接见了代表团,在媒体的参与下,接受了联合倡议。但由于另两位总统没有类似的态度表示接受联邦协议,所以东非联邦最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首先,我要感谢非洲民族联盟议会党团倡议召开议会党团代表会议,共商成立东非联邦事宜。会议表示,如果各国政府不能迅速按照人民意愿为人民服务,那议会的人民代表们就会根据各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推动人民实行自己的意愿。会议通过的这项决议对那些诚心渴望统一的东非人民来说是件令人极为满意的事情。

我理解决议和附带谅解备忘录中要求联合的紧迫要求。有人认为,除非在独立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推动实现统一,否则时间拖得越久就越难实现统一,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然而,如果假称联邦成立后会立即解决各国面临的各种困难,也不会对成立东非联邦产生积极作用。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东非联邦不懈努力。在联盟成立之初,当我们制定联盟的实际计划并决定关于各成员国政策和发展的优先权时,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任何联邦或组织成立之初都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压力和紧张,但我们还是拟定了联邦文件,并成立了联合机构,这都是经过仔细考虑和细致准备的。东非人民前赴后继,使奋斗在统一道路上的国家免于任何形式的困难。我们的子孙后代必将从国家的联邦中获得长远利益,我们这代人也会看到经历了困难之后应该获得的成就。

我们也必须清楚另外一点,那就是联盟一经成立,便永久不会撤销,可以有其他国家加入,壮大联盟,但不可出现解体的情况;东非联邦是根据人民意志建立起来的自由组织,所以绝不可以搞分裂,也绝不会解散;东非联邦将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团体组织,需要我們不惜一切代价防卫保护。就像各国人民会奋不顾身地拥护自己的国家那样,我们也需要忠诚于东非联邦。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加入东非联邦,必须遵守上述条件,只有当它全心全意拥护联邦,并对联邦做出承诺之时,才能被接纳为联邦成员。

如果有国家没有准备好做出上述承诺,这并不是什么过错;但是,如果接纳这些意志不坚定,没有承诺的国家进入这个新成立的政治集团,参与政务,讨论政事,可能会对整个非洲的未来产生极大的损害。因为这样的国家同我们的利益关系不紧密,不能众志成城地为东非的未来奋斗。

因此,只有完全认识到联邦面临的困难和蕴含的意义,我们才能明确地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还有我本人同肯尼亚、乌干达,或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或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一起做出承诺,表示立即加入东非联邦。我相信联邦各国的人民也会准备好做出承诺,加入东非联邦。

说了这么多,我也明白,各国现在不可能像处在一个国家那样让各国公民都自愿加入联邦。如果有哪个国家想加入联邦,但现在还不能按照承诺去做,最好还是等待时机。当然,坦桑尼亚共和国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政府支持你们的提议,认为你们应该加入联邦,那东非联邦的大门会向你们打开,因为不久之后你们会做出承诺,也会无条件地加入联邦。如果现在三个或多个国家联合不起来,最好还是两个国家先进行联合,这也是向统一大业迈出的一小步。

如果我们明白什么对联邦是重要的,什么对联邦无关紧要,我们就可以快速取得进展。在我们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实现联合,把其他问题留到联合之后再解决。我认为,现在已经有措施可供我们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了。如果一直等下去,等到各国间的问题都解决了,各国的内政问题也解决了,那任何联邦或任何形式的统一组织就再也成立不起来了。让东非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携手解决各自面临的问题吧,现在就联合起来吧。

如果姆齐·肯雅塔决定召开会议讨论你们将要采取的行动,我一定会参加你们的会议。

谢谢诸位,感谢你们出席今天的会议。

60 对叛兵判决的意见

兵变被镇压之后，大批士兵被开除，耻辱地离开军队。然而，一些兵变领导人在特别法庭接受审判。首席法官担任特别法庭审判长，两名军队长官担任审判员。由于没有哪位非洲人军官能符合旧法律对法庭审判员任期的要求，所以设立了特别法庭。除了领导人之外的一些叛兵，被认为是平民反叛者，实行公开审判。

最严重的判决结果是判处 14 年监禁，大部分叛兵仅判 2—3 年监禁。这种判决结果遭到很多公众的指责，尤其在一些抢劫案件中，有些平民被判得比较重，相比之下，叛军被判得较轻，很多人觉得不公平。1964 年 5 月 13 日，坦桑尼亚总统发布了这项新闻公告。

很多人批评我们对 14 名谋反并参加今年 1 月份坦噶尼喀兵变的士兵的判决过于仁慈，政府希望能向人民解释清楚。由大法官和两名军事长官决定施加给士兵的惩处——这些士兵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对国家的损害无关。尽管公众对这样的判决结果存在批评，但我们不会改变对这些案件的判决。干涉法庭的判决结果就如同在说国家对这些士兵仅是谴责而已，这样会使法律形同虚设。

这些士兵明白国家有规定其行为的法律，也有解决其怨愤的方法，但通过兵变，犯罪士兵可以煽动人们破坏和平，废除法律。在几个小时内，我们就看到了没有法律约束人们行为导致的后果。

法律是公民享有自由的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必须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即使是出于对叛兵的憎恶，我们也不允许有人挑战法律，挑战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

61 非洲统一：在非统组织开罗会议上的讲话

非洲统一组织第二次会议于1964年7月在开罗举行，其特点是就非洲统一的主题开展了激烈的讨论。总统于1964年7月20日就本主题做了演讲。

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统一的问题。我想再次说，说好听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关于统一的需要，我们在非洲都已经说过了，世界上其他各大洲在统一方面取得的成就比不上我们的一半，而本组织和此次会议本身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取得胜利的明证。

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没有任何非洲领导人，即便他不相信这种统一，也不敢这么说。因此，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关于统一的说教，而是对统一的更多实践。

我知道我们面临的障碍，也从没有低估过统一道路上会有的障碍。实际上，正是对这些统一道路上困难的敏锐意识，使我向东非的同事们建议应当先联邦后独立。但不管这些困难有多大，都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要求的是养成统一和合作的思维习惯，一定不能自问我们是否应该等到所有人都准备好前进，而是一定要采取实际措施，鼓励养成统一的思维……

我曾经认为，我们真的都需要一个非洲大陆政府，而我们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样一个政府，但我现在开始怀疑我早期的这个判断了。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非洲大陆现在存在两类人：一类人真正希望建立一个非洲大陆政府，并将逐步消除一个个障碍，为实现非洲大陆政府坚忍不拔地努力；另一类人只是用“联合政府”的幌子用来进行宣传。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是这两种人之间的分歧。

没有比这种无休止多次重复的宣传更能给非洲大陆政府这一概念带来更多嘲弄的了……

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宣布三国要合并成为一个国家。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深信三国的合并符合各国的最大利益，同时也会为非洲统一作出贡献。但是这个宣布引起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攻击，甚至有人费力试图终结这种通往统一的进程。为什么？因为东非联邦被视为有悖于亚的斯亚贝巴宪章的精神。有人进一步提出，我们分裂的程度越高，联合政府的成就就越大。现在在这个讲台上，又有人提出了这个赞同维持现状的奇怪论断。

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当任命一个永久的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组织也不需要选择一个永久的总部所在地。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告诉我们，用很多话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联合政府！

为了掩饰这一系列的荒谬行为，在提出所有反对东非统一的论断之后，又有人在这个讲台告诉我们，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开始统一……

我还想说，我们真正想要的非洲大陆政府和人们宣传的“联合政府”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成立一个非洲大陆政府意味着有一个单一的非洲政府，甚至在必要时，是一个联邦政府，这个政府的必要特征是她有一个国际特点：拥有主权。这意味着她的组成部分必须牺牲单独的主权，因为非洲大陆政府本身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我们被告知，“联合政府”并不需要牺牲各国的独立主权。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向任何奇怪的动物牺牲主权，但这个奇怪的动物能够成为我们完成现代国家目标的强有力工具。

主席先生，非洲大陆政府的概念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至少我们应该清楚这个概念包括的含义。

主席先生，我想就非洲统一问题表明我国的鲜明立场：我们致力于单一非洲大陆政府下的非洲统一。为了更大的统一，我们已经牺牲了我们的主权；为了更大的统一，我们愿意再次牺牲我们的主权。

我们认为，并不存在逐步实现非洲统一和一步实现统一的选择。除了在某些奇怪的想象中，一步实现统一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我们人类还不可能用自己的意志把想象变为现实，在我们对事物的想象和实现这一事物之间存在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或短或长，实际上，我们的目标越大，过程的时间就越长，但不管时间长短，总是一个过程，而过程就需要一步步来实现。在统一的道路上，排斥循序渐进的进步就是排斥统一本身。

排斥非洲统一进程中循序渐进的进步，就是希望万能的上帝有一天会说“让非洲统一吧”，然后非洲就有了统一，或者祈祷有人来征服非洲，但即便是征服者也需要循序渐进地征服非洲。那些认为循序渐进方法是帝国主义者创造出来的说法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也听说过帝国主义者因很多事情遭到指责，但不应为人类的局限而遭受指责，因为他们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我们面前唯一的选择就是循序渐进的选择，从边界上或功能上都是如此。例如，如果北非国家准备好合并成为一个国家，我也会欢迎他们向非洲统一迈出的这一步。

至于这种统一的时机和条件是否合适，每个国家都可以做出恰当的评判。如果这些国家感觉在政治方面进行合并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那么，我再次重申，欢迎他们的合作，因为这是往非洲统一迈出的一步。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迈出的步伐应当是在非洲统一组织的精神和庇护下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愿意看到这种统一的精神在各个方面发展壮大，其中包括任命一名秘书长和为组织选择总部所在地。

主席先生，正如我在讲话的开始所言，我不打算进行长篇大论。我已经就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浪费了你们的宝贵时间，所以让我以一个不同的论调来结束我简短的讲话。

作为一个大洲，不管是继续分裂还是通向统一，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的问题，也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要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当前科技发展认为合理的水平。我曾经这么说过一次，现在我再次重复一遍：1964年对于东非的马赛游牧民族、埃及的农民和纽约或伦敦的百万富翁来说，都是1964年。

干净的水和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我们非洲人民、对欧洲人民和北美洲人民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东西。如果自己的孩子不健康、感到痛苦，我的国家最落后地区的母亲和巴黎最富有的母亲一样，都会感到不高兴。

现代社会的繁荣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是，国际贸易就像是一台双向抽吸的泵：从发展中国家抽吸很多放到发达国家，但从发达国家抽吸很少放到发展中国家。结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有关贸易与发展的会议^①可能会改变当前这种局面，至少我们希望如此。但是我们在这里已经提过，而且我们必须鼓励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各国之间的贸易，这要求我们都有可以卖给其他国家的产品。

在东非我们有一个共同市场。经验表明，如果形成共同市场的各方不能平等地利用它，那么这个共同市场的存在就毫无意义。有了这些经验，我们必须坐下来，讨论某些产业应该在哪里落户。我们三个国家都得到了东非市场要求的一些产业。

主席先生，加纳的总理请求在考虑产业的落户方面，要以整个非洲大陆为基础，至少要以某个地区为基础。我很高兴总理先生提出了这个请求，也愿意支持提出这个请求的人。这样做会使我们能够利用人口 2.5 亿的非洲市场，而当前这个市场正在被其他人、被世界上的富人利用。

^① 1964 年 6 月 15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77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发表了《77 国联合宣言》，并以此组成一个集团参加贸发会议的谈判，因而被称为 77 国集团。——译者注

62 大学学院校区的揭牌仪式

1964年8月21日,距首都8英里之外的一座小山上,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新校区揭牌仪式暨首届法学专业学生学位授予仪式如期举行。因为没有礼堂,此次引人注目的典礼在新行政办公楼外的蓝天下举行。总统身穿大学校长的红、蓝、金三色长袍,在一支全职及访问教授和讲师学术队伍的陪同下走向讲台。

尊敬的阁下、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1961年6月,我们决定立即创办坦噶尼喀大学学院并选址在达累斯萨拉姆。那时,我们是责任自治,却尚未独立,奥斯卡·坎伯纳先生时任教育部部长。

现在,仅仅三年之后,从这所大学走出的首批毕业生正在政府和商界中任职。他们是开拓者,在临时凑合的宿舍度过了全部的大学生活。然而,他们能拥有这种机会,其实归功于坎伯纳先生和教育部的继任者所罗门·伊利伍夫先生以及这所大学全体员工的精力与热情。

然而我们都知道空有计划和想法是不够的。这所学院的毕业生,这里优美的建筑,其实都源于劳动,艰苦、枯燥、仔细的劳动;源于计划、解释、安排、挖掘、打桩、购买,还有教学。这所学院的存在,这些建筑的存在,都是团队劳动的结果……

除此之外,在众多曾为现在的景象作出贡献的人中,我特别想向两个人表示敬意。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不仅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是他们代表了除坦噶尼喀人民之外为我们无私劳动的两个群体。第一位是已经在坦噶尼喀住了很久的乔克·斯内斯先生,他是一位殖民地公职人员,之前坦盟曾经与之有过不少的小冲突,他也是能够接受——我想他高兴地接受——雇主改变的众多人中的一个,他用他所积累的所有经验和专业知识为我们服务。

另一个我想提及的名字是我们的校长克兰·普拉特先生。他是加拿大人，特意为此任务来到坦噶尼喀，是专程到来帮助我们发展国家的众多人士之一。关于普拉特先生本人，我能说的很少，但是我们现在取得的进步能替我说明。只是这样，我和政府中的同事们都不需要为这所大学的发展或推向前进而担心，因为普拉特先生承担了这项重任，并且在大学委员会和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已经完成了所有相关的各种任务。他向我们提出了建议，他向我们奉献了精力和智慧。而最后——我很遗憾地说——他坚持要在明年的三月份离开我们，因为他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一位可敬的来自坦噶尼喀的继任者……

然而，人不能在某些事情上犯任何错误，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因为政府制定的总体政策，我们不可能做好我们已经做的工作。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只是坦噶尼喀全局发展的一部分，现在也是政府所致力于的东非联盟的一部分。这是令人兴奋的一部分，也是全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已经投入100多万英镑资金，在这个项目完成之前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

只有满足一个条件时，这种类型的支出才能为我们国家所接受。那就是，这项支出必须能够增加联合共和国的财富，必须能够帮助提高这个联合国家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的发展中最大的不足之一是缺少受过教育的人。由于我们为不多的受过训练的人们都已超负荷工作，很多事情都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快；由于负担不起付给海外专家的工资，其他的事情还没有做。创办这所学院是为了让东非的年轻人们接受一流的教育，这与非洲的诸多问题密切相关。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能够为东非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无论它是否依赖那些享有特权在此上学的人。但是政府决定分配如此高比例的资源用于建设这些优美的综合建筑，用于全体员工身上等——做出这项决定，是期望学生们能理解我是故意使用“特权”这个词语，而不是夸大其辞。

坦噶尼喀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96先令，而一个学生在这所学院的花费约是每年1000先令。也就是说，要花费50多人的日均国民收入才能负担一个学生在校一年的开支，所以无需多说。显然，只有把其看作是穷人对他们未来的投资，这种差异才可在道义或政治层面为人们所接受。

这必须成为联合政府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其他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次要的。

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发展基础跟非洲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低下,没有世界其他国家叫喊着要的石油或其他原料,我们仅有的资源是土地或人民,只有通过有组织地开发这两类资源,我们才能取得进步。

我们已经制订了五年发展计划。要执行这个计划,我们必须拥有两样东西:国家努力下的绝对统一和外界对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援助。只有首先发展起来,才可能得到第二件东西。

尽管现实如此,让每个人都知道实现发展计划中哪怕最小的目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必须得到优先权,必须将我们的力量与智慧运用到解决国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中去。

我们的优先权是明确而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联合共和国中进行一场革命,必须根本改变人民生活的环境。这才是革命的真正含义,杀戮流血与革命无关,获得独立的政治变革只是革命的先驱。在如联合共和国这种欠发达国家中的革命,意味着经济的变革。

这种需要是很平常的。所有年轻的国家,如果想要生存,必须制定革命性的政策。正是这一点将它们与发达国家,也与它们的过去区别开来。但是革命不是随意发生的——经济革命更非如此;革命需要科学、客观的思想,针对现有形势对基本原则的推理应用,将不乐观因素审慎地转化为符合我们意愿的东西。

解决我们国家的发展问题,没有捷径,也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口号不会给人民带来食品,将我们的失败归咎于任何国家或我们自己的任何群体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现在,除了系统地、客观地面对我们国家的问题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思考,然后按照思想行动;我们必须承认现存的事实与形势;我们必须承认现存的贫穷、无知、疾病、社会态度和政治氛围,并在那种情境下考虑我们想要做什么,如何从现存形势向我们更喜欢的方向前进。

没有这种科学、客观的方法,就不会取得任何建设性成果。事实——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如果想顺利实现以后的进程,就必须得到承认、运用或规避,但不能忽视它们。有时候事实让人极其讨厌,而闭上眼睛假装它们不存在,或跟堂·吉珂德一样,在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强加一个个人臆想的世界,这些做法会让我们感觉舒服点儿。但是做这其中的每件事,都是不

科学的,因此也是反革命的。人民居住的又小又脏的屋子,没有因为被称为公寓或村舍而变得好些;我们的贫穷,也没有因为别人用图表或不敬的词语冒犯我们而有所缓解。我们那些被剥夺教育机会的人民,也不会因为我们想用当地的人来代替外来的公务人员,就能够变得更适合医生、工程师、教师或管理者等职务。

堂·吉珂德能从并不存在的龙的手中救出少女,能把破烂的农舍想象成浪漫的城堡,但没有伤到除了他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但是,如果联合共和国的人也试图沉迷在一种类似的浪漫主义中,那么,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和刚刚开始的经济变革都将不幸失败。

这一点不管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只有认真考虑自身的问题,坚持不懈地运用科学客观的思想,才能使我们得到我们追求的更好的生活。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在我们的行动下,我们已经着手将这辆公共汽车推到山坡上,与脚下大片的丰饶之地分离开来。只靠人民的蛮力,不足以把它推到山顶;所以这种力量必须与每一个原子的科学利用相结合:驾驶技术、对引擎的耐心摆弄、变换挡位、在正确的时间使用刹车和加速等。如果途中稍有放松,没有找到障碍物周围最好的路,那么这辆车将会滚回去,葬身其中的不只有司机,还有那些声称知道前方道路的人,而更糟糕的是,还有大量为全局目标默默奉献了如此多知识和力量的人。

在这些情况下,不能因为感伤就将责任推卸给人民,或是那些一旦失败就将工作留下不管的人,哪怕他们是好人。在所有的这些条件下,担心投入工作的、使公共汽车向上前进的人的皮肤颜色或宗教信仰也是不合理的。这些情况需要用到每一个能够用到的人,凭借技术或经验,无论用哪种方式,为朝预期方向前进作出贡献的人。有时爬上一座山的最快的方法,是先下一个较低的位置,找到一条较为干净向上的小路,然后再往上爬,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

这种客观思考的需要适用于我们国家生活的所有层面,但是我们拥有最大的权利要求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让他们的行动紧跟他们的思想。这所大学的很多学生都将进入公共服务行业,无论他们处在何种层次的公共服务行业,对客观性的需要将是重中之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权力要求受过教育的人民,也有权力驱逐不愿意或不可能将他们的智力运用到解决国家建设问题中的人。在我们政府的服务中,联合共和国不负责输送“乘客”,不支持多愁善感,我们的

公共服务必须高效,并对国家的革命性变化有强烈的紧迫感。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以个体或群体的形式从我们所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尽最大努力向他人学习。我们当中那些学习失败或不能继续学习以担负起我们继承的责任的人,必须回到他们能够有效工作的层面上去。我们公共服务中的高级职位,如果是因对他们过去的努力做出的奖赏,那么我们则不能再保留他的这个职位,我们必须考虑让那些现在能为这个职位的要求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无论是独立斗争中的记录,还是文职部门持久的概念,都不应对此产生影响。现在,在替换和保留任何个体职务时,我们必须考虑的是,现在他们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为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些什么。

不仅仅只在涉及我们公共服务人员时,我们要少一些多愁善感,对我们国家需求的客观的考虑必须被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和社会。很显然,处在真空中的人是不可能客观的。思考必定有其目的,必定是为了得到什么。只有明确了我们想要做什么,才能开始考虑如何去做。

但是,这不是我们联合共和国存在的问题。我们致力于我们称之为“非洲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致力于我们大陆独立国家之间自由自愿联系起来的非洲统一;我们致力于寻求世界和平及人类的兄弟情谊。然而,很明显,说了这么多,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或许除了名字,这不会得到世界上所有负责的政治家们的普遍赞同。就我们的国家而言,这些华丽的怨言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联合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旨在建立一个人民自由平等的公正社会,人民健康地生活,掌控着自己的命运,与其他人本着人类兄弟情谊的精神共同合作、追求共同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当然不是对我们当前社会的描述,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消除严重的不平等、普遍的营养不良及受教育机会的完全缺失——这正是我们的问题。

显然,存在一些特定的行动原则,它们对目标本身及实现目标的过程来说都必不可少。我们都知道它们——法律原则;言论、出版、写作的自由;为和平目的联合的自由;摆脱饥饿的自由;通过教育及其他机会全面发展自己的自由;摆脱歧视和强加羞辱的自由;人人平等等。名单很长,而我们必须再增加一项——保持联合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自由。

这些是我们已经接受的原则,它们是我们思想必须做到的基础。但不幸的

是，这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承认，每一个孩子都有上学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发展他的思想。然而，这不能解决我们现在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资源匮乏，无法支持普遍的小学教育、初中教育体系及大学教育。只有依据其他目标，清楚地考虑关于教育的优先性，才能在类似这些事情上得出结论。

这种类型的决定不是在对与错、公平与不公平之间做出选择。它们是在互相矛盾的需求中的选择，或许两者都对，或许只能选择其一。这种类型的选择也不只存在于政治层面。一个文员或一个老师，有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同时有三个人都明显能够从中获益——坚持什么原则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甚至在存在清楚的基本原则的地方，也依旧需要理性的方法。因为通常涉及的不止一种原则，而且这些原则经常相互发生冲突，所以我们可以理性地说，在给予一部分人高等教育之前，应该先使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一些教育。同时，保护国家和发展经济的需求，要求我们至少该准备好一些人，让他们为我们的社区提供高级服务。

这是一个矛盾，但只要我们的资源扩充了，它就会缩小，还有其他一些或许更基本的矛盾。举个例子说，如果一个人行使他言论和组织自由权利，而这会极大地降低我们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使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政府应该怎么做？言论自由、活动及联合的自由是我们希望为人民保护的宝贵的东西。但同时，我们必须紧急保护每个人能够摆脱饥饿、无知和疾病。难道我们能允许为了寻求一种自由，而滥用某种自由来蓄意破坏我们国家吗？

我们来谈谈未经审判直接监禁的问题，这是极其严肃的事。这意味着你关押了一个人，而他并没有触犯任何成文法律，或是你并不能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他触犯了法律。你限制了他的自由，并让他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只是因为你觉得他打算去干，或者你相信出于某些原因他已经这么干了。对一个社会的自由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危险了。因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今天的政府也面对这样的机会，每个公民的自由都减少了。在任何情况下，暂停法律原则都为严重不公的猖獗提供了可能。

然而，知道了这些，我仍旧支持引入这部法律，赐予政府不经审判而拘留人的权力，我已经亲手签署了《拘留法令》。作为共和国的总统，这样做是我作为总统的责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即使在如此重要、根本的问题上，其他的原则都相互矛盾。我们既没有悠久的国家传统，也没有保卫国家安全的物质手

段,而这些在建国较久的国家中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虽然广大人民群众全力积极地支持他们的政府和国家,但少数人仍然能将我们的国家置于危险之中,使几百万人民的努力化为灰烬。

我同意,从理想主义来说,“宁可错放九十九,也不错罚一个人”这样更好。但是像我们国家这种情况,必须考虑其他因素。在这个联邦国家,将九十九个无辜的人暂时关一下,比放跑一个可能会危害国家的叛国者更好。为了不让一个无辜者受罪而赦免九十九个罪犯,一定是彻底疯了。我们的理想一定要带领我们,而不是蒙蔽我们。

这是在极端形式下的问题。但是,哪一个问题影响我们整个未来的进程,哪一个问题牵涉到原则的冲突,每天都得做出判断。因此,我们又一次说回来了,我们需要科学的思考。在为建设我们想要的社会而提出的不同的政策间,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平衡。如果自由的一个方面优先于一切,那么我们的进程会被严重拖后,因而我们很可能会崩溃。我们时刻谨记:我们的人民从英国那里争取独立,不是为了建立非洲人的专制;同样,他们努力获得民族自由,也不是为了让他们曾经的伙伴们继续遭受贫穷和无知。

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调解短期内相互冲突的欲望。我们想保持并扩大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由,并且要确保批判的自由和对既定政策提出相反意见的自由。因为我们需要建设性的批判,它能催生新思想和更多有效的工作方法,而且也是我们正在为之努力的人权的一部分。同时,在维护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联合共和国必须比那些旧的国家更强大有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能将联合的力量投入到这场争取经济自由的战争中去。

这就变成了一个关于重点和优先权的问题。在原则的冲突面前,永远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因为要建成一个营养充足却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国家,或是建立一个人人饿着说话的社会,要相对简单得多。但我们的目标是获得“全部”的自由,那意味着在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思考原则和技术的进步的问题。

因为情况已经变了——被我们改变,因此我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自由的重点也会改变。然而,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综合大局,必须把让所有人过上体面生活的自由摆在第一位。必须首先考虑发展以及与其相关的其他事情。我们考虑任何事情的问题——哪怕是关于个人自由的问题——必须是“这对我们发展计划的进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有回答了那个问题,

我们才能就面临的特定问题做出决定。

只有一个例外。即便是为了寻求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我们也绝不允许我们的国家屈服于外界的控制——无论是直接控制还是间接控制。我们的确需要外界的经济和技术帮助，但是我们争取独立不是为了把我们的独立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我们的内政事务，以及我们在世界问题上的国际立场，必须由我们自己决定。这才是独立的含义，因为独立不是在联合国升起一面旗帜或占有一个座位的权利，而是本着共和国、非洲以及世界和平的利益，有权决定自己的政策。我们也不会因出于感激或期待未来的支持，而参与与我们无关的世界争端。我们没有敌人，我们也不想要敌人，而且我们也不准备让其他人在我们的国家与他们的敌人作战。

不要让我们认为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世界正在划分成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群体，而每一个群体都急于在非洲寻求同盟，而且更急切希望他们的对手找不到盟友。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认真而客观地考虑我们所走的每一步的含义。国际政治问题如我们的发展内政问题一样难以对付，充满危险。因为我们时刻谨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主要考虑的是自己，参与我们的经济斗争来帮助联合共和国的欲望——甚至跟我们交朋友的欲望——都是在其他国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之后的。

抱怨这些没有用；本质上我们也是这种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外国一些国家会帮助我们，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会对自身有害；另外一些国家帮助我们仅仅是希望获得某种回报——不管是外交、政治还是经济方面的。唯一能将联合共和国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国家是联合共和国自身。

这并不意味着联合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因为我们不同的利益经常会集中，尤其从长远来看更是如此。然而，这意味着即便在请求或接受外界的援助时，我们也要采取科学的方式。期望外国政府的无私帮助是不现实的。在我们确实极其幸运时，我们或许能得到几个人的这种无私帮助。但是所有的政府都对他们的人民负有责任，他们可以表示同情——而且这类情况的证据今天已摆在我们面前——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再有所期待。

然而，如果我们想快速发展，就不能跟鸵鸟一样将头插进沙子里，将自己孤立起来。我们必须得到外界资本和技术人员的支持，但我们所要做的是要结合

实际,并且要十分确定可能被迫付出的代价。然后,我们必须决定接受那种援助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

这种必不可少的科学思考,不能只留给总统及政府工作人员。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它的员工及学生们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现在还是在未来……

在我们的人民面前时刻坚持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这两个紧密相关的规则,也是这所学校所有人的任务。在理解了在规则冲突中找到平衡的需要之后,这所学院的人们必须尽力确保目前的需要将永远不会埋没我们为之努力的理想……

63 马西瓦青年培训中心

为了帮助解决坦噶尼喀南部农村地区一些受过小学教育但未来仍将务农的青年男女的问题，在马萨西的英国圣公会附近成立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培训中心。其中的一位联合主席是神父特里沃·赫德尔斯顿，另一位是地区专员。尽管成立初期主要依靠海外资金援助，这个中心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1964年10月15日，总统宣布中心正式成立。

……在这个国家，我们已经遭受了太长时间殖民主义思想态度带来的后果。但不幸的是，这种思想态度没有随殖民政府离开。长期以来，一直有这么一种想法：受过教育的男孩女孩，如果回家做了农民，将是“无用的”。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智力训练是没有必要的——任何人都能做，而且是否受过教育并没有多大关系。

没有什么比1964年的联合共和国更远离事实的了。我们未来的每一个方面，对农民的依靠要甚于对其他任何单一国民群体的依靠，他们是负责使用我们伟大的国家资产——土地的人，他们占据了我们总人口的90%。如果我们的农民无知、守旧、落后，那么我们的国家也将是无知、守旧和落后的。除非我们的农民拥有了知识和为了新生活促进发展的态度，那么城镇中所有美好的建筑、好的道路以及其他的一切，都将像一个奸商用来掩盖底层臭鱼的一堆鲜鱼一样。

现在存在的危险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我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里的一些青年人将要接受知识，但他们的父辈却没有得到过这种培训。因此，在他回到家中时，都有两种必须避免的危险：一种是年轻人可能会鄙视他们长辈的工作，从而在他们的村落中导致困难和不幸；另一种是年轻的毕业生们受传统影响至极，而不能把在这里学到的新知识付诸实践。

你们中那些能去新的地方定居的人,将以合作社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将在为我们国家作贡献的同时避免这些危险。对于那些学成回家的人来说,问题会更严峻一些。但有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教育。

即便现在,在这个国家中我们仍然认为,教育是一种要在学校或类似机构中做的东西,而“成人教育”就是学习读和写。这些定义都不充分,因为都只包含了真相的一部分。事实上,教育贯穿生命的始终:成人教育主要涉及一个人成年后发生的那部分教育。在现代世界中,一个男人向他的父亲学习——而父亲也向儿子学习,但这只是在父子相互尊重的条件下才会发生。

在这所学校可以学到来自全世界的知识和经验,但是我们年长的农民们经常会怀疑这些新思想,而对允许自己在自家农场上做实验非常谨慎。年轻人几乎总是缺乏耐心,将会发现这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来自这所学校的人应该意识到,这不只是愚蠢,这是恐惧与经验的声音,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直到现在,如果庄稼歉收,人民就要挨饿。一旦发现了一种能完全避免灾难的方法,那么负责任的人会因此反对进一步实验。

我建议,要帮助克服这种态度至少可以做两件事。首先,学生们必须努力理解为什么新方法更好,并且要记住它是在哪里试验并得到了证明,那样就能够解释这些事情了。第二,如果你必须在你父亲的农场上用传统的方式耕作,那么,另外开辟出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依照新技术耕作。当这些新技术证明确实有效——尽管这或许要花两三年的时间,那么人们就会接纳这些新方法了……

64 私人投资的价值

1965年2月11日，总统为达累斯萨拉姆 E. N. I. 炼油厂奠基，并阐释了这种私人投资与坦桑尼亚人民的关系。

我很高兴来为达累斯萨拉姆炼油厂奠基。我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我相信，这项实实在在的工程所付出的辛劳是我无法表达的。但或许我所做的也并不完全没用，至少它可以表明政府对这笔500万英镑投资的兴趣与支持。

这500万英镑投资无需坦桑尼亚政府出一英镑。关于这个项目，我们无需担心“当地的花费”或找技术人员建设及经营投资的问题，因为这个炼油厂由一个私人公司出资、建设及经营。这就是我们在《国家五年发展规划》中倡导的私人投资。

这个项目的进行源于两大因素。首先，政府决定在坦桑尼亚建立一个炼油厂，而不是继续进口原油的终端产品，因此我们着力吸引那些可能会承担这样一笔投资，并能使坦桑尼亚获益的人。第二个因素是，通过对一个有竞争力的石油公司的商业认同，使他们也能在坦桑尼亚建造炼油厂中获益。

联合共和国人民欢迎在此领域及其他领域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私人投资。尽管政府暂时没有企业资金，但这并不意味着坦桑尼亚人民不关注企业方面的活动和成就，实际上我们对此十分关注。而不管怎样，我们已经与石油公司达成一致：在一段稳固的时期之后，如果公司愿意，政府将会收购炼油公司50%的股份。但同时，我们也会用自己的资金进行其他的国内投资。

我们必须要有，也肯定会有其他的投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目标是，到1970年，在制造业的投资目标是4000万英镑，而这笔500万英镑的投资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开端。更重要的是，这笔投资将增加我们国家创造的财富，并因此促进我们国家的繁荣。因此，我们没有付款给其他国家的人民使其为我们

工作,而是付款给我们自己的工人来增加原料的价值。我们的工人将在坦桑尼亚消费工资,因而会创造出能够鼓励其他投资的市场。

但我们不要在这些方面犯任何错误。在建设期间,许多人将在此工作。但是,在炼油厂投入运营时,将要雇佣大约仅 250 个工人。这意味着在此企业中,每创造一份工作要投入 2000 英镑!所以,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每个工人的工作都由精细而昂贵的机器来补充,因此显得十分多产,但是我们必须谨记,必须要仔细维护、合理而高效地使用这种机械,而且不幸的是,我们需要为它们付出代价。在炼油厂的利润中,所有的设备及投资都需要付出。我们的工人越高效地完成任务,就需要他们对将要装置的机械越仔细地维护,那么坦桑尼亚就会越快从它土地上的这个炼油厂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65 对剑麻产业的政策

剑麻出口是坦桑尼亚外贸中最重要的单一出口项目。1965年2月13日，总统成为在坦噶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剑麻种植者晚宴上的尊贵客人。在代表大学学院接受了协会赠送的礼物之后，总统就这项产业的未来前景及政府政策发表了讲话。

……共和国现在拥有了一个致力于要快速进行经济扩张的政府，而且政府认为，这样的扩张需要我们社会所有部门的积极参与，政府自身也渴望在鼓励和促进生产的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

这种联合努力在未来将会变得十分必要，你们协会赞助的最近的研究证明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剑麻生产将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生产者不断增长的竞争，同时，人造代替品的发展缩小了我们所有人要努力运作的市场。我认为，我们必须敢于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未来5到15年内，剑麻纤维甚至剑麻产品的价格将会下降。我们甚至不能用任何短期价格来安慰自己；价格、质量或运输的不确定性只会加速剑麻替代品的商业化。

对我们来说，知道这些事情及进行这些“客观”的研究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因此变得消沉并接受挫败，那将是一件极坏的事。实际上，这种报告没有考虑到某些方面，尤其是它没有指明我们对研究所呈现的事实做何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的反应可以是，而且必须是为此产业的繁荣而战，使它在未来几年中为坦桑尼亚的需要服务。

在此基础上，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完全拒绝任何减少坦桑尼亚剑麻出口量的建议。我们打算在国内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剑麻，并且我们打算卖掉它们，不管是为了传统用途还是新的用途，不管是为了出口还是用于国内新的产业。

我这不是在说大话。我正在陈述一项政府政策，这是我们在全面了解未来

几年内剑麻产业将要面对的问题的基础上做出的决议。或许长远看来,剑麻将不会用作传统的目的,但是正如凯恩斯勋爵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而同样正确的是:世界人口正在不断增长,而世界贫穷国家也正在积极增加他们的农业产量。而剑麻纤维将在何时会因人造纤维而大大过时,至少部分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价格和运输策略。当然,坦桑尼亚人民无法决定新世纪的科技发展,但是对我们来说关键的时期是接下来的 15 或 20 年。在这段时期,剑麻必须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担当重任。到 1980 年,共和国内其他的发展将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对这一产业的依赖会减少,但同时我们必须团结起来面对出现的任何问题,而且必须从剑麻生产中为我们的国家获得最大的回报……

我们的销售政策也必须做出调整,来符合我们的情况和需求。我们必须保持传统市场,采取一种强有力的政策以增加这些市场购买坦桑尼亚剑麻及剑麻产品的数量。但我们也必须走出去,在新市场中寻求传统的出口。我们真的没有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用的东西吗?他们的经济计划中不可能有我们的剑麻能满足的潜在的需求吗?对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不以西欧及英国为榜样,同他们扩展我们的贸易呢?对政府成员来说,尽管同俄罗斯及中国等国家协商贷款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但那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向那些国家出售我们的产品,摆脱传统贸易的束缚。没有任何国家必须为坦桑尼亚的生计负责任,我们必须自己去谋生计。如果人们不想要我们的剑麻,那么他们就不会买我们的剑麻,就是这样。去发现、去供应每一个可能的市场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忽视东方新市场的可能性,那将会与忽视西方已有的、传统的市场同样愚蠢。

当然,确实政府希望打破现有的非非洲人对坦桑尼亚剑麻生产的垄断和控制。对聪明人来说,这极为明显,也无需解释。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这可以通过我们的扩张计划得到最有效的实施。我们没时间去冒险扰乱剑麻生产现有的组织,但是在未来 5 年中增加 32% 的产量这一目标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在发展规划时期结束之前,会使非洲人加入到这个产业中来。

因此,部分出于社会原因,我们制定了针对剑麻的五个新的解决方案,而且我们鼓励通过“合作小股权”的形式来种植这种作物,但这并不代表一个非经济思想体系的决定。正如我今晚早些时候提到过的,现在的坦桑尼亚政府不相信依靠激励就能扩张所规划的农业,只有通过新的解决方案,通过把农民组织到

剑麻合作社中,才能实现大部分的产量增加。

然而,我们从那些有剑麻生产经验和诀窍的人那里得到的合作和帮助越多,我们让非洲人加入到这个产业中的计划就会越成功。也就是说,我很高兴地说,从这个协会及他的成员那里,我们正在进行着这种合作……

66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

1965年2月,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同月26日,总统在北京广场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发表了讲话。

……在东非有这样一句谚语:大象打架时,踩碎的是草。因此在处理与我们无关的国际冲突时,我们决定采取不结盟政策。在世界舞台上存在着彼此敌对的阵营,但坦桑尼亚将无视来自双方的威胁或奉承,而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将不顾其他人的威胁建立自己的贸易;没有什么能够限制我们进行自由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我们继承的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世界相联系并互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但现在我们正在摆脱这种体制的限制。

13世纪和14世纪,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就同中国进行过贸易往来。现在,我们独立的国家正又一次同贵国建立贸易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渴望建立这种贸易关系。我们想从贵国这里买到产品,并将我们的产品卖给贵国,就跟我们与传统的贸易伙伴进行的买卖一样,我们的不结盟政策意味着我们本着人类的尊严与平等,友好地对待所有的国家,不关注他们自身所选择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如何。

我们的信念是,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的客观情况选择自己的社会形式。在我们为争取独立而斗争时,我们宣称了这个权利,正是这个信念贯穿了我们反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整个过程,我们希望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我们永远不会允许我们的朋友为我们选择敌人。

正是对这种信念的追求,使坦桑尼亚非常高兴能与中国建立新关系。有人告诉我们,中国是“危险”的。它是如此聪明,几个技术人员就能削弱我们整个国家,因此,我们不应该与中国有任何联系。我们说过,而且我现在再说一遍,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我们将友谊之手伸向中国,就跟伸向美国、俄罗斯、英国及

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会自己判断中国对我们有什么意图，而不需要别人告知。而且中国也已经伸开双手迎接我们。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位朋友，一位优秀的新朋友，但是在殖民主义统治的日子里，我们却没有机会结识这位朋友。他人的恐惧不会影响坦桑尼亚同中国的友谊，就如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友谊也不会因其反对者的言辞而受到影响一样。

因此，我再说一遍，坦桑尼亚希望基于平等的尊严和人性，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必须遵循那些基本的原则。但是，在非洲，这些基本原则仍然遭受着挑战……

我们不期望所有的国家在每件事情上都能达成一致，也不期望国际间的误解能到此结束。但我们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必须敢于直面 20 世纪中期的现实生活。我们必须共同生活，因此我们有必要坐在一起，共同商定该如何去做。

坦桑尼亚已经加入联合国，我们相信这对实现这个目标有利。我们并不认为这个组织是完美的，承认它必须改革。我们尤其认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不利于世界和平，并会因此大大降低联合国的影响力。但是，在我看来，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未必是联合国自身的决定。而这沉痛地提醒了我们：或许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中的很多国家都不像我们宣称的那样独立。

毫无疑问，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你们伟大的国家能加入联合国。如果所有这些国家一起努力，贵国一定能够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原先的组织形式和目的现在已被众多事件所取代。在 1945 年的会议上，资本主义世界在多数事情上占主导地位，可以与所有其他国家表示反对意见。

但是，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现在，联合国大会的大部分成员是非洲和亚洲国家。我们没有控制联合国，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会形成统一战线阻止其他国家出于自己的目的来控制联合国，从而使其成员国能继续通过联合国机构寻求国际调解。

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而且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能够加入这个世界组织。联合国是强还是弱，由其成员决定。它不是一个世界政府，而是一个世界观点的论坛，是一个大会场，是对全世界需要一个大会场的认同。在那个大会场里，我们所有人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的人性及我们同住在这个星球上这一事实。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现在必须建设……

67 对马里的国事访问

1965年4月10日,在对马里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总统受到了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总统的设宴款待。在回应为坦桑尼亚的祝酒时,尼雷尔总统再次就非洲统一发表讲话。

……坦桑尼亚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马里的面积更大。是什么把我们分开了呢?是地理把非洲以及非洲其他地区分开了,没有别的什么。我们有着为全体人民争取好生活的相同的抱负,我们有着能够不顾其他人的争吵而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的相同的目标,我们甚至面临着相同的内政及外交问题。所有独立的非洲国家都是如此。那么,当团结起来能让我们前行的道路更加平坦、更加安全时,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分开独自向前呢?

在沉重的压力下,36根单独的树枝每根都会折断,但如果把这36根树枝绑在一起呢?那么,不仅能安全挑起担子,而且每一根单独的树枝都能保持完整。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的人民从日常生活中都知道这些事情,非洲的领导人们当然也知道这些事情。

然而,我们不是树枝,也没有农民将我们捆在一起。我们必须自己把自己捆在一起,但那不是一件易事。

在非洲仍然是殖民地时,它很不幸地被几个不同的欧洲殖民势力瓜分。这意味着除了我们的本土语言之外,你和我,总统先生,已经学习了不同的国际语言,所以我们彼此交流时要用译员。而且,独立的国家不仅继承的是不同的语言,而且我们的行政机构和经历也不同,我们的教育也不同,我们的经济也对不同宗主国的经济感兴趣。

这些是确实存在的真正问题,它们意味着在将我们绑在一起时,我们都需要做出调整和妥协以达成一致。即便我们所受的训练让我们用不同方式表达

相同的意见,我们必须彼此信任。这类事情不能在一夜间完成,或许,其中一些必须在实现有组织的统一之前做完;另外一些可以在追求统一的基本的政治决定被非洲采取并落实之后,再慢慢做……

不要让我们在唆使之下,进入看起来容易的,却只能容部分人前进的道路。非洲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前进,否则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实现目标。非洲统一组织这个机构必须保留并得到强化,这是坦桑尼亚的信念,而且我们也将本着这个信念采取行动。

几乎无需补充的是,并不意味着较小的群体就不能把自己团结在一个团队中。如果两个、三个或四个国家都各自发现前进的旅程太艰难,它们可以增强彼此的力量,这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但是所有的联系都必须有这样一个特点:能帮助整个群体的前进,而不是阻碍它的前进步伐。在全非洲统一变为现实之前,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在实践统一的基础上区域经济及社会合作或政治联合会,而不是在另一种思想体系或政策的基础上所做的合作——这些事情都能够有用。但是对我们来说,离弃目标就是背叛,不仅是对那些为争取我们现在享有的独立而战斗的人的背叛,也是对信任我们掌管非洲的子孙后代的背叛。

这样的一种离弃也是对另一个群体的背叛——对南非那些仍在遭受殖民统治或种族压迫的兄弟们的背叛。因为有一项紧急任务,无论是团结还是分裂,非洲都无法逃脱,那就是我们非洲大陆的完全自由。

非洲几乎三分之一的土地仍处在殖民主义的统治和种族压迫之下;坦桑尼亚南邻只有赞比亚和马拉维是自由非洲的前哨。另外,西部一些小的地区仍然被殖民势力控制。

这种情形不能再继续了。非洲被压迫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有权得到我们这些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全力支持。而同样,通过统一的方式能够给予它们最大的帮助,必须不断加强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效力,并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因为非洲必须获得自由。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方式获得自由是我们对自己及世界的责任。坦桑尼亚相信,非洲应该督促西方国家并坚信他们将协助我们通过和平方式赢得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但是,如果这些方法失败了,我们不能因此默认奴隶制度。我们必须采用任何必要的方法……

68 对荷兰的正式访问

1965年4月21日,在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期间的一次国宴演讲中,总统就不结盟政策及坦桑尼亚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愤怒反对发表讲话。

……而正如我们保留对自己内部组织的决定权利一样,我们也保留决定最适合本国外交政策的权利,但我们不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决定哪个国家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有权向其他国家奉献友谊,而不会因其他人的反对而踌躇不前。

这项政策得到了不同的诠释:有时它被称为“积极的中立”,而有时被称为“不结盟”。它真正意味着试着跟所有国家成为朋友,而不是为了寻求与一半的国家的友谊而跟另一半国家争吵。我知道会出现反对这项政策的争论,任何感觉自己受到威胁的国家自然会寻求同盟,这个我们理解。但事实是,我们知道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对任何国家都不是威胁,因此我们不明白怎么会有国家希望成为我们的威胁。因此,我们要求有权根据每个国家对我们的态度及对非洲这个整体的态度,来对每个国家做出评判。

我承认,在我们获得独立之前,我活在一个假想中:很容易实施像“不结盟”这样简单的原则,但我发现这是极其困难的!或许,这也部分源于在我们独立之前,坦桑尼亚人民站在国际冷战冲突的一边,为了在与我们无关的事件中走中间路线,因此我们必须朝冲突另一边的方向前进。如果你从子午线西部的一个点开始,而又想到达那条线,那么你必须朝东走,此外没有其他能到达那儿的方式,但那不意味着你打算超越那条线,并在其东部相同的纬度停下。

实际上,坦桑尼亚的国际政策在独立后的三年半中没有变化。我们打算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任何干涉;我们打算努力促进非洲统一;我们打算为寻求和平努力工作;我们决定要致力于结束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先在非洲,然后在其他

他地方。

即使我们的确非常强大,这四项原则中,只有一个规则可能会被理解是对任何人的威胁,那就是我提到的最后一条原则,尽管在我们自己排列的次序中,它不是最后一个。因为我们强烈渴望非洲大陆及全世界的和平,但是我们不相信和平能建立在根本不公平的基础上。

因此,如果非洲大陆上某个国家全力追求种族主义,我们绝不可能袖手旁观。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患有这种疾病的人:认为自己天生比另一种肤色或种族的人高级——在坦桑尼亚也有这种人,但是这种疾病只在南非得到传播并进入其社会结构。非洲人是那个国家的主要受害者这一事实,使同处非洲的我们更能强烈地意识到它的不公,但是世界所面临的真正危险来自种族主义本身。应该战胜这种疾病,因为这样做不仅符合我们黑色、棕色或黄色人种的利益,同样也符合白种人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非洲人有权要求全世界支持我们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支持我们对南非政府政策的斗争,而我们并不为此要求而感到抱歉。

第二,我们还需要赢得摆脱外国势力控制获得自由的战斗。在我们很多人的一生中,自己的国家遭受外国势力大约五年的控制。我认为在第五年,荷兰人民不会再像在第一年时那样默许这种控制。同样,葡萄牙殖民地以及南罗得西亚的人民也跟它们首遭占据时同样坚定地寻求自由。实际上,并不只有他们自己如此坚定,整个非洲都是如此。

这些政策真的意味着对每个人的威胁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非洲跟欧洲、亚洲、美国一样,都有获得自由的权利。我们当然不希望威胁葡萄牙,我们希望能跟它像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和平共处、建立友谊。但是,如果能使非洲权利立即得以实现并受到尊重的,我们只能这么做。我们希望那些既是我们的友国又是葡萄牙友国的国家会帮助我们和平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这样做既满足我们,又满足葡萄牙及整个世界的需要,因为世界和平经常因这些明显的“局部”矛盾而受到威胁。

为了使葡萄牙殖民地和乎独立,西方国家有方法,实际上也有责任向他们的盟国——葡萄牙施加和平的压力。我们将这些西方国家看作是我们通向自由和平之路上的盟友。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会共同失败,这是上帝不愿看到的。但是如果失败了,我们非洲人不会放弃,将只能被迫放弃和平解放葡

萄牙殖民地的努力。

如果确实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被迫放弃和平的道路,西方国家最不可能帮助我们。而如果我们转向其他地方寻求帮助,正如我们必须做的——我再重复一遍,正如我们必须做的——西方国家将会误解我们。

我们请求西方国家不要让其发生。我们请求西方国家现在能理解我们,我们还有时间。

69 节俭

1965年4月26日，在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一周年纪念日，总统通过广播发表讲话。他谈及了发展的需要及问题，然后继续谈到坦桑尼亚应该向中国学习的一个经验。

在他于6月初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以及在随后的政府预算中，都贯彻了这项自律要求。

……2月间，我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那里我学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6亿多人口，而中国政府是愿意用资金和技术帮助坦桑尼亚实现《五年发展计划》的国家之一。他们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节俭的民族。他们确实节俭，小心地使用他们的资源，并且只把钱花在绝对必要的事情上，这对个体及政府来说都是对的。中国几乎没有私家车，人们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班。政府官员也是这样，只在真正有工作需要时才使用汽车——而汽车也是又小又便宜的那种。不需要将钱全部花在食品、衣服及住房上的工人们不会仅仅因为买了会高兴或因为别人买了，就会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他们反而会把钱借给政府，以提供更多投资、更多教育以及更多的健康设施。

我们必须也采取这种态度。对我们来说，向其他国家借钱为自身做些事情是很愚蠢的，我们也已经经历过这样做带来的危险。无论我们个人还是整个国家，如果因为想看上去跟美国一样富裕，而使我们的发展计划失败，那将是愚蠢的。我们在过去不久的一段时间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如为地区专员购买大型汽车——就是这类糟糕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重复犯错。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并不富裕，而唯一能消除我们现在贫困的办法就是接受现实，像穷人一样生

活,并将我们剩余的每一便士花在能使我们未来更富裕、更健康、更有教养,能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事情上,这就是政府将要采取的政策。我相信坦桑尼亚人民想让我们这么做,而且他们会与我们配合。这是巩固我们的联邦及统一进程的方法。通过献身未来、无私地工作来保护我们的独立,为我们所有孩子的生活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

70 非洲统一的本质及其必要条件

本文写于1965年3月,1965年7月发表于美国非洲文化研究学会杂志《非洲论坛》第一期。

在非洲独立之前,非洲的民族主义者还没有明确表达过“自由”的意愿,用东非的话说就是“乌呼鲁”。一般认为这些词语的意思不言自明,在追求独立的运动中有关宪法、国家机构和国与国之间关系方面的细节一片混乱,只会使我们不能在当前的主要任务中集中精力。上述这些事情都被认为是应当经过许多内部探讨协商的问题,而且在一国有权自主决定这些事情后,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处理。在非洲争取独立的最后阶段之前,几乎在非洲各地都贯彻这种政策。正是在那时,关于独立国家应采取何种形式机构的分歧在一些情况下导致了国内分化,不管怎样,事件的逻辑性通常会使得这种分化只是暂时的。

同样,这种方法也被应用在处理非洲统一的问题上。多年来,非洲各地的政客一直在呼吁非洲统一,并提出了关于非洲统一的政治和经济论点,但没有涉及具体的细节。但是,这种情况不久就会改变。要想实现非洲统一,当前他们应深思熟虑并进行详细的协商,而不是空喊口号。

要想在非统进程中取得进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平等协商来实现统一。这意味着,非洲大陆没有一个人能按自己最理想的组织形式实现统一。相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非统的目标并进行郑重协商,自愿放弃一切对非统不重要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非洲统一。

但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目标有清醒的认识,眼下我们应自问非统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使用非统这一口号现在是我们自己的事。外部力量可以延缓或促进非统进程,但只要我们真心想实现非统,他们就不能阻碍我们的步伐。当前,三分之二的非洲大陆已实现自由独立,有超过2.2亿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代表来

表达诉求。因此，目前能够延缓，甚至阻碍非统进程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争吵或对用人和机制的意见不一，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若对统一的意义和影响能有清楚的认识，就能减少这些危险。如果我们曾经对自己的目标有清醒的认识，就能够勇敢面对，乃至战胜非洲大陆上缺乏底气的那些人的恐惧，战胜那些鼓吹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在非洲当前国家分裂大背景看来，排外民族主义实际上等同于部落主义。

在非统所需的基本条件方面我们不应有分歧。我们吸取了其他地方统一运动的教训，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同时多年来我们也积累了处理政府问题的经验。36个国家的领导人现在都知道在非洲这个分裂的大陆内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我们了解来自国内外的基本的可能性和压力；我们知道虽然在各国压力的形式不一，但本质和根源是一样的。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能够感觉到自己国家按照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取得了进步，每个人都经历过国家机构不完善或落后而造成的挫败感。

同样在政治方面，每个非洲已独立国家都宣称不与任何大国集团结盟。但这些年来，每一个国家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实施这个政策时都会碰到很多困难，因为很多大国一直以来都将我们当作国际权力冲突的牺牲品，或把我们看作是留待他们或他们的敌人来填补的权力真空地带。

但是，自问非统的真正含义事实上是自问非统后我们想要什么、期待什么、想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探讨非统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位非洲领导人公开反对非统？

从广义上来说，答案很简单。非洲人民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消除一直在困扰他们的贫困。要想达到这一目标，仅仅获得人身自由、拥有议会、总统和部长还不够，还应赋予人民切实可行的权力，使之能从己之欲，应该有足够平衡、稳定、强大的经济，以促进和持续发展，并能经受住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冲击。换言之，非洲希望有政治实力来阻止其他大国利用自己来获取他们的利益，有经济实力调整经济并为现代经济提供支持——这是非洲人民实现繁荣的唯一途径。

当前这些事情还没实现，或者说还不可能实现。非洲众多实现独立的国家中，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遭受着不堪重负的压力。对我们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当前最大的威胁就是非洲其他独立的国家。

这种观点很特别,但情况确实如此。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从孤立来看实力都很薄弱,彼此之间为了获得富国的青睐而相互竞争;各国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但各国独立而又相邻的经济互相制约、互相削弱。假设坦桑尼亚与别国起了冲突,面临信贷或援助的减少,非洲的其他 35 个国家将利用这一形势来改善他们本国的前景。假如坦桑尼亚与非洲以外的一个国家签订了一份贸易协定,而邻国此时或许正同这个国家协商更佳的协定条款或建立一家工厂来生产贸易协定涉及的这种重要商品。那么这份贸易协定对它的邻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彼此都是独立的,而每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关注我们自己当前的利益。

其次,我们每个国家与外部的世界相比都是孤立的,看来都很弱小,但又非常依赖外部,因此在做决定时几乎都要考虑大国能否接受。对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来说,采取可能招致大国敌对的措施都需要极大的勇气,通常的后果是自我牺牲。我们缺乏人力和财力来反击针对我们的国际舆论战争,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轻松地解决任何试图破坏我们政府或宪法的颠覆活动或其他秘密活动。

这些不是我们闲来无事发的牢骚,也不是源于我们妄想的迫害担心,而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在做出任何重大国际性决策时都应将此考虑在内,甚至在做一些国内的决策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这些国家弱小,经验不足,要是不和外国合作就很难获得发展。设想一下,假如坦桑尼亚没有外国资金和技术援助的话,那么其《五年发展计划》也要做出调整。即便再过 15 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达不到预期的 45 美元。如此一来,我们的发展将十分缓慢,我们对全体人民自由的激情期待将变得一文不值,而对非洲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进一步说,不管我们有没有获得外国的投资和经济援助,要是我们各个国家之间仍然处于相互分离状态,那么要使我们的国民生活水平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将耗时长久。

这些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非洲的国家都尽力避免去面对这些事实,更别说承认这些事实了。我们经常谈论非洲将来会繁荣,并遵照自己获取自由的意愿行事,却完全忽视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真实存在,除非我们坦诚地去面对非洲当前分裂的影响,否则就绕不开这些阻挠非统的障碍。

实现非统我们应团结一致

统一是实现非洲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统一应保障这三者的

实现,否则就毫无意义;统一必须做到防止非洲外部势力利用我们的恐惧和需求来牟利,不应使非洲不同国家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相互竞争,到最后以政治妥协来收场;非洲应有效地自我管理,并且有能力最低限度地防止外部侵略;统一应确保非洲实现市场统一,而人民不应当被 100 多个国家的海关和关税壁垒隔开;非洲应实行单一货币政策来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与经济因素相关管理的合理化来提高生产率。

要实现这些要求非洲就必须取得统一,一致对外,不再有分散的非洲国家,取而代之的是非洲这一整体。单独国家的主权要为其让步,以此来达到所有非洲人的政府。

还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吗?因为很难达到这一目标,但很容易实现非洲国家联盟。实际上,非洲统一组织的很多方面已经实现:在该组织中各成员国保持主权独立,同时要与其他国家相互合作,并尽力与其他国家实现行动一致,所有成员国只会受到一致认可的原则的约束。

此项计划能否确保外部势力不会利用非洲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和愿望来损害非洲大陆的完整?能否保证法律和秩序只会受到来自非洲内部的阻碍?如果一个国家反对大家一致同意的决议怎么办?人们是否期待该国接受多数决定的共同责任原则,并在大陆委员会之外对此表示支持呢?如果该国做不到这一点该怎么办?

非洲国家联盟在很多方面确实有效。一方面,不同成员国之间不存在大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他们同仇敌忾的想法促使他们维护统一。可是一旦内部出现紧张局面,一旦不同地区间的短期冲突带来不可避免的优先权问题,那么应该通过什么方式使这些平等自由的国家接受一致行动带来的约束呢?

事实上,非洲联合国家在真正需要统一的时候是无效的。或许我们谈判协商的习惯会暂时使不同国家撇开分歧或利益冲突走到一起。这种情况只会在每个国家都觉得统一高于其他一切的时候才有效,而毗邻关系能带来相互理解,但也能带来敌对情绪。一旦统一的感情遭到削弱,那么联合国家要么完善成为更科学的机构,要么瓦解。

那么建立诸如欧洲正在建立的统一市场效果又如何?如此一来任何国家将不必放弃控制外交政策,或技术上来讲的经济政策的权利,那些达成统一的协定除外。

就我们而言,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点是真正的经济合作要求很大程度上的经济一体化,而这会影响国际关系。第二点是,没有一个国家希望在缺少政治一体化的情况下,使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停滞。非洲国家联盟这一组织当前仅处于技术层面,西欧国家早已经历过这个阶段,欧共体提供给我们的教训只是达到目的的方法的可能性和困难,而不是达到目标本身的经验教训。

但是非洲没必要将眼光放在非洲以外的地方,来研究经济合作和政治一体化的脱节问题。非洲大陆内一些国家间在某些领域的经济合作已显现成效,东非国家尤为如此,除三个国家外,这里已经有了统一的市场和很多统一的服务。

这种做法的优点对东非整个地区而言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个别国家来说却非常不利。尽管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国家看待问题时首先要从自身考虑,其次才是从地区整体考虑,但每一个相关的重大决定都应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决定。这种体系不可避免地会使效率低下,还意味着一国在迫切地需要发展时会受到其他国家决策的阻延。此外,东非为较贫穷地区的利益而抵消较繁荣地区的经济优势采取的行动不能抵消这一优势。上述三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对统一外交政策不同的具体理解,各自不同的参与对外贸易,并援助协定的能力及其他很多方面都为某些希望削弱我们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人孕育了沃土。

因此,这两个选择都不能解决非洲不和的根本问题。它们或许会改善这种状况,并为之铺平道路,但是不能为真正解决问题打下足够的、坚实的基础。实现我们统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直面这些问题的涵义并实现真正的统一。

放弃主权

长久以来人们经常认为非洲国家实现独立才不久,不会自愿交出主权,国家独立的艰辛使人们忠于国家,不会放弃主权,甘受主权被废弃之苦。如此看来,尽管我们应建立一个全非洲人的政府并使之在某些方面拥有权力,但所有国家应该和以前一样主权独立,甚至拥有更强的主权。

这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统一的目标要求一个全非洲人的组织应当在某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掌握权力,而组织的成员国家在这些事上没有权力,涉及外部世界时在非洲必须只有一个政府。

国家权力应掌握在谁的手中,人民、议会和议会团体是否应有自己的权力,

这些问题的理论依据与这个中心问题毫不相关。实现非洲统一至关重要，应让一个或多个机构掌握所有与外部相关关系的最终决定权。与当前一样，只要国家拥有主权，就会存在许多与外部世界相关的最终权力来源，这才是国家主权的真正意义。非洲实现统一后，就非非洲人权力而言，只能有一个最终权力来源；各国的主权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整合所有国家的单一的非洲主权。

关于这一点并不奇怪。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人对自己的州很自豪，渴望向外国人讲述该州的大小和重要性，但在外国人眼中他是美国人。要是在他介绍后有外国政府想要在得克萨斯投资，或从这里购牛或同得克萨斯人建立其他联系，这一切必须要通过美国政府。美国以外的国家不能说：“我喜欢得克萨斯州，但我不喜欢俄克拉荷马州，所以我打算只与得克萨斯建立友好关系，以此来使俄克拉荷马州难堪。”该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拒绝从俄克拉荷马采购商品，拒绝派遣国民去该州或在该州投资。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两州都只是美国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独立的实体，没有主权。通过宪法赋予两州的权力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在外界看来，权力的来源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

就外部世界而言，非洲也应该有唯一的权力来源，对外事务应有唯一的发言人，这就是非洲政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权力实际上是无限制的。理论上它应代表非洲发言和处事，但在实际生活中，它应把非洲大陆各国的观点、态度和需求都考虑在内。就像美国政府不仅要考虑那些认为是客观正确的事情，还要考虑中西部地区可能存在的孤立主义倾向、北方的商业利益和南方的民族偏见，同样，非洲政府也应考虑并抓住穆斯林、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不同观点，法语区和英语区的不同观点，占人口少数却有话语权的人和那些占人口多数却缺少话语权的人的观点。理论上非洲政府在各个领域应全权负责。实际上，非洲政府应和其他政府一样，在希望做出决定的背景下必须要考虑来自国内的压力以及能容纳这些压力的体力和经济实力。

但这种压力存在于尽力为非洲所有国家确立共同政策的每一个非洲组织。不同之处在于主权从分散国家转移到单一政府后就可以达成决议，但若主权仍分散在各个国家手中就很难达成统一的决定，与刚果的处境相关的非洲内的困难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非洲统一组织已经成立，但各成员国相互分散并时常产生对立，因此，要想做出有价值的决定，甚至妥协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放弃国家主权的基本需要不仅仅应用到与外交和政治事务相关的方面,还关系到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也关系到发展和经济的许多部门。理论上,经济援助通常与外交政策态度无关,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即便是通过受惠国所承担的义务及随之而来的感谢和羞愧。给予与接受的援助会影响政治态度,是有力的武器,即便这个武器是消极的武器。在有关政治团体内分散援助,对达成或否定重要的社会目标或社会政治目标有很大的潜在影响。给某一特定区域的援助可使当地居民自省,或促进该区域形成基于区域位置和形式的民族或国际视野,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

只有单一政府主权替代当前存在的分散政府主权,才能达到统一的直接经济目的。例如,非洲内部贸易的扩展依赖于国与国之间贸易壁垒的消除,依赖于建立统一的市场,这是在经济方面实行的最大限度的尝试。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 36 国就过渡的每一阶段和最终结构不能坐下来谈判并达成一致,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成立一个非洲财政权力机构在最终阶段来实施这一尝试,就需要 36 国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

同样,发展、投资和通讯扩张的首要任务不能真的依赖于非洲这么多独立分散的国家间的讨价还价。即便那些反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人,也会赞成建立政府的必要性。在整个非洲基础上的经济规划和发展是一个非洲政府存在的前提,这样的政府至少能在国与国之间问题达成一致的所有努力失败后,有权做出最终的决定。

一个崭新的国家

实现非洲的统一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实体来取代当前非洲大陆上的很多小的国际团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利用非洲资源为非洲人民牟利,才能免受来自其他世界威胁的担忧。必须建立跨非洲大陆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因为这是一个实体,而不是很多实体的集成。

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个集权制的、拥有单一至高无上权力的政府。它必须有一个在某些基础领域有至高无上、专有权力的联合政府。除此之外,也应还有其他的权力机构和政府,只不过权力要小得多,而且这些权力都源于宪法,而不是源于中央政府。这就是说,新的非洲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央和各组成部分的分权应取决于建国者和子孙后代的决定。

但是有些方面必须只归中央政府管辖,如外交、国防、国籍、货币、海关、对外贸易和矿产资源等,至少这些必须归中央政府管辖。当然,一旦发生冲突,中央政府对一些方面必须拥有并行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包括一些对经济发展、治安维持、通讯、公共医疗、教育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央政府越强大,非洲的潜力就会越大,因为在实践中权力可以按需下放,但要把权力从低级政府收归中央政府却很困难。同样还很重要,要意识到一旦下决心实现统一,小国和贫国最有理由支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整个非洲大陆实现利益和责任的均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国会从一开始就下统一的决心。相反,担心被大国支配可能会使他们在协商的过程中对统一持有更多疑虑,使他们更难做出决定。

新政府的宪法不可避免地将是当前非洲各国的政治态度和经济政治情况的自然结果。新宪法的成功与否只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新成立的非洲政府必须有能力使民众对其忠心。因此,政府的基础不是各成员国,而是各成员国的人民,否则这个政府就不能承受政府初建期的压力,就不能充分发挥整个非洲的潜力。这不排除对各成员国的忠诚,但对各成员国的忠诚必须要次于对非洲身份的认同。这意味着逆转当前非洲的发展趋势:十年以前问一个非洲人来自哪儿,他会说“坦噶尼喀的非洲人”,如今同一个问题,如果把所在的大陆加上,他会说“非洲的坦桑尼亚”。

其次,非洲政府部门应对整个非洲大陆,而不是只对非洲的某一部分负责,这个政府必须有能力履行相应的责任。在非洲,个人自由不被看作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的政府整天纠缠于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就会使所有的工作瘫痪,将永远不会实现我们渴求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突破。

实现统一

但所有的这些只是目标。就其作为目标而言,不会有多大争议,有争议的是应采取什么途径实现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紧迫性。

首先我们应当接受当前的非洲局势。当前非洲有 36 个独立国家,人口从 30 万到 4000 万不等。这些国家不仅语言和政体不同,与非洲以外的国家建立了互不相容的关系;各国之间的经济与其说是互补不如说是相互竞争;各国宪法在形式和复杂性方面存在差异;有些国家有国教而其他国家不信仰宗教。随

之而来的是为建立国家忠诚而付出的慎重的、深入的努力,而这些国家忠诚以对领导者、国旗或其他国家主权标志为中心。这些国家都必须加入到统一的非洲这个大家庭中来。

非洲统一的需求和非洲人民一直要求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的决心抵消了这些阻碍非洲统一的一系列困难和障碍。非洲大陆上弥漫着一种积极的“非洲人身份”意识,已经促进了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已使得很多专门机构开始运作,促使了非洲发展银行的成立。在走向统一的问题上,非洲比其他大洲做得都好。困难和阻碍只会使人们更加坚信所走的道路,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理想的情形是 36 个独立国家的政府都决定实现统一,然后召开大会来制订非洲合众国宪法。之后有一段时间用来承认这部宪法,再进行全洲范围的选举,将会诞生出一个新的国家。

最终我们将必须遵循类似上述的方法,因为实现统一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政治决定。其他经济方面的合作或经济一体化不能代替政治行为,其他方法或许能推动统一进程,但却不能最终实现统一。因为主权国家要上交权力,最后权力不能再下放,而且上交权力没有时间的限制,这就是政治行动的本质。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已经准备好启动这一统一进程,而且坦桑尼亚人民也一定会支持这一行动。

那种认为非洲每个国家和政府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想法是愚蠢的。在泛非会议上的讨论和不同国家的领导人所做的声明,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准备好启动统一进程不是光荣,尚未准备好也不是耻辱。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自己国家社会体制和历史的产物。我们当前所应做的便是接受这一事实和一些其他的事实:有些非洲国家现在还不愿意迈出通往统一的这最后一步。

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非统的计划。确实,拖得越久非统进程就越难实现。放弃非统不仅是那些打算在通过合作或其他方式靠近非统目标后再做最后决定的人的责任,也是现在就准备全心投入非统进程的人的责任。

与此同时,在非统进程中出现倒退或相互疏远也是不必要的。相反,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向实现非统的最终目标努力,可采取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协议的框架内实现泛非合作。非洲统一组织的设立,表达了对非统进程的诉求,其重要性在于该组织为促进非洲进一步合作而设定的原则和所建立的机制。

除此之外,所有不同国家的代表通过国际会议参加联席会议,这有时也会影响非统进程。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但至少可以减少分歧。针对对少数国家产生直接影响的特定问题进行有限的合作经常很有效;对不同区域所采取的协定和方法进行严格审查会发现很多诸如此类的有效合作。

有限的功能性合作会产生巨大的威胁,那就是会对非洲的其他国家产生相反的影响,使得非统的进程更加复杂。同非洲以外的国家和团体进行合作的话尤为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非洲一些国家同欧共体市场建立的特殊关系,尽管这种情况不止一例。

然而,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可以采取措​​施来简化非统进程。当前非洲的民族国家应当成为非统必要成员的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兼或联邦的形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将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该区域至少很快能尝到更大程度的联合和实力的增加带来的利益。第二,这将会减少需要坐下来协商非统最终形式的国家的数量。如果非洲地区不同国家的人民自愿同意组成新的联邦,那么最终的统一代表大会就在 10 个或 12 个代表间产生,而不是在 30 或 40 个代表间产生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最终的代表大会上就更容易达成一致。

当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决定要成立联邦时,这就是我们想在东非达成的目标,但谈判破裂。过去 18 个月以来,三国继续努力实现高度经济合作,却没有采取保证此种合作的政治措施。结果,困难接踵而来,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我们的经济合作比 1963 年的还少。这并不是因为三国之中有的国家开始反对统一,而是因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本地区的发展,并为本地区的发展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对三国人民负责,并确保三国的发​​展,因此三国有必要采取自认为对本国发展必要的措施。结果导致三国之间商品自由流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做必要的决定时出现公然的讨价还价,使得许多必要的服务遭受重创。

对于非洲来说,可从东非的经历中吸取经验:经济合作可以不依赖政治的一体化得以长久实行下去,但是存在一个运动发展或倒退的节点:如果向前就要达成政治决定,如果倒退就会减少经济合作。当非洲各国政府都想要积极参与这个新建联邦国家的经济活动时,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了。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之间的联盟展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尽管

两国相邻且自古以来就有联系,但两国却采取了不同的政府和管理形式、不同的税收和关税政策。两国在政治上决定实现联合,使得他们有能力实现政治一体化,并且在国际上建立统一的新的主权国家。政治上采取这些措施,可以消除新殖民主义者分裂行动带来的危险。桑给巴尔不能成为反对坦噶尼喀势力的大本营,同样坦噶尼喀也不能成为反对桑给巴尔势力的大本营。我们是一家人,因此我们已准备好,并有能力加入实现非统的进一步协商。

有人反对非洲实现联邦制。首先,新建起的对联邦成员的忠诚度会消弭他们对整个非洲的忠诚度,但我们很难会对这一观点信以为真。过去十年来,我们不得不扩大人们对各自部落的忠诚来整合国家。如果非洲联邦不分裂他们的部落,并且从他们的经历来看,非洲联邦比自己的国家要大,那么他们就很容易对非洲联邦表现出忠诚。通过联邦制引进另一种临时方法来实现非统并不太复杂,但或许会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将来可能会阻挠更多人民对联邦的忠诚。

有人认为,因为三级联邦制,通过联邦制实现非统是不可能的,但这种说法同样是轻率的。非洲已存在联邦,这一问题自尼日利亚独立以来就存在,但是人们可以很聪明地解决这一问题,会想到很多替代办法。

当前,反对非洲通过进一步的政治联邦制实现统一的唯一论据是,非洲联邦将成立足够大的民众团体和地域来自行发展可行的经济,但如此一来就阻碍了非洲作为整体发挥其最大潜能。但在实践中是否会成为真的危险,就要取决于打算加入联邦的国家的领导人,取决于其他各国是否愿意就非洲大一统迈出最后一步。但认为实现非统会削弱非洲的这种想法任何情况下都很少见,我们的经验表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弱小的国家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抓住获得别人援助的机会,如果这种情况要求它们同非洲以外的国家建立经济和其他联系的话(而且当前有些弱小的国家正这样做),那么这些小国将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此一来,弱小的国家会继续这样做,并加强与非洲大陆外集团的关系,不敢切断这种束缚自身的纽带,因为它们知道小国不可能孤立存在。如果一个联邦国家可以削弱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那么这将会为非洲实现最终统一做出巨大的贡献。

必须实现统一

就非洲是通过循序渐进的过程还是通过政治决议来实现统一的争论,实际

上意义不大。最终必须要做出一个政治决定,否则非统就不可能实现。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坐等奇迹出现,使非洲发展和独立永远处于危险境地,还是尽我们所能来取得进步呢?答案当然很明确。非洲国家必须相互合作,在一切可能的领域采取统一行动,实现尽可能多的现实目标。最重要的是,每个国家都必须尽自己所能,保证并增进统一精神与感情。

因为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点,只有通过各国协商一致才能实现一个统一的非洲。20世纪我们见证了很多联邦的瓦解,因为它们没有遵循民众的意愿来建立联邦,或者说它们力量太小,不足以抵御国际经济和政治风浪的冲击。

人人都应该明白,实现统一本身并不能解决非洲的问题。非洲统一只会使非洲的问题由非洲来解决。首先,泛非政府的效力将受到限制,肩负的责任重于拥有的权力。在前进的道路上,要一点点地向前移,每一步都要进行组织和讨论,逐渐提升名望——就像美国联邦政府一样,仍然为了其民众及世界的需求不断对政府进行完善。非洲合众国的成立不会为非洲人民开创新纪元,在它成立的那一日,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和美国一样富强,但是我们将会开始努力,相信我们也可能会有繁荣富强的未来。

尽管困难重重,非洲必须实现统一。在实现非洲统一的崎岖山路上,要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眼下的非洲人民,特别是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对前人负责,同时又要不辜负后人,承担起责任。在非洲统一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留下光辉脚印的人,将比那些顽固、心怀畏惧和傲慢阻碍了非统步伐的人得到更好的未来。我相信非洲人民将无愧于摆在他们面前的大好机遇。

ISBN 978-7-5675-3168-0



9 787567 531680 >

定价：78.00 元

www.ecnupress.com.cn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3844729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1东非的种族问题

2在立法会议上的第一次演讲

3 1955年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口头听证会上的演讲

4 1956年在联合国第四委员会上的声明

5 1957年在托管理事会口头听证会上的陈述

6我为何辞职

7国民财产

8非暴力手段

9兄弟越来越多

10坦噶尼喀将由非洲人主导

11水与土地的所有权原则

12坦盟的五位部长

13个人人权

14乞力马扎罗山上的蜡烛

15种族问题需要经济举措

16关于责任自治的提议

17腐败是人民的公敌

18东非联邦

19公务员的非洲化

20非洲人与民主

21卢蒙巴之死

22英联邦、南非和坦噶尼喀

23成为总理后的广播讲话

24非洲的未来

25英联邦成员资格

26“摸索前进”：在基武科尼学院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27领导的作用

28公民权原则

29教育与法律

30独立之挑战

31坦噶尼喀与英联邦

- 32就独立致坦盟的信
- 33接受独立文书
- 34在联合国的独立演讲
- 35辞去总理职务
- 36非洲青年运动的统
- 37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
- 38非洲统一和英联邦
- 39国家伦理的重要性
- 40总统就职演说
- 41非洲合众国
- 42民主与政党制度
- 43第二次争夺
- 44同私人资本投资的关系
- 45泛非主义政策和目的
- 46 1963年亚的斯亚贝巴会议
- 47东非大学落成典礼
- 48平等的含义
- 49浮华之风
- 50独立与团结
- 51在联合国日的发言
- 52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上纪念麦克杜格尔的演讲
- 53国庆广播讲话：1963年12月9日
- 54坦噶尼喀的公民身份
- 55一党制国家委员会指导意见
- 56和解的勇气：纪念达格·哈马舍尔德的演讲
- 57非洲统一组织外交部长紧急会议
- 58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合并
- 59期盼成立东非联邦
- 60对叛兵判决的意见
- 61非洲统一：在非统组织开罗会议上的讲话
- 62大学学院校区的揭牌仪式
- 63马西瓦青年培训中心
- 64私人投资的价值
- 65对剑麻产业的政策
- 66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
- 67对马里的国事访问

68对荷兰的正式访问

69节俭

70非洲统一的本质及其必要条件

封底